

前 言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提一下乔治·台德，是必要的。因为不仅这本书的大部分是他写的，而且本书得以出版，他也許比其他任何人做的贡献都多。1953年的夏天，有一批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其他有关人士举办了一个討論会，乔治·台德在会上所起的作用，我是記得很清楚的。編写这部工人运动史的計划就是在这个討論会上提出的。他的突然逝世，使他失去了目睹本书出版所带来的乐趣，对于我們这些为这项計划而和他一道工作的人來說，是莫大的悲哀。不过，在他逝世的时候，这项工作已經宣告完成；我想这部著作是他最希望获得的紀念品。

乔治·台德生于1914年8月25日，在新堡的德姆·阿林中学获得初級休姆奖学金而进入牛津大学布莱森諾士学院。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牛津大学历史学学位。1936年他在牛津加入了共产党。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將以一个共产主义知識分子（这个称呼有时为人所誤用了，这里是就这个字的最好的意义来用的）的榜样来怀念他。

他在《新堡日报》工作了两年，于1939年初来到倫敦，在《工人日报》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参加了军队，但在臥病了一个长时期之后，终于在1941年1月退伍。他一直沒有完全恢复健康，而且在几年之后，因遭受深重而不断加剧的病痛，使他的体力逐漸衰弱下来。他始終以百折不撓的勇气、毅力和乐观

2099/41

的心情来对待这种病魔的纏繞。凡是他认为对工人运动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他从沒有让自己受到疾病的妨碍。

1941年，他結了婚。我想，他的家庭幸福会大大地帮助他克服疾病的障碍。他所有的朋友一想起乔治在家里和妻子女儿們在一起的情景，便不由得感到衷心的喜悦。

离开军队以后，他在伯納堡中学教了一个时期的书，1943年又回到了《工人日报》。1948年以后，他任报业联合会的副編輯。

除了这本书和許多文章之外（其中有一些是以乔治·阿姆斯特朗的笔名发表的），他还編写了两本書，《倫敦的社会主义斗争》（1948年）和《倫敦各业理事会史》（1950年）。在我看来，后一本是一部小小的杰作，是对一个真正有价值的题目的精闢而透彻的論述。这两本书几乎都是用笔名出版的，这也許正是乔治的与众不同之处。只有那些和乔治在一起工作的人才知道暗藏在他那謙逊和虛怀若谷的作风背后的才干、不断增长的淵博知識和随时准备为他的同志效劳而从不使他們的要求落空的热情。他死时年仅41岁，还有許多他能胜任愉快的工作在等待着他去完成，这时他正开始为这部历史的第2卷搜集資料，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深深感到他的逝世是一个重大损失。

这本书是集体創作的果实，它是在我前已提到的那些討論会的发言的基础上，以后又在各个阶段融合了許多人口头与书面的批評和建議写成的。最后，当然得有一个执笔人，我負責写了本书的头三章，乔治·台德写其余各章。我們的目的是簡略地陈述我們认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前英国工人运动史中的主要特点。如果有相当数目的讀者觉得本书还不失为一篇有用和鼓舞人心的介紹的話，那么，我們的目的是完全达到了。

A. L. 莫尔頓.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一个阶级的诞生	1
1. 人民站起来了	1
2. 英国的雅各宾党人	13
3. 结社法令	26
4. 彼得卢时代	34
第二章 宪章运动	47
1. 改革法案	47
2. 工会与监狱	66
3. 人民宪章的发动	78
4. 宪章运动的复兴和衰落	90
第三章 发展的新方向	104
1. 宪章运动的余波和新模范工会	104
2. 从第二次改革法令到大萧条	117
第四章 帝国主义时代	134
1. 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	134
2. 帝国主义发展的社会影响	145
第五章 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160
1. 从民主激进主义到社会主义	160
2. 社会民主同盟	169
3. 破浪前进	181

第六章 工人阶级再次大步向前迈进	194
1. 新工会运动	194
2. 政治上的觉醒	207
第七章 工党的起源及其早期的发展	218
1. 雇主的反攻	218
2. 劳工代表委员会	226
第八章 社会主义和大动荡时代	239
1. 为社会主义道路而斗争	239
2. 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248
3. 罢工斗争	261
第九章 帝国主义战争	270
1. 战争的性质	270
2. 英国工人与战争	271
3. 群众运动和镇压	275
4. 俄国革命	288
第十章 战后的危机	294
1. 大战结束后的英国	294
2. 罢工斗争	296
3. “不干涉俄国”行动委员会	303
4. 领导问题	307
本书资料来源及参考书籍	319
1. 总介	319
2. 分期介绍	321
索引	327

第一章 一个阶级的诞生

1. 人民站起来了

英国工人运动正式开始于十八世纪后半叶。在这以前，当然也有过许多工资劳动者参加的群众性的运动，但只是到了大约 1760 年以后，工资劳动者才在人数上和团结力量上壮大到够得上称为现代意义的工人阶级。如果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属于近代的范畴，那么，它的悠久性、复杂性以及内容之丰富，都不是其他任何国家可以比拟的。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我们就经过了其他国家很久以后才达到的那些阶段。正像英国资本主义创立了其他国家后来略加修改而争相仿效的范例一样，英国工人阶级——英国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的经验成了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研究的典范。

总的说来，十八世纪是资本主义稳步发展的时期。在前一个世纪里，英国的革命斗争已为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赢得了发财致富所必需的国家、政府和政治制度。在 1688 年革命的最后阶段，捍卫小生产者利益的群众力量被击败以后，强大的辉格党地主家族便与伦敦以及其他大城市的富商巨贾和金融资本家结成了联盟，占据了牢不可破的巩固地位。此后几乎有 100 年之久，政治成了这个特权集团的外人不得涉足的猎场，政治斗争基本上成了为分赃而进行的私人斗争。

这个时期，貿易迅速地发展着，特别是利潤丰厚的貿易和对东西半球殖民地的掠夺，最明显的是对印度的掠夺。由于公地的圈占和其他因素把农民分化为拥有资产的农场主和无地的工资劳动者，农业日益資本主义化了，它經過了一系列的技术革新，既提高了生产，也增加了利潤。但是，农业方面的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剩下的小农階級和大量仍然保有土地使用权或小块土地的农村居民的破产。接連不断的战争喂肥了金融資本家、商人以及日益发展的陆军承包商和軍火制造商階級。

不断积累的資金具有流向工业的趋向，特别是由此受到刺激而发展起来的那些工业：如鋼铁、煤和造船业，以及如棉花和陶瓷这类新兴的工业。城市不断在扩大，其中最显著的是倫敦，在十八世紀中叶，倫敦已經有 50 多万居民，約占全国人口的 $\frac{1}{10}$ ，城市粮食和消費品的供应本身成了主要的企业，它为农产品和消費品提供了一个日益扩大的市場，同时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海陆运输体系。

正是在資本高度集中的新工业以及在运输业中，我們看到了工人階級的明显的发軔。东北部地区的矿工和船夫，中部地区的铁工，倫敦和布利斯特耳的碼頭工人、水手和运煤工人，无疑地已經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了。但是，不管从哪一方面來說，在十八世紀中叶以前，他們在人数上还没有多到能够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即使是現在，我們也必須抱謹慎态度，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工人階級只不过是在某些地区和某些工业中开始出現。大部分生产仍然在作坊里进行，在那里，实际的生产者仍享有不同程度的独立。举例來說，毛紡业就是这样情况，它仍然是仅次于农业的最大个体行业。实际上，許多从事这种作坊生产的人很早以来

就是工资劳动者，而且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已经成为正常情况了。羊毛和棉纱的手工纺织者，莱斯特织袜工，设菲尔德的剪刀匠和黑乡^①的制钉匠，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被卷入了这种变化中。这种变化意味着工人独立性的逐渐减少和生活水平的日益下降（在许多情况下，是急速下降）。比如，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在1819年彼得卢屠杀事件^②发生的时候，兰开夏和西里定城市中的广大手工纺织业者都是工资工人了，而且实际上是在那些年里骚动的领导力量。他们的地位使他们难以成立有效的工会组织，但是也许正是由于同一原因，他们才采取了顽强和激烈的政治激进主义。

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手工艺工匠进行个体生产，他们最多只带上一两个学徒或助手。要这些有文化、自恃有手艺而常常是反对国教者的技术工匠体会到自己和矿工、码头工人或往后的工厂工人彼此休戚相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所有这些工人的溶合和转变成一个单一的阶级，正是本书第一部分的中心内容。

1760年前后，英国的情况开始发生巨大的变革。百年来阶级力量的均势宣告结束：政治开始活跃，新的矛盾发生了，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阶级出现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代表着“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永久联盟”（马克思著《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年巴黎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1页。）的强大的辉格党的统治，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并不是来自左派，而是来自乔治三世和他的“尾巴们”所领导的右派，他们开始插手于当时形成

① 黑乡(Black Country)，英国中部地区的煤铁矿区。——译者

② 彼得卢屠杀事件发生在1819年8月16日的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当时有6万名群众公开举行集会，要求废除谷物法，英政府军警对群众进行攻击，伤400人，死11人，造成血腥的镇压事件。——译者

議會政治的有組織的腐敗現象中。这种干預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由于新階級力量的成长已从内部分裂了輝格党，而所謂牢不可破的統治集团已不复存在了。这种干預所造成的后果是进一步瓦解了輝格党，并把中等階級和手工艺工人在大革命后第一次推上了政治舞台。于是一个真正的左派出现了。同时，在和英王的斗争中，輝格党不得不違反本意地重彈几乎已被遺忘的百年前的“昔日光荣斗争”的老調。然而出乎他們意料的是，这些老調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反应，人們并不表示欢迎。手工艺工匠对几百年来政治为少数特权者壟断的現象产生了疑問。接着工資工人也提出同样的疑問。

当然，这并不是說，自下而上的新的騷动，只是或主要是上述危机所造成的。在整个十八世紀，一股热力一直在内部存在着，它时常表现为騷乱、纵火或狂热的监理教派运动。十八世紀后半叶监理教派的惊人的成功就是广大人民的不滿的表示，而且这种不滿仍然在寻求真正的表达方式。上层的危机剛好在工人階級开始形成的时期出现，这給人民的不滿情緒以一个寻找它所需的出路的絕好机会。所以，在这个时期我們能够看到工会和政治运动在“下层階級”中飞跃发展，并不是偶然的。

大約在1760年以后，斗争更加尖銳化了。直到这时，物价一直是稳定的，甚至实际工資还略有增长，虽然和資本家或地主的利潤和地租的增加比起来要小得多。1760年以后，粮食价格开始上漲，而实际工資則下降，特别是那些不熟练或半熟练的工人下降得最多，他們的全部工資差不多都要花在粮食上。1756到1783年間的时战时和的局面，使就业情况越来越不正常，而当时集中在倫敦和各大商埠的人数不断增加的碼頭工人和搬运工人等的就业情况尤其是不正常。因而約翰·威尔克斯才能在倫敦河畔的工人群中，找到他的坚决的支持者。

威尔克斯是一位伦敦富商的儿子，他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领袖；在他的事业中，我们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到这个时期的许多主要特征。最初他是作为查塔姆和坦普耳勋爵所领导的议会集团的追随者参加政治活动的。在他的报纸《北方不列颠人报》中，威尔克斯毫不客气地攻击了乔治三世和他的政府，接着这个党派斗争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要求公民基本自由权的斗争。后来他发现他的那些贵族保护人既不关心他个人，也不关心他所提出的原则。他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并被迫流亡，在他回来以后，又被监禁了一个时期。在这些事件的过程中，威尔克斯逐渐发觉他的真正的支持者是在伦敦的群众中，在每一阶段他都能从他的追随者那里学习到一些东西。不久威尔克斯就成了一个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真正的民主改革运动的领袖。当时有一份记载说：

“有人说威尔克斯先生在圣詹姆斯宫附近的敌人是45，拥护者是15；在伦敦商业区他的拥护者是45，敌人是15；而在华宾他的坚决的支持者和敌人之比却是45比0了。”

1768年5月10日，一大群威尔克斯的支持者在圣乔治广场举行示威，要求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示威者遭到军队的袭击，结果死6人伤多人。“圣乔治广场的屠杀事件”使整个伦敦沸腾起来。接着发生了一连串半政治性和半经济性的罢工。其中最积极的是海员、码头工人和运煤工人。但纺织工人、成衣工人、木匠和其他一些行业的工人也都参加了。这一运动由伦敦蔓延到附近各郡，北面远达兰开夏和约克郡。在1774年的选举中，威尔克斯作为一个早期激进党的领袖，提出政纲，参加竞选，他的政纲包括短期议会，取消官吏和领恩俸者，更平等和更广泛的选举权，保护英格兰、爱尔兰和美洲人民的权利。在这个政纲下，约有12位竞选者当选了，特别是在当时拥有众多选民的选区很少的情况下，能有这

么多人当选,的确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从长远看,更加重要的是,在这次运动中,发展了许多至今仍然具有极高价值的斗争武器和方法。自从平均派^①的时代以来,简直不为人们所知的通俗报刊和小册子被大规模地采用了。另一种再度出现的、平均派所曾经用过的武器就是群众请愿。就像后来的宪章派派遣他们的使者一样,他们派了许多流动演讲员到伦敦和外地城市中已严密组织起来的公众集会去。要求议会代表明确保证支持具体政策的做法,开始表达出议会成员是人民的代表而不仅仅是个不負責任的个人这一民主原则。这一时期中还成立了“权利法案协会”。这个协会虽然存在不久,而且是中等阶级组成的,却是后来出现的一系列最后产生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先声。

虽然在戈登暴动事件(1780年)^②切断了威尔克斯和他的最忠诚的追随者——伦敦群众——的联系以后,他已不再是一个起积极作用的政治力量,改革运动仍然在继续发展着。几年以后,甚至连统治阶级的主要政客们也发觉有必要把自己装扮成改革派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真正的激进派,其中有些人和后来的英国雅各宾党人联合起来。这些人中有威尔克斯过去的最得力的助手霍恩·图克和约翰·杰布博士;第三个是卡特赖特少校,直到1832年逝世为止,他一直都很活跃。1776年他写了一本题为《抉择》的小册子,实质上,这本小册子首次明确地概括了指导此后75年中的历次群众运动的整个纲领。卡特赖特在小册子中要求议会每年选举

① 平均派(Leveller)是英国十七世纪70年代清教徒革命时期的一个革命的政治和宗教派别,主要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印成大量的小册子散发。——译者

② 戈登暴动开始于伦敦,目的在反对一项取消对天主教徒的某些合法限制的建議。接着发生了大规模的纵火和掠夺事件。作为郡长,威尔克斯积极参加了镇压这一暴动的工作。

一次，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用投票方式选举，平等代表权和議員支領薪金。上述三人是“宪法知識促进协会”的成員。另一个完全不同但在組織上有些重叠的团体是由非国教的激进主义者組成的。其中以非国教牧师普賴斯和科学家普里斯特利为最著名。他們組織了“倫敦革命协会”，这个团体实际上远比它的名字所表示的为穩健。

所有这些都是中等階級的，有时甚至是貴族領導的中等階級組織。这种中等階級的激进主义，主要是十八世紀末期迅速发展的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的著名，因而在这里只要简单地介紹一下就行了。它的主要特征是大工业的增长，它在几十年的時間內挤掉了过去曾經占优势的小生产，使小的和程度不同的独立生产者轉变为与生产工具完全脫离关系的工資劳动者。一个龐大的新的世界市場出現了，它要求源源供应日益增长的商品。結果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組織形式相继在各种工业中出現了。

1750年前后，采用了焦炭炼铁的决定性的步驟。接着，在十八世紀的最后25年間，新的紡織方法革新了棉紡織工业，不久以后又革新了毛紡織工业。蒸汽的利用大大地增加了大量生产的可能性，并导致了机器制造业的产生。公路、运河以及后来的铁路和輪船的建造，首先沟通了国内市場，随后又为英国商业开辟了世界市場。工厂生产把成百上千的工人集中在一个大企业內。

伴随着这一切，人口急遽地增长了。在1801年进行第一次戶口調查时，人口实际上已达到1,050万，50年后，接近2,100万。人口不仅是絕對增长了，而且分布状况也完全改变了。在十八世紀中叶，約有半数人口散处在乡村地区，但是到了1851年，乡区的人口竟不到总人口的 $\frac{1}{4}$ 了。新的城市出現了，本来很小的城市人口也急遽地扩大起来。这一点可以下列数字证明：

	1801年	1851年
曼彻斯特	35,000	353,000
里昂	53,000	152,000
谢菲尔德	46,000	111,000
伯明翰	23,000	181,000

大部分这些城市的特点之一就是绝大多数居民为工人阶级，在較老的城市里，則是工人阶级、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杂居在一起。現在出現了几乎清一色由工人組成的大工业城市。而在最大的城市中，工人被限制在令人作嘔的骯髒的貧民窟內，和那些有錢的居民住宅区截然分开。

的确，工业革命不仅是技术革命，也是一种产生新阶级关系的社会变革。馬克思說：

“……………手工工場才第一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規模，以致后来让位給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厂。居民中的許多阶级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新的生存条件和新的要求的新阶级。一个新的更强大的资产阶级誕生了；当旧的资产阶级在和法国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新的资产阶级已在夺取世界市場。这个阶级变得如此神通广大，以致在改革法案还没有把政权直接轉交到它手中就能强迫敌手頒布几乎仅仅对它有利并滿足它的要求的法律。”（馬克思著《評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討論〉1850年巴黎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2頁。）

这个新的资产阶级（企业家、商店主和跟随着他們的小商人）的产生，导致了十八世紀末叶十九世紀初期中等阶级的激进主义的出現。这个新兴资产阶级原来是不属于从1688年以来就壟断着国家政权的輝格党統治集团的。但是到了十八世紀末，这个阶级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而迅速地壮大起来，要求分享政权和胜利果实。正如我們已见到的那样，它提出了一个改革议会的广泛的民主纲领。

如果早期的激进主义仅仅如此，它的历史当然就很简单。但是还有許多其他的重要团体没有被包括进去，特别是手工业者和产业工人。所以早期激进主义的历史也是一段相当复杂的历史，它包括这些非特权阶层相互之間不断变化的关系和一系列經常变动和敌对的联盟。这一段历史显然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首先，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前，领导权和主动性一直是出于中等阶级，但在他們骚动的过程中，唤醒和吸引了大量的工人，特别是在倫敦。

中等阶级对在法国发生的事件和随之而来的英国下层阶级的激烈反应感到惶恐不安，所以在1789年以后他們就开始后退了，尽管起初只是逐渐撤退。这个时期的激进主义，即英国的雅各宾派的骚动，几乎完全是一个下层阶级的运动，同时这个骚动从倫敦扩展到全国許多工业中心——諾威治、伯明翰、設菲尔德以及兰开夏、約克郡和苏格兰的紡織业区域。在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期間，整个有产阶级团结一致反对国内外的雅各宾党人。

在最后于滑铁卢之役击败了拿破侖和反动势力在欧洲暂时复辟之后，开始进入第三阶段。这时比以前更加强盛的中等阶级，再度要求在国家政权中占一席。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也比过去壮大和成熟了，他們开始注意到，他們的敌人除了旧贵族，还有直接剝削他們的工业家。因此，在1832年选举改革法案获得通过以前的这一时期，他們的关系更为复杂多变，虽然大多数工人阶级还是跟着中等阶级走，但是他們越来越怀疑和犹豫了。

从1832年开始进入第四阶段，当时中等阶级已达到了他們的

主要目的，因此对他們的工人階級同盟軍的欺騙也日益暴露出来了。在1832年以后，很快就进入到宪章运动时期，在这个运动中工人孤軍作战，反对其他一切階級，他們希望夺取政权，以达到改变整个社会結構的目的。中等階級激进主义在这时期虽然坚持了下来，但其目的已經改变而且更为狭窄，对群众的吸引力也更小了。

不論什么时候經常注意中等階級激进主义的发展和下层階級政治和經濟力量的日益壮大是很重要的。現在我們就后者来談談。

关于十八世紀工会主义的起源我們知道很少。那时的工会活动是不合法的或者只是半公开的。当时也許留下了一些記載，但現在都已失傳了。除了在当代文献中可以看到攻击它的片言只語外，沒有其他可資参考^①。但仍然有足够的证据來說明当資本主义的发展使工人失去了生产資料以后，工会和劳資斗争是很頻繁的，而且是在不断地扩大。在这个时期，工資劳动者和雇主之間的关系漸漸发展成为典型的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关系。虽然它仍然常常是作为一种原始形式存在着，而且夹杂着个体小生产者的关系。

在本世紀末那些正沿着資本主义道路向前发展的作坊或家庭工业中，我們可以发现有大量工会活动的证据。必須記住，这类工业通常仍然是农村或半农村規模的。它們經常是集中在人口稠密的比較大的村庄里，和現今的許多矿区差不多，村子里的大多数居民都在同一个作坊內为一个或少数几个資本家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們进一步的联合和統一行动就有了可能。这往往引起了罢工，甚至在沒有永久性工人組織的地方也是如此。这种罢工經常伴随着規模相当大的騷动、纵火和毀坏机器等事件——这些行

^① 在巡迴裁判所和区域法院的記錄中有很多有用的參考。

为既可向雇主施加压力，也制止了可能发生的对罢工运动的破坏。

在许多工厂和地区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斗争：英格兰西部成衣业雇主常常抱怨说，工人经常采取联合行动，举行罢工，而骚动则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诺丁昂花边编织业在1783、1787和1791年以及在其他年份中都发生了骚乱。诺威治毛织区具有骚乱的悠久传统和与破坏罢工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东北沿海地区的矿工在1710、1744、1750、1765、1771和1794年都发生了骚动或罢工，其中有几次，存煤被烧掉，矿井机器也被捣毁了。至于伦敦的工会活动，我们在威尔克斯的起义中已经讲过。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看到当初的工会组织是很原始的，但具有强大的力量和气魄。因为没有正式机构，缺乏罢工经费，所以就必须采取在短时期内能产生最大效果的骚动和破坏手段；罢工如果不能迅速取得胜利，胜利就永远没有希望了。

在一篇关于1751年莱斯特郡梳毛工人的组织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似乎比较完善的工人组织——这个记载概括了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几乎所有雇主对工会的看法。这篇文章告诉我们梳毛工人的情况：

“在几年之后自己建立了一种团体（虽然没有立案）；他们的目的首先是照顾有病或失业的穷困的弟兄。他们每星期聚会一次到二次，每个人捐两个到三个辨士，放在盒子里做为这个团体的基金。当他们有了一定的力量之后，他们就向他们的雇主也对他们自己立下章程——就是：任何人不得在低于两先令梳一打羊毛的条件下受雇；主人不得雇用他们组织以外的人，如果他这样做，他们大伙就联合起来不再替他工作；他要是雇用了20个这样的人，他们就要将他们全都赶出去。他们常常这样做，但还不满足，他们甚至凌辱受雇的老实工

人，毆打他，打坏他的梳盆，毀掉他的工具。他們更进一步在各地互通声气，在整个国家中形成了一个統一的团体。为了坚持他們的要价，他們宁願懶惰拒絕工作。要是他們的組織中有人失业了，他們就給他一張車票和一些錢，让他到邻近的有他們的組織的城市去找工作，在那里也有人供养他。这样他可以跑遍全国受到各地組織的照顾，而不用他自己花一文錢或干半点儿活。紡織工人也学他們的榜样建立了这种組織，不过还没有扩大到全国范围，只限于他們工作的地区。”（《商界状况簡介》，1741年。引自韦伯夫妇著《工会史》，第36—37頁。）

这些萊斯特梳毛工人的組織似乎是介于我們已經讲到的那些团体和城市手工艺工匠的俱乐部之間的一种組織。人們过多地注意了这些俱乐部，而忽略了我們方才叙述的那些組織較松懈但战斗性却較强的团体，工业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新工厂企业中的工会組織便是从这些团体中发展出来的。

同业俱乐部通常是一种极小的团体，只由一个城鎮或一个地区的同业工匠組成。它們往往是友誼社团或社交俱乐部的性质，很少有其他的作用。但是每当增加工資或改善工作条件的联合行动可能遭到国家反阴谋法迫害的时候，这些俱乐部就形成了一种最好的合法的掩护，甚至早在1799年結社法令通过以前就是如此。这些俱乐部当中有一些具有悠久的历史：倫敦帽商俱乐部可追溯到1667年，在1771年我們发现除了在倫敦和騷斯沃克以外，它們还在12个以上的小城鎮中建立了地方工会俱乐部联合会。这时同业俱乐部已經开始发展成同业工会了。在其他行业中，这种組織在成衣匠、水車匠、細木工和印刷工人中也是很盛行的。利物浦的造船工人和設菲尔德的剪刀匠是組織得最好的团体。1790

年，“設菲尔德之虹”登載了一則反映雇主怨气的典型报道：

“磨剪刀的和其他工人们参加了非法的社团，他们企图增加工资。”

如果前面所讲过的那种团体可以有资格称得起恩格斯所说的“战争学校”的话，那么这两种类型的团体就可以叫做“政治学校”。在这整个的时期中，工人被迫采取了政治斗争。政府借口“阴谋”对工人经常进行迫害，一再企图实施当时已经和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工资率和学徒制的旧法律，以及法律和裁判官毫不掩饰地维护雇主的利益，这些事实使得工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国家掌握在他们的阶级敌人的手中。因此，议会改革对他们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为群众取得政权（至少是一部分政权）的一个具体步骤了。

2. 英国的雅各宾党人

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加强了这种不断发展的政治动荡。政府当局对革命战争的无能为力充分暴露了它本身的腐朽不堪。同时，殖民者提出由于议会中没有他们的代表不能缴纳赋税，并要求有权利抵抗暴虐的政府，这些不能不影响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成千上万的居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也是被压迫者，并且深知他们也是没有代表的。

工会俱乐部开始对那些已经懂得关心政治的人增加了政治课题，这些俱乐部是从威尔克斯时代到圆厅党人^①时代一切改革运动的温室。兰开夏纺织工塞缪尔·班弗德的自传《一个激进主义

^① 圆厅党为1831年初英国罗维特和欧文派创立的，正式名称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全国联盟”，由于他们经常集会地点在一个圆厅里，因此被称为圆厅党人。——译者

者一生的变迁》，是早期工人阶级运动最生动的叙述之一。自传把1816年左右在俱乐部里讨论政治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对于十八世纪最后20年的描述在某些方面大概是真实的。

“每个人面前都放有半品脱黑啤酒；许多人同时发言，嗡嗡的声音和混乱会给你这样一种印象，就是那里的评论家比思想家要多得多——说话的人比听众要多得多。顷刻之间，有人喊‘肃静，开会了’，于是，嘈杂的声音低了一点，接着主席客客气气地以恭维的言词介绍一位外来的或本地的讲演人。随着就是‘静点，静点，不要说话啦！’的喊声，伴随着鼓掌声和以指节敲击桌子的响声，敲得半品脱黑啤酒杯在桌面上直跳。然后是一篇演说，对某一位兄弟演说家或有名望的政治家赞颂一番。其次是通过赞成议会改革的决议，一个人会发表一篇演说赞成这一决议，另一个人对若干细微末节提出修正。然后又是一个附议，某位情感容易激动的人破坏了秩序，五六个人站起来对他批评，又有十多个人把他们压服下去。人们指手划脚，喊声越来越高。”（《一个激进主义者一生的变迁》第1卷，第23页。）

也许这种混乱情况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工人们正在努力学习着如何进入一个新的国家，学习着用一种新奇的言语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上一世纪的政治沉默正让位给一个紧张的政治活动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英国的工人阶级形成了，并且第一次郑重地出现了。

美国革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每个人都受了它的影响，但是对于不同的阶级其影响的性质却大有区别。对于统治阶级和它的寄生者，它是一个灭亡的标志；标志着他们的垄断权力和这种权力所带来的利益即将结

東。即使他們本身能够得以苟延殘喘，他們唯我獨尊的时代則已成过去，而且这种苟延殘喘仅能以接連不断的战争和最最圓滑的阴谋詭計的代价来換得。對他們來說，革命是終止內部紛爭和團結一致的信号。皮特政府和他的后继者就是这种統治階級巩固團結的产物，这种政府从对内意义以及对外意义上說都同样是一个战时政府。

但是，那些仍然处在特权阶层以外的資產階級集团的反应却和他們大不相同。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曾經支持过早期的改革运动，許多人起初由于相信革命会促进他們的利益而欢迎革命。但是，当革命具有日益增长的群众性的时候，当农民开始用武力夺取土地的时候，当封建王朝被推翻的时候，当代表工人群众和中等階級的下层最先进的部分的联盟的雅各宾党取得了政权的时候，他們的態度就改变了，絕大多数投到皮特的陣营中去了。現在他們的最終目的只是在政治圈子里為他們自己謀得一席之地。当1793年皮特能够向年輕的法国共和国挑起战争的时候，他获得了几乎所有有資產者的支持。

只有工人和独立的手工艺工匠們全心全意地拥护法国革命，現在他們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政治組織开始作为领导力量出現了。也許有3本著名的书可以說清楚明了地反映了这些不同的反应。1790年，像皮特一样一开始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溫和的改革者的埃德蒙·伯克，出版了他的《法国大革命回顾》。在这本书中，他不但攻击了法国革命，而且也攻击了整个民主概念。这本书曾經轰动一时，而且引起了許多回击。詹姆斯·麦金脫希爵士的《为法国辯护》也許是这些书中在文学界最負盛名的一本。然而，到了1796年，麦金脫希已經完全拋棄了他的早期的激进主义，正如赫茲利特所說：

“麦金脱希改变了信仰，他不仅仅仿效伯克先生的优容举止和严肃态度，而且仿效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和他的实际的看法。”（威廉·赫兹利特著《时代精神》，《詹姆斯·麦金脱希爵士》。）

麦金脱希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印度审判官的职位。

托姆·潘恩在其所著的《論人权》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和影响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潘恩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起过领导作用，并且认为法国所发生的事情是争取民主的一个新的阶段。《論人权》前一部分是对法国人民所作的辩护，也是对伯克的人民除了遵守法律以外与法律毫无关系的論断的有力的駁斥。他在书的第二部分中，給了英国盛行的腐敗的买卖市鎮議員席位制度以毁灭性的打击。潘恩捍卫了共和主义和革命的权利，并嘲笑君主政体和它的拥护者說：

“不难想像到，那些和君主制度利益攸关的人如官儿們、領恩俸者、內室侍从、厨房侍从、厕所侍从以及上帝才能知道的另外一些人，他們一定能够找出和国家所支付給他們的薪俸一样多的为君主政体辩护的理由。但是如果我問农民、制造业主、商人、小販、工匠和各行各业的人，以至于普通的劳动者，君主制对他有什么好处？他一定說不上来。如果我問他君主是个什么人，他一定說他大概是个吃闲飯的人。”

这是一种新的声音，該书在談到那些根深蒂固的积弊时是滿怀憤恨和輕蔑的，它所用的語言和口吻就是最簡單的人也能理解。《論人权》詳細地证明了，一个民主的爱好和平的政府，裁減了軍隊、取締了非法利潤和尸位素餐者以后——这些开支侵吞了大量的国庫收入，就可以廢除間接稅；并且，在采取了累进所得稅以后，它就能够提供充足的資金，以支付养老金、普及教育和許許多多不然就要

等到一百年后才能办得到的社会事业。这种简单的政治的算术越是容易被人民理解，就越是使富人害怕。《論人权》首次揭示了民主制度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是群众借以获得富裕生活的道路。这本书虽然很快就被禁止，但它已经成为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教科书。这本书在3年之内就销售了20万册，还被翻译成了威尔士文和苏格兰高地人的文字。

1792年，“下层阶级”的激进运动建立了它自己的最初的组织——“倫敦通訊社”。此外还有其他团体如“宪政社”和“人民之友社”，但它们在性质上都是中等阶级的团体，它们用高额捐款的办法有效地拒绝了工人参加。1792年1月25日，有8个工人在拜耳酒店开会，决定成立“倫敦通訊社”，每周捐款1个辨士，他们把8个辨士正式缴纳给当选为书记和司库的托马斯·哈代。哈代是苏格兰的一个制鞋工人，在倫敦住了18年，美国战争期间才开始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从杰布和卡特赖特的小册子中受到了教育。他不是个演说家，但已经是一个有卓越才能的组织家了。他建议通訊社以30人为一个分社。社员人数增加以后再成立新的分社。组织发展得很快，1792年底该社社员总数达到了3,000人。

它的主要纲领是男子普选权和平均代表权。8月该组织发表了一篇“公开宣言”，指出一个公正的具有代表性的议会能够为普通民众排除残酷的压迫；就能削减抚恤养老金^①、缩减军队和秘密警察以减轻人民负担，简化法律和归还圈占人民的公地。一个设菲尔德工人的话更透彻地说明了这种改革同日常生活的关系。当有人问到这个社的目的时，他回答说：

“启发人民，将道理告诉人民，把他们的一切不平和苦难的根源向他们讲解清楚。告诉他们由于什么原因，什么道

^① 当时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受抚恤养老金。

理，一个人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 13 或 14 小时，一星期工作 7 天还不能养活他的家庭。这就是我对它的目的的理解。”（《国家审判》第 24 卷，第 630 段。引自布朗著《法国革命对英国历史的影响》，第 62—63 页。）

設菲尔德的确走在倫敦的前面了。这里的“宪政社”是在 1791 年未成立的，它的社員是小作坊主和受雇的剪刀匠。哈代的分社組織計劃可能就是仿效这个机构的。1792 年 4 月，“宪政社”的書記塞繆尔·艾希頓写信給哈代建議彼此建立联盟关系，声称自己拥有好几千社員。設菲尔德仅仅是这些社团的所在地方之一。不久它們就和“倫敦通訊社”建立了联盟，于是“倫敦通訊社”成了这个松散的联盟的中央领导机关。最引人注目的是，許多改革运动的据点都是工会长期活动的地方。諾威治的紡織工很快就建立了“諾威治革命社”的分社网，而諾丁昂的花边編織工与较为进步的中等階級改革者也結成了同盟，建立了一个“宪政社”。1796 年他們把一株“自由树”强栽在諾丁昂的市集上。甚至到 1802 年，巴士的獄陷落周年紀念还是用椅子抬着激进派議員唱着馬賽曲在全城游行来表示紀念的。事情很明显，如果不是工人階級已經拥有几十年以上的丰富經驗，1792 年英国雅各宾組織絕對不可能有那样迅速的发展。

工人階級这一新兴的激进主义使政府慌乱成一团。它連忙采取了一整套的镇压手段。首先是大屠杀。1791 年 7 月 14 日攻击科学家普里斯特利和其他伯明翰的激进主义者的住宅的“教会和国王”暴民事件^①，并不像通常所說的那样是憤怒工人的自发行动。它是統治階級拿来恫赫它的反对者的处心积虑和經過周密計

^① 1791 年 7 月，王权党的群众在官吏的默許纵容下，焚掠伯明翰等地激进主义者和反国教徒的住宅。——譯者

划的陰謀，这个陰謀受到包括乔治三世在內的許多領導人物的支持。乔治三世写道：

“对普里斯特利是他和他的党所灌輸的教条的受害者这一点，我不能不感到快慰。”（布朗著《法国革命对英国历史的影响》，第81頁。）

类似的騷动在其他一些城鎮里被煽动起来，以致許多中等階級的改良主义者吓得不敢再从事政治活动了。

1792年政府进一步打击工人階級的改良主义者。首先，酒店主人在政府的压力下，拒絕將房間借出供政治集会之用。接着是对托姆·潘恩以顛复性的誹謗罪起訴——罪名的根据是《論人权》一书中的几段文字，其中之一是：

“英国将要哭笑不得的日子已經不远了。因为英国从荷兰、汉諾威等处請来一些人^①，每年要花100万鎊来供养他們，但他們既不懂它的法律、語言，也不了解它的利益。論这些人的才能，連充当一个村鎮的警察也难以称职。”

潘恩逃到了法国，險些遭到逮捕。12月进行缺席审判，他被判有罪，并宣布他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继判处潘恩之后，接着是对“叛乱性”书报的印刷人、出版者和經售者的打击。在这一問題上，政府得到了一个非官方的但确系受命出面的团体的协助，即“保护自由和財產协会及反对共和派和平均派协会”。甚至早在这个时候，所謂“自由世界”的騙术就被使用了。而这一次便是由一个民众团体来使用的，而这个团体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监督官吏們履行他們拒絕給工人階級以任何自由的义务。

戏剧的第二幕发生在苏格兰。在这里，統治階級的特权集团

^① 指从荷兰和汉諾威等处迎奉来的英王及貴族。——譯者

的圈子比倫敦还要狭小，因此对議會改革的支持相应地就更加广泛了。恰巧在审判潘恩的时候，苏格兰的雅各宾党人在爱丁堡举行了一个大会。“大会”(Convention)这个名称听来确实有一点法国味道，但事实上會議的議程是相当有分寸的：会上宣讀了“爱尔兰人大同盟”的来信，这封信祝賀了苏格兰以“一个統一民族的团结和力量”进行改革的願望，但这封信并没有被正式接受。可是这种温和节制并没有使苏格兰改革主义者的領袖托馬斯·繆尔免于被捕和受到审判。他被控的主要罪名是推荐托姆·潘恩的著作和宣讀“爱尔兰人大同盟”的“叛乱性的信件”。

审判繆尔和其他苏格兰的改革主义者的布莱克斯斐尔德大法官表露出一种公然的偏頗行为和对于慣常的法律手續的違反。而这种偏頗和違反是自从杰弗雷斯法官和“血腥的巡迴审判时期”以来，在英国法庭里从未見过的——也許这是因为自从上次偉大的塞儿穆尔群众起义^①失敗以后，英国的統治階級第一次感觉到它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的緣故。在这些审判的过程中，沒有证明，甚至沒有提出有哪些叛乱行为。政府控告的理由是：即使他們所采取的手段是和平合法的，这种改革議会的企图本身也是一种叛乱行为。正如布莱克斯斐尔德所說：

“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完全像一个社团一样，而在这个

^① 塞儿穆尔(Sedgemoor)群众起义：1685年7月蒙默思公爵(Monmouth)于新教派人的拥护下在英国登陸，企图推翻天主教派的王室詹姆士二世，他受到工人、小自耕农和西部織工的热烈欢迎，而民权党的富豪和紳士們并不支持他。所以很明显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最后，起事群众打算夜襲塞儿穆尔的敌营失敗，虽然他們作战很英勇，但終于为王家騎兵所击潰。接着便是追捕和屠杀。当时臭名远揚的大法官杰弗雷斯(George Jeffreys)主持此案的审訊。在“血腥的巡迴裁判所”(Bloody Assize)中，經他手被处絞刑者达320人，流放者841人，被投入監獄和受鞭笞者不計其数，蒙默思本人也被捕斬首。——譯者

国家(英国)里,政府是由有地产的人组成的。只有这些人才享有被代表的权利。”(《国家审判》第23卷,第231段,引自布朗著《法国革命对英国历史的影响》。)

謬尔被判处14年的流刑。尽管如此,苏格兰的激进主义者又召开了第二届大会,“倫敦通訊社”的两个代表約瑟夫·哲杰德和莫里斯·馬格罗特,以及“爱尔兰人大同盟”的3个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是1793年11月举行的,但很快遭到了迫害。馬格罗特、哲杰德和斯开尔文等被捕。他們也是由布莱克斯斐尔德审判的,布莱克斯斐尔德这一次以助理檢察官的身分参加审判。这次审判最精彩的場面也許要算他在哲杰德說耶穌基督也是一个改革者时所作的回答了:“正是因为他喜欢小題大做,所以才被絞死的”。所有这些受审者都被判处14年的流刑,在起解的航程中他們受到难以形容的折磨,以致斯开尔文和哲杰德到达波坦尼灣不久就死去了。謬尔被一只美国的武装民船所救护,最后到了法国,也在1799年死于法国。

这些判决和对大会的镇压,引起了工人和苏格兰中等阶级中許多人强烈的憤懣。在人們中間广泛地得出这样的結論:如果和平宣傳改革是非法的話,那么唯一行得通的道路就是武装起义了。成群成群的人們在秘密地进行訓練和收集武器。但不幸的是,他們之中混杂着一些政府的暗探和特务,有时这些暗探和特务故意挑起事端,为的是向政府檢舉,从而領取賞金。罗伯特·瓦特就是这种事件中的一个例子,他和其他几个人一同因叛国罪被捕,可是后来发现他原来是政府的暗探。在审判时他辯护說他一直在从事暗探工作,但是檢察官宣称,他在被捕之前一个时期就已被解雇,并且事实上他已經轉变信仰,和他所要偵查的那些人“沆瀣一气”了。不論事情的真相如何,瓦特还是于1794年10月被处絞刑。

可以肯定，英国政府大约从那时候起，就开始有组织地利用暗探和煽动者来破坏工人阶级的运动了。

这种在整个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事件，仅仅是加强国家镇压机器，镇压劳动人民的总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它是一个政策的一部分，这个政策包括：运入外国雇佣兵（通常是德国人），建筑兵营使军队和市民隔绝，建立义勇骑兵作为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另外如通过六条法令、结社法令等一整套的压制性的法令，以及为罗伯特·皮尔爵士和他的继任者们所设立的官僚警察武装等等。总之，这些措施反映了当工人阶级逐渐发展成熟时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对苏格兰改革主义者进行镇压之后，接着是对其中央机关“伦敦通讯社”的直接进攻。1794年5月，“伦敦通讯社”的7位领袖和另外一个改革组织“宪政社”的6位领导人被逮捕了。他们中间最重要的人物是托马斯·哈代，霍恩·图克和约翰·特尔瓦尔。哈代是“伦敦通讯社”的书记，是公认的伦敦激进手工艺工匠的领袖。图克是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在工人运动中有悠久的历史和很高的声望，并且是“伦敦通讯社”与中等阶级改革社团之间的主要联系人。特尔瓦尔是这一运动的卓越的发言人和演说家。他总是喜欢做出夸张的姿态：审判他时，一个暗探作证说，曾经看见他打断一只啤酒瓶子的头颈说，“对一切专制暴君都应该这样办”。

被捕的人都被枢密院三番五次地审问，千方百计威逼利诱，企图使他们招认自己的罪名，或揭发他人的罪行。对几个犯人的待遇是不人道的，这种待遇预示了从这时起到后来对塞缪尔·何尔柏里、欧内斯特·琼斯和其他宪章派民主运动领袖的监禁待遇。约翰·特尔瓦尔被囚禁在监狱的停尸间。而死于霍乱或其他传染病的犯人的尸体通常都停放在那里。各种讯问和恫吓手段无效以后，就和往常一样，在告密人的帮助下，捏造一套证据，扣上叛国罪的

罪名，将犯人交付审判。对政府来说，最遗憾的是，这里没有布莱克斯斐尔德，而且密德尔塞克斯的陪审员并不像苏格兰的陪审员那么容易对付。第一个案件是关于哈代的，从10月28日开始审判。经过9天，他被宣布无罪释放，得到了远至伦敦以外的人们的欢欣若狂的庆贺。政府虽然受到这一次的挫败，还是决定继续审判，名单上第二人是霍恩·图克。图克将皮特拉到证人席内，使政府非常狼狈。皮特在证人席内被迫勉强承认，他曾经说过实质上与使图克和他的朋友们受到控告的大体相同的话。继图克之后，特尔瓦尔的无罪释放，使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其他的控告也被撤销了，政府为全国其他改革者准备的800张拘票也随之作废。

次年，即1795年，是充满着极端不满和愤怒的一年。粮食价格直线上涨，1793年每夸脱（28磅）价值49先令3辨士和1794年每夸脱值52先令2辨士的麦子，到1795年已涨到75先令2辨士，到1796年涨到78先令7辨士。^①工资远远跟不上物价，就业情况尤其不稳定。1795年，由于普通工人的工资不够养活一个家庭，柏克郡的司法机关被迫采取了著名的“斯皮恩汉兰德工资制”，按照面包价格的高低，用教区基金补贴工资。这个措施给乡间的工人带来了灾难。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救济，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些年头饿死。事实上因饥饿而引起的骚动遍于全国，在许多情况下，还发现军队公开同情这些骚动，不能用来对付人民。10月，情势发展到高峰。当时人数众多的人群在国王去参加议会开幕典礼的路上，用石块和一阵阵的高呼“面包与和平”、“不要皮特”和“打倒乔治”的口号来“祝贺”国王。

尽管如此，并且他们在法庭中取得了胜利，“伦敦通讯社”的影

^① 这是全国平均价格。在不同地区，和一年当中的不同时间，价格往往有很大差别。

响还是开始衰落了。这有许多原因。第一是，它的严格遵循合法斗争的战术对这些饱受战祸和镇压之苦的人似乎是不适当的。其次，这场战争虽然不得人心，但是由于英法两国在十八世纪期间的世仇使政府很容易制造一种强烈的反法情绪，并以敌国奸细的罪名加在改革主义者的头上。更主要的原因也许还是法国政府本身的道德败坏。1794年7月雅各宾党被击败了，国外逐渐了解到，革命时期已成过去。在五执政政府、总裁政府和以后的帝国时期，英国的民主主义者所能对法国感到兴奋的事情是越来越少了：特权与民主之间、压迫与自由之间的明确界限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显著了。战争还在继续着，似乎不论哪一方面取得胜利，实现1789年以后最初几年人们所期待的那些宏大希望的前景都是非常渺茫的。此外，战争在某些地区和工业中创造了繁荣的条件，这种繁荣仿佛很可能使一些中产阶级支持改革的人们比从前更容易接受这个将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制度。

最后是政府历次镇压激进主义运动所累积起来的影响。在1795至1796年的冬天，“两项法令”重新规定了叛国罪的定义，使之包括言论和公开的行动，并且把集会权缩得那么小，以致反对派不可能举行任何集会。甚至少数几个改革主义者在一起聚会都感到愈来愈困难了，同时他们希望进行的活动也很少是属于合法的了。为了防止“士气”低落，政府批准了一项规模宏大的建造兵营的计划，使士兵在民间宿营的古代的惯例宣告终结。可是事实证明这一措施也无济于事。结果大批的汉诺威人和其他的德国兵被运过海来镇压民众和监视本国军队。科贝特第一次被监禁就是由在伊利唾变的一团民兵遭到德国雇佣兵极其残酷的镇压这件事所引起的。此外，还募集了一支完全由上层和中等阶级组成的新武装力量——义勇骑兵。他们除了作为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以外没有

任何軍事价值。不久我們就要談到他們在彼得卢原野上的高貴行動了！

在“倫敦通訊社”和它的地方組織衰落以後，出現了更多的帶有謀叛性质的秘密团体，如“蘇格蘭人大同盟”和“英格蘭人大同盟”。1797年8月，一群蘇格蘭的紡織工人和騎兵發生了流血衝突，這些騎兵在特蘭南特的麥田里對他們大肆屠殺。但是，這一切比起“愛爾蘭人大同盟”就微不足道了。“愛爾蘭人大同盟”是一個真正強大的組織，民族的希望和農民的不滿同激進主義以及法國大革命的平等信念都在這個運動中結合起來。

沃爾夫·頓和“愛爾蘭人大同盟”的最有才能的領袖們都看得很清楚：他們首先必須依靠農民和工匠。如果不滿足“沒有財產的人們”的要求，民族解放鬥爭是不能成功的。他寫道：

“如果我們進入愛爾蘭，我們就要改善貧苦的勞動者的生活條件；就要打擊那些可惡的和卑鄙的愛爾蘭鄉紳的集團。”

（傑克遜著《故鄉愛爾蘭》，第133頁。）

“愛爾蘭人大同盟”不僅把貧苦的勞動者團結起來進行民族解放事業的鬥爭，甚至还進一步調解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糾紛，這些糾紛是英國和愛爾蘭統治集團所挖空心思製造出來的。1794年審判哈代的時候，“愛爾蘭人大同盟”被宣布為非法組織。頓和其他的人不得不到法國去避難。這時一個秘密的指揮部開始在愛爾蘭策動武裝暴動。

1796到1797年期間，一支法國軍隊渡海登陸的計劃在緊要關頭遭到了失敗，這支法國軍隊的來臨就是民族起義的信號。於是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酷刑和逮捕，企圖挑起一個孤立無援的暴動，好一舉撲滅。新成立的義勇騎兵，在這場暗無天日的屠殺中到處大逞威風。

1798年春天，一切希望从法国方面获得帮助的想法都落空了，爱尔兰人准备自己起义。这时，政府当局在一个告密者的协助下逮捕了民族运动的全体领导者。人民发动了起义，可是暴动缺乏一个中心计划，所以尽管武器窳劣的农民军在各地表现了无比的英雄气概，在某些地区取得了胜利，但是，最后人民的起义终于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被政府军镇压下去了。和以往一样，随之而来的是集体大屠杀。

这些爱尔兰事件，以及1797年在斯皮特海德和诺尔的海军兵变，使政府惊惶失措，于是新的镇压开始了。1797年7月通过了一项法令：“彻底镇压和禁止英格兰人大同盟、苏格兰人大同盟、爱尔兰人大同盟和不列颠人大同盟……以及伦敦通讯社和其他城镇或地区的一切通讯团体。”

在以后的15年里，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运动被剥夺了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但是，这决不是说，工人阶级的活动已经停止。

3. 结社法令

禁止通讯社团和“爱尔兰人大同盟”的法令公布之后，接着就是更为罪恶彰著的1799年的结社法令。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期是工业发展空前迅速的年代。铁的生产从1790年的7万吨增加到1820年的40万吨；进口原棉1764年至1794年增加了615%，自1794年至1824年增加了445%。工业的性质随着产量的增长也发生了变化：规模愈来愈大和愈挖愈深的矿山雇用着人数众多的矿工，炼铁的规模日渐扩大，工厂代替了家庭工业——这些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业革命。但是必须注意，我们不要夸大这些早期的发展的程度。从家庭工业过渡到工厂生产的速度是缓慢的，并且发展得不平衡。举例来说，棉织品发展在先，毛织品发展在

后，紡在先而織在后。到了1800年和此后的一些时候，家庭工业仍然继续存在，不过愈来愈受到资本主义的控制。一个巨大的变革已在酝酿中，如果说1800年工厂生产还并不普遍，那末，它至少是在发展中。

工人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工厂工人还没有成为标准的工人，但是，从整个工人阶级的发展趋势来看，他们的重要性在迅速地增长。整个阶级的性质在转化。工人比以前更加集中了，许许多多工人常常聚集在一个企业里为一个雇主工作。在某些地区，同时有许多这种大企业比邻相向，这意味着聚集在一个城市或乡村中的成千上万的工人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问题。而在人数众多的工人共同为一个雇主在自己家里或在狭小的店铺里做着同一类型的工作的时候——这是常有的事——情况也是这样。工人集中程度的增长导致工人团结的加强。最后，雇主与工人之间的界限比在家庭工业或者小型工业里明显得多了，在小型工业中，雇主本人和少数几个徒弟或雇工在一起进行劳动。工业发展加深了阶级的对立。

所有这一切，都被普遍存在的令人憎恶的工作条件加剧了。这些都是人所共知无可争辩的事实。难以维持温饱的工资、14到16小时的工作日、卫生条件恶劣的工厂和更加不卫生的工人住宅——这些在一切关于工业革命的记载中都是常常可以看到的。但工人阶级与这种情况以及造成这种情况的政治制度作斗争的故事，人们就不大知道了。改善生活条件和最终建立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正是这本书要探讨的主题。工人在这一时期的穷困倒并不是怎样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如果说今天工人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那么，任何一点改进都是工人自己努力的结果。

由于和法国的战争，工人所受的这些痛苦在1790年与1815

年之間是更加严重了。粮食价格跳动很大，而往往是向上跳动。在1790年以后的3个10年中，小麦的平均价格分别为63先令6辨士，83先令11辨士和87先令6辨士。1800年是113先令10辨士，1801年是119先令6辨士。即令在有贫穷救济金贴补的时候，工资仍然远远追不上物价。为什么父母被迫尽早将子女送进工厂或者在田地里工作，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这一时期，除了那些得天独厚的技术行业以外，工人赚得的工资还不够养活一家人。

因为全部军费的担子落在工人阶级的肩上，生活费更高涨了。几乎所有预算收入都来自间接税，所以据估计，每周赚10先令的人，纳税要占去他的收入的一半。此外，大量发行纸币引起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同时1815年后，相反的通货收缩的办法又将巨万英镑放入“国债”（对拿破仑的战争，已使国债由23,700万英镑增至85,900万英镑）持有者的钱袋里。

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的，工会运动在十八世纪的最后10年中，就开始获得一种新的、对统治阶级来说是可怕的性质。原先参加旧式俱乐部组织的手艺人很少罢工，现在他们也经常举行罢工了，而且他们的战斗性愈益加强。工人纠察队严厉打击狗腿子，破坏机器、甚至破坏工厂的行动开始变得愈来愈普遍了。最使他们吃惊的也许是工会组织日益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的不断增长的趋势。皮特和皮特时代的雇主们，当然认为每一次罢工和反对政府的事件，都是法国雅各宾党人指使的，正如今天他们的后继者把一切都认为是受了莫斯科代理人的煽动一样。这当然是荒谬绝伦的。但是，从争取民主政治的意义上来说，雅各宾主义的确赢得了北方新兴工人阶级的拥护。在1800年要想再组织一个“教会和国王”的暴民事件是不像在1790年那么容易的。

在当工会运动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候，雇主们开始抱怨

反結社和反陰謀的現行法律还不够严厉。倫敦水車作坊的師傅們在1799年4月給議會呈遞了一份請願書：

“好些时候以来，在水車业的伙計中已經存在着一个有危險性的組織……目的是迫使師傅普遍提高他們的工資，阻撓雇用拒絕參加他們組織的伙計，以及进行其他非法活动；伙計們經常进行这种陰謀，師傅往往不得不退让。最近又提出要求提高工資，我們还没有答应他們，可是他們已經拒絕上工了。”（1799年4月5日《下院日志》。）

他們請求通过一項临时法令来对付这种图謀不軌的行为，議會当然欣然同意。辯論时，“慈善家”威尔柏福斯站起来建議，這項法令應該加以扩大，以便适用于全国所有的社团。

这就是臭名远揚的結社法令的来源。第一个法令在6月17日至7月11日之間匆匆通过了所有的程序——通过得那么迅速，以致大多数工人都蒙在鼓里。這項法令禁止一切結社，和一切旨在組織社团的集会和活动。違反此項法令者任何治安法官^①均可予以惩处，并且应受3个月以上的监禁。這項法令中的一款違反了英国法律的一般慣例，就是强迫被告提供不利其本人的证据，否則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当人們識破这一法令的性质时，抗議書和請願書就紛紛涌进了議會。1800年，利物浦（在这个选区里，由于当时选举制度的一种疏忽，造船工人工会的許多會員享有选举权。他們在选举中一向采取一致行动。）的一个議員提出了一个新的法案。于是新的法令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細小的更动：例如本来規定一个治安法官改为两个治安法官，并不得由有关行业的雇主充任，虽然他們可能是而且常常是别的行业的雇主。应当补充一句，虽然

^① 所謂治安法官，是由普通公民担任的，沒有薪金，是一种义务职。他們协助地方法院或警察局审理一般与治安有关的案件。——譯者

在理論上雇主和工人都一樣禁止結社，但找不到任何一個關於雇主由於違犯這項法令而被告發判罪的記載，雖然雇主們的結社是非常普遍而且是公開的。

1800年法令的有效期間繼續了25年，它給工人階級組織發展的道路上設置下許多障礙。但事實上，1825年的工會運動比1800年更為壯大了。結社法令斷斷續續地和橫暴地推行了一部分，但不能全部實行。它在大部分的工業中沒有普遍實行。這一方面因為告發是雇主們的事情，而許多雇主認為還是不惹事的好。同時在較老的手工業中，伙計們的俱樂部有着長久的歷史，很少受到干預。儘管如此，這項法令畢竟是存在的，它無形中是一個威脅，它提醒工人不要搞得太過火了。但在新興的工廠企業中，情況就不同了。這裡檢舉告發是常有的事。杰·爾和巴巴拉·哈蒙德引自《手藝工人和機器特別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中的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此項法律在這裡實行的情況：

“斯托克波特紡織工人約瑟夫·謝爾溫介紹一個蒸汽織機廠廠主的情況：當地的一般工資是每日工作14小時，每周8先令。但1816年他以需要設置燈光為借口，將每一部織機工資降低3辨士。就是說大多數工人的工資減少了6辨士，某些工人減少了9辨士。到了夏天，廠主也不願恢復減少了的工資，而到1817年冬天，他又想再一次減少工資，工人們提出了抗議，並離開了工作，這樣做的有12個女工、11個男工。他們被帶走去見治安法官，治安法官將他們送到監獄的院子裡，要他們考慮：究竟想做工呢還是坐牢。他們拒絕在減少工資的情況下復工，於是他們被判處一個月的徒刑。女工被關在密德爾威治監獄，男工關在切斯特爾監獄。”（《城市勞動者》，第130頁。）

甚至在这个小小的例子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這項法令失敗的第二個也就是主要的原因。它從來沒有完全實行。因為工人千方百計堅決要在最困難的條件下組織起來，這就使這個法令不可能全部實施。幾乎在所有的地區和工廠中都有這種工人鬥爭和進行組織的記載。我們可以舉一兩個突出的例子。

一個是1804年到1805年蘇格蘭織工的鬥爭。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格拉斯哥的織工請求實行伊麗莎白法令，授予治安法官以規定工資之權。織工們因為生活費用異乎尋常地上漲，請求規定新的計件工資標準。經過重重周折和受了許多經濟損失後，治安法官終於宣布這項請求是合理的，並頒布了一個新工資制。可是僱主們竟置之不理，結果發生了包括蘇格蘭各地4萬工人的規模空前巨大的罷工。3個星期後，僱主們開始動搖了，這時警察就逮捕了罷工委員會的全體人員，將他們分別判處徒刑。於是罷工不得不停止，這個全國性的組織也隨之結束。在當時的情況下，地方組織一般都能夠保持，但是全國性的組織只能在一個特別運動展開的時候存在一個短暫的時間。

蘇格蘭織工的這次運動採取了比較公開的形式，並且盡量利用合法的手段進行鬥爭。結社法令實行的結果，往往促使出現像諾丁昂編織工人那一類秘密的地下組織。他們都是在工業革命以前就能操作複雜機器的熟練技術工人。因此，他們具有工會運動和政治激進主義的悠久傳統。從這些工人的完善的組織背景看來，魯德派^①運動就與最初一般認為無濟於事的破壞機器的行動不同了。事實上在這個企業里，很早很早就有了機器，所以說工人仇恨

^① 魯德派(Luddite)，指1812—1818年間英國大規模毀壞機器的參加者，他們認為機器是使他們失業貧困的原因。這個名稱是由30年前諾丁昂一個破壞襪機器的工人納達·魯德(Ned Ludd)的名字而來的。——譯者

机器本身是絕不可能的。魯德派运动只是一个反对吃不飽飯的工資(在1811年每周仅6—7先令)和恶劣工作条件的有組織的运动。工人从雇主租来机器在他們自己家里使用,为了确保完全停工,唯一办法只有毀坏机器。

斗争于1811年2月在阿諾德开始,很快就扩展到全郡和更遙远的地区。到1812年初,远至卡尔莱斯尔、格拉斯哥和諾丁昂的地方都派代表聚集在格拉斯哥,策划运动的进行。諾丁昂的工会組織非常健全,它有一个专职書記格雷夫納尔·亨逊,他在很长时期內是諾丁昂工人的杰出領袖。1811年12月,紐卡斯尔公爵不得不承认:

“最大的困难是几乎不可能获得关于騷动者的活动和企图的情报。每一件事他們都組織得很严密,而且他們的活动进行得非常机密,沒有一个人肯冒着生命的危險来告发,所以不可能偵察出他們的情况。……現在騷动的花边編織工人的代表所組成的委员会正与……袜商和师傅之間进行談判。”(阿斯皮納尔著《英国早期工会》,第116頁。)

从1811年和1812年,以及此后到1817年的一个期間,魯德派运动連續不断,一直很活跃,并且在許多次还能贏得实际的胜利。甚至当局派遣12,000名士兵(这比惠灵頓帶到伊伯利安半島上去的部队还要大)到諾丁昂郡去,和在1812年通过了一項法令都不能制止工人破坏机器。(法令規定破坏机器要处死刑。拜倫勋爵曾在上院发表一篇有名的演讲对这条法令提出抗議。)

在其他地区,魯德派运动所采取的方式和目的各不相同。在兰开夏郡从1811年至1826年,飢餓和失业迫使破坏机器者对曼彻斯特附近地区的新的蒸汽織机工厂发动多次攻击。在約克郡的西里定,1811年到1813年之間魯德派运动一部分是屬於勞資斗争性质的,一部分則含有革命的性质。霍斯福尔的被杀是这一运动

的最高峰。霍斯福尔是一个工人所深切痛恨的雇主，他吹嘘说，他要在“鲁德派运动者的血海中策马而行”。这里的鲁德派运动者的主要队伍是由“剪绒工人”或称“剪工”的熟练工人组成的（他们把绒栽在织好了的布上，然后用沉重的剪子完成最后一道工序——一种熟练的手艺）。他们很久以来就由于他们的组织和反对使用机器而闻名，使用机器威胁着他们的技术地位和他们的饭碗。在拿破仑战争末期，英国对法国及其同盟国实行经济封锁，结果使几乎整个棉布业陷于停顿，就在这个严酷的灾难时期，若干个大制造商却企图采用新机器。

“剪工”以“鲁德将军”的名义向全体剪绒工人、织工和所有公众发出一个呼吁：

“勇敢的同胞们：请求你们全副武装挺身而出，协助改正错误的人们去纠正他们过去的错误，并挣脱老昏君乔治三世，以及他那些比他更为愚蠢的儿子和他的坏蛋大臣们所加给我们的可憎的枷锁。必须打倒所有的贵族和暴君。起来，让我们学习勇敢的巴黎市民的高贵榜样，他们在暴君的3万名士兵面前将一个暴君拉下了台……。”

另一封信通知使用“这些可恨的剪裁器具”的一个雇主，如果他在一个星期内不拆掉机器，“我将派我的部下率领至少300人去把它们捣毁”，并且要他把这话告诉他的“罪恶的同党”。信上又说：

“我们希望得到法国皇帝的帮助，以挣脱从没有过的最腐败、最恶毒和最专横的政府的枷锁。我们要打倒汉诺威的暴君以及所有的从最大的直到最小的暴君。我们要成立一个公正的共和国。这个国家里千百万人盼望上帝使这个幸福的日子迅速到来。”

有几个月这个棉织业地区一直处于惊慌状态中。武装起来的

魯德派忽而前进，忽而后撤。当局就是雇用密探也不能渗入这个运动的核心組織，派去镇压魯德派工人的士兵們，却和他們亲如兄弟。

因此，1799年到1825年工会非法期間使工人階級获得了丰富的經驗。特别是工会学会了合法与非法手段相結合的新策略，进一步巩固了組織，并懂得了如何随时在万分危險的情况下反击敌人。尤其是工人們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一个教訓，即国家决不是中立的，它是雇主階級的一个工具，这一教訓是世世代代的工人都應該重新学习的一課。

結社法令沒有达到企图摧毁工会运动的願望。但是，这决不是說这项法令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在反抗这项法令的人中多次获得胜利、并在廢除这项法令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格雷夫納尔·亨迹，对这个法令的影响，特别是对紡織工人的影响作了如下的叙述：

“一块沉重的磨石套在当地手艺工匠的脖子上，拼命地压制他和贬低他的人格；他的一举一动以及他保持或增加他的工資的一切行为，都被认为是非法的。整个政权和該地区的势力都被利用来对付他，因为他在‘进行非法活动’……所有的委员会和其中的积极分子都被认为是兴風作浪的危險的爱鬧事分子。认为对这种人必須加以監視，可能的話还要加以消灭。”（韦伯著《工会史》，第81頁。）

果然，当1824年这块磨石去掉以后，工会活动立刻就活跃起来了。

4. 彼得卢时代

1815年与法国的战争以滑铁卢的胜利宣告結束，随之而来的

和平为工人阶级运动带来了新的条件和新的前景。这并不是说残暴的镇压有所减弱。这时皮特已经死了，政府为他手下的一批人——西德默斯和卡斯尔雷，埃耳登和利佛浦——控制着，他们具有皮特的一切反动偏见，而没有他的才能。雪莱在为抗议彼得卢大屠杀而写的“无政府的假面具”一诗中，使这一批恶棍遗臭万年：

“路上我遇见了一个‘杀人犯’，
他戴着假面具，很像卡斯尔雷，
外貌温善，内心冷酷而阴险，
他身边有七只恶犬。

恶犬个个肥硕，
也许它们的待遇令人羡慕，
他从宽大的外套里掏出，
一个个，一对对的人心，抛给它们去咀嚼。

第二个遇上了‘欺騙’，
身穿貂皮长袍，颇像埃耳登，
他善于哭啼，
大滴眼泪落地就变成了石磨。

小孩子們，
来回嬉戏在他跟前，
以为每一滴泪都是碧玉，结果
他们都被磨石砸得脑浆四溅。

接着，怀抱圣经，
如金光护体身披夜幕，
模样如西德默思的‘伪君子’，
骑着鱷鱼从我的旁边走过。”

此外，战争的结束使政府很难再用维护“法兰西原则”或图谋通敌来污蔑改革主义者和工会运动者了。

如果说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那么和平也并没有使人民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科貝特写道：

“这场戏也许演完了；可是啊！不！我们还不能回去吃晚饭。还有事需要我們去做。我們每年照例要为这出戏付出450万镑。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儿。事实上这出戏并没有演完。也许第一幕是结束了。在1789年首次爆发的伟大的革命，这颗明亮的星仍然在照耀着全世界。那一年，封建的和宗教的专横、愚昧和迷信受到了第一次沉重的冲击。从此以后，它们还遭到了别的打击。不管采取怎样有利于它们的措施，它们是注定要被消灭的。”（1815年7月29日《政治纪事》。）

战争的结束立刻带来了物价的暴跌，而以重工业的情况为最坏，虽然从表面上看，战争曾经给重工业提供了无限的订货。铁每吨价格从20镑跌至8镑，什洛普郡的34个高炉，就有24个停止生产。数以万计的煤矿工人和炼铁工人流浪街头。纺织品同样发生了生产下降和价格猛跌的情况，这给手工织工们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在不正常的战争环境下，他们曾经赚得相当高的工资。30万复员的陆海军士兵增加了已经相当庞大的失业大军。

工资普遍下降，但价格仍然人为地维持在高水平上。国债的利息达3,000万镑，占全部预算的 $\frac{1}{3}$ ；所得税的废除意味着更多的

賦稅落在群众身上。資本家和地主們在享用晚餐，但是却要工人們付賬单，賦稅要占到他們平均工資的一半。只有粮食价格沒有下降。战争結束后的头5年內，小麦价格平均每夸脫80先令11辨士，仅仅比战争期間遇到荒年情况最坏时的价格稍低一些。这就是說，当工人每周在最好的情况下賺到10先令的时候，买一磅面包要花3辨士，而面包在当时是工人阶级最主要的食品。1815年，議會通过了谷物法，規定谷物价格除非每夸脫超过80先令，不得輸入小麦。谷物法对价格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們姑且不論，但它对工人阶级所发生的影响却是毫無疑問的。政府这一措施使得千百万人們相信，議會是雇主們的工具，这給予改革議會的要求以特别的动力。

战后的危机首先导致了一次騷动的爆发。塞謬尔·班弗德在他的有名的一段著作中作了如下的叙述：

“1815年谷物法通过以后，开始了一系列的騷乱，时断时續地一直延續到1816年末。当此法案正在討論时，倫敦和威斯敏斯特相继发生了騷动，一直持續几天之久。因为面包价格高昂，布里德浦尔特发生了騷动。貝德福德发生了制止粮食出口的类似騷动。在柏里，失业工人搗毀了机器。在伊利，騷动演成了流血鎮压。泰因河上紐卡斯尔的矿工和其他人掀起了騷动。在格拉斯哥，工人們为了設置施粥所而流血。在普勒斯敦有失业紡織工人的騷动。在諾丁昂，魯德派工人破坏了30台机器。在麦瑟提德維尔的騷动是由减少工資引起的。在伯明翰失业者也騷动起来。在瓦尔薩尔发生穷人的騷乱。12月7日在登迪由于伙食太貴，有100多家店鋪被搶。”（《一个激进主义者一生的变迁》第1卷，第6—7頁。）

伴随着騷乱而来的是群众政治認識的提高。在北部和中部地

区以及在伦敦的新的工业城市里，按照卡特赖特少校建议的形式建立了“汉普登俱乐部”^①。在这些俱乐部里，工人们开会讨论和进行议会改革的酝酿活动。这些俱乐部达到了许多以前通讯社的活动所没有达到的地方。由于当时所颁布的法律，俱乐部要想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是不可能的。但是，增长中的左翼报刊的势力，特别是威廉·科贝特的定期的文章，却是一个统一的力量。

科贝特逐渐从一个爱吵嚷的保守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激进派。他的信仰的根源和潘恩以及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后继者们是完全不同的。他的确拥有一大堆偏见，但这些偏见是光明磊落的。他的《政治纪事》总是随时准备对假公济私和陋习进行攻击，并且永远为被压迫者说话。在滑铁卢之役的前几年，他仍然是一个主张议会改革的伟大力量。阻止《政治纪事》接近群众的唯一障碍就是它那高昂的售价：当局为了阻止受大众欢迎的报刊发展，故意课以重税，使它不得不以1先令半辨士的价格出售。但在1816年11月，科贝特发行了一种2辨士的《纪事报》，不登新闻和其他内容，只登他的《致手工艺工人和产业工人书》。他在信中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因此：

“在你们对自己的价值有了一个正确的概念以后，当你们听到人们把你们叫做乌合之众、贱民、暴徒、粗野的群众时，你们该多么气愤呵。”

他在讨论了人民的不满和苦难以后，作出结论说：

“唯一挽救的办法就是在下院或人民院进行一个改革，给所有直接税的纳税人以投票选举权，并且議員要每年选举一次。除此而外，再无其他办法了。”

^① 以约翰·汉普登得名，他是十七世纪反抗查理第一的内战中的领导人之一。

这封信销售了 200,000 份，它把民主改革作为主要政治问题提到整个工人阶级的前面。继这封信之后，科貝特发行了定期的 2 辨士一份的、不贴邮票的《紀事报》，它的固定售銷額达到了 50,000 份。而《泰晤士报》当时每天只銷售 5,000 份。随科貝特的《紀事报》之后还出現了一些其他的定期刊物：伍勒的《黑矮子》，卡萊尔的《共和杂志》以及約翰·加斯特的《母夜叉》，所有这些杂志均傳誦甚广，至于討論它的人那就更多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整个时期内，不仅当时杰出的新聞記者，而且几乎这一时期所有的主要詩人和有才能的作家，都同情、往往甚至是积极地支援激进和民主运动的斗争。如雪萊、拜倫、赫茲利特、彭斯、布萊克、济慈、利·亨特、兰德尔、皮科克以及华滋华斯、科勒里季和騷錫，他們至少在年輕的时候，都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他們的表现往往是非常革命的。保守党除了唯一鼎鼎大名的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和一些腐化的雇佣文人外，沒有可与这一宏偉的陣容相匹敌的人物。而那些墮落的女文最可称道的地方，只不过会說几句俏皮話而已。

早期领导人中，除了卡特賴特外，現在还在积极参加活动的人已經沒有几个了。站在前列的多是新的领导者，如科貝特、伍勒、卡萊尔、霍恩、本鮑和亨特。这些人中，卡萊尔以他的激进主义和自由思想的結合，以及他爭取新聞自由的勇敢和坚毅称著于世。除了科貝特，最有直接影响的人物就要算是亨特了，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勇敢而有才华的演說家，他的这些优点远远超过了他的虛荣和性格乖僻的缺点。

这些意見各不相同但信仰大体和卡特萊特的綱領（見第一章第一节）差不多的改革主义者，开始在全国各地組織大規模的群众集会。其中，托馬斯·斯宾斯的信徒們在 12 月 2 日于克拉肯威尔

的斯巴广场举行的一次集会结果发展成为一场暴动，他们最初也许打算举行一次武装起义。由于这一时期的“证据”大部分都是警察密探所提供的，因此很难确定事实的真象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政府随时准备利用特务所挑起的事件来打击整个运动。1817年1月，议会匆匆忙忙通过一项法令，授予治安法官以禁止集会的特别权力，而且和1794年到1806年的情况一样，停止了人身保护法。科貝特认为政府这次停止人身保护法的主要目的是想逮捕他和封闭他的《政治紀事》，于是他跑到美国去了。但是，大部分激进主义者都坚守岗位，运动继续发展着。

3月間，兰开夏的失业工人企图到伦敦去呈递要求改革和解除他们痛苦的請願书。好几千人，大半都是手織机的織工，集合于曼彻斯特，但他们遭到军队的攻击并被驅散了。出发較早到达斯托克波特的那些人也遭到进攻，被冲散了。少数意志坚决的人一直推进到达比郡的阿希布尔奈。这次“毛毯党人”（因他们把随身携带的一切东西都卷在毯子里，看上去很像澳洲樵夫的行囊）的請願进军，和往常一样以被逮捕和监禁而告结束。这些事件所引起的愤怒以及一切抗議的合法手段被禁止的事实，使人们轉向武装计划，在曠野中秘密进行訓練，准备武装起义。但这些准备活动只是地方性的，而且規模小，相互之間缺乏联系，加上还混入了政府的密探，所以一开始就注定要遭到失敗。在倫敦，爱德华茲把錫斯耳伍德和他的同伙引来参加伽图街的密謀计划。在北方，臭名远揚的奥里佛正在进行他的可恶的勾当。

他的方法是周游各地，伪装成一个“革命”党的中央机构的代表。他驅各地的改革者的組織說，其他地方已經提前准备，武器齐全，只待一声命令就会有大批的人起义。他說，“只有你們这里，事情还没有齐备”。但是1817年6月14日《里子信使报》上的一

篇文章詳尽地揭露了他的阴谋，使他的计划未能得逞。这次揭露不仅使奥里佛狼狽不堪，而且也使雇佣他的政府出了丑。他所取得的一次成功，是誘騙了三四十个达比郡的工人从彭特里几向諾丁昂进军。率领他们的是一个叫吉萊米亞·布兰德萊斯的織袜带工人，一个毅力坚强为人正直的人。他们被騙說是大队人马的一部分，实际上，他们完全是一支孤軍。这支小小的队伍遭到军队的襲击，被驅散了。在經過慎重挑选的陪审官面前，19个人判处流放，布兰德萊斯和另外两个人就在諾丁昂处以絞刑。

但镇压和叛变出卖都不能阻止运动的发展。在倫敦、伯明翰以及其他地方紛紛举行大会，接着就筹备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举行一个兰开夏全体工人大会。所有周圍的市鎮和乡村都作了妥善的准备。1819年8月16日，带着乐队和高举旗帜的队伍，其中包括很多妇女，秩序井然地行进到开会地点。对于政府当局說来，他们严守紀律比任何秩序混乱都更加可怕。当亨特正要开始讲话的时候，一队驃騎兵和曼彻斯特的义勇騎兵向密集的人群发动了攻击。驃騎兵似乎只是机械地执行命令。特別积极的倒是属于上层阶级的义勇騎兵，他们肆意砍杀和踐踏手无寸铁的人们。不多一会就死了11个人，約400人受了伤。

亨特、班弗德和其他等人遭到了逮捕并被以叛国罪提起公诉。政府企图把这次集会說成是一次暴乱，或者是革命的序幕，以便为集体屠杀开脫罪責。甚至《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

“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副檢察长卡斯尔雷勋爵和其他議員們在下院所陈述的关于曼彻斯特集会是暴乱的話，乃是彻头彻尾的謊言，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他們的話既无真实性也无可能性。”（班弗德著《一个激进主义者一生的变迁》。）尽管有这种揭发，同时集体屠杀甚至在許多中等阶级人們中

引起了恐怖，亨特和其他等人还是被判处了长期囚禁。同时政府更进一步通过了所谓“六条法令”，这个法令将合法镇压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六条法令授权治安法官禁止超过 50 人以上的集会。它们禁止军事训练和带有乐队及旗帜的游行。它们授权搜查任何有藏匿武器嫌疑的民家和逮捕携带武器的人，不用说，这一条当然只适用于下层阶级。最后，法令还规定每份售价在 6 辨士以下的报纸和小册子须要再抽 4 辨士的税。其目的是阻止像科貝特所出版的 2 辨士的《紀事报》这一类刊物在群众中流行。为了反对这项法令和 1817 年查禁“诽谤和煽惑性”作品的法令，理查德·卡莱耳和他的店员志愿军从 1819 年到 1825 年斗争了 6 年。关于 1817 年的法令（它是卡莱耳的主要反对目标），当 150 名男女在监狱先后总共住满了 200 年以后，斗争才获得胜利。

阴谋暗杀内阁成员的伽图街事件，就是在彼得卢事件和“六条法令”通过以后才发生的。应当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一事件中，錫斯尔伍德和他的同伙（其中 4 人已被绞死）仅只是同意了一项计划而已，而这项计划的每一细节都是警察密探爱德华兹的主意。在这以后不久，在格拉斯哥和附近地区爆发了政治性的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参加罢工的大约有 60,000 工人——其中许多是煤矿工人——双方都盼望这次罢工会成为武装起义的序幕。不管原先计划如何，武装起义的口号却始终没有喊出来。可是有一小群罢工的工人受了密探的挑拨，未待时机成熟就采取了行动，在保内穆尔和第 10 愿骑兵的一支队伍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

自此之后，激进派的活动暂时低落了，但是群众对改革的渴望并没有丝毫减退的迹象。但是，“六条法令”使得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这种愿望变得更为困难了，并且压制了曾经在运动中起团结作用的群众报刊。加上从 1820 年起，有 5 年是商业繁荣时期。在这

一时期中，物价虽然有相当的跌落，但是，出口从1820年的4,800万镑增长到1825年的5,600万镑；同时，进口从3,200万镑上升至4,400万镑。国内市场的扩展不易计算，但增长的幅度大概比前者还要更大一些。战后经济脱节时期已经结束，现在，英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发生了作用，一个经济不断扩张的时期开始了。与其说这种经济扩张为日益显著的周期性危机所中断，还不如说被它分成了好几个阶段。

同时，工厂代替了家庭工业，重工业在抬头。虽然有结社法令的阻挠，这种不断增长的大规模工业生产，使得工会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工会运动的发展特点之一，就是在某些行业中出现了全国性的组织，这种全国性组织比过去长期存在的组织松散和非正式的行会俱乐部联合会要有效得多。有时候这些机构为了防范万一，便采用表面看起来合法的联谊会的名义来作为掩护，如1809年的“翻砂工人联谊会”即是一例。另外一个早期建立起来的全国性的组织是印花布工人的组织。1818年警察在波尔顿逮捕了参加集会的工人，参加这次集会的都是来自英国各地的代表。从对他们的审判中，证明这些集会是一种预定的每年例会。

工会运动新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组成地方工会联合会的趋向——这是一种初期的、往往是短暂的工会理事会。从这些组织遗留下来的一些零散的账簿中可以看出，这些工会组织间的财政上的相互支援是非常普遍的，同时当彼此利益相同时它们还常常采取一致行动。从1823年到1825年这种联合委员会在废除结社法令的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方面的杰出人物是约翰·加斯特。他是伦敦造船工人工会的书记。工会运动的第三个发展应该归功于他。

这就是工联 (Trades Union)，它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能够配合全国各地工会工作的组织。第一个这种组织叫“慈善社”，或叫“慈善大力士”，建立于1818年。在曼彻斯特、伦敦和斯塔福德郡北部陶器出产地都可以找到这个组织的痕迹。加斯特还在他的杂志“母夜叉”上刊登过“慈善大力士”的文章。但它的寿命很短，正如1826年在兰开夏第二次企图建立的工联存在时期不长一样。但这种思想普遍存在于工人群众中的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工联主义在成长之中。在各地的激进派中，议会改革和要求废除谷物法，是和要求废除结社法案同时提出的。

由于这种形势的发展和这种群众性的要求，同时统治阶级内部许多人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法令是行不通的，如果非要执行，那是很危险的。这就是1824—1825年间废除运动的背景。如果只把它说成是弗朗西斯·普雷斯或其他任何个人操纵的结果，而忽视了群众运动这一方面，那就是把实际发生的那些事情完全歪曲和表面化了。在这一段历史中，普雷斯所占的地位是奇特的。他原先是一个裁缝，嗣后独自经营。借助于他在伦敦威斯特敏斯特区的组织（这是伦敦少数几个居民多，选民富于民主精神的选区之一），他变成了激进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之间起着一种联系作用。虽然他在这一点上有时确实对运动作出了有价值的实际贡献，但整个看起来，他的影响是危险的，因为他在伦敦的手艺工人中散布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知道，在1831—1832年的选举改革法案的斗争中，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虽然如此，普雷斯无疑地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他为激进派议员约瑟夫·休谟所作的辩护，他在议会特别委员会面前对证据的巧妙处理，他的避免引起他的对手恐惧的本事，所有这些都是出色的。一项废除一切结社法令和使工会组织合法化的法案在一周之

內，沒有經過一次辯論或任何意見分歧就在上下兩院通過了。

它的后果是普雷斯和大部分其他的人所沒有想到的。在非法状态下隱藏着的工会运动的强大力量現在显示出来了。同时，許多新的工会建立起来了，老工会的會員人数在迅速增加。到处听到罢工和增加工資的消息：曼彻斯特的紡織工人，設菲尔德的剪刀匠，泰因和韦尔的水手，倫敦的造船工人和桶匠都行动起来。

《設菲尔德信使报》反映了雇主們的惊惶失措：

“这已不是个别的一部分合同雇工为了某一点要求所进行的增加工資的罢工，而是几乎全国所有的技工联合起来，强制雇主接受他們的条件。”

雇主們要求廢除这个新通过的法令。船主們拟就一項法案，这些船主在当时是臭名远揚的、最凶恶最反动的雇主集团之一。整个工会运动立即投入了行动。代表“兰开夏棉紡工人工会”的加斯特和約翰·道尔蒂与普雷斯联合起来，在倫敦和各郡中心地区成立了防卫委员会。請願书潮涌而至，群众不断地到議會去会見議員。几十个工人在議會特別委员会前为結社法令的恶劣后果作证。但結果还是通过了一項新的法令。它虽然承认工会和罢工是合法的，但却使許多工会的正常活动非法化了，使人們很难举行罢工而不触犯法律。

虽然这样，但总的說来，1824—1825年的斗争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并为以后的进步奠定了基础。1825年的法令对阻止前进或减少罢工次数事实上并不起作用。諸如“蒸汽机制造工人工会”（現屬混合机器工人工会）和“木工和細木工总工会”（現屬联合木工协会）都是在这些年代中成立起来的。1826年兰开夏的棉紡工人和矿工为反对削減工資展开了一系列規模空前的罢工。但是，这些罢工都遭到了惨敗，1825年底，商业繁荣时期結束了，随后是

一个削减工资和广泛的失业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再度被迫转为防守，但下一个运动一开始，彻底的政治变革的要求就又重新提了出来，这个运动一直到 1823 年选举改革法令通过后才告结束。

第二章

宪章运动

1. 改革法案

1830年快要来临的时候，改革运动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活跃起来；这一运动的复活标志着各种力量的重新聚集。皮特的政府是建筑在各有产阶级——地主、商人、战争暴发户、金融资本家以及新兴的工业资本家、较殷富的店主和专门职业者——的工作联盟上的；而皮特的继承者在彼得卢事件期间也是以这一联盟为基础，只是程度较低而已。这个联盟以反对来自下层阶级雅各宾主义的威胁为目的，它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开始逐渐瓦解。

工业家和中等阶级渐渐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平等的联盟。他们在享受政权方面受到排斥，政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手中。他们也许是从1815年的谷物法通过以后才开始有这种认识的。不久事情就很明显，整个税收制度使得地主纳税最少而获利最多。此外，挂名的干薪和外快以及十八世纪盛行的徇私舞弊的得益也全部落入这个特权集团的腰包。特别重要的是，阶级结构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甚至在1800年，当工业家还仍然是小规模的经营者的时候，他们的野心只是想取得一个立足之地和获得利润的时候，在他们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也就是在工业资本积累了起来、和企业的一般规模扩大了以后，他们就随着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潜在力量，越来越不甘心自己的从属地位了。十九

世紀20年代后期的工业資本家和他们的前一代已迥然不同，他們要求按照自己的財富和經濟实力，直接分享控制国家的政治权力。

結果引起了托利党的迅速解体。它分裂成为几个敌对的派別，这些派別也就是当初組成这个階級联盟的不同集团。坎宁^①死后，这些派別大部分都和輝格党的殘余合并。一个新的形势出現了，“改革”重又成为一个广泛的階級联盟的口号，来反对那个壟断了政权的特权小集团。

“改革”变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字眼。但是，这只是变化的一个方面。直到当时为止，改革的要求基本上是工人階級的要求，不过是由一部分比較进步的中等階級领导的工人階級所提出来的要求。同一期間，工人們經過30年的艰苦斗争，已經認識到所有的資本家都是他們的敌人。工会运动在1825年結社法令被廢除以前就已开始，結社法令廢除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工会运动的发展以一种令人十分吃惊的方式巩固了工人階級的队伍。因此正当上述广泛的改革联盟形成的时候，出現了一个新的分化过程。正是因为这个联盟的领导者已被工人們看作是自己的敌人，他們中間的最进步的阶层这时便开始拒絕这种领导，并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进行活动。在圍繞着改革法案而进行的斗争中，我們可以看到这种新的階級关系的最初迹象，而这正是宪章运动时期的标志。

这个时期，工人階級本身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从1800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工厂工人的人数，而他們在工人階級内部的比重增长得更大。同一时期中，手工工人的人数下降了，他們的处境每况愈下。一部分从前的工人貴族——熟练

^① 坎宁在1822年任托利党内閣的外交大臣。他放棄了前任外交大臣所实行的支持“神圣同盟”的政策。他使英国首先承认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并且促进英国資本侵入近东各国。——譯者

的手艺工匠——也遭到同样的不幸。在农村，圈地的过程现在已经差不多完成。农业工人已濒临贫困的绝境。成千上万的农业工人被迫迁往新兴的工业中心，和当地的就业工人以及当时大量移居英格兰的、处境更为狼狽的爱尔兰工人展开竞争。

在兰开夏、约克郡、伦敦、中部地区和苏格兰的低地，大面积的惨不忍睹的工人贫民窟正在增加。这些居住区的令人难忘的情景可以从恩格斯1844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看到。这本书不仅根据确凿的材料对群众的悲惨生活作了全面的叙述，并且描绘了工人的斗争和他们的不可征服的精神，这正是一般正统历史家非常随便就忽略过去的事实。关于这种精神，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足够的材料。

十九世纪20年代的末期，一切迹象都表明政治斗争即将重新开始了。这个运动从彼得卢时期所遭到的失败和残酷的镇压中恢复过来了。统治阶级内部危机重重的迹象给人们带来了新的信心，同时以往工会组织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增加了这种信心。与此同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又发生了。工厂纷纷倒闭或开工不足，失业人数迅速增加，罢工和停工遍及各地。在农村，神秘的斯文队长^①的夜袭又出现了，纵火和破坏事件随之增加。从工业区传来了工人们武装自己并进行操练的消息。

左翼的报刊再度风行一时。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本来困难很多，现在发行额大大增加。1830年，赫瑟林顿和奥布林创办了也许是所有激进刊物中最伟大的报刊《穷人卫报》。这家报纸首次在英国以生动的、通俗的形式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在以往10年中，这些概念一直在酝酿中。这些意见的发表说明了工人阶级

^① 斯文队长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他的名义下，农村工人焚烧草堆，捣毁打谷机。

日益成熟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正像当时许多其他东西一样，起源于罗伯特·欧文的著作，并赋予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以新的和革命的解釋。这些社会主义的概念在许多著作和小册子中都有精辟的闡述，例如同在 1825 年出版的約翰·格雷的《关于人类幸福讲稿》和托馬斯·霍季斯金的《为劳动申辯》；威廉·湯普森的《劳动的报酬》（1827 年）以及出版稍迟的約翰·弗朗西斯·布雷的《劳动的流弊及其补救办法》（1838—1839 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思想在英国具有悠久而輝煌的历史。许多思想家和革命領袖，从鼓动 1381 年偉大农民起义的爱尔兰乡村教士約翰·保尔和入道主义哲学家托馬斯·莫尔爵士到掘地党人溫斯坦利与平均派华尔文等，都曾梦想和談到理想的共和国。在那里“金錢不是万能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公有的”，在那里自由公社集体拥有和耕种土地。虽然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包含一些未来世界的种子，但实质上都是朝后看，向往理想化的农村公社的农民想法。群众的力量在十七世紀的英国革命中被击败了，这些想法也随着破灭，不过人們也許永远不会完全忘掉这些理想。十九世紀初期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嶄新的社会主义，它起源于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新的工人阶级。

虽然新的社会主义也是历史的产物，但它所展望的目标却是一个用理智和科学来实现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新世界。如果没有大規模工业所产生的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出现新的社会主义。同时，如果法国革命沒有燃起人們心头的火焰，使他們充滿信心，社会主义就不会发展得这样快，也不会具有这样乐观的情緒，正像瑪丽·沃尔斯通克腊夫特所說的，法国革命“为我們的世界带来了比以往更多的美德和幸福”。（《論人权》，第 119 頁。）

沃尔斯通克腊夫特曾用男女平等的思想充实了激进主义的武

庫。瑪丽的丈夫威廉·葛德文所写的《政治正义論》(1793年)是当代最偉大的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之一，这部书对这些理想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的确，与其說葛德文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倒不如說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一切政府都是恶的，他向往一种組織松弛的、由农村公社組成的社会。公社居民只服从开明的理智，这种理智就足以消除貧困和剝削，因为理智和正义本身就决定了“各取所需”的原則。私有财产并不正式取消，但是将成为无足輕重的东西。因为，他說：

“如果一切都以正义为主，平等的状态就会出現。劳动将变得十分輕松，或是以一种愉快的消遣和文雅的体操方式来进行……在一个人們都能同样分享自然賞賜的社会中，与目前的财产制度紧紧連在一起的罪恶必将消失。自私的狹隘的原則也会消除。”

葛德文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在他改变环境的同时也改变了他自己。在他全部的信仰中，也許要算这个概念影响最大了。欧文和所有其他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都信奉他的这个概念。

他們还吸取了葛德文和托馬斯·斯宾斯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或者称为合作社会，因为在当时这两个名詞是相互混用的)。这是一种由許多农村公社組成的，外来控制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社会。斯宾斯在1800年前后所出版的一系列的书籍和小册子中提出了他的論点。他主張一切土地都應該作为公有财产，把教区当作行政管理的基础。土地應該向所有的人自由出租，而交給教区的地租應該代替当时的一切稅收。由教区向国家財政部上繳少数必要的款項。

葛德文和斯宾斯的这些想法对于欧文的理論的形成，以及对于此后接受这些理論的群众运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見的。欧文是一

个白手起家的人，从1800到1820年他在紐拉那克他的紡織厂附近创办了一个模范新村由此而开始聞名。在那里，他做到了他的同行所做不到的事。他用事实证明他可以付給他的工人以高額工資，縮短他們的工作時間，并为工人举办大量的社会福利事业而仍然能够获得巨額利潤。他也证明了，生活条件改善以后工人的品质可以随之轉变。在他的工区里消灭了犯罪和骯髒的現象。他說，人的品质不是固定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后天生活环境的产物。欧文的例子确切地证实了葛德文及其学派的人性可善論的真理。同时也駁斥了統治階級普遍持有的偏見：他們认为工人的生活之所以貧窮悲慘是因为他們具有低劣的和好犯罪的本性。到这时为止，欧文是一帆風順，他得到了許多最有名望的人物的称贊和支持。

但是他并不滿足。他看到即使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上，社会还是可以为所有的人做很多事情——然而数百万人却衣著襤褸、掙扎在飢餓綫上。在《紐拉那克州的报告》(1821年)中，他一开头便写道：“在妥善的支配下，劳动力可以变成一切財富和国家繁榮的資源。”事实上，这是从十七世紀的約翰·洛克和威廉·佩蒂爵士到十九世紀早期的李嘉图一切正統派經濟学家所公认的定理。然而，欧文把这个定理又向左推进了一大步，做出了这样一个結論：如果工人的劳动沒有給他們自己带来幸福，那是因為他們受到了剝削的緣故。他发表了这种見解以后，他的声望立刻就一落千丈。公爵和主教們不再来拜訪他和征求他的意見了。不久，他发现，要使他的讲演有人听，他只有轉向被剝削的劳动人民。欧文偉大的地方就在于他能毅然决然地采取这一步，正如他的弱点在于他从来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劳动群众里的一員一样。他只能以一个高高在上的恩人，一个帮助他們脱离苦海的救世主的身分来接近他們。这是因为，他看不到工人是一个創造历史的階級。他心目中

的农村合作形式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结果，而是纯理性胜利的结果。

只是在经过了追随者——格雷、霍季斯金、汤普森和布雷——的努力以后，欧文的理想才开始和群众的生活和经验密切地结合起来。例如，汤普森在他的《财富分配原则的探讨》一书中一开始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实质上（如果形式上不是如此的话）就是千百万工人所要求回答的问题：

“这个国家有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原料资源、机器、住宅、粮食和智慧而勤劳的生产者，它显然有可以获得幸福的一切手段，而且从社会中一小部分阔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幸福的迹象，但是为什么这个国家却仍然陷于贫困之中呢？”

“为什么勤俭的人们经过了多少年不断地辛勤劳动所获得的果实，他们自己既没有犯下什么过错，也没有发生什么自然的变异，竟会神秘地不知去向了呢？”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制度，它牺牲了广大生产者的利益而使少数人致富，使穷苦的人陷于绝望的贫困中，使中等阶级的人下降到穷人的队伍中来，从而使少数人不仅能够把全国的资本恶毒地大量积累在自己的手中，而且依靠这种积累操纵着社会每年的劳动果实？”（见《财富分配原则的探讨》，序言，第18页。）

汤普森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他指出少数人垄断和占有生产资料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他说：

“拥有没有生命的生产工具的不从事劳动的人，由于他们对生产工具的垄断，不仅获得了和最勤勉最熟练的真正有效力的生产者同样的享受，而且他们还通过种种方法按照他们占有的财富积累的比例，获得了比那些勤劳的生产者竭尽全

力劳动所得多过十倍、百倍、千倍的财富、劳动产物和享受手段。”(同上,第164頁。)

同样,霍季斯金发现资本家的利润是工人贫困的原因。他写道:

“一个劳动者在取得一块面包之前,他必须付出超过面包本身所值的一定量的劳动,作为农民、粮商、磨坊主和面包厂主的利润收入,以及他们使用的房屋的利润。此外他还要以他的劳动所得偿付地主的地租……不论有无谷物法,资本家一定要让劳动者活下去,只要他的要求能够被接受和得到满足,他就绝不会允许他再去做别的。”(《为劳动申辩》,见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76—77頁。)

这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家能够一针见血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弊,然而由于他们脱离群众运动,他们仍然只能从纯粹性中来寻求解决的办法。他们认为只需要展开普遍的宣传,使所有的阶级认识到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就行了。他们没有用历史的观点来认识社会发展,所以他们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要经过一个发展和斗争的过程,而认为它是一种概念,只要等到它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使所有的阶级都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时候,它就可以实现了。

只有等到群众接受了这些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社会主义思想才能显露出它的丰富内容。请比较下列两个例子:这是霍季斯金在《为劳动申辩》一书中抽象地谈论阶级关系:

“我确信,除非劳动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只有生产性的工业才得到发展,只有懒人才会贫穷,除非那可赞美的格言‘不劳动不得食’真正实现,除非财产所有权不是建立在奴役制度上,而是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原则基础上,除非受到人们尊重的

是人而不是他脚下的土地或是他手里的机器，世界上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人和人之间也不会推诚相见。”（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78页。）

请再看看登载在1832年3月《穷人卫报》上的一篇不署名的简洁有力的文章：

“我一听到工厂和商店老板们说——我们必须获得巨额的利润，才能给你们增加工资，我的血液就在身上凝固起来。我当时立刻希望我要不是人而是一条狗，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就好了。……工厂老板的利润，和征收地租人的地租、征收教会什一税者的什一税以及其他各种利润一样，是只有压低工资才能得到的。……劳动人民和榨取利润的人之间是没有共同利益可言的。”

懂得了“没有共同利益”这句话的含意，就会使人对国家有了新的认识，即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压迫人民的一种手段。这个概念和马克思的看法很相近。奥布林用锋利的笔调将当时的社会主义文献写成文章在群众中推广。这些文章深深地打动了工人读者们。他在1833年4月27日一期的《穷人卫报》上写道：

“人类一切罪恶和迷信都是从富者压迫穷人的这种人吃人的斗争中产生的。人们企图依靠剥削别人劳动果实为生的这种欲望，确实是世界上罪恶的根源。”

他又写道：

“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不过是富者用来对付穷人的阴谋诡计，都不过是强者和狡猾者用来掠夺和奴役弱者和愚昧无知的人的借口而已。目前的英国政府就属于这一类。”（《穷人卫报》，1835年3月7日。）

十九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的被广泛接受，以及它和群

众本能的阶级感情的结合,使这个运动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工人阶级已不再追随中等阶级的激进派之后,而是逐步在宪章运动中采取独立行动了。老一辈的激进派,像亨特、霍恩或科贝特,仍然向往着已经成为过去的、工业革命以前的小生产者的时代。他们从未接受,甚至不了解欧文的思想。例如科贝特曾轻蔑地称欧文的计划“是要建立无数穷人公社”。阅读《穷人卫报》,参加“工人阶级全国联盟”,以后又参加“工人协会”的是新的工人阶级的激进派。他们欢迎欧文主义而且不久又超过了它。

在这十年之间,各处都在讨论酝酿建立模范村和生产合作组织。这些组织被认为是走向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步骤。但这些计划绝大部分都流产了,最好的也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不过,这只是广大的合作化或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方面。这个运动的规模可以从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所写的汤普森传记中看出来:

“十八世纪30年代的末期,合作运动者在3年中发行的小册子达200万本。汤普森所发起的“合作运动传教士”经常访问的城市达350座,一年之间讲演就达1,450次,其中讲神学和伦理学的占604次。在曼彻斯特每个星期日可卖出小册子1,000本,在伦敦每年可销售4万本,在一次集会上,出卖小册子所得的款项可达50英镑。……弗洛拉·特列斯坦于1839年访问了英国之后,估计在1,600万人口中至少有50万人相信社会主义。”(潘克赫斯特著《威廉·汤普森传》,第197页。)

最后随着宪章运动的兴起,这个运动已经超过了乌托邦幻想阶段,而变成了一个夺取国家政权,利用它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全国范围的运动。运动中具有远见的人们已经看到宪章是通往新社会的一把钥匙。他们会毫不困难地接受共产党的纲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人民不掌握真正的政权是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须从少数的资本家手中把政权夺过来，并牢牢地掌握在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多数人民的手中。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民主才能实现。”

奥布林的看法已经非常接近这种观点了。他写道：

“有了宪章，土地、货币和贷款归为国有之后，人们不久就会发现集体的劳动比起个体劳动来，在生产、分配和交换方面能创造多少奇迹。然后就会逐渐地，不是幻想而是真正地出现一个社会化的国家，或社会主义社会。毫无疑问，最后会在全世界出现一种在本质上和欧文的理想并无不同的社会。但是，要想不先确保人权，不建立任何立法或制度，把人民从目前愚昧和奴役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而想从现在这个罪恶和腐朽的社会一跃而进入欧文理想中的社会乐园，这简直是一种幻想。”（《全国改革者》，1847年1月30日。）

但是，和仅在一年后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比起来，奥布林的看法的模糊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说，共产党宣言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恰恰是在当时千千万万的工人正在思考着同样问题的环境中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居住的时期，大部分正好是宪章运动的时期。他们和宪章运动者保持了密切和友好的联系。他们研究并且珍视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当然，他们大大地丰富了它的内容，并且以新的形式和明确的词句说明了这些往往陷于混乱的思想。尤其是他们指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的阶段，两者都是从前一个阶段中的冲突和矛盾中产生的。尽管如此，像欧文、汤普森和奥布林这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成，以及间接地对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的工人运动所作出的贡献还是不可估价的。

《穷人卫报》在当时得以出版，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当时政府破坏工人运动的手段之一就是対一切报刊課以重税，使工人无力购买这些报刊。科貝特和別的人用了种种办法来逃避这种税，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穷人卫报》則公开进行抵制，以1辨士的价格出售，并提出这样的口号：“为了表示抗議而出版，以公理对抗强权。”全国各地的其他报刊也展开了反对这条法律的斗争。約有500名报刊推銷商和报販被关进監獄，但是这个反对“知識税”的斗争終于获得了胜利，1836年稅額降低到1辨士，1855年終于被完全取消。

社会主义的思想深入到工人阶级以后，使得这个新恢复起来的运动具有一种新的性质。“工人阶级全国联盟”在1831年春天成立的时候所通过的綱領仍然是最激进主义的綱領。《穷人卫报》归納了它的内容：

“廢除奸惡的貴族阶级；建立共和国，即建立以全民选举产生的代表民主制度；取消世襲的官职、爵位和官阶；廢除不合理的和不公平的长子继承法；遺產平均分配；建立收費低廉、办事迅速的訴訟制度；廢除狩猎法^①；取消对报纸、年鉴及其他出版物征收的高額稅；解放我們的同胞犹太人；在爱尔兰通过济貧法；廢除侵犯財產罪的死刑；把大主教、主教的收入分配給貧民；取消宗教的什一稅制；牧师由各教区供养；廢除‘国債’；取消专制的工具常备軍；建立国民自卫軍。”（《穷人卫报》，1831年3月3日。）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們認識到，目前爭取政治民主的斗争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同时認識到，如果工人阶级仍然跟着中等阶

^① 狩猎法禁止普通农民打猎，甚至危害作物的鳥兽也列为禁猎之物。——譯者

級走，他們就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可是，旧的概念的影响毕竟还很强烈。这就是造成改革法案的斗争如此复杂曲折的原因之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1829年广泛地存在着不满情绪，普遍要求改革。在1830年初以中等阶级及工业资本家为领导和以工人阶级为基本队伍的“伯明翰政治联盟”成立了。各地争相仿效伯明翰的组织，不到几个月，“政治联盟”的组织已经遍及全国。可以看到，当时在北部的许多工业城市中，工人阶级的性质和观点在联盟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在某些城市中甚至成立了两个联盟，一个是中等阶级的，另一个是工人阶级的。

这些政治联盟很快就形成一个得到左翼群众支持的广泛运动。它的阵容包括从格雷和罗素这种辉格党的贵族，到由达拉姆与布鲁姆所领导的“左翼”辉格党人和受了边沁影响的“激进哲学派”。他们都要求实行某种改革。1831年产生的改革法案就是这个广大联盟中阶级利益完全不同的各阶层的一个折中方案。但在那个时候，为了攻击当时制度的腐败和荒唐，他们还能维持这种团结。

这种腐败的确达到无法为之辩护的地步，除非说：任何变革对社会都是危险的。下议院很久以来就已失去它曾经一度起过的代表机构的作用了。不仅仅因为有选举权的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也不仅仅是被选举的人并非为群众真正想选举的人，而且整个选举过程本身已变成了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滑稽剧。在郡里，由于圈地和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使得原来有40先令即有选举权的自由农的人数大大减少了。同时郡议席都由大地主集团“内定”了。

城市选区的情况就更为恶劣了。从十七世纪初以来，选举制度简直很少有改变。可是，人口有了巨大的变动，许多古老的城镇

已經衰落，而許多新兴的大城市建立了起来。結果，像除了刺丛以外現已別无他物的老薩隆姆城，在議會里却仍然有兩名議員“代表”它。另外像阿普尔皮貝，“它的选民都在猪圈里”。而諸如曼徹斯特、里子、設菲尔德和伯明翰等城市却沒有一个代表。在其他的城市里，选举权被当地的市商会所把持。这些市商会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由貴族或当地的大地主所操纵的自封的团体。

在少数地方，选民的人数較多，公开投票的制度使得賄賂公行。一本揭露当时黑暗的激进派的小册子《特別黑皮书》曾經写道：

“在全国只有五、六个地方，一个有能力的大家都知道的誠实人可以有希望击败不惜花費大量金錢的对手。”

竞选必須有一大筆的金錢。在 1832 年的前几年里，一个候选人在一次选举中要花費 1 万到 2 万鎊才有希望当选。在 1820 年依普斯維区的一次选举中，輝格党候选人光是免費供应飲料，仅在一家酒館花的錢就达 800 鎊。富人願意提供巨額的金錢，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說明当选議員可以期望所得到的好处了。像这样的竞争究竟是一种太費錢的賭博，所以只要有可能，双方总設法安排避免竞争。据估計，当时 658 名議員中有 471 名的提名人只有 277 人。而提名者半数以上是貴族。如此提名产生的議員，当然只能代表他們的后台老板而已。

当然，腐敗并不是議會独有的特色。教会、司法、法院、文官、陸軍、海軍等机构也同样被把持和貪污成風。几千个支干薪挂空銜的差事和退休金都是为統治集团及其寄生者的利益而設立的。不过，激进派把議會看成是腐敗的核心。他們认为首先是进行議會改革的斗争，以为議會改革了就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經濟的、廉潔的行政制度。

1830年8月，在法国和比利时革命影响下所举行的一次大选，结束了托利党长期统治的局面。辉格党人和主张改革的托利党人以微弱多数组阁执政。由于大量选区因选民太少而失去选举区实质和受到把持，选举的结果还不能完全反映出广大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情绪。格雷组阁以后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无情地镇压正在英国南部和东南部展开的农业工人运动。

这个运动最初是反对采用威胁到农民冬季就业的新打谷机的，后来很快发展成为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了——在肯特和萨塞克斯郡每天2先令6辨士，在威尔特郡和多塞特郡每天为2先令。群众在一个村子接着一个村子捣毁打谷机，焚烧麦堆，冲进作坊和强迫惊惶失措的农场主接受增加工资的要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情况下，群众都表现得很有自制力，只在极少数的地方才发生伤害人身的事件。但政府的行动却是没有节制的。有9人被判处绞刑，至少有457人被判处流刑，数以百计的人被投入监狱。辉格党在这次“血腥的审判”中充分地证明它和托利党政府完全是一丘之貉，当时的人们也并没有忽视这个事实。

这次农村革命产生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迫使辉格党人认识到人民不满的深度和广泛性。另一方面，使辉格党人有机会以事实向有产阶级再次提供保证，新政府不会以过分温和的态度来对待群众，并向有钱的人证明，他们进行的一切改革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富有者的权力。政府以制造暴乱罪逮捕了科贝特，但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采取了攻势，他迫使法庭传讯格雷、墨尔本和布鲁姆等人出庭作证，使他们受到难堪的反复的质问；他终于被宣判无罪释放。一次企图打击改革运动左翼的尝试遭到失败。

早在1831年成立的以罗维特和赫瑟林顿为领导的“工人阶级全国联盟”，就反映了工人们辉格政府和正在领导改革运动的资

本家們是不信任的。这个組織由他們經常举行會議的大厅（即后来聞名体育界的“黑衣僧运动場”）而得名，被称为圓厅党。“工人階級全国联盟”在成立之初是一个倫敦手工艺工匠的組織，但是和“倫敦通訊社”一样，它大体上采取了“倫敦通訊社”的組織形式，后来变成遍及全国各地的其他許多組織的中心和領導核心。在某些地区，它和“政治联盟”发生冲突，而在另一些地方，当政治联盟的成員全部是或主要是工人的时候，它們合作又非常密切，以致常常不易区分它們。“工人階級全国联盟”在曼彻斯特拥有 27 个分会、5,000 个盟員。

“工人階級全国联盟”的影响当然是相当大的；但是得到实际好处的是为了配合各地的政治联盟而設立的“全国政治联盟”的領袖，普雷斯和伯明翰的一个銀行家阿特伍德。他們首先的目的是要動員人們支持 1831 年 3 月所提出的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具有如下的两个特点：第一，廢除一些小的萎縮的城市选区，而将这些席位分配給席位过少的郡以及像曼彻斯特、里子和設菲尔德等过去沒有代表的城市；第二，扩大选举权的范围以包括城市的中等階級、郡的佃农和租佃农場主^①。

这个法案距离男子普选权、每年議會制和不記名投票等具有历史性的、激进的要求太远了，尤其对后两个要求可以說毫无进展。它也沒有对当时尚未取得选举权的工人提供任何东西。可是，甚至科貝特也在躊躇和忧虑的心情之下决定支持这个法案。他的理由是，这个法案虽然并不能令人滿意，但是对当时議會的要

^① 在英国，tenant farmer（佃农）和 leaseholder（租佃农場主），与中国的所謂佃农不同，他們不是一般农民，而是租用大面积的土地从事农业經營的人，和农場主差不多，只是地是租来的。租佃农場主与地主訂有特別合同，可以終生或在多少年内具有使用该土地之权，类似典当抵押的性质。——譯者

求也只能到此为止，不过必须了解这只是第一步。他和其他的许多人希望，改革法案通过后所产生的新议会能包括一个由激进分子组成的有力的集团，并且希望新议会能带来更好的结果。

可是圆厅党人并不这么乐观。他们认为，工业资本家和中等阶级是在利用工人，他们的政治野心一旦满足后，要想进一步进行具有真正群众性的改革就困难了。《穷人卫报》形容这个法案是“一种邪恶、专横、欺骗和奸诈的措施”，并警告它的读者说：

“如果这个法案获得通过，你们将成千上万地被饿死，像死狗一样地赤条条地被人抛弃在垃圾堆上。”（《穷人卫报》，1832年4月11日。）

1834年所通过的济贫法完全证实了这个预言的正确性。

这时，改革法案开始通过议会的审议程序。该法案以一票的多数二读通过，政府在委员会里被击败了，于是5月进行了新的大选。在许多选区，旧制度的势力和旧的提名方式几十年来第一次崩溃了。辉格党在80个郡议席中取走了74席，并获得136席的多数。改革法案又一次被提出来了，并在下议院的审议程序中获得了通过，但在上议院却以41票的多数遭到否决。投反对票的人绝大多数是主教，以及由皮特及其继承者培养出来的在战争中发财致富的贵族。

选举改革法案在上议院遭到失败以后，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势。原来同意圆厅党人对改革法案的批评的成千上万的工人现在看到（让他们看到这一点是很容易的），这是一个人民和支持“旧的、腐朽制度”的贵族之间的斗争。总的来讲，可以说群众以“行动表示”了他们对科贝特的看法的支持。科贝特认为应该（虽然是批判地）支持这个法案，把它当做人们仍然要求实现的完全的民主纲领的一个开端。全国各地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示威运动，这些示威

往往發展成為暴動。達比的監獄受到襲擊，諾丁昂的城堡被焚毀，在布里斯特耳暴動者甚至占領了城市好幾天，並造成很大的破壞。在倫敦，群眾在街上襲擊主教和托利黨的貴族，打碎他們住宅的玻璃窗，圓廳黨人的露天集會吸引着大量的聽眾。

當時政府由於霍亂病猖獗號召全國齋戒一天。圓廳黨人認為霍亂是由於飢餓和不好的衛生條件造成的，而不是因為觸犯神怒。他們把這個騙人的號召稱作“全國滑稽劇”，他們呼喚人民在倫敦街頭遊行以後到各處舉行公開聚餐。據估計當時參加這次示威的不下10萬人。1832年3月的這個事件，突出地表明了他們在群眾中的影響。

然而，在這次危機中領導群眾的實際上是普雷斯和“全國政治聯盟”，他們甚至間接地利用了圓廳黨人的力量。人民普遍發自內心的憤怒被利用來證明只有通過改革法案才能阻止革命和混亂。革命的威脅不僅被利用來恫嚇托利黨人，也用來阻止輝格黨政府和托利黨進行妥協。因為有些輝格黨政府的成員早就願意和他們妥協了。這就是政治聯盟團結群眾的號召“改革法案，整個的改革法案，我們什么都不要，只要改革法案”的雙重意義。

1831至1832年的秋季和冬季，群眾的壓力以各種形式繼續增加。12月圓廳黨組織了一個“國民大會”，採用了後來憲章運動的策略，自己草擬了一個改革法案。老激進派和日後的憲章運動派本鮑提出舉行他稱之為“全國大節日”的政治總罷工。《窮人報》還出版了一期特刊，專門講解巷戰的戰術和建築街壘的最有效的辦法。同時人們對十月暴動中被逮捕工人的殘酷的判處紛紛提出抗議。諾丁昂兩名工人被執行絞刑時，一大群人憤怒地肅立一旁，並且不時地高呼“無恥的謀殺”和“血債血還”。

改革法案在12月第三次被提到下議院，並於1832年4月14

日在上議院以 9 票多数通过。上議院的議員們企图将它扼杀在小组委员会里，于是格雷辞职了，惠灵頓试图組織新政府。面临着实际上是全国的压力，他的組閣试图甚至得不到他自己本党的支持。国王被迫只好又授命格雷組閣。他坚持要求答应他，在必要时增加上議員的人数以使选举改革法案在上議院获得通过。这样贵族和托利党才放棄斗争，而改革法案终于在 1832 年 6 月 7 日得到通过。

改革法案的通过，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它使工业资本家和支持他们的中等阶级侧身于统治集团。从此，开始了辉格党（除了短暂的间歇外）继续执政 55 年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辉格党变成了自由党。改革法案带来了前两次产业革命所需要的政治制度。

从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的观点来看，改革法案的重要性或许可以从下述的事实中得到最好的说明：这个措施一直普遍地被称为“改革法案”，而不称为“改革法令”。这个名称的正确的含意就是说，最关紧要的不是这个法令的具体条文，因为这些条文本身远远落后于激进派的要求，而是在法案成为法令以前所进行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它所引起的希望和幻灭，以及从 1830 年左右开始步入一个新阶级关系的时代。

这是多少年来工人阶级最后一次在政治斗争中追随资产阶级的进步派，也是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一支庞大的队伍独立参加战斗。工人阶级的希望被出卖了；工人阶级中激进派的警告得到了证实。此外，资产阶级改革者的胜利，使带来改革法案的、包括工人和资本家的阶级联盟宣告结束。现在，争取民主的斗争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可能进行。因此，改革法案是宪章运动的前奏曲，是导致工人阶级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大国中承担起领导

作用的序幕。

2. 工会与監獄

羅維特曾于 1837 年在他的《生活与斗争》中称輝格党人为：“虛伪、阴險和扼杀自由的輝格党人。”（第 114 頁）当时，英国工人階級的絕大多数都贊同这句断語。那些主張工人階級只有独立行动才能带来希望的工会領袖們已不再代表少数派或是向少数的人說話了。这个巨大的轉变是由改革法案被出賣后开始的，法案通过后选出的新議會所遵循的政策最后完成了这个大轉变。新議會所奉行的政策显示出，議會改选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力量来鎮压劳动人民。最引以为訓的是下列的两件事：政府对工会的态度和 1834 年通过的济貧法。

在这些年代里，我們經常見到所发生的事情好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从政治斗争轉到經濟斗争，而后重新又回到政治斗争上来。这种简单的表面現象是容易使人誤解的。的确，从 1832 年以后普遍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沮喪情緒，同时人們离开了那种工人群众仅仅作为一个配角，尾随在中等階級后面的政治活动。“政治联盟”消声匿迹了，“工人階級全国联盟”由于它的领导人物轉入其他形式的活动（主要是合作社运动和爭取公民自由权力的活动）而无声无息了。《穷人卫报》也在 1835 年結束了它的輝煌的生命。

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群众脫离了广义的爭取真正民主的政治斗争（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国家政权應該掌握在人民手中，并应当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但它确实意味着，在这个斗争中人們強調采取新的策略。过去采用的方法所引起的失敗促使人們另外寻求其他更有效的方法，特别是在工会活动方面。可是，我們如果把偉大的 1834 年工会运动的高漲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看成是一种

特殊的现象或是奇迹，而不把它看成从1824年废除结社法令以后整个工会运动发展的一个顶点的话，那么我们又会得到一个错误的认识。

工会运动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825—1826年失败以后它曾经有过停顿，但在第二年它又恢复了。走在最前列的是兰开夏的工人，1829年兰开夏的纺织工人首先组织了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纺织工人在内的“联合王国全国大联盟”。事实证明，采取这个行动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但是从那时起，迅速成为棉纺织业重要中心的兰开夏郡的工会组织似乎已经坚固地建立起来了。

纺织工人的领袖约翰·道尔蒂接着以这个组织为基础着手建立规模更大的机构——“全国劳工保护协会”。这个协会创建于1830年，不久它不仅包括了纺织工业的其他工种工人如印染工人、丝织工人、针织工人，还包括了许多机械、翻砂和其他行业的地方性组织。此后它又进一步扩大，吸收了西雷丁的煤矿工人、陶器工人和毛纺工人。它出版的周刊《人民之声》的发行数达到3,000份。“全国劳工保护协会”除了支持许多罢工运动以外，还积极地鼓动宣传从这时起开始受到所有工厂区广泛拥护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

“全国劳工保护协会”像其他早期组织一样寿命不长，它在1832年就结束了。但是，它仅仅是许多重要工会组织发展之一。1830年诺森伯兰和杜兰两地的矿工建立了他们第一个强大的工会，它在汤米·赫潑本的领导下继续了两年，只是在一次坚持了6个月之久的英勇罢工失败之后才瓦解的。在这次罢工中，煤矿主大批地使用陆军和海军部队来对付工人。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建筑工业中也成立了一个“企业工会”，它不仅组织了熟练工人而且也组织壮工。它召开了一次年会，取

名为“建筑工人議會”，出席會議的有来自各基层組織的代表，他們还成立了区工会組織。1830年“陶器工人工会”也成立了，到1833年它已拥有8,000名會員，其中大部分是斯塔福德的工人，但也发展到新堡、达比和布里斯特耳等地。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发展足以证明，1833—1834年突然发展起来的“全国各业統一工会”，并不是由于受到政治上的刺激突然出現的，而是由10年来一点一滴的艰苦工作和工人們不断增长的战斗情緒的結果。这次运动中所含有的新的因素就是欧文和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1829年，欧文因为他在美国的“新和諧公社”遭到了戏剧性的失敗而回到了英国。可是这次失敗，并没有使他对他的理想的正确性的信念发生动摇，他准备寻找其他的方法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方面，欧文的情緒和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情緒是非常相似的。

回国以后，他在倫敦以及其他地方的技术工匠中組織了小型的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組織开始取得协作并成立“交換所”来出售他們的产品。人們希望通过这种合作社生产逐渐代替资本主义生产。1832年，欧文亲自主持了“全国公平劳动交換所”的筹建工作，这是所有这类尝试中規模最大的一个，它設在葛雷旅館大街。我不預备在这里叙述这个交換所的遭遇。重要的是这个工作使得欧文与工会主义者发生了联系，引起了他企图通过工会运动以达到建立一个欧文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想法。

他开始梦想建立一种社会，以工会作为社会的生产单位，管理他們所屬的企业，最后以一个相互联系的合作社組織网来代替国家。欧文相信通过这个办法就可以和平地达到消灭国家的目的，他反对一切阶级斗争。但在实际生活中每天都在进行着阶级斗争的工人不能接受他的这种看法。摩里逊和史密斯发表在《先锋》和《危机》上的文章可以代表他們倾向于战斗的态度。这种对立的思

想所造成的混乱是1834年“全国各业统一工会”迅速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工人們的切身經驗使他們倾向于战斗的思想和行动，但是作为这个运动的旗帜和中心的欧文的崇高威信，使得这些意見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

然而，一个新的思潮正在傳播开来。1833年10月《穷人卫报》写道：

“一个将要体现国家物质力量的巨大的全国性組織正在靜悄悄地、但是迅速地成长着；它的目的是理想中最高尚的——即建立生产者对他們生产的果实的支配权。”（《穷人卫报》，1833年10月19日，引自馬克思·摩里斯著《从科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87頁。）

《穷人卫报》相信通过工会的活动能取得对国家的控制权。《先鋒》周刊提出工会将可以代替国家：

“如果每一个工会會員都是选民，而工会本身成为国家的一个主要組成部分，它就立刻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产业議院’，以取代現在的下議院，并根据組成工业协会的各行業的意願来指导全国經濟事务。这是一个实现普选权的阶梯。它将从我們工会的基层組織开始，擴張到我們的整个工会，然后取得各業的管理权，最后取得全部政权。”（《先鋒》，1834年5月31日，引自摩里斯著《从科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103頁。）

从上面所引的这一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工人們的战斗情緒，这是主要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混乱的欧文式烏托邦的思想。

1833年10月，欧文主持了在“全国公平劳动交換所”举行的工会大会。这次會議通过決議要成立一个包括各行各業的工会組織。这就是不久以后著名的“全国各业统一工会”。我們已看到不少强大的工会組織起来了——“建筑工人工会”，“紡織工人工会”，

“陶器工人工会”，“縫紉工人工会”以及“西雷丁毛紡工人工会”。除了“建筑工人工会”以外，所有这些工会都参加了 1834 年 2 月举行的另一次大会。在这次會議上正式成立了“全国各业統一工会”。《危机》对这次會議写道：

“現在在倫敦开会的有两个議會。我們毫不犹豫地认为‘产业議會’重要得多，并且在一、两年內它的影响还要更大。比起另外一个議會来，它更能够代表全国的人民；它的选民人数也大得多。‘全国各业統一工会’是由約 100 万會員組成的，他們人人享有普选权。”

这次會議起草了一个章程，規定各个工会都是新組織的一部分。他們仍保留各自的規章和組織，但是都参加区工会和全国委员会。

甚至在这次會議開幕之前，一个广泛的吸收新會員运动就开始了，同时規模空前的罢工和停工也随之而来。最著名的是和累斯特針織工人罢工同时发生的 1833 年 11 月的“达比大罢工”。在格拉斯哥，建筑工人、印染工人、火車司机和家俱制造工人都和雇主发生过糾紛。在短短的期間里“全国各业統一工会”會員人数达到了 50 万人。甚至像珀思、埃克塞特和貝尔福斯特等遙远的地方也有它的會員。會員中包括了数以千計的农业工人，以及相当数量的由妇女組成的基层組織（尤其是在服装工业中）。建筑工人組織沒有正式隸屬於“統一工会”，但是也同样受到了欧文的影响，它正从事代价高昂的建立生产基尔特的嘗試，并在伯明翰建筑一座基尔特大楼。

所有这些罢工运动和其他的活动耗尽了“全国各业統一工会”有限的力量，同时雇主們和政府对这种爆发大为震惊，何况工会公开宣布的它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使社会中唯有真正

有用的和有智慧的阶层才能管理国家事务”。于是統治阶级下决心要在这个运动未壮大以前就摧毁它。工会的組織者被逮捕了，在许多地区雇主要工人填写一种“保证书”。下面就是这种“保证书”的一个典型：

“我等签名者……今声明願和建筑工人总工会断絕任何联系，并且当上述工会会员由于参加該工会而遭到失业之际，我等对他们絕不提供援助。”（摩里斯著《从科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92頁。）

这种“保证书”几乎没有例外地导致了工人的停工。

1834年在多塞特郡托尔普都尔村乔治·洛夫累斯和其他5个农业工人被控在成立工会分会的仪式上采用不合法的宣誓，遭到了逮捕。这件事非常清楚地把政府的阶级实质暴露无遗。在农村中展开的工会运动特别使統治阶级感到惊惶，他们沒有忘掉1830年的暴动。同时也許他们认为打击工人阶级陣綫的最弱的环节是正确的策略。为了要对这6个人判罪，他们不惜歪曲法律，判处他们流刑，并匆匆忙忙地把他们送到了澳大利亚。

这个案件引起了全国的抗議，它使所有的工人組織团结起来了。請願书不断地涌来，到处举行示威抗議大会。抗議运动的最高潮是一次約有10万人参加的大規模游行示威，群众从哥本哈根广场出发，繞道威斯敏斯特，穿过倫敦市区到达坎宁頓。工人们得到了再也明白不过的证明，改革后的新政府和过去的托利政府一样，同样是他們的凶恶的敌人。经过几年的抗議运动之后，托尔普都尔案件的受难者终于得到了寬恕，并且回到英国。

但早在此以前“全国各业統一工会”就瓦解了。雇主和政府的打击、内部組織的不健全以及它的混乱的思想造成了它的迅速瓦解。欧文和左翼之間的紛爭甚至严重到这种地步，为了不让他的

反对者发表意见，他竟不惜停办工会的刊物。罢工和停工几乎都失败了。伯明翰的“基尔特大楼”没有造好就停工了。会员人数减少的速度恰如它过去增加时一样快。等到8月间召开的代表会议决定解散“全国各业统一工会”的时候，它不过是接受既成的事实而已。

看来工人运动似乎遭到了一次惨败。不过，这个运动并没有结束，不过是告一段落而已。工会运动并没有随着“全国各业统一工会”的垮台而停止。各个工会仍然存在，尽管它们会员人数比以前减少了。陶器工人工会甚至反而变得更强大了，它在1835年还获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工人的希望和目標仍然未变，而且他们对实现这种希望的道路变得愈来愈现实，它原来所具有的乌托邦的色彩日益减少。此后不到两年，就出现了宪章运动的最初信号。但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次足以说明辉格党政府本质的事件。

对旧济贫法所带来的恶果没有人有任何怀疑，尤其是它在所谓斯皮思汉兰德工资制下从户外救济变成工资补贴之后。它使得数十万工人，特别是在农村中，沦为教区农奴的地位。它压低了工资。它常常造成一种对济贫法救济委员会的卑躬屈膝的依赖情况。然而，这并不是济贫法在1834年遭到抨击的原因。统治阶级也不喜欢它，首先因为它太费钱——当时每年大约要为此支出700万英镑，而且这个沉重的负担完全落在最贫困的教区的身上。更坏的是因为它延长了小生产和家庭工业的寿命，使它得以和工厂生产分庭抗礼，从而堵塞了资本家所渴望的廉价劳动力大量流入工业城市的来源。它使得收入下降到每周五、六个先令的手纺工人和手工匠还能苟延残喘，而农场工人在冬天农闲时不离开家乡到新开辟的城镇中也能勉强维持生活。

1834年的新济贫法结束了这种情况，它摆在他们面前两条可怕的道路：就是如果他们不愿挨饿，那他们就得进工厂或是进劳动

院。新济贫法以规模更大也更严酷的“协会”来代替原来的教区。救济金完全掌握在一心只顾节省开支的纳税人所选出来的代表手里；这些人有一个含有讽刺性的称号：“贫民保卫者”。新法令废除了户外救济，并通令救济金只能在劳动院内分发。这些劳动院是在“更为不合标准”的原则下开办的，那就是说院内的生活一定要比外面任何地方都要坏。这个新法令的起草人（也是以后几年中该法令的主要执行人），毫无人性和同情心的改良派爱德温·查德威克的解释说得很明显：

“劳动院制度意味着一切救济要通过劳动院，它的目的要使劳动院成为一个受拘束的、令人生厌的地方。住在里面的人没有得到监工的书面批准不得外出或接见来访的客人；他们不准喝啤酒和抽烟，使他们尽力劳动；它使救济金管理人员成为最严厉的工头和懒人与游手好闲的人所碰到的最吝啬的出纳员，这样穷人除了万不得已外不会来请求救济。”（哈蒙德著《暗淡的时代》，第114页。）

最令人感到痛恨的残酷行为就是拆散进入劳动院的人的家庭：劳动院规定男人、女人和小孩不得住在一起。这样做，一部分原因是怕他们太舒服了，一部分是由于受到了当时流行的马尔萨斯^①理论的影响，有钱的人害怕人口的迅速增长。马尔萨斯理论在边沁派激进分子中间的影响尤其大。在过去，他们还常常和工人阶级的进步派进行合作，由于他们支持1834年的新济贫法，这种合作终于破裂了。

这个新法令首先在英国南部和东部的农业地区实行。那里的工人没有组织，同时因为长期受到贫困、失业和镇压，他们的情绪

^① 马尔萨斯是《人口论》(1798年)的作者，他提出人口的增长速度将大大超过粮食的增加速度，只有用人为的方法例如战争、灾荒和疾病才能降低人口增殖率。

低沉得不能进行有效的反抗。在肯特、索福克、貝德福德及其他等地均发生暴动。許多地方出现了有組織的反抗行动，后来与宪章运动結合在一起。在这些年代里，发生了大批的纵火案件，受害者一般都是所謂“貧民保卫者”，另外从1844—1852年間在东索福克地区劳动院中有807人受到伊普斯威奇巡迴法庭的审判。从上述情况看来，这些反抗行动常常是个别的頑强的人所进行的游击式的斗争。

新济貧法在农业地区所造成的一个显著的结果，是成批地雇用妇女和儿童进行耕种的人数有了惊人的增加。这就产生了令人发指的虐待行为，以及在普遍雇用女工和童工的地区造成死亡率的剧烈增加。例如在魏斯貝赫地区儿童死亡率已增加到和曼彻斯特一样高了。

1837年英国政府想在英国北部实施新法令，于是真正的斗争开始了。1835年科貝特逝世后，約翰·費尔登、理查德·奧斯脫雷^①、被开除的美以美教派牧师詹姆士·雷納·斯蒂芬斯、弗格斯·奧康諾和許多地方上工人階級的激进分子領導着群众对監獄和“莎美西故宮三显貴”(济貧法委員們的綽号)展开了斗争。他們得到全体工人的支援——不仅有1834年統計的84万手織机工人，而且还有由于間續不断的长期失业也有被投入劳动院危险的工厂工人。广大群众拥护斯蒂芬斯的这种論調：

“应该而且必須早在父子夫妻分离、監禁、吃‘薄粥’之前——在妻子或女儿穿罪衣之前——早在这种事件之前——将新堡付之一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熄灭这种火焰，那就

^① 費尔登是托特寧登的一个激进的磨厂主人。奧斯脫雷系一个田产管潔人，結合了保守党和激进派的两种理想。这两人同为“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限制童工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是用全体支持这个法案的人的血来将它浇灭。”（《北极星报》，1838年2月10日。）

他在另外一段文章里详细地证明：以色列人在埃及所身受的奴役，较之于英国人在他们自己国度里所受的待遇，是仁慈得多了。

许多地方，大街上都发生了骚动和战斗，劳动院被拆掉了，在别的地方“贫民保卫者”吓得不敢建立劳动院或坚持严格执行济贫法所规定的宣誓的要求。最后，兴建了监狱，可是反抗运动的声势浩大，以至在大部分地区都不可能十分严格的实施这个济贫法。不论在农业或工业地区，户外救济始终没有完全取消，虽然救济的数目很微薄，而且愈来愈使人感到屈辱。

同时，继美国戏剧式的经济大风波后，从1836年开始的大萧条，到1837年更加恶化了，给工业地区带来了饥饿和大批的失业。像翻砂和锅炉制造等工会已经发给它们会员失业补助金，由于工会经费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不免捉襟见肘。陶器工人工会在1837年举行罢工失败而告崩溃。事情愈来愈清楚了，当时的情况需要一个新的运动，把各各分散但相互有关的骚动——要求议会改革、反对济贫法、要求出版自由、要求十小时工作制以及争取工会权利——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伟大的全国性的团结，并订出一个各方面全都同意的统一纲领。正是因为这一需要，因为工人们认识到每一个斗争都是工人和他们的敌人所控制的国家的面对面的斗争，才产生了宪章运动。

1836年夏天，议会改革运动向前迈进了一步，看来虽然只是微小的一步，罗维特和他的朋友们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最初它有33个会员，其中包括约翰·克利夫、亨利·赫瑟林顿、詹姆士·华生和罗维特自己。在伦敦时它每月要征收1先令的高额会费，加上关门主义的倾向，它一直是一个活跃的工人阶级政治活动家的

小集团。但它的影响却很大，并且当它蔓延到各省的时候，它的会员人数就扩大了。克利夫、亨利·文森特和其他“傳教师”巡游全国各地，到了1837年，包括最大的城市在内，全国已建立了100多个工人协会。到了1838年初就发展到150个，其中许多都拥有大量的会员。

“倫敦工人协会”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在1836年年底出版了一本具有历史性的小册子，书名为“腐敗的下議院”。它断言有两个因素壟断了議会，一个是地主利益，一个是資本家的利益，二者同样敌視工人：

“假使拿我們过去为了維持我們糊口活命的工資与豪富階級和商人階級所作的斗争，和拿他們获得部分政权后所通过的臭名昭著的法令做为他们对待我們态度的标准的话，那末我們对于他們完全获得政权以后的行为不能存有什么幻想，正如我們不能对以往和我們斗争的暴君不能寄存任何期望一样。”

接着，小册子又对議会中的各个集团作了一个詳細的分析，对資金集团、地主集团、財閥集团、貴族集团、陆海軍軍官集团、放高利貸者和工业家集团，总之，除了工人以外对每一种人都做了分析。这本小册子还揭露在6,032,725个成年男子中，只有839,519人有选举权，而且选区的安排也不合理，151,492个选举人控制着大多数的議会席位。这些都是煽动者的很好的資料，不久更創辦了新的激进的报纸，如《北方解放报》、《战士》，尤其重要的是《北星报》。这些报纸把上述的情况和类似的事实眞象在英国北部广为傳播。

1837年2月28日，在海濱“皇冠和铁锚酒家”举行一次会议，提出了一个包括六点要求的請願书（这个六点要求日后形成了人

民宪章)，当场就有 3,000 人签名表示赞同。是年 5 月和 6 月里，“伦敦工人协会”的领袖们和一群激进派的议会議員之間开了会。会开得并不热烈，不过最后大家同意根据六点要求起草一个法案，其“六点”要求如下：

- 确定男子普选权，
- 议会每年选举一次，
- 不记名投票，
- 国会議員应有薪俸，
- 取消国会議員的财产资格，
- 选区平等。

这个法案的草案是罗維特在普雷斯的协助下拟成的，如今人民宪章已万事齐备，只缺少正式的名称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促成了全国运动的形成。1837 年 4 月，格拉斯哥棉紡工人罢工反对削减工資，但因全体罢工委員被捕而遭到失败。委員們被控为对不进行罢工的工人进行暴力和恐怖行为，在难以凭信的证据面前，有 5 个人被判处 7 年流刑。整个工会和政治运动联合起来抗議这个判决，觉得这种判罪和 4 年前打击工会运动的托尔普都尔案件并无分別。1838 年，議會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要审查工会組織，整个的工会运动警惕起来。他們委任了一个以罗維特为書記的“伦敦各业混合委员会”来指揮这起案件。最后，政府觉得情况不妙，不如把全案不了了之。从托尔普都尔案件和“新济貧法”以来群众的觉悟就渐渐提高了，这个新的打击最后教育了群众，并开始使伦敦的领袖們与北部的工会运动者建立了紧密的有效的合作。

3. 人民宪章的发动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发展，是自从选举改革法案的斗争结束以后，实际上已停止存在的“伯明翰政治联盟”到了1837年春天又重新复活了。伯明翰和伯明翰附近地区的阶级情况是很特殊的。这里中等阶级特别激进，但由于当地工人的小规模家庭式的和包工性质的生产，他们和工人还没有显著的区别。结果，他们组成了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本力量，但以中等阶级为领导的巨大的群众运动。这时期的突出人物是托马斯·阿特伍德。他是银行家兼伯明翰的国会议员，他利用改革运动来宣扬他自己的货币计划。恰如普雷斯所说：“这个计划只有很少数的人了解，而凡是了解的人又都不赞成。”

伯明翰的激进分子在指挥政治运动方面，具有高度发展的技巧，这一点是罗维特和他的朋友们所望尘莫及的。如组织大规模的请愿，召集代表会议，庞大的群众集会，偶尔搞一次适可而止的暴动，以及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引向一个仔细准备好的高潮——在这些方面，他们都是老手。到那时为止，他们一直控制着他们所发动起来的运动。伯明翰政治联盟发展迅速，在7月里参加集会的人数已达5万人。他们批准了阿特伍德的币制计划，并通过了一项改革纲领，这个纲领距离后来的人民宪章的要求仍然很远。

到了1837年的年底，这个联盟向前迈了一大步，使它的政治纲领和“伦敦工人协会”的政治纲领完全一致，并提出了一个由《伯明翰日报》编辑道格拉斯起草的“国民请愿书”。这个请愿书和最后在1838年5月8日发表的罗维特所草拟的法案合并成为宪章运动第一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两个文件适切的在暴风雨的中心格拉斯哥的人民的面前提了出来。当时格拉斯哥的人们在纺织工人罢

工和罢工领袖的被逼害后余怒未息。在格拉斯哥集会的人数达15万人,其中许多是从附近城镇和乡村赶来的。人群向阿特伍德、纺织工会领袖詹姆士·爱姆奈许和伦敦来的代表们欢呼。人民宪章在形成中。

初看起来,一切似乎没有什么多大的新发展,只不过是伦敦手工艺匠和中等阶级激进分子另一次议会改革运动而已。然而事实上这里已经发动了一个有决定性的步骤,它使英国工人阶级这个为时10年之久的宪章运动成为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人民宪章空前地在思想上得到了工业地区的群众的拥护;当这个运动从伦敦和伯明翰蔓延达到兰开夏、约克郡和格拉斯哥时,它已不再是一小群人的所有物,而成了整体阶级的财富了。一个由新的领袖指导的新的运动掀起来了,把人民宪章从罗维特和阿特伍德谨慎的手掌中夺了过去,成为人们一切希望和志愿的奋斗目标。所有的人都把它当做一个使他们摆脱压迫和痛苦的手段。奥布林写道:

“有了胜过法律的权力,凡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事人民就都可以做到;而没有它,他们将什么事也不能做。”(《穷人卫报》,1833年11月30日。)

“六点要求”被看作是导致新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用哈尼的话说:

“我们要求普选权,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利。不仅仅是因为它我们的权利,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的国家带来自由,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幸福。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引自萨姆·杜德著《当英国站起来的时候》,第23页。)

全体劳动人民需要一种新的生活:对于新生活的详细内容可能有

各种不同的意見，但人民宪章是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那是所有人民都能同意的。因此宪章把整个工人阶级結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联盟。

其次，宪章运动把业已存在分散的反抗运动和不滿的騷乱团結起来。希望享受民主和教育的技艺工匠，为生活工資、工会权利和十小时工作制而奋斗的产业工人和为了生存的权利而斗争的手織机工人都拥护“六点”宪章。也許最重要的还是，在当时宪章运动和反抗万恶的济貧法的全国性斗争結合起来，并把这个斗争提高到一个新的政治水平。

我們也許可以总括一句說，在宪章运动时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具有三个主要的趋势。第一，工会保障在职工人的斗争——争取合理的工資，較短的工作時間，取消专断任意罰款和严厉的工厂紀律的压迫，和取得工会及其活动合法存在的权利。第二，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它起源于中等阶级，但一到工人們手里以后很快就具备了新的內容。自从1832年来，工人們有一个日趋坚决的信念，就是做为一切財富的創造者，在社会上他們應該掌握政权，这便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一个新“特性”。这个坚定的信念联系着第三种趋势，即前曾經提到的日益增强的社会主义思想。宪章运动的綱領从来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当在宪章派的群众中散播了社会主义思想以后，群众了解到“六点”本身不是斗争的最終目的，而是彻底改革社会的第一步，等到工人获得政权以后，就可改变社会使自己的一切希求得到滿足。

如果有人能在融和与澄清这个理想方面起了巨大作用的話，那末这个人便是“人民宪章运动的导师”奥布林。十多年来他主要通过《穷人卫报》和《北星报》，在群众中傳播阶级团結和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他后来也犯过錯誤，但无论如何他在人民宪章运动孕育时

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煞的。

无论是在以前或在今后，英国工人都不会比现在更有理由表示不满。在这些年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罪恶已经达到了顶点，绝对需要改善，但是却沒有采取任何改善的措施。新兴的工业城市的发展毫无计划，在这些城市里生活条件差，卫生情况非常恶劣。用水和空气同样的污浊。在采用机器，加强了劳动强度的地方沒訂出关于调整时间或改善工作条件的规章制度。最后一代的数十万手工工人的生活瀕于绝境，由于他们竞争的结果，工厂里产业工人的工资也降低了。由于英国资本主义面临到有史以来最长久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发生了广泛的失业，以致更加剧了情况的恶化。大家常说的“饥饿的40年代”并不是一句口头禅，而是悲惨的事实。

那时的死亡率反映了这个危机的惨状。1730年，每1,000人就死亡33人以上，以后逐渐降低，到1810年降至19.98人。但从1810年起，下降不仅停止而且回升，到1840年再度增加到每1,000人死亡率为20.80人^①。人口虽然继续增加，但增加率在1820年左右以后显著下降，而且继续下降到60年代。

然而这种生活日益悲惨的事实，只不过是当时情况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时期不但觉悟到它所受的奴役和压迫，并且也觉悟到本身的力量和他们改进社会的巨大潜力。当时情况和未来的前景之间的对比更明显了。宪章运动是这种进一步的觉悟和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表现。

虽然如此，我们决不能就此认为工人阶级已经是一个充分成熟，组织完善的阶级了。因此我们必须对宪章运动及其主要组成

^① 这些统计数字尚未表达出事实的全局，国内许多地方虽然死亡率继续下降，但这不能抵销主要工业中心地区死亡率急剧递升的情况。

团体，作一些分析。这样的分析，比传统式地把宪章主义者分为“道义派”和“实力派”（这种分法是容易使人误会的），更能使我们了解宪章运动的力量和弱点，以及它内部发生矛盾的原因。

首先，就是由中等阶级和下层中等阶级的激进分子组成的重要集团，他们和过去一样希望他们在辉格党里的斗争能够获得群众的支持。现在主要是根据他们对1834年济贫法的态度来划分他们之间的界线。休谟和格罗特所领导的边沁派激进分子支持新济贫法，他们的主要愿望是使资本主义摆脱封建残余制度的阻碍而获得自由发展，但是唯有反对新济贫法的团体才参加了宪章运动。我们已经看到休谟和格罗特所领导的这个集团集中在伯明翰，不久斗争的发展使他们失去了对伯明翰工人的领导地位，于是他们脱离了运动，而渐渐趋向于废止“谷物法”的纯小资产阶级要求，这要求的基本愿望是要用减低面包价格的方法来减低生产成本。

在这集团左边的是罗维特、赫瑟林顿、克利夫和其他等人所领导的手艺工匠，他们是“伦敦工人协会”的基本队伍。他们了解工人做为一个阶级必须在斗争中居领导地位。可是由于他们比较优越的地位和脱离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使他们不可能摆脱坚持合法行动的观点，使他们不知道怎样和新工业区的文化程度较低但却更具有战斗性的工人们一起工作。所以纵然宪章运动在萌芽时代须归功于他们的积极领导，但当运动发展起来以后，他们渐渐变成运动的阻碍和分裂的原因了，虽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具有很大的勇气和正直的人格。在行业工会中也有许多产业技术工人具有和他们相类似的观点和情况。

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这些团体是宪章运动中工人阶级领导的主要力量。整个宪章运动的弱点在于比较具有战斗性的分子在这个阶段中不能产生自己的领导人来领导全国的运动，而必须依赖

像奥康诺, 泰勒和麦克杜尔两博士以及欧内斯特·琼斯这些人。他们的观念, 虽然在许多方面比罗维特和他的朋友们为进步, 然而总是带着上层或中等阶级的色彩。这个弱点在全国领导机构处于紧要关头需要当机立断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地方上工人阶级倒有很多杰出的领袖, 例如布腊德福德的梳毛工人乔治·怀特, 哈利法克斯的本杰明·腊希顿, 莱因下亚士吞的理查德·皮林, 巴恩兹利的弗兰克·麦费尔德和伊普斯威奇的木匠威廉·加勒尔德。宪章运动的一个特点是地方上的领导一般地比上层领导要强。不管宪章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绝不是因为群众缺乏斗争精神。

宪章运动中的杰出人物弗格斯·奥康诺是运动里一切矛盾的象征。他原来是一个爱尔兰的破落地主, 他过去的主要历史是曾参加过 1798 年的民族解放斗争, 后来他成了处于绝境的广大手工业者的代言人 (手工工人这时在人数上依旧是工人阶级里的一个重要部分, 而且可以算作宪章运动里的第三个力量)。他们主要是通过反抗济贫法的骚动参加到宪章运动中来的。奥康诺主持的《北星报》最初就是反对济贫法斗争的机关报, 后来才成为宪章运动的报纸的。应当注意的是, 该报出版于里子, 因为西雷丁区是手织工人的强大堡垒和反抗济贫法斗争的中心。

他们是宪章运动中最活跃的力量的一部分, 这些人在早年参加过大规模的运动和火把游行。这些处于穷途末路的人随时准备斗争, 但他们的人数在逐渐减少。由于他们的悲惨遭遇, 他们是一股力量, 可是他们向往过去手织工人的工人侧身劳工贵族之列的兴盛时代。许多人还能记得在早年——约在 1800 年——他们每星期能赚到 20 先令或更多一些, 但到了 30 年代的后几年间, 一般的工资只有 6 先令或 7 先令了。他们的情况清楚地反映出—

事实，就是英国工人阶级依然是一个新的阶级，依然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手工工人依然在缅怀过去，希望再回到过去的好日子中去。迟至 1851 年的户口调查的数字表明，所有的大城镇里从外边迁移来的人口仍旧多过当地人，这个事实说明英国工人阶级是怎样的不成熟。

成千上万的爱尔兰移民，在外来人口中占着一个重要部分。1841 年单兰开夏一地就有 133,000 人，1841 年和 1851 年间，据估计又有 50 万人来到英格兰和苏格兰。他们大多数属手织工人或非熟练工人，因此在运动中他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是逃避饥饿和贫困的难民，他们来的地方比英国任何地方都更要贫困。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常常愿意接受远低于当地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条件；于是当地工人总是仇视爱尔兰人，认为他们影响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爱尔兰人带来了斗争的传统和对政府的憎恨，常常欣然加入工会运动。有一个雇主抱怨说：

“爱尔兰人比较喜欢闹事，常常提出无理的要求，因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并且用罢工或恶言来强迫雇主接受他们的要求。”（哈蒙德著《暗淡的时代》，第 38—39 页。）

对英国工人运动，爱尔兰提供了杰出的人物，如道尔蒂、奥布林和奥康诺。同时爱尔兰工人在宪章运动中占据着光荣的地位，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爱尔兰人大同盟”在英国的支部常常做为有组织的团体参加斗争。取消英格兰和爱尔兰联盟的要求，在宪章运动的领袖中占居着显著的地位。

最后，还应当谈一谈受雇于工厂生产的工人群众。他们是运动中最进步的部分，在他们的队伍里，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是最一致的。他们是宪章运动大军中最坚定和最可靠的部分。可是他们有两个缺点我们应该注意。第一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

他們沒有产生自己的領袖。第二，和前面的缺点有着密切关系的是，政治运动与工会之間的脫节。个别的工会成員也許而且也常常是宪章运动的支持者，但是工会作为組織却袖手旁观。他們有一种錯誤的看法，认为政治斗争不是它們的正当任务。地方工会倒常常給宪章运动以較多的直接支援，例如亚伯丁的各工会都参加了1843年8月欢迎奧康諾的游行。他們在“队伍整齐的面包工人联合会的率領下，高举着工会旗帜，穿紅色衣衫，包着华丽头巾。”（《宪章运动在亚伯丁》原稿。）

矿工可以看作是运动中有关系但又稍有不同的集团。宪章运动在所有的矿区中都得到了热烈的支持，武装起义的思想也以在矿工中間最为强烈。

从所有这些情况看来，宪章运动不是一个简单的，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运动。各方面团結一致，才有可能进行宪章运动，而他們之所以能够团結，原是各种特殊境遇的結果，同时团結中的意見分歧又导致了严重的內部矛盾和混乱。团結因素的消灭引起40年代后期宪章运动的迅速衰落，并且使得这个运动在1848年以后不可能再从失敗中恢复过来（这次失敗从表面上看，并不比1839年或1842年的失敗更彻底或更有决定性）。

但是在1838年的时候，胜利似乎已在眼前，大多数人以为在几个月內，最多不出几年人民宪章就会成为法律。随着5月21日格拉斯哥举行的集会，所有的大城市都举行了同样的集会：在新堡集会的群众达8万人，布拉德福德有10万人，伯明翰有20万人。声势最浩大的要算是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开沙尔—摩尔的集会，在那里参加的人数約达25万人，无怪梅科伯說，“这可能是英国有史以来規模最大的政治集会了”。这次集会是在星期一举行的，該地区的工厂全数因而休业。

冬季来临的时候，兰开夏和約克郡的几十个城市都举行了火炬集会。在所有这些集会上，都搜集了請願书的签名，并选出代表去参加春季将在倫敦召开的代表會議，这个會議将为整个运动的领导机构和团结中心。

由于“通訊法案”禁止成立具有地方支部的全国性組織，要创立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党是有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宪章运动报刊就有了重要的意义。在約有十多种的地方报刊中，以奧康諾的《北星报》影响最大。它的报导和政治論文使全国的每个角落都联合起来。它的平均銷路在 1838 年就高达 10,900 份，1839 年春季更升至 48,000 份。在这个时期(以往和以后也是如此)，发行一份独立的工人报刊是推进工作的必要条件。

代表大会和提呈請願书的时期渐渐临近了，人民的情緒更激昂了。工人们开始訓練和武装起来，有时武装出席开会。領袖們面临着这样的問題：“倘若議會拒絕我們的請願——这是很可能的——那末应当怎么办？”羅維特和他的支持者的答复是：

“主要的是組織，交納会費(其中一部分应当用于文字宣傳和讲演上)以及教育群众进行自我改造，因为这是社会和政治幸福、賢明政府和純洁高尚制度的唯一的偉大泉源。”(薩尔姆·杜德著《当英国站起来的时候》，第 34 頁。)

“伯明翰政治联盟”也主張采用和平和合法的手段，但比較強調煽动群众进行騷乱。少数极左派就已經提出，最后必須准备通过武装起义使人民宪章获得通过。奧康諾和絕大多數的領袖們都拒絕这种作法，可是他們自己又沒有明确的办法。有些人希望单靠革命的威胁，而不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就能获得胜利。另一些人則侈談总罢工，但也提不出明确的目的和具体的办法。

結果是，到了 2 月 4 日在却林十字路口附近柯克司浦街“英国

旅館”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們还是在反复討論这些問題，做不出任何具体的决定。最后在5月才通过了一个折衷的決議案，宣布政府正在武装富人来对付穷人，并說根据宪法人民有武装自己的权利，但是該決議案一再強調輕率地或在时机未成熟时使用武力的危險，实际上等于不主張行使这个权利。

可是政府却毫不犹豫。軍隊开到了曼彻斯特、約克郡、諾丁昂、南威尔士和其他鬧風潮的中心地区。政府一边宣布携带武器为非法，同时却积极准备武装上层階級作为特別警察。接着一批人被逮捕了，其中有亨利·文森特，他是代表大会的重要人物，这时正在南威尔士和西部地方主持一次如火如荼的騷动。代表大会感到本身受到了威胁，等到把有1,250,000人签名的請願书在5月7日送交議會以后，便决定迁移到伯明翰去，以便和运动的核心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代表大会受到了伯明翰工人的热火朝天的欢迎。这时阿特伍德和其他右翼代表們早已离开了代表大会，一批比較果斷的人，代替了他們的位置。大会决定准备在圣灵降临节那天各地同时举行會議，以提醒政府請願书是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的。代表們回到自己的地区进行准备，代表大会宣布休会到7月1日。

复会后，在伯明翰的“賽牛場”里，几乎連續不断地举行群众大会。7月4日的大会，被特地从倫敦調来的警察，仗着軍隊作后盾，野蛮无理地驅散了。参加开会的麦克杜尔和泰勒遭到了逮捕。代表大会提出强硬抗議以后，罗維特和科林斯也随着遭到逮捕。7月12日，議會以235票对46票拒絕了請願书。7月15日，警察的挑畔行为引起了伯明翰群众暴动事件，店鋪和堆棧被纵火燒毀。特別應該提出的是，这次虽有相当的破坏，却没有发生掠夺搶劫的事情。

这些事件引起了普遍的混乱，各地武装和操练的消息频传。贴在莱因下亚士吞教堂门口的一张布告可以反映当时群众的情绪：

“亚士吞的人们，要不‘大家都有面包吃’，要不就‘大家流血’。准备好你们的匕首和枪，你们的矛和孔格雷夫火柴^①。大家整队前进，没有面包就流血，不能活着就死掉。牢记着，1,280,000人要求面包的呼吁被讥笑为可笑的诡计。啊，你们这些专制魔王！你们认为你们的监狱能够阻挡了我们吗？”
(霍佛尔著《宪章运动》，第158页。)

早些时候，有一个宪章运动的使者，即陶器工人工会的约翰·理查德，在他的报道里发表了一个类似的决议案：

“在里克，我看到工人们的生活已经降低到人类天性难以容忍的限度。许多人公开说，他们每天劳动15小时，最多每星期也只能赚得7至8先令……我恐怕‘和平、法律、秩序’的格言他们是听不进去的，在那些地方的流行的语言是……与其饿死，不如在刀下丧生。”(霍佛尔著《宪章运动》，第131页。)

7月16日，代表大会在一个出席人数极为可怜的会议上决定从8月12日开始举行总罢工。但没有采取任何实现这个决议的措施，代表大会和工会之间似乎没有联系，如果没有工会的支持，总罢工当然是无法实现的。7月22日，这个决定改变了，改为采取示威罢工“二天或三天，以便集中全部时间作庄严的游行和集会”。这个决议获得了兰开夏和约克郡许多地方良好的反应，特别是在杜兰郡，那里许多矿工都停止了工作。

这个承认软弱的退却，鼓励了政府，8月里政府开始大批捕

^① 孔格雷夫火柴系由英国 Sir William Congreve (1670—1729) 发明的一种火柴，一划就着。——译者

人。不久，几十个宪章运动者被投进了牢狱，其中包括运动的许多领袖。面对着这个打击，代表大会因缺乏领袖只好在9月12日宣布解散。大会没有再做出任何其他决议。但宪章运动并没有因为这个镇压和这个退却而消灭，它转入地下活动，许多秘密的委员会开始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这里我们进入了宪章运动史上最暧昧不明的阶段，知道事实的人从未讲起过，而所有当时的记载又都充满了矛盾和不足征信。

看来各方面似乎制定了计划，准备以布拉德福德、南威尔士、伯明翰（或者还有其他的地方）为中心，在1839年底一同起义。但只有威尔士酝酿成熟，首先举事。11月3日，几千来自蒙默思河谷的矿工进入了纽波特，希望来一个夜袭占据该城。天雨和黑夜延迟了进军的队伍，等他们在晨光稀微里到达纽波特时，他们遭到了埋伏在西门饭店中的军队致命的攻击。他们猛攻该饭店达20分钟之久，终未攻下，结果14人被打死，50多人受伤。以后几天内，有125人被捕，包括他们的领袖约翰·弗罗斯特，他是当地的一位有名的人物，曾经做过纽波特的市长。

如果纽波特起义成功，这可能成为南威尔士和其他地区总起义的信号。在审讯弗罗斯特时，有人作证说弗罗斯特曾经说过：

“他打算把桥炸断，阻止威尔士的邮件达到伯明翰。他说，那边的代表们将在邮件脱班后等候一小时至一小时半，倘使邮件不来，他们就攻打伯明翰，从那里再蔓延及整个英国北部。”（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158页。）

11月3日后，各地断绝计划起义，可是由于他们彼此没有联系，而一无收获。虽然设菲尔德于1月11日发生了袭击警察局的事件，同时在布拉德福德也有起义的计划，可是他们的领袖们被暗探告密而被当局逮捕。这时，警察派遣的暗探在运动内部十分活

跃，由于他們的告发，許多人被捕了。到了春天，将近 500 个宪章运动的領袖关入监牢，其中有奥康諾、奥布林、罗維特、斯蒂芬斯、本鮑、罗伯特兄弟和文森特。

在紐波特起义后，宪章运动者的活动一連有好几个月集中在为被捕者的辯护上，尤其是弗罗斯特和其他紐波特的領袖們，因为政府以謀反罪向他們提起公诉。宪章运动者发起筹募“辯护訴訟基金”，当弗罗斯特、澤法奈亚·威廉斯和威廉·琼斯被判处死刑时，成千上万的人在抗議书上签名請願。群众的情緒非常激昂，政府找了一个法律上的借口趁机下台，把死刑改为流放。在此以后，騷动减少了。从 1840 年起，反动势力似乎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大多数領袖都被关在監獄里，許多宪章派的报刊停止出版，虽然《北星报》还依然存在。看起来宪章运动好像从此結束了。

4. 宪章运动的复兴和衰落

在 1840 年中，監獄內外的宪章主义者作了深刻的反省。結果，他們认为他們缺少一个具有集中領導并和工会运动具有更密切联系的更为坚强的組織。因此当宪章运动在这一年年底恢复的时候，它开始具备了比較明确的工人階級性质。伯明翰中等階級激进分子已經脫离了运动，同时罗維特和科林斯从監獄里出来以后和大多数“倫敦工人协会”的老人搞教育計劃去了。这些計劃后来大部分都流产了。

新思想的主要結果是組織了“全国宪章协会”，这个协会可以說的头一个真正工人階級的政党。加米季在他的《宪章运动史》中写道：

“协会的基础自然是人民宪章；大家同意只能用和平和宪法上規定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凡願入会的人，只須他們宣称

赞成协会的原则，就可以加入协会为会员。入会者有一张会员证，每季更换一次，每张会员证收费两辨士。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员以每 10 人为一组，每组有一个组长，由执行委员会指派。执行委员会由 7 人组成，其中包括一个秘书和一个司库……执行委员会和全委会一样，每年选举一次——前者由全国会员过半数票数选出。”（第 197 页。）

“全国宪章协会”的章程措辞委婉而谨慎，极力避免触犯政府取缔“通讯会社”的法律。尽管如此，它还是发展得很快，在 1841 年底它已拥有 282 个分会，第二年它的会员人数已达 50,000 人。所有会员是否都能每星期按期缴付 1 辨士的会费，我们还不清楚。这个组织的作用可以从第二次全国请愿书有 3,315,752 人签名这个事实上看出来。早在 1841 年 5 月就有 200 多万人签名要求释放弗罗斯特。

想把宪章运动和工会运动结合起来的企图，收获是不大的，虽然麦克杜尔这时认真地设法在工会内部建立宪章运动的组织。协会也注意到选举政策的问题。由于选举权的限制在绝大部分地区，宪章运动者的候选人都没有当选的希望，同时在经济方面，他们也没有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竞选。他们曾经想用候选人第一次在国会议员选举场和群众见面时举手表决的办法。在这个场合中宪章派人物常常能够获得胜利，于是他们想到假使各地都采用这个办法，那就可以选出真正代表人民的议员。这个方案始终没有实现，但这再一次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人民议会的概念在这个时期中被一再提出来。

宪章派的人物正确地认识到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是一个由全国一小撮少数人所选举并只代表他们利益的阶级议会。他们希望选举一个具有高度道德标准的议会，这些议员即使不是按照严

格的法律程序选出来的，也是由广大人民选出的。他们希望这个议会能独立工作，希望它的广大的代表性能够使它代替有钱人的议会。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因为他们始终没有面对这样的议会须具有强制力量的事实，但除非它成为一个具有足够力量和决心的革命运动的工具，否则它是无力行使它的权力的。因此，事实上他们没有面对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从旁边绕了过去。

在1841年，被捕的领袖一个一个获得了释放，宪章运动便又卷土重来。新的报刊出现了，宪章运动宣传员到各市镇去讲演，开始吸引愈来愈多的听众。他们和中等阶级的“反对谷物法同盟”展开了斗争，该同盟企图以降低粮价的诺言来骗取工人的支持。宪章派的策略是出席参加该同盟的会议，而当他们提出通过废除谷物法的决议时，就提出通过支持人民宪章的补充决议。宪章派常能控制该同盟的会议，揭露了雇主一面假装成工人的朋友一面忙于削减工资和维持过长劳动时间的伪善面目。

1841年8月30日，奥康诺从约克监狱释放出来，于是第二次请愿运动开始了。由于运动的巩固和加强，以及许多旧领袖已经脱离了运动，奥康诺当然就成了宪章运动的重要人物。这样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集中。运动内部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没有像过去那样的破坏作用。虽然奥康诺有着巨大的魄力和无限的精力，虽然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鼓动家，但他却缺乏组织和领导一个政党的能力。他虚荣心很大而且专断独行，最糟的是他没有固定的政治见解，同时他也不了解工业革命在英国所造成的变化。所以，他倾向于接近比较落后的工人，那些怀念过去的工人们。他把农民美化了，他所向往的社会主要是一个由个体农民组成的社会。在这方面，他和那些最近离开土地参加工业生产的千万宪章运动者的看法是一样的。这一部分人经常怀恋过去乡村中的生活，他

們閉眼不看农村中飢餓和剝削的真實背景。由于他抱着這樣的觀點，所以在生死鬥爭的緊急關頭，他對他的領導工作就不能勝任了。1839年發生的事情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在領導導致1842年請願運動的騷動方面，却是他的拿手好戲。這次提出的請願書比1838年在伯明翰提出的還直接了當得多；它直接訴之于工人，而且表達了工人心中的悲憤。請願書在提到了“濟貧法”，講到了國家每年花在供養皇后和皇室的龐大費用和控訴政府逮捕及虐待憲章運動者之後，請願書接着寫道：

“你們的請願者控訴：勞動時間，特別是工廠工人的勞動時間，被延長到超出人們所能忍受的限度以外，在高溫和簡陋的廠房內進行非人的勞動，所得工資又不足以維持體力和取得因體力過分消耗而迫切需要的那些物品。”（比爾著《英國社會主義史》第2卷，第132頁。）

在5月，這份請願書送交議會，結果以287票對49票遭到否決。議會中的辯論要以馬考萊的發言最值得注意，這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受人崇拜的文學大師，把資本主義對民主的態度說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我是反對普選權的……我認為文明是建築在財產安全的基礎上的……因此我們決不應該把國家的最高權力委托給一個明顯要嚴重和系統地侵犯財產安全的階級，這樣做是太危險了。……請願書要求最高權力；要求把全國各個團體的資本和積累的財富完全交給勞動階級。這會造成怎樣的結果，難道不是很清楚的嗎？”（馬克斯·比爾著《英國社會主義史》第2卷，第135頁。）

請願書被否決了，代表會議面臨了在1839年使它遭到失敗的相同的問題。代表大會再一次表明，它無能力作出任何有效的決

定。但至今继续 6 年之久的经济危机在各地都达到了顶峰。失业人数超过了 100 万。手织工人和织袜工人已濒于完全绝望的境地。工厂主和矿主一再削减仅够工人维持生命的微薄工资。8 月初在拉纳克郡有 20,000 矿工开始罢工，该地工人的工资，在 5 年中从每日 5 或 6 先令降到了每日 2 先令 6 辨士或 2 先令 9 辨士。矿工工会书记于 8 月 13 日发表在《北星报》上的一篇文章说：

“煤矿和铁矿工人们的平均工资为 7 先令 7 辨士半到 2 先令 5 辨士半，可是劳动时间较他们在一年前每天得到 9 先令时还要延长 $\frac{1}{3}$ 以上。”

理查德·皮林系兰开夏棉织工人的领袖，因参与了伟大的 8 月罢工而被逮捕，在受审时，他在法庭的被告席上陈述了他穷困的经过。他说他从前是一个手织工人，到了 1830 年，他的收入降到每星期 6 先令 6 辨士，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进了工厂。在工厂里工人的工资一再被削减：

“1840 年，制造业雇主……通知我们工资要减低 1 辨士。有些人会想，1 辨士算不了什么。但在一年当中积累起来等于 5 个星期的工资。……那次的削减以后，雇主还不满足，他们又减了我们 1 辨士。此外又把每星期仅赚 9 先令的纺织工人的工资减少了 2 先令，把每星期仅得 8 先令的梳毛机纺工人的工资减少了 1 先令 6 辨士。”（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 181 页。）

最后使他们忍无可忍的是，雇主又要求削减 25%，于是工人一致决定坚持反抗到底：

“我工作的时间愈长，愈勤奋，我就愈穷愈苦，一年不如一年。到最后，我差不多已经精疲力尽。如果雇主再拿走我的工资的 25%，那我与其在棉纺织厂一天工作 12 小时，只吃点

洋山芋和盐慢慢累死，倒不如现在自杀的好。”（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183页。）

由于这些原因，在1842年的夏天，继长期的经济不景气之后，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6月和7月斯塔福德郡和窝尔维克郡的矿工和铁工首先罢工。一个矿场或一个铁工厂停工后，工人们就整队出发到邻近的矿场和铁工厂去动员该厂的工人罢工。整个这次运动常被称为“塞子骚动”，因为工人在这次运动中常常用敲坏锅炉塞子的办法来保证罢工。不久，罢工运动席卷全部北方工业地区，并且蔓延到苏格兰和威尔士。8月初，兰开夏的各棉纺厂，在斯塔莱勃立奇、亚士吞、海德也开始作同样的罢工。8月9日，曼彻斯特因周围市镇的工人联合进军也罢工了。伯恩利在这个月13日也开始罢工。不久这种风潮传到约克郡的陶器工业区和其他地区。

在罢工风潮发展的同时，它的性质也在发生着变化。十年来发生的事件已经教训了工人，他们知道单纯依靠罢工而不对社会进行政治改革，是不会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东西的。各地开会通过了“在人民宪章未成为法律之前，决不上工”的决议案。然而“全国宪章协会”并没有领导这些活动。他们碰巧选定于8月13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会议，在彼得卢周年纪念这一天为亨特的纪念碑揭幕，并讨论其他内部问题。代表们惊奇地看到这个城市处在罢工的状态中，于是他们急忙改变了他们的预定议程，来讨论当前新形势。

过去的犹豫不决，立刻又重新显露出来：大多数代表对这次罢工都表示赞成，但是少数人已经认识到只有把罢工当做革命的第一步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其中之一就是麦克杜尔，他比他的同伴具有更丰富的工会运动经验。由于他的建议，会议拟就了一个宣言，如果他们采取了使其实现的措施，它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而

动人的宣言：

“同胞們，你們兄弟們的鮮血，染紅了普勒斯敦和布萊克本的街道，可是凶手們渴望得到更多的血。要剛毅，要勇敢，要做个好男儿！……我們完全准备好了，你們的义举将在3天内得到我們的全力支持。……在这个生死关头必須坚决；你們要拥护你們的領袖；為我們的神圣事业而團結起来；让正义之神和战斗之神来决定成败吧！”（梅科伯著《1832—1852年的英国激进主义运动》，第240頁。）

可是这个會議沒有商得任何具体措施就散会了，任凭罢工在沒有集中領導的情况下繼續进行。更坏的是奧康諾在《北星报》上猛烈抨击麦克杜尔。他譴責罢工是“反对谷物法同盟”企图减少工資和轉移人民对人民宪章注意力的陰謀詭計。

既无領導和組織，又缺乏經費，在这种情况下罢工注定了失敗的命运。然而它仍然頑固地坚持到8月下旬，有許多地方甚至坚持到9月里。在布萊克本、普勒斯敦、哈利法克斯、斯塔福德郡北部的陶器业区和其他地区都发生了巷战和騷乱。当工人們被迫退却以后，政府便开始大批逮捕罢工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被捕者共达1,500人，其中約有700人受到审判。麦克杜尔是嫌疑最重的人物，而且受到了奧康諾的攻击，他不得不逃亡国外。

反动派再次获得了胜利，运动迅速地崩潰了。它的报刊銷路一落千丈，“全国宪章协会”會員減至4,000人。在这次运动中宪章派領導的袖手旁观断絕了和工会合作的一切希望。果然，在1842年年底，市面繁榮虽然沒有出現，但蕭条景象却开始好轉了。于是工会开始回到它的狹隘的利益打算上去，越来越多地注意职业問題而忽略政治問題。1842年經濟危机是宪章运动取得胜利的最好而且恐怕也是唯一的机会，但是由于領導上的失策，致使坐失

良机。

1842年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这事一部分发生在8月危机前，一部分发生在8月危机后。1841年年終，自由貿易主义者、教友派教徒約瑟夫·斯特季組織了“全体参政同盟”，企图为中等階級夺回激进运动的领导权。該同盟採納了全部“六点要求”，可是拋棄了它在宪章运动中所取得的階級实质。斯特季赢得了几个前宪章派分子的支援，其中包括着亨利·文森特(監獄生活似乎摧毀了使他在1838—1839年成为最干练的鼓动家的精神)和在早年大力鼓勵工人階級采取独立行动的奥布林。

1842年4月和12月举行的會議，使斯特季遭到了失敗，并部分地被孤立起来。“全体参政同盟”沒有能够取得对大多数工人的领导地位，从而达到他們替代或破坏宪章运动的目的。但它还是吸引了一部分工人，特别是手工艺工匠和熟練工人，他們觉得跟在中等階級后面要比独立进行斗争来得安全和体面。

1842年的失敗以及宪章运动的迅速崩潰，使奥康諾的思想轉到另一个新的方面去，說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又回到他的老想法上去——小农制度和建立农业試驗場。1843年，他实行了他的“土地計劃”，并邀請工人一同参加。

《北星报》发表了“土地計劃”的目的是：

“购买土地，安置它的會員們，以向全国的工人階級证明：第一，土地可以使他們摆脱資本家的压榨；第二，必須使人民宪章迅速获得通过，因为人民宪章通过以后就能使該会把在局部範圍內取得的成就扩展到全国去。該会的基本目的是解放被奴役和被侮辱的工人階級。”

当筹集了足够款項以后，他們举行投票选举，当选的人可以在“奥康諾区”或别的宪章运动者的試驗場中領得一所房子和一小块

土地。这个计划最为手工艺工匠和刚刚参加工业生产的工人所欢迎。他们湊集了8万鎊經費，开办了好几个試驗区。这些試驗农场全数失败了，因为全部计划完全是一种烏托邦的幻想。但在40年代中間，它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就是在困难时期中它維系了运动。

宪章运动第三次和最后一次的复兴是在1847年，当时它处在一个新的而基本上不利的环境中。过去使全体工人阶级团结在人民宪章周圍的特殊条件已不复存在。熟练的和有組織的工人轉向狹隘的工会活动的傾向現在已經很明显了。由于宪章运动的压力而获得的胜利果实也助长了这一傾向。1847年夏季通过的“十小时工作制法令”就是广大群众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但是这次的騷动主要是由人道主义的保守党人如理查德·奧斯脫雷和謝弗特伯爵勳爵领导的。这个法案的通过使許多工人产生了不通过政治斗争，用其他方法也能达到他們目的的思想。同样，虽然宪章运动者对“反对谷物法同盟”进行了斗争，但还是有許多人受了廉價粮食宣傳的影响，把1846年廢除谷物法看成是政府的一个重大让步。

同时，资本家也用很小的让步收买了部分工人，叫他們脱离运动。1837到1842年的长期危机到此結束，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大好时代正在开始，它只在1847—1848年受到一次虽然剧烈但为时甚短的经济蕭条的阻碍。这时候铁路扩张正方兴未艾，工厂生产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出口业在迅速地发展。大約从40年代中期以后，有組織的熟练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似乎有了一些改善（但非熟练工人的境况还是和以前一样）。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曾为宪章运动大軍重要骨干的龐大手工业工人群众，現在正进入了他們衰落的最后阶段。他們不再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了。

由于这些原因，人民宪章已不再能代表整个工人阶级了。它

变成了非熟练工人和富于战斗性的在政治上进步的少数派的事业。这也許正是宪章运动的最后衰亡与它在政治認識上的突飞猛进同时发生的原因。少数派从以往的經驗里取得了教訓，但是已經太迟了，这时候已不可能再掀起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了。所以当1847—1848年宪章运动再次复兴的时候，它的基础比以前更加狭窄了。

1845年，宪章运动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欧内斯特·琼斯。他的蓬勃的精力和魄力很快使他成为一个杰出人物，他了解必須有組織，也懂得宪章运动是一个阶级力量，这种認識在宪章派領袖中还是少有的。琼斯和乔治·朱利安·哈尼是宪章派中两个最接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物，他們吸收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大部分的科学观点。

1847年宪章运动复兴的那年正逢議會进行大选，奥康諾在諾丁昂选举中获胜，而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宪章派国會議員。在諾威治有一个宪章派人物几乎击败了惠灵吞公爵的儿子，相差不到100票。可是琼斯、哈尼和其他等人在选举中都不很成功。奥康諾当选的重要收获便是他在議會里为爱尔兰問題所作的斗争，使宪章运动者与爱尔兰的民族运动接近起来。爱尔兰运动，自丹尼尔·奥康奈耳逝世后，經過了改組斗争性大大加强了。

那年秋季，兰开夏发生了大規模的罢工。爱尔兰的饥荒（饥荒的原因与其說是洋山芋歉收不如說是因为农民們遭到地主們的掠夺）正在发展成为灾难。失业的人数在逐漸增加。“全国宪章协会”开始恢复了，并且策划草拟一份新的請願书和召开一个新的代表會議。这恐怕正是这个运动弱点的象征，它沒有提出任何新的內容，而只是重复过去已經失敗了两次的老办法。

然而2月里法国革命爆发了，革命迅速地席卷了全欧洲，給了

宪章运动复兴以巨大的推动力。在伦敦和格拉斯哥，失业工人举行了巨大的示威运动，并发生了持久的暴动。政府立刻乘机把宪章运动和暴动与外国革命混淆起来，在上层和中等阶级里制造恐怖气氛，这甚至于也迷惑了一部分工人。

第三次的请愿运动就是在这种空气中进行的。他们决定在4月10日将请愿书递交议会，打算先在坎宁顿草场召开一次盛大的集会，然后整队向威斯敏斯特出发。但政府巧妙地利用了它和报刊所制造的紧张气氛，借口有人在阴谋政变，调集了大批军队和上千的特别警察。依仗着这种武力，政府宣布坎宁顿集会或者可以准许召开，但不准结队游行到威斯敏斯特。面对着这个威胁，宪章派领袖们只得决定取消游行，以免造成流血。结果这个有1,975,000人签名的请愿书竟由一个人数很少的代表团送交议会，这大大违背了奥康诺以前的主张和群众的期望。政府非常得意，因为它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

假如4月10日是一个重大的失败，这还不是资产阶级对宪章运动的神话所想像的那样最后的失败。富有战斗性的领袖们——琼斯、哈尼、基德、麦克杜尔和其他各人——并没有气馁。他们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那就是运动需要一个更坚强的组织，没有这种组织而仅靠骚动是不会得到永久性的效果的。从4月到5月，伦敦、兰开夏和西雷丁差不多每天都有集会，而且渐渐地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听众。苏格兰开始组织了一个“国民自卫军”。宪章运动与“爱尔兰人大同盟”的联系也加强了，如果1848年夏天计划在爱尔兰举行的起义不流产的话，恐怕宪章运动者就会在英国进行一个相同的起义。

政府并不因4月10日的胜利而松懈，它提高了警惕，并采用了更加残暴的镇压手段。全国各地都动员了军队和特别警察，集会

常常遭到野蛮的破坏。大规模的利用密探钻进运动中来进行破坏。新的逮捕浪潮又开始了，首先于6月6日逮捕了欧内斯特·琼斯等人。

琼斯在看押候审时间送出来的一封信，概括了他对运动在未来发展的看法：“加强我们的组织”，“扩展这个运动”，“告诉群众人民宪章的意义和斗争必胜的信念”，“最重要的是叫他们关心手艺人，这些人是工人阶级的精华。”（盖维尔著《宪章运动者欧内斯特·琼斯》，第106—107页。）这些是激进分子重建宪章运动工作的原则。但在资本主义即将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这种原则对运动处于低潮中的工人阶级是不适用的。

这时，政府在全国所执行的恐怖统治已经发生了效果。6月、7月和8月，遭逮捕者有数十名之多。法国、德国和爱尔兰革命运动的失败造成了一个沉闷的局面，同时警察密探的活动所产生的疑惧也令人沮丧。基德在8月5日写道：

“同胞们——恐怖统治有加无已，而且愈来愈逼人和恐怖了……我们的政治空气这样沉闷，我们差不多都要窒息了。谣言频传，而且倏忽不定，每个人都是战战兢兢，草木皆兵，在这个时候，保持头脑冷静也需要一定的胆量。从这种混杂纷乱中，进行指挥更是要有勇气和坚强的神经。”（《北星报》，1848年8月5日。）

9月，运动显然被破坏了，最优秀的领袖都被捕下狱了，宪章运动的队伍瓦解，人们举足不定。然而宪章运动并没有死亡，在以后的几年里它仍然能继续发展着，并在整个工人阶级运动中留下了永恒的影响。但是这些事情最好放在下一章里讨论吧。不管怎么说，1848年以后，宪章运动的确没有再作为一个伟大的全国性的运动出现过了。

从表面上看来宪章运动好像是一败涂地。但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它所提出“六点要求”虽然没有得到实现，但是这个运动和宝贵的“十小时工作制法令”、“1842年矿井法令”和“1844年工厂法令”的获得通过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恩格斯以后所写的：

“所以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多年以来，就在为争取人民宪章而热情地战斗着……他们被打败了，但这场斗争在得胜的中产阶级之间留下了那样深刻的印象，致使这个阶级，从那时以后，甘愿以对劳动人民不断的让步作代价，买来比较长期的休战。”（《英国工人运动》，第19页。）

更重要的是，宪章运动不仅是英国的，而且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真正工人阶级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工人阶级在这个斗争中学会了各种各样的策略和方法，这个实际和理论财富并没有随1848年的失败而消失，而是传留下来，并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一部分。在宪章运动的大部分时间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英国，他们不仅向宪章运动者提供了意见和忠告，同时也向他们学习。宪章运动斗争的经验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作用。

不仅宪章运动的经验教训没有消失，几千个积极的宪章运动者也没有在1848年以后突然停止活动或背弃他们的信仰。^①在以后的15年到20年里，无论那里只要有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工会、合作社或政治运动，就有前宪章运动者参加。他们的活动方式虽然各不相同，但始终保持着宪章运动的基本信念——所谓民主政治就是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劳动人民从1832年到1848年的斗争中首次获得的明确信念，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过，而是从宪章运动一

^① 有数千宪章运动者带着他们的民主信仰和传统迁往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直傳留到我們今天的运动。

宪章运动这一次虽然没有贏得它的“六点要求”，但在历史上却具有重大意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的工人阶级第一次独立进行的政治斗争，也是我国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成长和英勇斗争的一頁。

第三章

发展的新方向

1. 宪章运动的余波和新模范工会

十九世紀 40 年代的后期, 是英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轉折点。这几年, 在政治上, 标志着随資本主义兴起而发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結束, 这个斗争从法国革命到宪章运动以各种形式进行着, 几乎沒有間断。在經濟上, 标志着英国資本主义的成熟和稳定, 同时也是一个繼續扩張时期的开始。从 1848 到 1874 年間, 只发生过两次經濟危机, 一次发生在 1857 年, 一次发生在 1866 年, 这两次危机不論在時間和程度上都不及 30 年代和 40 年代早期的危机那么长久和严重。在这个稳定和扩張的时期中, 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采取了新的和較比妥协的形式。

十九世紀中叶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 由于运输方面的革命性的变化, 資本主义越来越集中。1843 到 1853 年間, 巨大的铁路系統的主要干綫已經完成, 貫通了倫敦和所有重要的工业区。英国这时已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市場, 在这个市場里, 任何地区的产品能够迅速而輕易地运达到任何其他地区。虽然还有几千英里的铁路綫等待修筑, 不过那些都是次要的路綫, 只是补充和加强主要的干綫。同一时期, 輪船不仅改进了沿海的貿易, 而且可以把英国工厂的商品便宜而迅速地运往世界各地, 同时把粮食和原料运回本国。

銀行和財政系統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同时在工业中,也出现了重要的技术改革,特别显著的是鋼的生产,鋼首次以低廉的价格大量生产,在许多用途上代替了鑄铁和鍛铁。最后,这一时期出现了生产力和輸出品不断的巨大增长,总的說来,这些輸出品反映了工业的发展。棉織物和毛織物仍然是最重要的輸出品,但是在1850到1872年間,煤的出口在价值上增加了5倍,机器出口增加了4倍。

資本主义的生产,这时在美国和西欧許多国家中正开始扎根,这一事实,更助长了英国的这些商品的出口。因为海外資本主义的初期发展,为英国的商品和新品种的貨物开辟了新的市場:譬如,在十九世紀50和60年代,世界上的铁路大部分是由英国修建的,每一条新铁路,不仅意味着为英国重工业提供新市場,而且也等于为英国消費品的輸出开辟了新的地区。在这几年間,英国的雇主們每当要削減工資或面临增加工資的要求时,总喜欢提到外国竞争的危險,可是在这个阶段,根本就不存在足以发生影响的国外竞争,直到1875年左右,海外資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是美国和德国的发展,才开始真正地威胁英国的壟断地位。

大約有30年的時間,英国的資本家們处在一个左右逢源的天地中,市場的扩大和利潤的不断增长似乎成了一条自然法則,纵使是效率最低的制造商也能获得很大的利潤,而比較大胆和果断的人往往就可以一本万利。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运用一种非常有效的两面政策来对付工人,这就是极端残酷和明智适时的让步相結合的政策。

一方面,我們已經看到,而且在本章中还要看到,凡是会从根本上动摇現行制度的任何斗争和要求,都必然要遭受雇主和他們的國家机器殘暴的鎮压。另一方面,与此同时,当事情变得很明显,

工人下定决心要使用巨大的压力时，雇主們又随时准备在无关紧要的問題上作出重大让步，由于經濟扩展，雇主是完全有力量作这种让步的。我們已經看到，“工厂法令”和“十小时工作制法令”是怎样在宪章运动的压力下得到通过的。这种两面政策的运用一直延續到1850年以后。其次是，愈来愈多的熟练工人参加了强大的工会，坚强地組織起来了，因而能够在实际工資的增加方面获得較大的进展。第三，也是由于使用了巨大的压力，工人們在1867年終于贏得了相当的政治民主，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体制中，为工会組織取得巩固的合法地位。

但是，这里必須着重指出，第一，如果没有經過激烈的斗争，这些收获是决不可能获得的。第二，得益最多的主要是技术最高和組織得最好的工人。

因此，我們必須对这个时期中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对事物的看法和命运加以明确的区分。毫无疑问，熟练工人改善了他們的地位。他們的实际工資有了很大的增加，工时愈来愈短，工作环境也漸漸改善了。經過一系列的坚苦斗争以后，他們的工会在社会組織中贏得了确定的合法地位。至于非熟练工人，他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善。他們的实际工資和工作条件实质上沒有多少改变，工业市鎮的住房和卫生情况也依然如故。这就是說，他們的景况依然恶劣得使人感到可怕。同样真实的是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比数在增加，受雇的情况比較正常。失业虽然仍然存在，但在1850至1869年間的經濟扩展中，失业的情况不像以往几十年那样广泛和长久。有人作过估計，从1852到1868年，大約有300万人移居外国，主要是移民到美国和今天所謂的自治領。

由于这些原因，工人們对事物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对許多人來說，似乎至少另外还有一条路可以摆脱他們的苦难，那就是

移民、小心翼翼地社会阶梯上往上爬、和通过組織取得极有限的成就。即使情况真像梅科伯所說那样，在 1848 年后，

“工人阶级对基本问题的主张并没有改变。对于普选权仍然保持宪章派的观点，对于经济和社会組織則保持社会主义的看法，至于信仰问题，大多数人是漠不关心的或是没有信仰。”（梅科伯著《1832—1852 的英国激进主义运动》，第 297 頁。）

可是人們的态度已經和从前不同了。宪章运动者所提出的口号成了籠统的希望，而不像在宪章运动时代，它們是几百万人願意为之进行斗争的目标。

由于这些情况，宪章运动虽然在 1848 年以后的 10 年間，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但它在逐渐衰微下去。尽管如此，它的傳統仍然存留下来，成为十九世紀 40 年代的偉大斗争与日后在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发展之間的极其重要的联系。如果在这 10 年中沒有欧内斯特·琼斯和其他人士的英勇奋斗，第一国际能否在 1864 年出現是很成問題的。

1850 年 7 月，琼斯被釋放出獄，他立刻再接再厉地进行鼓动工作。1851 年 3 月 31 日，宪章运动者在倫敦召开了一次會議，通过了一个新的政綱，这个政綱可以用一句口号来概括：“宪章和更多的权利”。实质上这个政綱包括了一个現代社会主义政党政綱的許多特征。它包括土地国有化、工作或維持生計的权利、“迅速廢除工資奴隶制和发展合作原則”，以及軍隊民主化。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綱領也不能使宪章运动再度成为偉大的群众运动。《北星报》在 1852 年停止出刊了，而琼斯的《人民周报》（1852—1858 年）虽然編得非常出色，在理論上比过去任何工人阶级刊物都跨进了一大步，但它的銷路却始終沒有超过 3,000 份。宪

章运动在有組織的工人中也不能起任何作用。因此，“全国宪章协会”虽然一般來說还有相当的影响，并能在某些有关眼前利益問題的斗争中得到群众的支持，但是它毕竟是在走着下坡路。

1853年，普勒斯敦紡織工人为了要求增加工資进行了罢工，宪章派当时动员了全国力量支援他們，但宪章派企图在这次斗争中建立一个“劳工議會”的野心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个显著的例子說明了他們潜力和影响的极限。宪章派最大的成就是在国际主义領域中，他們在支援波兰、意大利或其他国家进行解放斗争方面的倡議，往往能导致巨大的代表會議的产生。

但最能說明問題的事例，恐怕还是 1855 年反对政府禁止“星期日貿易”的法案的倫敦騷动。这个法案对于整天进行劳动在其他日子沒有空余時間的数十万劳动人民有莫大的关系。宪章运动者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把傳单、标語貼滿了全倫敦。

“‘新星期日法案’禁止窮人在星期日享受他們現在还在享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各种需要，如看報紙、刮鬍鬚、吸烟、吃飯等等。首都所有的手艺工匠、工人和‘下等阶层’将于星期日下午在海德公园举行一个‘露天大会’。他們要来看看貴族是如何虔誠地遵奉他們的安息日的，看看是不是像該法案提議人高罗斯文諾助爵所說的那樣，貴族在这一天甚至不願差遣他們的僕役和馬匹。集会定于三點鐘召开，地点在塞品丁右岸，靠坎星頓花园的一边。来吧，并把你們的妻子和儿女帶來，以便他們可以从‘上等人’給他們做的榜樣中得到教益！”（《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英国》，第 416 頁。）

大批群众——馬克思当时也在場，据他估計約有 20 万人——屆时在預定地点集合，警察虽尽力驅散，也毫无效果。来到公园的几百輛馬車，只好忍受群众的訕笑和那种刺人的倫敦腔的俏皮

話。第二个星期日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公园被“下等阶层的人”連續占据了4个星期，最后政府被迫撤銷了这个法案。这件事本身也許是微不足道的，但它清楚地表示了这时倫敦工人的階級感情的深度和敏感性。

但宪章运动已不再是工人階級活动的主流了，到十九世紀50年代末，这个运动开始衰退。由于它是逐漸慢慢衰退的，所以很难准确地說是什么时候消灭的。一位宪章运动的老战士于1859年10月在写給欧內斯特·琼斯的信上說：

“我很遺憾地报告你，在哈利法克斯以及邻近的乡村里都沒有宪章运动的組織了。……过去宪章运动中大部分的积极分子現在都迁走了。而其他留下的人，由于看到群众对自己利益的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感到非常灰心失望，他們决定今后不再为公共事业作任何牺牲了。”（薩維尔著《宪章运动者欧內斯特·琼斯》，第74頁。）

而哈利法克斯是宪章运动者坚持到最后的堡垒之一。对于非熟练工人，只是在如海德公园星期天那样的場合，他們才有发泄自己不滿情緒的机会。至于熟练的工人，他們有其他表示不滿的方法，特别是通过工会組織。

早期手工艺工匠的小型地方性的行业俱乐部和大型的富于斗争性但不稳定的产业工会，現在多半已經让位給全国性的巩固的行业工会了。这些工会都是高度的关門主义，經濟力量雄厚，领导集中，有专业的工会干部，并具有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观念。

我們已經看到，这些发展甚至在1848年以前就已經开始了。“陶器工人工会”創立于1843年，“全国排字工人协会”和“鉛玻璃制造工人联合会”成立于1845年，而机器业工人也已經有了强大的組織，其中最重要的有“蒸汽机工人和机器安装工人协会”，以及

“蒸汽机制造工人协会”。前者早在 1848 年就拥有会员 7,000 人，并以它的谨慎的政策和避免卷入任何政治纠纷而闻名。“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主要是这个协会的两个领导人威廉·牛顿和威廉·阿兰在 1851 年一手创建的。这个协会是第一个著名的所谓“新模范”工会，它的会章的主要内容不久就受到其他工会的广泛模仿。

但事实上，阿兰和牛顿的会章几乎原封未动地是他们从前工会的会章。而新模范工会也只不过是 10 年来发展的必然结果。真正新的倒是这些工会现在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很快就拥有 11,000 名会员，大多数都是伦敦和兰开夏的工人。但它还没有组织好就不得不为其本身的生存而进行斗争。它所发起的反对加班过多的斗争导致了 1852 年 1 月全国性的罢工事件（和现在一样，在当时这就是工人们斗争反对的项目之一），这正中雇主们的下怀，他们决定借这个机会乘它还没有成长壮大的时候就将这个“祸害”消灭。他们使用了强迫工人填写“保证书”^①的老办法，到 3、4 月工人们被迫复工。工会劝告工人签署“保证书”，但因为它是在强迫下签名的，所以可以不予理会。结果工人虽然罢工失败，但工会组织却完整无恙，会员人数几乎毫未减少。几年以后，会员又增加到 12,500 人。从此以后，会员人数逐步增加，同时它的雄厚的基金也是别的工会望尘莫及的。

既然“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成为一个许多大小工会群起效尤的模范，我们不得不问，什么是这个“新模范”工会的特点和信仰呢？

在组织上，它是一个全国性的行业工会，限制很严，只有本行业内学徒满师以后的正式技术工人才能参加。它是一个领导高度集中的组织，它有一个全国领导机构。地方分会，除章程有明文规定者外，不经它的许可不准擅自发动罢工或挪用经费。它的会费

^① 见本书第 71 页。

很高——往往是一星期一先令——它的經費除津貼罢工外，还作許多其他用途。它設有疾病补助金，喪葬补助金，失业补助金，还用作迁徙出境和旅行的补助金。工会本部經常反对會員罢工，因为他們认为罢工会損害工会的固定收入^①。因此，这种工会常常有退化成一种联誼会互助会的危險^②。

这个根本原因是它已放棄它原先的观点，在最初这种观念曾使“全国大会”宣告它的目的为：

“建立一种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內，只有社会上真正有用及智慧的人士，才能領導国家的事务。”

但漸漸劳动力系一种商品的观念，和正統派政治經濟学家由此而推断出来的劳动力的价值受供求“法則”支配的結論代替了以上的看法。恰如杜兰郡矿工領袖湯米·雷塞所喜欢讲的：

“青年們团结起来改善你們的生活。

当着缺乏鸡蛋的时候，鸡蛋是珍貴的；

当着缺乏工人的时候，工人是高貴的。”（見莫尔頓著《人民的英国史》，三联书店版，第365頁。）

因此，工会的主要目的不是企图改变社会秩序，而是限制劳动力的供应。这当然不是为全体工人階級着想，而是为个别行业的特殊技术工人的利益着想。他們的办法是限制該行业內工人的人数，将人人能做的工作进行不必要的复杂分工，反对額外加班，或鼓励工人迁移他地（但最后一項策略做得并不很成功）。由于这种观点，这个时期內所发生的罢工，其目的大都是为了减少工作時間与增加工資。很明显，具有这种观念的工会当然都是目光短淺、狹窄、排外的工会，除了它們自己組織得很好的特权团体外不关怀广

① 在1851年和1889年之間“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关于各种互助金的支出达2,987,993 鎊，而罢工津貼仅占87,614 鎊。

② 見本书第130頁。

大工人群众。他们希望改善他们的地位，但是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是尽量采取消极的示威或通过巧妙的谈判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不愿采取罢工的手段。事实上，当这些工会的力量和地位渐渐增长以后，这些特征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可是，虽然他们尽量避免罢工，但当罢工不能避免时，他们就坚决而顽强的进行斗争。我们已经看到“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在它刚刚诞生时是怎样应付它所遇到的难关的。这20年中充满了罢工和雇主闭厂歇业事件，在这些斗争中，工会领袖往往和工人群众一起为争取他们的基本权利表现了无比的能力和坚毅。而他们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工会组织的合法地位和一定生活水平的维持。

但这些工会对我们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而具体的贡献。它们带来了一种对组织和细节问题的关心，一种实事求是的责任感，没有这种责任感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永久性的收获的。它们使工会运动第一次成为千万工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可惜的是这些有价值的贡献没有能成为一个明确的阶级政策的基石，而常常只是到此为止。如果没有这些人无声无嗅的努力，工会运动将永不会达到当时那样的规模，同样，如果它们的这些策略后来没有蜕化，它们的原则没有被摒棄的话，工会运动也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成就。

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新的情况，产生了一批新的工会领袖。永久性的全国性的工会工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热心的工人在业余时间来担任，或是由像欧文那样的中等阶级的同情者来做了。工会工作需要专职的工会干部来做，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些专职干部具有着与他们所服务的工会相同的优点和缺点。不错，确如韦伯夫妇所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滴酒不进”。不喝酒和工作规律固然很好，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工会领导干部和工人会员之间在生活方式、兴趣和观点上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这

种领导与工人群众的脱节产生了一种危险，使这些领袖易于受到与他们接触日益频繁的上层和中等阶级人士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这些工会领袖中的一些最有影响的人物渐渐形成了一个集团，韦伯夫妇管这个集团叫做“议会”（Junta），虽然这个名称在当时似乎并没有被人采用。这个集团包括全国四大工会的领袖——“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威廉·阿兰，“混合木工协会”的罗伯特·阿普尔加斯，“翻砂工人工会”的丹尼尔·盖尔，“砌砖工人工会”的埃德温·柯尔生。此外还有乔治·奥杰尔，他是一个小制鞋工人工会的领袖。他的重要性是在另一方面，他是政治激进派中的著名人物，同时是1862年至1872年伦敦各业理事会的书记。他是这个“议会”的对外的发言人。当时伦敦工会界的重要人物还有W. R. 克里默，乔治·豪威耳和乔治·希普顿。

当十九世纪50和60年代中这些“新模范”工会和“议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另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活跃的工会。尤其是在英格兰北部，这些工会不像那样高度集中，但也很有朝气，它们保留着早先时代的斗争性。这些工会经常与“议会”发生冲突，不承认它有权代表整个工运说话。它们的发言人是乔治·波特，当时影响最大的工会刊物《蜂巢》的编辑。这些工会的弱点是，虽然在战术方面它们的斗争性比较强，但它们的观点和“议会”并无原则上的区别，所以它们也提不出任何新的不同的政策。

工人阶级力量的第二个主流是合作运动——这也是一个新型的运动。十九世纪初出现了几十个合作社，许多工人团体希望借此摆脱磨坊主的垄断，好吃到廉价而未经掺假的粮食。这些早期的合作社几乎就没有几个存留下来的，我们已经看到与欧文有关的合作社生产和模范新村的失败。在当时人们都把这些合作社看做是从内部来彻底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如今合作运动的乌托邦

幻想已為實際目標所代替，或者說人們把這種烏托邦幻想推遲到遙遠的將來，不讓它干涉目前合作運動以實求實的方針。

1843年，“羅奇德爾先鋒隊”開辦了一所小型商店，按會員的購買量付給紅利，這件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不論好壞，這種“紅利”成了新模範合作社的基石。在這種基礎上，“羅奇德爾先鋒隊”扶搖直上，取得了穩定的發展：他們的辦法很吸引人，大家群起仿效。合作運動再次取得了肯定的成績。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合作化運動把工人的力量從政治性的階級鬥爭引向了一個次要的領域中去。歐內斯特·瓊斯和其他富於戰鬥性的分子之所以常常尖銳地批判合作運動，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

20年後，英國一共有454個合作社，大部分都在英國的北部。大多數的合作社都擁有上千的社員，但還沒有一個是超過5,000人的。最大的合作社有：哈利法克斯的合作社（擁有會員4,300人）；羅奇德爾先鋒隊合作社（4,013人）；赫爾合作社（磨谷廠）（3,818人）；里子合作社（霍爾比克）（3,555人），以及利物浦節約合作社（3,154人）。1863年成立了“批發合作社”，它在購買大宗貨物時比单个的小合作社更為有利，從此以後，合作運動得到了不斷穩步的發展。合作運動有兩個積極的效果。第一，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終止了在工人糧食中摻混雜物的現象，任何讀過恩格斯的《1844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人都知道這是如何的必要。第二，這個運動把成千上萬的男工人和女工人（雖然為數極少）訓練成了組織和管理人才，這有力地證明了並不是唯有資產階級才有經營大規模企業的能力。

工人階級第三種重要的活動是互助會，它的發展反映了熟練工人地位的改善。地方性的小型互助會早就存在，但十九世紀中葉全國性的互助會也迅速的發展起來了。1855年左右，“老夥伴”

互助协会就拥有 20 万会员，“森林工人老同盟”也拥有 10 万人。及至 1872 年，它们各拥有 436,918 和 400,217 人，另外还有一些力量较小的互助会社。各会社都有自己的地方支部网，其中有数千工人担任着职务，这不仅给了他们合法的地位，而且使他们有机会发挥他们的组织能力。

这些工会，合作社和其他的组织本身虽然都很重要，可是它们的活动范围狭窄，目光短浅，而且派别复杂，各有其自己的特殊利益。当工人阶级像这样四分五裂，他们的领袖日益接受中等阶级激进派思想的时候，像宪章运动年代里的那种独立的阶级政治斗争是不可能的。同时国际事件也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分裂，这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的第一次。从 1815 年到 1854 年，不论是反抗俄国的沙皇还是反对法国的拿破仑，整个的工人运动都是和伟大的欧洲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 1854 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却不是一个这么容易解决的问题，当时英国联合了拿破仑三世与俄国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人为科布登和布赖特的资产阶级和平主张所吸引，这两个人这时已成了中等阶级激进派的领袖，他们反对战争的理由主要是认为战争危害了贸易和利润。而另一部工人则赞成战争，他们觉得帝俄沙皇是屠杀波兰和匈牙利人民的刽子手，是欧洲反动的主要堡垒。但在这一部分工人中意见也有分歧。许多工人支持帕默斯通和官方的主战派，虽然帕默斯通的战争目的与工人阶级传统的国际主义显然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帕默斯通决不会发动一个可能促使被压迫民族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战争。即便他真的对伦敦的载货马车夫们收拾赫诺将军^①一事暗暗喝彩，这也不能改

^① 赫诺曾残暴地镇压匈牙利革命，因而是个在全世界臭名昭彰的人。

变他在国内外执行反动政策的事实。根据这些理由，欧内斯特·琼斯和“左翼人士”都争辩说，只要主持这场战争的是帕默斯顿，是这位“下院国务大臣席上的有鬓鬚的宝贝，英国贵族壟断地位最坚决的捍卫者，”（薩維尔著《宪章运动者欧内斯特·琼斯》，第183頁。）它就絕不会产生工人們所希望的结果。这种意見分歧使得工人們在战争問題上不能做为一个阶级发挥作用。

同样的，3年以后，琼斯在《人民周报》上为被英国历史书称为“印度叛乱”的人民起义运动进行辯护，訴之于工人的传统的国际主义：

“全欧洲对于印度斯坦的起义应该只有一种輿論，它应当是世界历史上最正义最高貴最需要的輿論之一。……波兰的起义不是对的么？那么印度斯坦的起义也应当是对的。匈牙利的起义不是正义的嗎？那么印度斯坦的起义也应当是正义的。意大利不是应该受到支援嗎？那么印度斯坦也应该受到我們的支援。凡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人民所爭取的，也是今天印度人民所要爭取的。”（薩維尔著《宪章运动者欧内斯特·琼斯》，第219頁。）

这次也有許多工人为輝格党和托利党的报纸所掀起的关于印度人殘暴的宣傳所欺騙。值得注意的是，一向主張和平的布賴特这次也参加叫嚷，主張鎮压印度“叛变”了。

由于这些原因，虽然政治改革的要求从未停止过，可是这个呼声現在被削弱了，而且失却了它的阶级內容。宪章运动者曾經为实现“六点要求”进行过斗争，把它当做彻底改变社会秩序的一个手段。这个概念在1851年所通过的綱領中达到了理論的頂峰。但是如今大家漸漸接收了这个現存的社会秩序，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熟练工人甚至把改善他們在这个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当做自己

的奋斗目的。所以，宪章运动者的传统虽然没有完全消失，却在片面地发展着，大家对“六点要求”的了解停留在表面上，它们的革命意义则完全被遗忘了。

我们可以从“改革法案”于1854年、1858年和1860年在议会中被提出来时无人积极表示关怀的情况中，看到这种发展的结果。所有这些法案的性质都被大大地冲淡了，工人对它非常冷淡。真正的癥结所在，是议会外边没有足够的群众压力迫使辉格党或托利党政府通过真正的新法案，或对原法案的欺骗性质提出抗议，强迫议会予以修改。由于这种情况，政府得以宣布并没有什么人要求改革，而将每一个提出的法案束之高阁。

2. 从第二次改革法令到大萧条

但是，工人阶级运动的停滞只是表面上的，十九世纪50年代后期工人运动卷土重来的迹象已很明显。工业界首先发动。在许多地区，地方工会俱乐部和各种会社已经习惯于在劳资纠纷或其他问题上彼此合作，相互支援，但还没有形成任何永久性的组织。1858年里，“格拉斯哥各业理事会”宣告成立，以后几年中，在设菲尔德、利物浦和爱丁堡等地也有了各业理事会的组织。这些理事会往往是直接在某些斗争中诞生的，因为他们感到了以前地方性的合作已经不够，而需要更进一步的团结起来。

1858年左右，曾在1848年和1852年间遭受严重失败的矿工工会运动开始恢复了。约克郡的一次雇主闭厂歇业事件导致了一个强大的约克郡总工会的建立，这是走向建立“全国矿工工会”的第一步。它的杰出人物为亚历山大·麦克唐纳，他原先是一个矿工，后来成为一个成功的实业家。麦克唐纳的政治自由主义，加上他热情的个性，以及在他所发动的斗争中表现的机智敏捷和决心，

使他在許多方面成为这个时期里的标准工会领导人才。无疑他是主張階級合作的，但他也的确从其中为他的工会會員攫取了大量的眼前利益。他早期的成功之一，就是他领导矿工爭得了自己指派过磅計核員的权利，終止了煤矿主人长期以来在矿坑口过磅时的欺騙行为。1863年左右，“全国矿工工会”已經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几年之后又出現了一个拥有會員20万人的“混合矿工协会”。

在許多地区的企业中，工人們长久以来希望减少工作时间的願望导致了9小时工作制运动。一个代表倫敦主要建筑业工会的联合委员会向雇主提出了每星期减少劳动時間4小时半的要求。雇主用打击工会中积极分子的手段来施行报复，于是触犯了工人，引起全倫敦地区的罢工和閉厂。全部組織起来的工会都来支援建筑工人，这次运动規模之大是自从1853年普勒斯敦罢工事件以来所未有过的。捐款源源而来，尤其轰动一时的是“混合机器工人协会”連續在几个星期內3次捐款1,000鎊。雇主們又拿出了“保证书”的老办法，但由于建筑工人的决心和其他工会的支援，毫无效果。这次劳資糾紛以双方互相让步而告終，工人們放棄他們减少工作时间的要求，而雇主們也撤銷了“保证书”。

这次糾紛产生了两个重要的永久性結果。一个是在这次糾紛中曾成立了一个倫敦各业的委员会来支援建筑工人，紛爭終了后，1860年5月18日，該委员会召开了一个會議，决定成立“倫敦各业理事会”。这个理事会不久就变成了全国的领导机构，因为“議會”和許多其他著名的工会人物都参加为該会的會員。在还没有像类似現在的“全国职工大会”的組織的时候，“倫敦各业理事会”就成了一个全国各工会到紧要关头时都向它求援的半正式性的全国組織。且不說倫敦的劳資糾紛，“倫敦各业理事会”在它成立后

的头几年中就曾有效地支援了諾丁昂的花边工人，約克郡和諾森伯兰的矿工、黑乡的鏈子工，泰賽德的铁工和設菲尔德的鋸刀工人的斗争。它最早取得的最惊人的一个成功，就是在1861年它迫使政府撤退了国防部派去镇压建造契耳西兵营的建筑工人罢工的军队。

另一个收获是在1861年成立了仿照“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混合木工协会”，它很快就成了新模范工会中最富足和最有力量的工会之一。

与工会运动的这些发展并行的是国际形势的发展：新的事件激发了工人阶级的情，并终止了早先的怀疑和彼此之间的分歧。第一个，和也许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事件是1861年的美国内战。这件事划分了英国的阶级——赞成还是反对奴隶制，以及赞成还是反对希望奴隶主获得胜利的英国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英国有权势的人物想进行干涉，帮助南方，他们除了武装干涉以外用尽一切办法来支援南方。在“伦敦各业理事会”召开的大会上，“石工工会”的康诺利宣称说：

“由于我国贵族，或者说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公开赞助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和奴隶商人，从而延长了这场悲惨的战争。要不是他们的干涉，这场战争早就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終了，棉花自由出口，奴隶也得到解放了。”（引自《1860—1950年伦敦各业理事会史》，第29页。）

英国的工人们，特别是兰开夏的纺织工人（尽管由于北方海军封锁棉花出口，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他们也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的民主原则）表现了英雄的气概，击败了反动势力而获得了一次重大的政治胜利。正如马克思于1864年在“国际工人协会”开幕辞内写的：

“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远巩固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十字軍征討冒險的，并不是各个統治階級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階級对于他們那种罪惡的胡作妄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馬克思著《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61頁。）

1863年波兰人揭竿起义的消息，重新喚醒了对俄皇专制主义的傳統憎恨，这一次工人中沒有发生像上次对克里米亚战争的那种态度分歧。的确，那些上次竭力強調美国南方諸州有脫离美国联邦宣布独立的道义权利的人，这次却如此敌視波兰的独立，这个事实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第二年，群众的热情由于1864年4月加里波的光临倫敦而达到了新的高峰。《蜂巢》周刊写道：

“倫敦工人組織了一支游行队伍，前去欢迎这位意大利的解放者。但这支由5万智慧工人組成的在各行业或互助会的旗帜下整齐行进的队伍，被全首都前去欢迎的人山人海淹沒了，仅仅作了英国人民对加里波的爭取自由独立的宗旨和貢獻所給予的崇高評价的一个象征。”（J. B. 杰弗里斯著《劳工的萌芽时代》，第181頁。）

群众的情緒是这样的高漲，工人階級的民主傾向是这样的明显，政府坚持要求加里波的立即离开英国，以免再发生这样的示威运动。

“国际工人协会”（或称第一次国际）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于1864年9月成立的。

我們已經看到了英国工人階級国际主义精神的强大而悠久的傳統。英国的雅各宾派，罗維特派和圓厅党人，特别是宪章运动者，都認識到各国人民斗争的目的是相同的，于是出現了一連串推动这个目的的組織。1838年，哈尼曾組織“民主协会”。不多几

年，“民主协会”归于消灭，代之而起的是由左翼宪章主义者和欧洲各国的逃亡者组成的“民主共济会”（1845—1852年）。哈尼总结它的纲领如下：

“我们抗议、排斥并谴责一切政治上遗留下来的不平等和阶级区别。我们宣布，地球及其所有的天然产物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我们宣布：现在的社会是十分不公平的，它允许懒惰和狡猾的人壟断地球上的果实和工业产品，并迫使工人阶级为低微的报酬而劳动，甚至迫使他们充当社会的奴隶，使他们陷于穷困和堕落的境地。”（T. 罗斯坦著《从宪章主义到工会主义》，第131页。）

继“民主共济会”之后的是“欢迎与抗议委员会”，这是由欧内斯特·琼斯组织来抗议拿破仑三世访问英国和欢迎他的主要政敌之一巴勃士的。这个组织经扩展成为“国际协会”，它在十九世纪50年代后期随同宪章派的最后衰亡而消灭。

所有这些团体在维持国际主义旗帜的飘扬方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它们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但是它们与“国际工人协会”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所有这些组织都在英国，主要是在伦敦，而且它们都是由少数激进派与个别的流亡在这个国家里的外国人组成的。“国际工人协会”才是第一个真正的国际组织，因为它是由当时许多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组织组成的。在它存在的8年中，在任何时间它拥有的会员人数都是无法估计的，但在一定的时间在一定的国家里，它无疑是个强大的组织，而它的影响又每每超过它的人数所表示的力量。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才改变过去不参加立场模糊的团体的态度，投到这个国际组织的工作中来，并在开幕词中草拟了一个为欧洲工人运动指明了前进道路的纲领。他写信给恩格斯说：

“我知道，在倫敦与巴黎这两面，这一次出现了真正的‘势力’，所以，我决定把我对这类邀请都加以拒绝的常规取消了。”（《馬恩通信选集》，1949年解放社版，第5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在英国已經住了很多年，馬克思住在倫敦，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因为他家里在那边有一个紡織工厂。他們研究英国的情况，并完成了他們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論。他們謹慎地避免被牵扯到許多政治流亡者所搞的徒劳无益的活动中去，只靜悄悄地工作，并在真正需要他們的时候給予帮助。他們在工人运动中建立了自己的威信，他們帮助工人提高他們的理論認識。他們与宪章运动者保持着友誼关系，并为他們的报纸主要是《北星报》和《人民周报》写稿。社会主义历史上的里程碑——《共产党宣言》，最早就是由哈尼譯成英文刊登在他的杂志《紅色共和国》上的。現在“国际工人协会”給他們提供了更广阔的工作园地，該会成立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將馬克思主义从几个小集团推广到全西歐的工人群众中去。

“国际工人协会”的會員組織主要分为两类：一为由工会形成的組織，一为由个人构成的地方政治团体。英国的會員差不多全是前一类，許多著名的工会領導人物，包括豪威耳、阿普尔加斯、奥杰尔和克里默都参加了它的执行委员会。有一个时期《蜂巢》是“国际工人协会”半官方性的刊物。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自由主义的工会运动者接受了馬克思所草拟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規章”的政治观点：

“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斗争不是要爭得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得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并廢止任何階級統治。”（馬克思著《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規章》。《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

科中文版,第363頁。)

他們只是把“国际工人协会”当做团结各国工会运动者的一个便利手段,特别是抗击当时英国雇主們日益采用的輸入外国工人以破坏罢工的方法。第3届年会的报告(1867)中就有这么一个例子:

“在去年冬天倫敦編籃工人举行罢工的时候,工人們得到报告說,有6个比利时工人在柏蒙狄賽‘藍錨巷’铁道拱門下做工。他們受到严密監視,不准和外界接触,好像关在女修道院中被劫持的女孩子一样。理事会里的一个比利时人施用了計謀見到了他們,当他們了解被雇用的真相以后决定回家不干了。当这些比利时人在碼頭上等候輪船时又碰到了一批新到的比利时工人。他們立刻把情况告訴了那批新来的人,于是新来的人也放棄了他們的合同,折回去了,并且答应他們将努力阻止其他工人到英国来,他們实行了他們的諾言。”(杰弗里斯著《劳工的萌芽时代》,第189頁。)

“国际工人协会”能够在更大的規模上給与这种支持,如1871年泰賽德机器制造工人爭取每星期工作54小时的罢工,由于得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帮助而胜利結束。

“国际工人协会”的偉大重要性,是在爭取基本民主权利和工会权利的斗争基础上,把許多政治水平不同的工人团体联合起来。但它最終还是失败了;因为这时还不可能消除存在的各种意見分歧,和使英国工会領袖們接受一个独立的階級观念。它虽然失败了,但它为未来的工人階級政党打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爭取民主政治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的原因是工会活动日益頻繁,工会需要保卫和改善他們的法律地位,以及在美国內战一事上的精神胜利也促进了工人运动,而“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国际工人协会”會員在1865年成立

“全国改革联盟”中，以及在 1867 年第二次改革法令通过前的整个斗争中都起了领导作用。“伦敦各业理事会”也参加了这个斗争，同时各工会组织在 1865—1867 年的政治斗争中比以前更积极了^①。“全国改革联盟”和其他联合团体不久就在兰开夏、西雷丁、泰赛德和伯明翰，特别是伦敦（因为在伦敦宪章派的机构虽已消灭，而它的传统依旧存在）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

正是这种鼎沸的群众要求，才逼使罗素和格莱斯頓在 1866 年春季提出了一个改革法案，虽然它还远不能满足改革联盟的要求。当托利党人和右翼辉格党人联合一致否决了这个法案，使内阁垮台时，群众的愤怒达到新的高潮。而辉格党議員罗伯特·斐对工人及工会的无理侮辱更是火上加油。伦敦和外地都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示威运动，“全国改革联盟”号召在 7 月 23 日在海德公园召开一个全伦敦工人的集会。内务部大臣下令禁止集会并关闭了公园的大门，这更激恼了集会的人们。7 月 23 日，约有 20 万人聚集在被锁闭的并且有许多警察守卫着的公园门外。“全国改革联盟”的领袖们于是决定到特拉法加广场去开会，一部分群众跟他们走了。可是大部分人坚持要在公园里开会，他们留了下来，他们冲破了栏杆蜂拥而入，举行了非正式的大会，警察用尽力量阻擋也无济于事。

经过了整个秋冬二季，群众的激昂情绪始终没有减退，政府恐慌起来。特别是“国际工人协会”不仅在大不列颠而在全欧洲开始造成一种恐怖局面，同时政府发觉了英国工人阶级激进分子企图与爱尔兰芬尼党^②人联合的明显迹象。芬尼党人在美国内战结束

① 在 60 年代中叶，各工会展开了争取完全合法地位的重要战斗。这样就使得政治权利变成了当前急迫问题。（参看本书第 129 页。）

② 芬尼党(Fenia)：1857 年由一群流亡在美国的爱尔兰人创立的秘密团体“爱尔兰革命同盟”，通常称为“芬尼党”，或逕称芬尼亚。——译者

时，在美国、爱尔兰和英国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准备一次新的争取爱尔兰独立的起义。由于这些原因，托利党人虽然在改革法案一事上推翻了前任内阁，但他们迫于外界的压力，不得不再提出一个改革法案。当公布该法案内容的那一天，从特拉法加广场到伊士灵顿有成千上万的工会会员拿着旗帜和标语举行游行，由马掌工人骑在马上在前开路，单是砌砖工人参加的就有22个分会。

托利党的这个法案较之辉格党的改革法案更为含混，但群众的压力迫使托利党人一再让步，以致最后在1867年通过的法令比辉格党早先提出来的还进了一大步。但是得到选举权的仍然只有中下阶层和比较富裕的工人。这个“1867年的改革法令”纵然远不能满足工人们从宪章运动继承下来的传统的民主要求，但毫无疑问，它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巨大胜利。

如果把1865—1867年的斗争与宪章运动那十年间的斗争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所发生的变化了。表面上看来似乎又返回到了宪章运动的时代。现在也有同样巨大的集会和几千人盛大的示威游行，也有愤怒和紧张的气氛，以及工人阶级的激昂的斗争情绪。从某一方面来说，的确是有了进步。各工会组织都参加了政治斗争，这是以前所未有过的。这样看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希望“全国改革联盟”能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可是到了1869年初，该联盟却寿终正寝了，而且后继无人。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这些年发生的事件与宪章运动中发生的事件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缺乏一个独立的阶级观念。宪章运动者知道（虽然有时知道得还不很明确），他们所要争取的民主制度，就是劳动人民应当成为社会里的统治力量。但是十九世

紀60年代后期的改革联盟的領袖們却已經放棄了这种观念，只感觉工人們在現存的社会中应当为自己取得較高的政治地位。在这方面，1867年的法令，加上1872年的投票法令，熟练工人的眼前的政治要求得到了滿足。这些熟练工人正漸漸脱离其余的工人，变成一个特殊特权阶层。

实际上，熟练工人的領袖們如豪威耳、阿普尔加斯、奥杰尔和克里默，現在已經以列身自由党之側而感到心滿意足了。而自由党也随时准备对他们作某些让步，以便取得剛剛获得投票权的工人的选票。所以，我們看到“改革联盟”受到了“进步”資本家如針織业的百万富翁賽繆尔·摩萊，“庫脫尔德公司”的P. A. 泰勒和羊毛大企业家太特斯·索耳特的支持和資助。由于他們的津貼，“全国改革联盟”才得以殘留到1868年的选举，并为自由党罗致数以万計的工人选票。少数工会領袖还代表自由党参加了毫无希望的竞选。

所以虽然1867年是在政治上获得胜利的一年，可是由于領袖們接受了資產階級的思想，伤損了工人階級的独立性，并腐蝕了相当一部分有組織的工人，从而葬送了胜利的果实。这个胜利非但没有領導群众走向新的高潮和更高阶段的斗争，反而标志着向階級合作的大步迈进。从1860年左右开始复兴的工人运动到1867年到达了頂峰，以后便轉入下坡路，和所謂“自由党—工党”的观点的逐漸增强。工会領袖們不仅愈来愈以資產階級激进派如布賴特和摩萊等馬首是瞻，而且还追隨在格萊斯頓和自由党的官方領導之后。凡此种种行为的后果从1874年的大蕭条开始以来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民主政体一詞本来是“下层階級”用来称呼他們所盼望实现的那种社会的，但今天各階級都用它来称呼現存的社会。所以这个

詞已經被庸俗化了，失去了它的階級內容，它被縮小到表示某些有限的政治權利。現在，各工會對這些權利的主要用途，就是為它們的組織取得被承認的合法地位。

首先就是修改“主僕法”，這個法律使當契約遭到破壞時資方與工人站在完全不平等的地位上。正如一個發言人在1864年5月在倫敦舉行的工會大會上所宣稱的：

“這是一條非常殘暴的法律，每次不經通知就逮捕工人，往往在他們被送進監獄後，他們的家屬或朋友還不知道到底為了什麼事情。”（杰弗里斯著《勞工的萌芽時代》，第92頁。）

這些法律的殘暴性，可由下邊的這個事實來證明：單單在一年之內就有10,337起破壞契約的案件。僱主們極少受到起訴，即使他們受到起訴，也不過是科以罰款，而並不加監禁。經過普遍的反抗鬥爭後，終於在1867年通過了一個法令，刪改了這些法律中的若干最不公平的條款。

工會運動者感到他們決不能置身於政治鬥爭之外，而與1867年改革法令的鬥爭同時產生的新發展更加強了這種感覺。在1867年初的“霍恩比與克萊斯案件”中，大家出乎意料地發現，當工會會員或職員盜用公會基金時法律竟不予工會以保障。讀者必須注意，此時有許多工會由於他們謹慎的財政方針和竭力避免舉行罷工的政策，積存下了驚人數額的基金。而更直接的威脅系來自所謂“設菲爾德暴行”。設菲爾德的五金業中有許多小工會和俱樂部，其中有一兩個工會常常對不肯罷工的人和為大家嫌惡的僱主採取直接的粗暴態度。政府和報紙就利用几樁這類事件，大肆宣揚，並以此為借口對全國的工會運動發動進攻。1867年2月，議會成立了一個“皇家委員會”來調查工會運動的情況。

“議會”、“倫敦各業理事會”和其他工會團體也相應地組織了

一个工会委员会“混合各业大会”，准备为工会进行辩护，并搜集证据，供“皇家委员会”参考。许多工会领袖迫不及待地加入资产阶级的报纸谴责设菲尔德的“暴行”。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比斯莱教授在埃克塞特会堂^①进行反击，揭露统治阶级的虚伪面目时，他博得了听众最热烈的掌声。曾在“国际工人协会”开幕典礼上担任主席的比斯莱指出，那些自称对工会的所谓“暴行”感到震惊的人，就是那些赞美和为血腥镇压牙买加人民起义的埃里总督进行辩护的人。

“人们曾要求这个国家的富有阶级对富人在牙买加的暴行表示意见，正像今天人们要求穷人阶级对穷人在设菲尔德的罪行表示意见一样。可是那次他们表示了什么意见呢？他们有没有在埃克塞特会堂召开一个大会，宣布他们反对这种罪行，宣布他们虽然希望保护自己的财富，但他们却反对埃里总督采用的那种办法呢？他们这样做了没有呢？没有！他们反而设宴招待他，对他称颂备至，对他的行为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杰弗里斯著《劳工的萌芽时代》，第102页。）

摆在“皇家委员会”面前的证据，以及它对议会所作的报告，表明这个对工会大肆污蔑的叫嚣是多么缺乏根据。虽然如此，政府还是提出一个法案，规定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并对它们的基金给予保障，但同时也对罢工的纠察等活动加以严格的限制。这引起广泛的抗议，抗议的结果首先是把这个法案分成两部分，1871年通过的“工会法令”增进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同时“刑法修正法令”限制了罢工时纠察活动。许多领袖认为他们在头一个法令中所取得的收获似乎大过工人在第二个法令中的损失。但是群众是不满意的；加上一系列正常和平的罢工活动连续地受到控诉和监禁的打

^① 该会堂系伦敦河沿的建筑物，从前曾用作五月大会的会场。——译者

击，更激起了工人們的积憤。他們的抗議导致了 1875 年的“反阴谋和财产保护法令”和“雇主与工人法令”的通过，这两个法令在工人的法律地位上均較前有所改进。

“全国职工大会”就是在这些斗争中萌芽的。一般在傳統上认为它正式成立于 1868 年，但这个說法似乎有些武断，因为在 1868 年所召开的那次大会不过是 60 年代中所召开的几次性质相同的會議之一。这个全国性的合作机构并非出自“議會”的动議，因为它已很满足于它在“倫敦各业理事会”中所享有的稳固地位了。正确的說，它是“議會”与某些和《蜂巢》周刊的乔治·波特合作的富于斗争性的北方工会冲突的副产品。1867 年，波特的“倫敦工人协会”召开了一次會議，虽然“議會”对它进行抵制，可是这次會議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种抵制一直繼續到 1871 年。最后“議會”决定插手这个显然具有远大前途的事业。它联合了“全国矿工工会”的亚历山大·麦克唐納以及其他北方工会中的右翼分子，将波特排挤了出去，于是增强了的“議會”获得了統治地位。

“全国职工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創立“議會委员会”，在大会休会期間执行任务，爭取合法地位和将工会运动者选进議會。就是这个“委员会”組織了导致 1875 年胜利的反“刑法修正法案”的騷动。1874 年，两个矿工工会的領袖，亚历山大·麦克唐納和托馬斯·伯特当选为議員，这是工会运动者第一次进入議會，可是他們是做为自由党人，而不是做为独立的工人階級代表进入議会的。

在这些年代里，工会运动的領袖們与自由党之間的关系变得愈来愈亲密了。我們已經看到，他們的政治目的都一个个地达到了。現在工会有了法律保障，投票权也被“滿意的”扩大了，他們感觉他們所有的主要目标已經达到了。这几年来，新会员的大量增

加和財政力量的日益壯大，隱匿着一個嚴重的政策退化，即工會領袖們放棄了工人階級的思想 and 最後的一點鬥爭性。

這種跡象在於50年代中調整了它們的步調的大型的混合工會中發展得最早也最明顯。甚至訂書工會的右翼書記 T. J. 登寧也在1866年寫道：

“作為一個工會，曾經威風一時的‘混合機器工人協會’現在就跟‘橡木心’、‘森林工人’以及其他的大型共濟會一樣，沒有舉行罷工的力量了。……它以前有兩個作用，但如今只剩下了一個，那就是在會員失業和到別處尋找工作時撥發補助金的共濟會的作用。……‘混合機器工人協會’作為一個工會組織已經不存在了。”（韋伯著《工會史》，第321頁。）

這種癱瘓甚至導致工會合併傾向的倒退，制模工人就在1872年脫離了“混合機器工人協會”而另外組織了他們自己的行業工會。

人們漸漸公開談論，說罷工已經過時，應當不顧任何犧牲避免舉行罷工。“混合機器工人協會”書記阿蘭就在1867年對“皇家委員會”宣稱：

“我們相信，所有的罷工都是一種金錢上的浪費，不但對工人，就是對僱主也是如此。”

1874年，在一篇於全國職工大會舉行的論文比賽中得首獎的論文里，就有這麼一段說：

“一般來說罷工乃是一種不得已的手段，總書記往往拒絕的多，批准的少。的確，大多數的工會書記都以自己攔阻的罷工多，發動的罷工少來自誇。從工會的地方支部總是在鼓動罷工的情況來看，這話是完全可以相信的。”（杰弗里斯著《勞工的萌芽時代》，第42頁。）

這最後一句話清楚地表明，以前在建立全國性工會的時代所需要

的工会总部中央集权化，在今天成了工会运动的致命伤。工会领袖們与会员之間存在着一条很深的鸿沟，同时随着工会地方分会重要性的降低，工会的内部民主也在逐渐减少。

停止使用罢工这一武器以后，仲裁开始抬头了，許多工会领袖把它看作是一个胜利。麦克唐納在 1875 年就說过：

“25 年前，当我们提議采取仲裁办法的时候，我們遭到資方的訕笑。但在我們所发起的运动中以它发展得最快，影响最为深远。請看看今天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光輝成就吧。在諾森伯兰如今工人与他們雇主坐在一張圓桌上談判。……在杜兰郡成立了一个‘仲裁調解評議會’，75,000 工人完全信任該会的仲裁。約克郡有 4 万工人也是如此。”（韦伯著《工会史》，第 338 頁。）

继仲裁之后，“矿工工会”又采取了按煤价折合工資的方法。但他們的“完全信任”在当年里就动摇了。因为就在那年煤价大跌，矿工的每日工資受到削減，例如諾森伯兰的工人在 1873 年平均工資为 9 先令 1 辨士半，到了 1880 年竟降到了 4 先令 4 辨士。

这个“撤退”的后果之一就是英国工会退出“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在馬克思的领导下，到 60 年代的晚期已經漸漸变成了欧洲工人階級的領導机构，它在許多国家里都有强大的分会組織，这些分会組織正朝着成立工人階級政党的方向迈进。但是像克里默、阿普尔加斯和奥杰尔这种愈来愈沉于“自由党—工党”活动的人，对这些发展是不感兴趣的。“国际工人协会”對他們來說，主要只是一个对付雇主从国外輸入工人的保障，和表示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一致的傳統性感情的工具，而这現在看起来已經有些过时了。危机是由 1871 年的巴黎公社引起来的。这个劳动人民的第一个革命政府到处遭到資产階級的咒罵，而坚决支持巴黎

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当然饱受攻击。英国工会领袖们发觉他们被指责支援外国的革命者和谋杀者，当时他们作为格莱斯頓和自由党的追随者，正急于树立自己的威信和名誉。于是他们赶忙也攻击巴黎公社，并退出了“国际工人协会”。面对着这种背棄，与日俱增的迫害，法国支部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归于消灭，再加上内部无政府主义者的宗派分裂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无法再存在下去了。虽然它在名义上延长到1876年，实际上早在1872年就停止活动了。

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来说，这是一件不幸的大事情，英国工人阶级一百年来伟大的国际团结的光荣传统第一次遭到了破坏。它对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和进步的斗争从来也没有袖手旁观过。这次当一个正义斗争需要它支援的时候，它却临阵逃避了。这件事清楚地说明了它内部的腐败已到了什么地步。

但必须指出，这种腐化是从上层开始的，虽然它的影响深入到某些基层组织，可是许多地方工会仍然保持着过去的斗争性，同时也有积极的建树和新的发展，这表明在熟练工人队伍之外工会运动仍然在不断地扩展。

譬如机器工人长期坚持的“九小时工作制”斗争，到1871年发展成为一个历时5个月的罢工。这次罢工得到了完全的胜利，在机器制造业中赢得了“九小时工作制”。应当注意的是，这次罢工并非由“混合机器工人协会”领导，而是由一个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共同组成的“九小时同盟”领导的。接着，建筑工业的许多部门也赢得了较短的工作时间。

1872年初，約瑟夫·阿奇在窩尔維克郡组织了一个农业劳动者工会，它迅速地在全国发展起来，到年终时“全国农业劳动者工会”的会员已近10万人。此外还有5万人分散在许多组织松弛的

小工会里；它們合并起来形成了“农业劳动者联合会”。由于許多各业理事会和其他工会的大力支援，它們在全国大多数地方都贏得了工資的增加。但 1874 年，这个工会在东盎格利亚和东密德兰举行的一次罢工中遭到了严重失敗。农业工作的分散性和个体性使农业劳动者特別容易被雇主各个击破，而雇主們殘酷地施行了这一武器。到十九世紀 70 年代末，这个工会已經几乎完全不存在了，然而它給农村带来的希望和信心却从未完全消失。

和农业劳动者差不多受到同样摧殘的，是城市中的非熟练工人。例如倫敦煤气伙夫，他們在 1872 年組織了一个工会，这个工会領導工人举行罢工，結果許多人以破坏契約和刑事陰謀罪遭到逮捕。以后一罪名起訴的人中有 5 人被判处一年监禁，这事引起了全倫敦工人的抗議，最后贏得了改判，削減了刑期。这一事件在反抗“刑法修正法令”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地方性的斗争带来了成千上万的新會員，以致“全国职工大会”到 1874 年竟拥有會員 1,191,000 人，而在 1871 年它只有 375,000 人。會員人数的增加，部分是因为以前沒有合并的工会現在并了进来，但无疑的新增加的人数是巨大的。1874 年大蕭条的到来——这是一个长时的商业不景气和价格跌落的时期——暴露了工会运动这些表面成就的虛假性，和在自由党領導下的工会在困难情况中的軟弱无能。这些領袖盲目的乐观想法使他們对困难一无准备。資方从矿业和铁器制造业开始，要求减低工資，而工会无力反抗。大批的失业工人不久就耗尽了許多强大工会的准备金。會員在迅速减少，只懂得在資本主义經濟繁荣时期中，通过談判爭得一些有限让步的工会領袖們，对当前的局势束手无策。到下一个 10 年中，我們才能看到一种新型的，以更明确和更独立的政策为基础的工会运动。

第四章

帝国主义时代

1. 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

十九世紀最后的 25 年和二十世紀初期，在英国的历史和工人运动史上是一个分界綫。的确，这个时期所发生的变化，規模宏大并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与工业革命时期相比拟，但是它們的性质却又完全不同。在早期，年輕和生气蓬勃的工业資本主义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发展，它不但影响了生产技术，而且影响了社会关系、階級构成以及人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資產階級除非使生产工具經常发生变革，因而除非使生产关系，亦即除非使全部社会关系革命化，便不能生存下去”，1848 年《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宣布的。“生产中經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連不断的震蕩，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資產階級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69 頁。）

而在我們将要談到的这个时期，資本主义正趋于成熟，同时也露出了逼近衰微的征象。形成本世紀初国内发展背景的英国世界工业壟断地位，現在就要結束了，并且正在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壟断和勢力范围所代替。在国内也是一样，工业的結構，特别是在二十世紀初，随着大托拉斯、大联合企业和日益占据統治地位的金融資本的出現也发生了变化。

我們在二十世紀中叶所看到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这种錯綜交織互相紧密联系的发展中形成的。随着大規模工业进一步的发展，工人階級的規模和力量都比过去壮大了，它現在又开始轉向群众性的工会和政治活动，期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同时，正如帝国主义暂时拯救了整个資本主义一样，它也延长了与資本家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工人貴族”的寿命。如果不把金融資本和帝国主义的因素考虑在內，要想正确地了解这个时期工人階級及其思想的演变是不可能的。本章將討論这个新阶段的某些主要特征和它們对工人階級的影响，作为对本书第二部分所讲述的这一时期(1875—1920年)的一个前言。

十九世紀最后的几十年中，英国的絕對經濟优势結束了，并且在世界市場中开始日益受到威胁。世界經濟在許多国家同时发生的技术迅速改进的基础上，开始具备了二十世紀的雛形，同时把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經濟推入資本主义的竞争軌道。当代的人虽然不能了解这些新因素的性质和結果，也看出了它們活动速度和范围，并对他們所看見的景象感到迷惑和惊異。当代的一个美国經濟学家D. A. 威尔斯在他所著的《近代的經濟演变》(1890年)的序言中对新形势的主要面貌总结得很好。他說，在上一世紀最后25年中的經濟变化，“无疑的比过去世界历史上任何时代的經濟变化都更重要和复杂。在这样一段短短的时间中有这样規模的經濟扩张是从來沒有过的事。可是这种經濟扩张带来了不断的动荡和不协调：价格下降了，利潤和利潤率跌落了，新发明破坏了資本，你死我活的竞争，国际上的冲突和工潮。”威尔斯說，从这些变化中，可能会产生进一步的动乱，許多人认为这种动乱将“充滿了威胁”，将危及“目前整个的社会組織，甚至文化本身的傳播”。換句話說，資本主义經濟体系統治世界的胜利，将导致使資本家感到沮丧的发展。

在 1873—1896 年間，英国工业尖銳地面对它在世界市場壟斷地位結束的后果。德国和美国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奠定它們的重工业基础，并使它們国家全部工业化了，其他国家在較小的程度上作同样的努力。所有大的工业生产国家都在向外找寻出路，以維持国内市場的价格，并尽力从它們經營的巨大投資中榨取利潤。現在英国工业在国外市場上體驗到了激烈的竞争，这些国外市場一向是它独占的領域，甚至是它国内市場的一部分。

价格趋向下跌，市場上充斥的商品达到了饱和点，利潤小了。严重的危机发生了，尤其是重工业和出口业。不景气时期愈来愈长，愈来愈严重，而繁荣时期愈来愈短，并且不能像前一时期那样令人滿意了。商人們模模糊糊地感到一种新的变化在酝酿中，主要是由于他們的抱怨，这个时期才获得了“大蕭条”的这个称号。他們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自然只得服从这个体系的冲击，他們所采取的措施，例如降低价格，減低生产成本，削減工資和加强竞争，只能使他們所恐惧的結果更加迅速的到來。

英国經濟的一个部門經驗到了一次真正长期的不景气，而且它永远也沒有完全恢复过来。这就是英国在世界上最資本主义化的农业，經過了 25 年的繁荣和扩张，遇到了来自新兴农业地区的猛烈竞争。铁路和輪船的廉价运输，使得某些农产品生产成本低的国家，主要是美洲、澳洲和新西兰，把大量的农产品送到了英国农人的大門口。由于其他利益的考虑而不得不維持的自由貿易政策，使得英国无法防止国内粮价暴跌的后果。农村收入和地租下降了，于是大批农业工人流入城市。从此以后，英国的粮食供应漸漸需要仰給于国外，同时由于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肉类和奶类也須要从外国輸入。在这个过程中，地主階級的財富和勢力进一步被削弱了。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现在进入了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也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阶段”。在十九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达到顶点的最高阶段。当时垄断组织还只有一点不甚明显的萌芽”。1873年危机之后，是卡特尔广泛发展的时期，但是卡特尔当时还只是一种例外。在十九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时，“卡特尔已经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4页。）

应当记住，列宁为资本主义这个新阶段所作的分析和所下的定义是一般性的，是对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来讲的，而不是专指英国的资本主义。列宁在对帝国主义下定义之前就申明过，他所下的这些定义“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现象的全部发展上各方面的联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8页。）因此下面列宁为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的五点特点，当然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来解释英国帝国主义的特别情形。

列宁的定义列举了帝国主义的五个主要特征：

- “1. 生产和资本的积聚已经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垄断组织；
- “2.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融而为一，在这个‘财政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财政寡头；
- “3. 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4. 分割世界的资本家的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 “5. 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

出版社 1961 年版, 第 258—259 頁。)

这里要注意的是, 上述五个特点中的前面三个与后面两个不同, 前三个特点讲的是各大国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 这些变化迫使它们向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侵略或政治征服, 也就是最后两个特点的内容。后面两点适用于一切情况。因此, 在评价英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它的世界地位时, 需要特别注意是前三个特点。

当这三个特点在这个时期的英国发展中变得日益明显的时候, 与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特别是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初阶段, 以第三个特点为最突出——即资本输出的日益重要性。

这是英国作为资本主义强国发展的结果。在 1914 年以前, 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继续占有无可匹敌的, 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统治的地位。它得到这个地位是由于较早的工业化, 它的海军优势, 十七和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商业时期形成的庞大的殖民帝国的地位, 以及它在伦敦市设立的无可比拟的国际银行金融机构。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是最大的、独一无二的买主, 它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意味着英国的资产阶级具有巨大的资本储备, 可以在国内和海外任意使用。他们每年从国内和殖民地的工人农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金钱。

在大萧条时期里, 英国抛弃它在商业中和事老的身份, 加紧帝国主义掠夺和攫取海外投资新市场, 企图以此来解决它的经济危机。

英国对它的殖民地, 特别是印度, 进一步的榨取; 新领土如埃及和南非的获得, 以及新取得的势力范围, 例如在中国, 加上集中的金融力量; 使得英国能从它在世界贸易的地位中压榨到巨大的利益。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 英国控制了原料和粮食供应的宝贵来源, 为它的工业生产产品取得了独占或优惠市场。增加国内投

資，固然会增加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但同时也会减低利润率 and 进一步使市場商品充斥。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增加国内投資，因为这与維持資本主义和統治階級的勢力是不相容的。帝国主义是英国資本主义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帝国主义引起新的可怕的巨大难题，但它也消弭某些其他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英国資本主义得以存在的一个条件。从90年代后期起，資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倾向已很明显并收到了效果。1914年世界大战前10年中——这段时期有时被称为是英国資本主义的“迴光反照”时期——曾几度出現繁荣景象，使得頹喪的資本家們又恢复了信心。

我們已經看到，英国資本家在帝国主义时代刚开始的时候所占有的优越条件，是英国国内（殖民地当然不在此列）經濟和政治发展中具有显著“自由”特征的原因，这是和欧洲大陆或美国的帝国主义的經濟和政治发展所不同的。

英国的世界地位和巨大的財富，使它有可能执行灵活和让步的政策，而放棄过去危險而且也是費錢的露骨的鎮压政策——虽然，我們以后看到鎮压并没有完全停止。英国帝国主义初期的优越条件和順利发展，也使得英国在它丧失了絕對的商业霸权很久以后，甚至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了保护关税之后，仍然保持了自由貿易政策。大量的进出口貿易、海上运输、国际金融和保險事业，以及从这些事业中取得的大量利息、股息、利潤和佣金，使得英国資本家不得不維持自由貿易——当然，这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英国資本家必須在国际銀行业、投資和貿易上，能够基本上保持領導地位。的确，从80年代起他們对这个问题的意見就有分歧，可是他們之中比較有勢力的人士在1914—1918年大战結束之后还认为采取关税政策将得不偿失。直到二十世紀20年代，这个外表上的“自由”政策才被毅然絕然地放棄。

可是“迴光反照”的繁荣已从根本上被动摇了。二十世紀第一个10年中就发生了两次商业萧条，当大战爆发以后又呈现出另一次更严重的危机的征象。国家经济现在依赖殖民地已经到了不健康的程度。从70年代中期由于不断再投资的资金积累而成长起来的海外投资，现在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着，这也就是这个时期中能够出现普遍繁荣的原因。到了1914年，英国的资本家握有40亿镑的海外资产，每年平均能有2亿镑的收入。可是另一方面，与英国人民的生活福利密切相关的基本工业却遭到忽视。许多经济部门处于寄生或奄奄一息的状态，虽然其他部门仍在迅速发展着。

此外，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的分割已经完毕。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和军备竞赛预示世界再分割的开始。帝国主义的代价是陆海军费日益增加的重担，实际工资水平的停滞，以及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死亡和破坏。

我们再看一看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的前两个特点——垄断和金融资本的成长——就可以看出，与德国和美国（列宁经常拿这两个国家的情况做他的例子）相比，英国在这两方面的经济发展是显然“落后”的。根据手头的资料来看，当时英国虽然某些企业很集中，并且采取了限价措施，竞争状态却继续盛行于大多数其他企业中。这种在发展上的“落后”情况主要是由前面所提到的英国经济发展中的那些特点促成的：即英国在工业化上的优先地位，和它在金融和商业领域中的国际领导地位。

大部分的英国工业历史都很悠久，这是妨碍集中的一个因素。英国的工业是在技术因素造成高度集中和合并之前，在竞争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在较老的企业部门中存在着许多小型或中型的厂商，大鱼吃小鱼的过程只是缓慢地进行着。这些厂商的领

袖們保持着高度“个人主义”的思想。

所以，虽然紡織工业管理单位的平均規模正在变大，虽然十九世紀 90 年代中也出現了一些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大联合企业組織，但依然存在着广泛的竞争性。同样，鋼铁业方面，虽然出現了几个强大的企业，但整个說来，它仍旧强烈地带着古老的标志。完善的大型工厂还是少数，限价也是不稳定的。煤矿工业繼續保持古老的管理分散的特性，虽然其中也出現了一些巨大的企业，但和德国的“萊因—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是不能相比的。而且英国的煤矿业也还没有显著地控制在鋼铁生产者手中。

英国經濟由于需要向国外发展，才保留了自由貿易，但这意味着国内市場可能发生竞争，而国内市場上的竞争将会阻碍或影响壟断的建立和价格协定。从国内資源取得主要原料的企业是不多的，同时有可能通过取得原料儲备和設立像美孚石油公司那样的康采恩以建立壟断势力的只限于次要的企业。

英国許多工业产品出口的重要性也起了延緩企业集中的作用。这一部分是由于許多企业的出口貿易掌握在富商巨賈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制造者手中。商人們喜欢与許多小厂商打交道，同时許多国外市場的专门性也阻碍把生产集中成少数几个制造标准产品的大型单位。

虽然由于这些或其他原因，英国的合并和壟断过程发展比較緩慢，但决不是完全没有。在某些企业部門里，早在 1914 年前就出現了壟断势力并迅速的发展着，主要是在某些新兴的或在技术上經過改造的企业中，如运输和公用事业，軍火业，造船业，以及需要龐大资本的联合的重工业。在这个时期中，甚至当全部或部分实行壟断的条件还远沒有成熟的时候，大規模的企业就出現了。它們沿着新路綫向前发展，并每每受德国和美国榜样的强烈影响；許

多各不相同的部門，例如化学品、橡胶、烟草、可可、肥皂和电气材料制造业都是如此。許多企业实行了价格协定，在生产者之中划分市場，或进行密切合作外（但不真正进行合并），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在一个生产阶段获得成功以后，就会使其他竞争单位在另一阶段采取防守和进攻措施。另一方面，当一个壟断“集团”或“同盟”形成以后，为了其本身的利益，它就要設法使和它有交易关系的企业保持竞争，并竭力阻止它們組織起来。

此外，当壟断势力占据了某些重要經濟部門以后，虽然其他部門繼續保持竞争，关系也就不大了。小买卖人、分承包商，以及在倫敦和伯明翰这种大城市中接零活的人，常常只有名义上的独立。“存留下来的小手工艺工匠、做零工的鉛管匠或磚瓦匠、設菲尔德的磨刀工人或伯明翰的黃銅鑄工、在自己家里做活的裁縫或家具制造工人，虽然人数很多，但他們愈来愈依附制造者的各大公司或承包商，这些承包商接他們的活并貸款給他們。”（霍布森著《近代資本主义的演变》〔1898年〕，第213頁。）漸漸地，开酒館的也“依附”釀酒商，零售商店“依附”小商品制造商了。在某些情况下，保持一群相互竞争的为自己图謀利潤的小买卖对大資本是有利的，否則的話，这些利潤将为小型厂商賺去用来发展和解放自己。

所以，英国壟断企业发展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1914年前，各大財团的确是朝着那列宁所說的“在經濟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发展的。但是他們并不是到处都成功的，同时它們的相对重要性也不如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財团在那些国家的經濟中那样大。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地促进了这种发展的速度：战争对軍火、装备和其他物品的无限要求，給大財团提供了用大規模生产方法从事“长距离赛跑”的巨大可能性；使他們通过合并和吸收較小的同行企业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机器制造

业,就是这种大财团发展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这个企业的规模和重要性长期以来就在不断地增长。从1913到1921年,維克司公司的股份和借貸資本从950万鎊升到3,100万鎊,同时維克司集团的股本和借貸資本則从2,000万鎊升到5,300万鎊。1919年,某政府委员会开出的名单上就有98个卡特尔、辛迪加和联合組織,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声称各企业均有进行合并和联合以限制竞争的趨勢。在大战后几年內,在铁路、煤、棉、汽車、粮食和紡織业都可以看到这种发展的显著例子。

技术和組織发展的步調和性质在各个企业中的差別很大,所以很难做出一个完全令人滿意的概括。但可以說,在这个时期中,机器技术在三个主要方面取得了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第一,它渗透了那些范围广大的小規模和手工业的生产,例如制鞋、成衣、家具制造、书籍装訂和印刷业。

第二,在較老的机器工业中,技术发展得相当慢,但仍向前发展。例如在銅器制造中采取了印压的方法,在铁器鑄造中采用了机器模型;在这方面显著的特征是机械制造业发展的迅速,和紡織业发展的緩慢,而紡織业原是十九世紀初期资本主义經濟的心臟。

第三,在一系列的新兴企业中,机器技术无疑占着重要地位。由于这些工业是新建的,所以能够把科学更有系統地应用到生产上来;这些企业包括脚踏車、汽車、飞机、橡胶、化学品、电气及其設備、軍火等生产,以及群众消費品如烟草、肥皂和紡綫。恰如我們所看到的,在这第三类中,壟断的发展最快。

——財政資本——列宁所說的帝国主义第二个特点也日益取得了重要地位。在这一时期,銀行資本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控制了工业。自十九世紀早期以来,金融集中的情况一直在进行着,而国际金融資本集中在倫敦城的几个大銀号如“巴林斯”或“罗斯柴

耳德”手中的这个事实，决定了1914年前大英帝国的国际地位。

倫敦城^①的主要活动是海外投資、短期貸款、政府貸款、铁路和公用事业的投資。英国工业本身的資金，至少在十九世紀后期以前，大多都不經過倫敦的金融和銀行組織。主要都在这些工业巨头和他們的亲友之間解决。一直等到固定企业和設備、規模和复杂性发展到現有資金难以应付开銷和交納保險金时，才开始大規模无限制的接納外資組織股份有限公司。

80年代和90年代以后，企业发展到了股份公司的組織形式，倫敦城的金融家和保險人对这种发展所提供的营业机会，感到兴趣日益濃厚。另外，公司形态的組織特別适合企业的大規模和壟断性的发展，可被用来完成合并和集中。

这样，金融和企业巨头之間进一步混合，结果是增强了金融資本的力量。可是英国在这方面的发展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为緩慢。在1914年前，英国的企业家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勉强向資本市場和銀行要求經濟援助。这个出現于英国資本主义經濟中的新的重要特征，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間发生危机的年代中才取得其統治地位。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各大国帝国主义发展的三个突出的特点正在英国发展着，虽然速度和別的国家不完全相同。但帝国主义的成长是一种影响全世界的現象：国际壟断的大联合企业和强大的資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的分割已經完毕。

壟断統治发展得較快的国家，由于他們的性质，在爭夺世界市場、殖民地和投資地区方面，与英国发生了日益尖銳的競争和矛盾。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大国，英国愈来愈难保持它的統治地位了，

^① 倫敦城 City of London 是最早的倫敦，在現倫敦市的中心，方圓不过一、二平方哩，大銀行均集中于此。——譯注

到了由于这种冲突而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终于超过了它，一跃而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同时，帝国主义的成熟也带来了全世界被压迫国家的工人和农民的反抗，特别是在1905—1906年和1917—1921年，这些新运动给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了鼓舞和无比巨大的力量。

2. 帝国主义发展的社会影响

这个时期，这些正在发展的帝国主义特征愈来愈多地影响着英国内部的社会演变。在十九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抱着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自由经营理想，并与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结成同盟的那个资产阶级阶层曾经承担了使英国变成一个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历史使命，但现在它开始盛极而衰了。1832年以来的整个改革——选举权的扩大，贵族壟断文官、高等教育、军队和教会的结束，以及工人阶级中平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分子对自由党人的资本主义正当性和必然性的基本思想的接受——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成功。但是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力量使这种局面不过是曇花一现。大商贾和金融巨头正在社会上取得优势地位，那些不承认现实的资本家发觉自己日益陷于孤立的地位。

在政治方面，自由党分裂了，1914—1918年的大战加速了自由党的最后垮台，保守党慢慢地逐一把自由党集团吸收过来，而变成了唯一的统治阶级的政党。统治阶级更换了。由旧贵族团体组成的保守党，在遭受了农业萧条的严重打击以后，联合了大商贾和金融巨头（因为他们和这些人比和工业和商业中等阶级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同时，保守党人改变了战略，支持进一步扩大选举权，借助政治和帝国主义蛊惑宣传骗取了下中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援。

他們發展了一套帝國主義的理論，企圖以此來為他們佔領和滲入海外領土的行為進行辯護，和取得群眾對這種政策的支持，因為海外領土現在已成了關係統治階級生存的事。為了尋找根據，他們歪曲如達爾文學說等科學理論。篡改英國歷史。歌曲作家、新聞記者、學者、教士、詩人參加了對帝國主義的謳歌。他們用盡各種方法，把帝國主義宣傳成是英國的一種新信仰。理想主義的言辭，諸如“自種人的責任”、“傳布文明的使命”、“引導落後民族走向自治”等等不一而足。但也有比較坦白的供狀，如在1895年約瑟夫·張伯倫就說，殖民地是“用英國人自己的錢”開發起來的“財產”。又如路加德勳爵在1893年說，“爭奪非洲”是由於“日益增漲的商業競爭使得文明國家不得不佔領這塊唯一剩下來領土來從事企業投資和擴張”。

他們希望帝國主義的事業能通過為“過剩”人口提供“出路”，為固定就業提供市場一事來說服群眾相信在開拓帝國的疆土一事上，他們和統治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從而緩和階級矛盾。賽西爾·羅德斯在1895年說，他在出席了倫敦東頭失業工人的集會，聽到了“等於是叫喊‘麵包！麵包！麵包！’的憤怒發言”後，他比以往更相信帝國主義政策能夠解決“社會問題”。“帝國”，他說，“是一個關係麵包和黃油的問題。假使你想避免內戰，你就要做一個帝國主義者。”

因此在這個時期中，帝國主義不論是作為一個經濟政策，還是一個思想體系，都是英國社會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影響了整個社會結構。工業資產階級及其工人階級同盟者在十九世紀中的傳統政策，舊自由—激進派的反帝國主義思想並沒有立即消滅，但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力量而被迫採取守勢。自由黨人最後一次反對戰爭和反對帝國主義的巨大運動發生在1899—1902年的“南非戰

爭”期間，當時在“排外侵略主義者”的攻擊下，好幾個進步團體不得不團結起來進行自衛。

現在只有堅決和有政治覺悟的工人階級能夠進行這樣一個鬥爭。這個新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從80年代就開始了，但直到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才出現反對戰爭和反帝國主義的群眾性政治運動。我們將在下面看到，即使在社會主義者，也不能完全擺脫帝國主義思想。獨立工黨的戰士彼特·柯倫，在他於1900年第二國際大會上的發言中，提到了這種迷惑工人的宣傳和如何予以抗擊的情況：

“現在英國正在大力展開宣傳，企圖使工會運動者相信殖民政策對他們是有利的。說殖民政策創造了新市場，從而增加了就業機會並提高了工資。但英國的工會運動者都沒有被這些甜言蜜語所迷惑。他們回答道：只要英國還有兒童餓着肚子上學，還有工人衣衫襤褸流浪街頭，顛困而死，英國工人就不會對把他們生產品輸往殖民地感到興趣。如果帝國主義者對英國現已變成一個領土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國而得意非凡，那末我要說，英國有成千上萬的家庭，對他們說太陽還從來沒有升起來過呢。”（J. 倫茨著《第二國際的興衰》，第51頁。）

這時候，在其他階層的人民中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有些變化為帝國主義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

首先是投資債券和股票的小食利者的人數的日益增多。這些“報紙金融欄的奴隸”（這時債券和股票的價格已成了報紙每日新聞的一個項目），把他們的利益與掌握國家實權的金融家和董事們的利益結合在一起。而他們所買的多半都是海外投資的股票，這便使他們的利益與帝國主義的命運有直接的利害關係。

第二，我們前面已經說過，許多小企業主、分承包商、自由工人

等已經失去或正在失去他們的獨立地位。他們趨附于大企業，并日益依賴統治着國家經濟的大聯合企業和大廠商。

第三，經濟結構的日漸擴大和複雜化，大大增加了薪資階層、專門職業者和辦公職員的人數。他們如今形成我們一般稱為“中等階級”的大部分，雖然其中一部分只不過是“穿着黑禮服”的無產者罷了。工業、商業和金融事業要求日益增多的文書工作和日益複雜的組織。從數量上說，一支逐漸增大的職員、簿記員、小販、代理商、經理和工頭的队伍正在階級構成中占據重要地位。这里面也包含着數量在不斷增加的婦女，特別是在低級職員和店員的階層中。在這個階層里，有許多人認為自己有一雙白潔的手和穿着白色的襯領就比干粗活的工人高一頭，但也有許多人積極地參加工人運動。

最後，上述的經濟和社會變化也深深地影響了工人階級的構成、分布和人生觀。同時機器化的發展和企業規模的擴大促進了工人階級的團結和消滅了他們相互之間的隔閡。在這個時期開始時工會會員的人數尚不足 100 萬，及至這時期末竟增至 800 萬人。具有代表性的企業的規模日趨擴展，尤其是在正在發展的工業部門中，結果使數目愈來愈多的工人在一起工作——新興的工廠雇用了數百甚至數千工人，這和在這個時期初大規模生產開始以後仍然殘存在某些部門中的小作坊適成鮮明的對比。機器化的第二個結果，是企業組織的進一步合并，使工人的工作環境更加一律。

機器化“使生產過程具有一種集体的性質，一種半機器半人力的集体活動”。勞動中的分工發展到了“往日所未有過的錯綜混雜的程度”，而且日益要求工人的動作符合機器的節奏。這反映在資本日益成為一種團結和組織工人的力量上。（多布著《資本主義發展之研究》，1946 年，第 259 頁。）在許多工業部門中，需要經過長期學徒訓練的全能技術工人的場合，愈來愈少了。工廠中正在出現

一种后来被称为“半熟练”的工人，一种不同于受过全面训练的手艺工匠的机器操作者。这种新倾向渐使工人阶级中许多部门的工人在技能、工资和立场上彼此趋向一致，虽然直到1914年以后，“工人贵族”们才完全体会到了机器化的作用。在这以前，工厂中“贵族”的老基础依然存在——那就是机器本身的不完善——虽然这个基础已受到了威胁和破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机器也须要新的技术。一般讲来，1914年前，工厂中所发生的情况是“减少了最低工资的工人，而增加了工资稍高的工人”（E. J. 霍勃斯邦著《民主与工人运动》一书中“十九世纪的工人贵族”一章，1954年。）

制造业在继续扩张，虽然它雇用工人人数的增加不如运输、售卖、服务性行业和类似的各业那样快，所以大部分工人（这样的工人或许还要增多）并不在工厂里工作，而是仍然在工业化以前的状态下在小规模的作坊里工作。这种雇用情况至少一部分是由于薪资分配的不平均和英国帝国主义的寄生地位所引起的。

在工业中，以就业人员的数目来看，发展得最快的莫过于开矿、建筑、机器制造和造船业。矿业和建筑业技术改进相当缓慢，同时生产量的增加和劳动力的变化成正比例。人员增加得惊人的要算机器制造、造船业和成品加工（尽管在这些部门中技术改进也很显著），并且在“大萧条”结束之后，它们一再得到繁荣。在另一面，钢铁工业工人的增加比全部人口增长的比例还要小。

除了制造业而外，运输部门——包括铁路、码头搬运、市内运输、航运——的雇用人员增加得非常迅速。在伦敦和其他的大港口和城市中，有一大群非熟练的和临时雇用的工人，他们都是从农业中招来的。十九世纪中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几占全国人口的 $\frac{1}{4}$ ，等到这世纪末竟不到 $\frac{1}{10}$ 了。

这个时期内，工人阶级大约可分成三类：现在我们概括地谈一

下,由于上述的巨大发展在这三类工人内部所引起的变化。

首先是上层的“工人贵族”,他们约占全部工人人数的15%,他们的工资比较高,职业稳定。从40年代到80年代,参加工会的差不多都是这些工人。

第二类工人人数很多,差不多占工人阶级的半数,他们是普通的熟练工人,工资较高的劳工,以及随同机器化在日益增加的半熟练工人。

第三类是各行各业里的所谓“不熟练”工人和“卖力气活”的工人。这个时期历史的特征是工会组织在第三类工人中戏剧性的飞跃发展(这种发展后来扩大到第二类和第一类工人),和这个富于战斗性的“新工会主义”与手工艺技术工人的保守的“旧工会主义”之间在思想、目的和组织方面的矛盾。

从1840年以来,工人贵族这个阶层添加了生力军,原因是新崛起的行业带来了大批熟练工人,例如机器制造业、建筑业和印刷业。同时,从80年代起,纺织业女工人数的增加使高度技术性的男工人有了更为突出和优越的地位。在这世纪的下半期,工业重心从工业革命前的老式手工艺行业转到了金属工业,其次是棉纺织业。1906年的工资情况调查(此次调查不包括煤矿业)表明工人贵族最多(占20%或更多些)的企业是: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和锅炉制造业、造船业、各种金属工业、棉纺织业、建筑业、细木工制作业、印刷及针织业。

这些工人的社会观点是非常保守的,结果他们的工会当然也是如此。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十分敏感,并一心希望通过谨慎的政策和声望来保持他们似乎在70年代从雇主那里争得的地位。“锅炉和轮船制造协会”总书记罗伯特·奈特曾生动地说明了他们的看法。奈特在90年代对“皇家劳工调查委员会”说,

他的工会会员与泰赛德工会会员在利益上不应该彼此有任何分歧，“我们一定要使壮工循规蹈矩……铁甲工人是技匠，打下手的自然应当听技匠的指挥。”他同意铁甲工匠对做辅助工序的工人的地位有几分雇主的味道，他认为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也有类似熟练工人与雇主之间的那种利益矛盾。因此，从未有过不做过几年学徒的工人请求加入为该工会会员的。奈特还讲，“我认为人应当各安本分，一个阶级的人不应跑到另一个阶级里去。”（E. J. 霍勃斯邦著《工人的转折点》，1948年，第4—5页。）

我再举一个棉纺织业中的例子，以进一步说明工人贵族与其他工人的关系。詹姆斯·莫德司雷也是一个顽固的旧派工人，同时是政治上的保皇党人。他对委员会说，一个纺织工人至少要带3个学徒工，但其中只有一个能成为纺织工人。

“雇主有充裕的选择余地，他们可以挑选能力最优秀的来做纺织工。其余的，即能力稍差的，很多都改行干别的去了，有的去干翻砂工，有的去作叫卖小贩，有的去做搬运工人，有的则当了煤矿工人——在其他行业中也是如此。有一部分学徒工一辈子都作学徒工，只在纺织工生病的时候才临时代替他一下。”（同前书，第5—6页。）

因此，由于工人贵族的特殊地位和他們所怀的希望，他們热中于阶级合作的思想。兰开夏的棉纺工人和特赛德造船工人都在各自的企业中进行投资，他們的工会也是如此。廉价的“利润分沾”的策略，通过房屋协会购买房屋的办法，以及通过教育和报纸对接受至少是一部分帝国主义好处的大力宣传，凡此种种都助长了工人贵族那些早已經有的思想。

“经济萧条”对工人贵族发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它给許多企业部門带来了广泛的失业，增加了就业的不稳定性，而雇主們立即

利用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计划的延长工时和加紧剥削。

奈特在 1886 年的《锅炉制造工人年会报告》中写道:

“在每个造船港口都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失业工人找不到工作。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所忍受的艰苦贫穷是不堪想像的。疾病流行,同时,数百张饥饿瘦削的脸显示出他们的痛苦和辛酸,这是任何乐观的人都无法否认和缩小的。”(韦伯夫妇著《工会史》,1920 年版,第 378 页。)

同年,莫德司雷在巴黎的“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上报告称:

“工资下降了,失业人数很大……每天都有亚麻厂在倒闭……整个建筑业的景况都不佳……铸铁厂困难重重,1/3 的造船工人无工可做……不景气影响了无数的主要企业,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同前书,第 379 页。)

“全国店员工会”的 R. 戴维斯于 90 年代早期在对“皇家劳工调查委员会”的证词中,生动地叙述了工人在与雇主交涉中被削弱的地位。

“店员及其他企业的工人失业现象非常严重,常常有工人于失业一星期或两星期后,为了供给他妻子儿女一家人的面包和黄油,愿意在任何条件下接受工作。”

由于市面一再萧条,工人遭受失业,各工会在失业津贴的沉重负担下均摇摇欲坠,甚而至于瓦解。例如在 1879 年经济不景气的风浪中,“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会员失业人数为 13.3%;“伦敦排字工人工会”为 14.3%;“翻砂工人协会”达 22.3%;“锅炉和轮船制造协会”为 20.4%。

但在另一面,十九世纪最后数十年中物价不断降低,给能设法继续保持就业的工人带来了实际利益。加之,从 1840 年以来巨大的工资差一直保持到 1914 年世界大战,因此一个赚 40 先令的工

人，在每次降低生产成本后比一个赚 20 先令的工人能多获 2 倍以上的利益。但只有工人阶级的上层才能享有如表、家具、书籍和自行车这种落价最多的机器制造的半奢侈品。

这就是为什么“旧工会主义”在经济大萧条之后还能继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萧条使这些旧工会捉襟见肘，暴露出它的理论不足以作这个历史新时代中整个工人阶级的指南。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在1914年世界大战之前，帝国主义的发展为英国资本主义带来了新的力量和利润，从而延长了产生工人贵族的条件。像机器制造业和造船业一再得到发展，上层阶级的兴隆富裕维持了小规模服务性企业的成长。一直到大战以后，这个时期内出现的趋势才使工人贵族最后垮台。

但是在这之前，这些动摇工人贵族的势力和社会地位的趋势就已经露出了端倪。十九世纪中叶工人贵族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仅次于雇主的、而与店主、小作坊主和工头等平行的牢靠地位。这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继续保持自由激进派观点，和不能组成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原因。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管理人员和“白领”职员阶层开始扩大，而且慢慢与体力劳动者区别开来，他们代替了工人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地位。这是使熟练工人转向独立工人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具有熟练技术的工人贵族和其余工人阶级的关系也在变化之中。从 70 年代以后，分合同（就是一个熟练工人承担一宗活以后，再把工作分配给他的助手，助手的工资由他去付）制度开始衰落。很容易看得出来，这种制度的衰亡如何削弱了工人贵族与雇主间的联系。继之而起的是计件制度，它虽然也维持着工资的差别，但它打倒了以前那种几乎是阶级的障碍。自动机器的采用也增加了半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同时也破坏了熟练技术工人的特殊地位。

在我們所討論的这个时期內，上述的普遍的技术改革和人力分配降低了旧工人貴族在整个工人階級內的重要性。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在工人貴族較少的企业中（例如矿业、运输业、服装和制鞋业、化学品业、公用事业、食品业、飲料和烟草业）、在半技术性企业中（如正在发展中的密德兰机器制造厂），以及在像电机和机器模型鑄造业这种新的企业中，工人的人数都增加了。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工人階級中的后两个阶层。

除工人貴族之外，就是包括工人階級半数的广大的中間阶层。他們是普通的熟练工人，工人貴族很瞧不起他們，认为他們——用“宝石工人协会”書記 H. 阿兰在对“老年貧民皇家調查委员会”作证时的話來說——“虽然誠实，有向上心，但由于缺乏教育，或由于缺少毅力和魄力”，是不能和“第一級的工人”同日而語的。这个中間阶层也包括机械化企业中日益增长的半熟练工人和工資較高的工人（即那些在傳統上被认为是非技术企业中的有特殊技能的工人）。这个中間阶层与工人貴族之間的区别在逐漸縮小，因为这一部分工人也在較小的程度上享受到了这世紀末物价下降的好处。事实上，这个时期总的趋势之一，就是出現了一个扩大的混合的工人貴族阶层，它包括了整个工人階級中的上半部分的工人。

工人階級其余的部分，約为 40%，系“非熟练工人”，包括碼頭工人、煤气伙夫、农业工人、建筑工人、铁路工人、造船工人和普通的壮工，以及大部分的矿工。在“混合”工会的全盛时期，大家认为在大部分这些企业部門中工会組織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但是事实上，許多企业中的广大工人群众漸漸有了共同一致的利益，特别是在矿业、铁路、碼頭和煤气各业。所以在 80 年代后期，一旦出現了工会組織之后，立刻就迅速蔓延起来。这世紀的下半叶中，这些主要企业部門不断地从乡間招募新工人，他們（其他部門这个阶层

的工人也是一样) 失业和就业不稳定的情况甚至比在技术企业中尤为严重。他们又没有互助金可拿, 一旦失去工作, 就只有典当、借债、指望慈善舍施和行乞一道了。据估计这部分工人 $\frac{2}{3}$ 在老年时流浪街头。我们有绝对可靠的关于当时情况的材料, 证明工人阶级约有40%生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查尔斯·布思, 在80年末和90年代初对伦敦作了大规模调查后结论说, 伦敦约有 $\frac{1}{3}$ 的人口在艰难与贫困线上挣扎, 在该市的各大区域内几乎有 $\frac{2}{3}$ 的人口属于这一类。自由党领袖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 在1903年评论说“约有30%的人口吃不饱, 处于饥饿的边缘……生活在长期贫穷的铁掌之中。”经济学家里欧·吉柴·马尼爵士在他于1905年出版的《富与贫》一书中曾说到: “多数人一贫如洗, 少数人纸醉金迷”, 这“从两端腐蚀我们的国民生活”, “在一端有1,300万人陷于饥饿的边缘, 并由于生活穷困和无人照顾, 造成了他们在道德上的堕落。”政府的调查报告里也显露出同样一幅图画, 二十世纪初大家所熟知的“血汗制度”证明工业主义最坏的恶果仍然存在于大城市的小街背巷中。

这部分工人在富于战斗性的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所作的有力反抗, 以及他们在80年代后期所组织起来的“新”工会, 在工人运动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他们发展新会员和坚持斗争的决心也感染了现在壮大起来的老工会。从此以后工会运动不是几万几十万, 而是几百万人的事了。而且不久, 工会运动作为一个主要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但是, 我们已经看到, “旧”工会主义者的基础仍然很强大, 同时帝国主义时代又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生命。数十年来, 他们一直垄断着工会运动, 几十年来丰富的组织经验使他们能够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坚持他们的政策, 而他们的政策是以打入中等阶级, 宁

願妥協不願斗爭和相信資本主义的必然性为基础的。当此工人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发展的时候，这派工会領袖不仅控制着扩大了工人階級上层部分，也影响了新組織起来的非熟练工人。雇主們立刻乘机利用了这种傾向。我們可以举出一些直接腐化墮落的例子^①。但对工人运动來說，更其严重的是工人接受了統治階級的观点。列宁曾經指出这是这一階层的工人在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

“有了这样巨量的超額利潤（因为这个利潤超出了資本家从‘自己’国家的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潤），自然可以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領袖和上层工人貴族。‘先进’国家的資本家，就是这样千方百計地、直接和間接地、公开与秘密地收买他們。

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資數額和整个世界观說來已經完全市儈化的、資產階級化的工人或‘工人貴族’階層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而現在則是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不是軍事）支柱。因为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資本家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理人。”（《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5—186頁。）

有眼光的雇主看到在勞資关系中，在馴服的工会領袖控制下的工会是很有用的工具。例如由大承包商組成的“全国建筑包工者协会”的書記諾克斯就对“皇家勞工調查委员会”說，勞資双方爭端的减少当归因于工人和雇主都有較好的組織的这一事实。他认

^① 例如1889年，《勞工选举者》報紙揭露，“职工大会”及其議會委员会的書記亨利·布罗德赫斯特曾支援了自由党候选人約翰·卜内（“卜内門公司”的领导人之一，該公司后为龐大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一个构成部分）。不久之后，卜内就把他的十五份“普通股票”轉让給布罗德赫斯特，股份的利息是49%。

为“与工会代表安排事宜比不分皂白地与一群工人商量来得容易。”

“与工会代表安排事宜”的倾向与全薪的工会专职干部人数的增加同时发展着，在1850年尚未出现的专职工会干部到1892年已发展到600或700人，而且在继续增加。这些在思想上已经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工会干部渐渐地变成了一种专门职业者。他们关心的只是本企业中的技术性和眼前的問題，而不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方针。这种思想的一个极端例子，就是棉纺织业的许多工会干部在高薪聘请之下，常常愿意到雇主所组织的俱乐部里去当干部。

“不问他们是为雇主还是为工人服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使集体协定在工厂与工厂之间取得一致。有人说这个工作和评价人或会计员的工作一样，完全与个人的思想与信仰无关，他可以忠于任何一方。工人们对这个很有意见，在某些企业中工人提出，这些工会干部‘完全听雇主的话’”。（韦伯夫妇著《工会史》第9章，第479页。）

一个“富有思想的技术工匠”曾经对工会干部所受的这种影响和他们以后的蜕化作作了很好的描述：

“以前手工艺工匠所过的穷困和奴役生活的生动情景，渐渐地在他脑海里变得淡薄了。他们开始渐渐认为所有工人們的抱怨都是荒謬和不合情理的。随着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可能发生更加叫人气愤的变化。今天太工会里的专职干部都受中等阶级的包围和阿諛。他们邀请他们登門赴宴，于是他们就会羡慕雇主們精致的住宅，美丽的地毯，安适而奢侈的生活。慢慢地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觉得自己与工会会员們格格不入了。……他把这种隔阂归之于不满分子的影

响，或是归之于年轻工人的激烈思想。而年轻的工人则认为他们高傲、‘自大’，过分谨慎，甚至对工会事务感觉迟钝。”（同前书，第469—471页。）

当这些工会干部“感觉自己与他们工会会员格格不入”的同时，资本家圈子里也流行着一种强烈的看法，尤其是在自由党人中，他们主张接纳和利用这些工会干部。1886年两名工会运动者，“矿工工会”的托马斯·伯特和“石工工会”的布罗德赫斯特被任命为自由党内阁的次长，就是这种政策的一个有力的证明。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典型人物是1871年机器工人“九小时运动”的领袖约翰·伯纳特。1886年他在商业部新设立的劳动局中作了官。

“他原是‘九小时罢工’中的一个富于斗争性的铁匠，当时既无组织又无经费，但伯纳特发动了男女工人向强大的英国兵工厂阿姆斯特朗挑战。可是他后来竟做了给格莱斯顿和自由党竞选运动的宣传员，并对工会设置互助金一事表示遗憾，说‘这是社会进步最大的障碍’，他还极力主张劳资双方在‘谈判桌’上解决彼此的争端，认为劳资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肯在商业部自由党部长下面任职，和他过去的行径是并不矛盾的。”（J. B. 杰弗里斯著《机器工人》，1946年，第110—111页。）^①

这些人的野心并没有到此为止。1906年，一度是社会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历史意义的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的领袖之一

^① 在这时候，同样的趋势席卷了全欧洲：德国的伯恩斯坦在社会民主党人中攻击马克思主义，法国的米勒兰和饶来士主张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俄国出现了主张让自由党人去搞政治的“经济主义”。这些全都发生在1898—1900年中。

的約翰·伯恩斯做了自由党内閣的部长。

同时，两大統治階級的政党都想用小小的改革来收买工人階級，获得工人階級的支持，或者至少使他們不致反对政府。創立这种“贖买”（馴服工人階級的代价）学說的是激进帝国主义工业家約瑟夫·張伯倫。他甚至盜用了社会主义的名义，說：“社会用来履行它的責任的每一項善意的法令都是社会主义，而且并不因为是政府頒布的法令而有所減色。”自由党領袖勞合乔治在1914年大战前工会运动如火如荼的期間，把这种伎俩發揮得更为淋漓尽致更为成功。

因此，这个时期是一个充滿了复杂而深刻的經濟和社会变化的时期，这些变化对工人階級具有重大的意义。在70和80年代里，英国的龐大和日益扩展的經濟在激烈竞争的冲击下受到了震动，但继之而来的代替了工业壟断的帝国主义壟断暂时稳定了英国的資本主义。这种稳定只是暫时的，而重新調整的負担落到了工人的身上。問題擱置起来了，而沒有解决。这个以“經濟蕭条”开始的時代，結果以世界大战的屠杀和战争年代中第一个毁灭性的經濟危机而告終。可是，当旧社会在經受改变，在被它自己的矛盾弄得千疮百孔时，工人階級却变得比以前更集中和更团結了，也更壮大更有觉悟了。这种发展当然势必要引起与那些以傳播和培养資本主义思想为其政策的一小撮有势力的工人貴族的冲突。尽管有統治階級的威吓和諂媚，尽管有帝国主义的蠱惑宣傳，尽管老工会領袖迟鈍甚至墮落腐化，可是当英国工人階級由爭取独立的時代进入夺取政权的時代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和斗争性还是在工人队伍中成长起来了。

第五章

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1. 从民主激进主义到社会主义

在1875年的时候，只有年逾45岁的人还可能对伟大的宪章运动时期的状况保持着童年的记忆；只有年逾55岁的人还依稀记得罗伯特·欧文的全国各业统一工会。社会主义在英国几乎好像已经绝灭了。10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在那些正在进行组织工作和罢工的、受压迫的群众中间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由自由党人散播的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必然会取得进步的幻觉现在甚至对某些工人贵族也逐渐失去了影响。工人激进派的俱乐部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维护生活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正在涌现出来。“社会民主同盟”不断进行的自我牺牲的宣传、威廉·摩里斯的才华卓绝的教导和汤姆·曼恩在建立群众性工会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进行的。组织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组织和目标的政治性劳工运动的想法复活了——这是和几年以后基尔·哈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伟大运动的显著特点。英国工人阶级像一个被人蒙住了眼睛的巨人，现在从眼睛上扯下蒙布来了。

在70年代和80年代里，整个社会发生了急遽的变化，这个社会的许多基本原则都受到忧心忡忡的怀疑。这时，广泛的人民运

动圍繞着各种各样的問題开展起来——扩大民主問題、爱尔兰問題、帝国主义問題、土地問題和大萧条时期产生的各种社会問題。

这些运动的兴起及其力量来自曾經支持过自由党而現在却远远走在自由党领导机构前面的地方俱乐部和协会中的工人階級激进派。的确, 80年代和90年代初叶可以說这些激进派試圖把自由党变成一个真正屬于人民的政党的时期。他們从經驗中知道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同时, 通过工人階級的候选人来表达工人階級意見的想法导致了建立独立組織和奉行独立政策的思想, 从此, 这种趋势日益强烈起来。

1875年3月16日的《雷諾新聞》在討論格萊斯頓內閣垮台問題時說:

“劳工阶层的任务就是准备好自己的候选人——他們自己的人, 他們本階級的人——这些人将不参加这两党的阴谋活动。(两党指自由党和保守党, 着重点是我們加的。——著者)

“工人階級在1868年的选举中为格萊斯頓先生帮了很大的忙, 可是他們得到了什么报酬呢? 人民被利用了、被欺騙了、被出卖了, 因为自由党人从来不曾考虑过劳动者的利益——除非当委威先生考虑对火柴盒征税的时候, 或者当布魯斯先生考虑如何尽可能不修改一件关于煤气厂司炉工人的完全不公平的判决的时候, 他們才会想到和劳动者利益有关的事。格萊斯頓先生利用选举中取得的多数进行統治, 为中等階級的利益服务、并保护上层階級的利益。”

于是, 工人中的先进分子进一步了解了自由主义的階級意义。早在80年代初期他們就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組織。

具有政治头脑的工人的不再受駕馭是促使自由党发生变化的

一个主要因素。自由党内部出现了两个重要派别，都是激进和共和主义的。其中以约瑟夫·张伯伦和查尔斯·迪耳克爵士为首的一派在前面一章已经提到过。张伯伦是英国密德兰实力雄厚的工业家。他担任过伯明翰市长，并在1876年为代表该市的议员之一。迪耳克爵士在1868年到1886年间是契耳西的议员。这一派的目的是通过社会改革和效率强大的政治机构为自由党内的工业家集团建立群众基础。他们把社会改革和帝国主义结合起来，并猛烈地反对爱尔兰自治。爱尔兰自治在当时是占头等重要地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张伯伦终于在1887年和格莱斯顿发生决裂，另外组织了“自由联合党”——这是他走向保守党的一个踏脚石，后来他果然参加了保守党。

另外一派的领袖是激进主义者和无神论宣传家查尔斯·布莱德洛。布莱德洛曾经和安尼·贝赞特一起进行过反对褻瀆法和其他限制出版的法律的巨大斗争，因此声誉卓著。他的“全国俗人协会”的某些会员后来变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这个协会变成了一个著名的进步的政治中心。布莱德洛在80年代为了进入下议院而进行的6年斗争提高了他作为先进的激进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他是1880年在北安普敦当选的。但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拒绝进行议员就职宣誓。他在被下议院开除以后，屡次以更大的多数当选，直到1886年他被容许不宣誓而就职为止。布莱德洛虽然顽固地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后来在有人企图压制社会主义宣传的时候，他却积极地参与了保卫言论自由的斗争。

自由主义运动中这些激进派别的强大说明，国内必须有充分的政治民主的思想在工人群众和中等阶级的下层人士中是根深蒂固的。作为宪章运动的基本特点之一，这种思想不但从来没有消灭，而且鼓舞了60年代为通过第二次改革法案而进行的伟大斗

爭。^①人們对1867年通过的这个法案所作的有限让步的不满与日俱增，因为这个法案仅仅把选举权扩大到城市的手艺工匠。贫苦的城市工人、矿工和乡村中的农业工人仍然无权投票。他們中間某些人是在1884年自由党政府通过第三次改革法令以后才获得选举权的，这次改革使选民人数（爱尔兰除外）从不到300万增加到将近500万。^②

从70年代末期开始，争取爱尔兰自由的斗争成为英国政治的中心問題之一。这是因为：爱尔兰发生了影响到大部分人口的极端尖锐和广泛的农业危机；威斯敏斯特^③的爱尔兰議員組成了团结一致、紀律严明的集团，在英国政治舞台上起着重要作用；在爱尔兰拥有地产而本人并不在爱尔兰的英国地主組成的集团在保守党内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以迈克尔·达維特和他的“爱尔兰土地联盟”为首的爱尔兰革命者和具有政治觉悟的英国工人相互之間有着傳統的强烈同情。当自由党政府对爱尔兰革命运动采取拖延政策或企图予以扑灭时，英国工人阶级激进派就和居住在英格兰的爱尔兰工人一起举行游行，要求給爱尔兰以自由。同时达維特的斗争一方面是为了争取社会改革，一方面也是为了争取民族解放。他在1890年建立了“爱尔兰民主劳工联合会”，鼓吹英格兰和爱尔兰两国工人之間的合作。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先驅者之一、后来成为工党領袖的潑普拉的兰斯伯雷就是在参加争取爱尔兰自由的激进运动时开始获得政治觉悟的人之一。

① 这里指的是1867年英国議會通过的选举改革法案。按照这个法案規定，在伯爵領地，选民财产資格由15鎊降到12鎊；在城市中，一切房东和租房人以及居住一年以上、納付租金不少于10鎊的房客都获得了投票权。——譯者

② 25年以后，在1911年，同一地区內的40,000,000人口中只有7,200,000人有选举权（1955年，51,000,000人口中选民有34,000,000多万）。

③ 英国議會所在地。——譯者

我們已經看到，征服和剝削其他国家当时已經逐漸成为英国政治和經濟的一个基本特征。当然，这种情况違反了英国民主傳統最堅強的、最不可动搖的原則，激进主义者一直把帝国主义政策看作是保守党的一种欺騙手段。

70年代中叶，工人階級和激进派組織領導憤怒的群众，猛烈地反对保守党在国外的阴谋活动和反对保守党准备在巴尔干发动战争的政策。其規模之大和60年代曾經制止英国干涉美国内战的那次运动不相上下。1876年，保加利亚人举行了反抗土耳其帝国橫暴統治的起义（保加利亚当时是这个帝国的一个省份），俄国人对保加利亚人进行了援助。土耳其軍隊的殘酷暴行激怒了英国輿論。但是，狄斯累利的保守党政府由于垂涎于更多的权力和中东的領土而准备把英国拖入战争，帮助土耳其人鎮压保加利亚人的起义。政府的这种政策遭到人民广泛的譴責。在海克利的哈格斯頓路“劳动者俱乐部和学院”举行的一次集会发动了反战运动。这次集会是倫敦一个專門为這個問題成立的委员会召集的，它的主席是“劳工代表权联盟”的托馬斯·莫特斯赫德^①。英国各省許多中心地区很快也举行了类似的群众集会。只是在这种群情激憤的情况下，格萊斯頓才发表了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保加利亚的恐怖》，虽然他对巴尔干的局勢早已就很注意了。这本猛烈抨击土耳其人的小册子在出版以后4天之內就售出4万本。不久，有一批人組成了“东方問題协会”，他們反对政府——如摩里斯所說——“把我們拖入一場可耻的和非正义战争”的企图。这批人里面有些是激进主义者，还有像威廉·摩里斯这样从前在政治方面并不活

^① 托馬斯·莫特斯赫德是第一国际常务理事會理事。这个理事會常常在克勒肯威尔·格林路37号“激进俱乐部”（现在是馬克思紀念圖書館）开会。莫特斯赫德是这个俱乐部的書記。

跃的人。

1877年5月，摩里斯拟定了《告英国劳动者书》。“是誰在把我们引向战争？”摩里斯问道。“是证券交易所的贪得无厌的赌徒，陆海军中游手好闲的军官们（这些可怜虫！），俱乐部里日暮途穷的玩世不恭者，为供给那些在战争中不会受到损失的人在丰盛的早餐桌上阅读的聳人听闻的战争消息的亡命之徒，最后还有高踞显赫地位的、保守党騙子手，他们是我们这些厌倦了和平、理性和正义的傻瓜在上次选举时挑选出来充当我们代表的。如果我们在这种人的领导下参加一场反对并不是我们的敌人的人民、反对欧洲、反对自由、反对天性、反对世界希望的非正义战争，那将是多么羞耻，那简直是双倍的羞耻啊。”参加“东方问题协会”集会的数以千计的群众都唱着他为这次运动写的一首歌。这首以“醒来吧，伦敦的青年们”为题的歌最后两段是这样的：

怎么！难道我们敢在重担下跪伏，
把劳苦说成幸福，
默不作声地盲目走入
充满羞辱的道路？

醒来吧！伦敦的青年们！时候近了，
明亮的曙光将带来白昼；
抛开欺騙、扔去羞辱，
把土耳其暴徒赶走。

1878年1月在埃克塞特会堂召开的一次集会在这次运动发展的顶点。关于这次集会，摩里斯写道：“晚上的集会开得十分庄严、井井有条、人们热情奔放。但是应当记住，为了把敌人的打手

阻擋在門外所需做的工作是很艱苦的，他們在屋外的喧嚷就好像咆哮着的海洋在冲击灯塔。……毫無疑問，过去两周的群众运动已經阻止狄齐^①提出撥款的要求和远征加利波利半島的建議。”

但是在外交政策和帝国主义問題上，自由党上层階級的意見和工人階級以及激进主義者的意見是分道揚鑣的。1880年自由党再次組閣以后，不久就卷入了殖民战争，特別是在埃及(后为英国占領)和苏丹。

爱尔兰人决定了这个席卷英国乡村的强大抗議运动的步調。他們在推进思想斗争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在英格兰，斗争起初是圍繞工資問題和70年代約瑟夫·阿奇进行的英勇的工会工作展开的。后来，斗争采取了政治形式，农业工人在阿奇領導之下投了自由党的票。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以及爱尔兰，主要的問題是租金和物价。运动的发展超出了自由主义的范圍。这是苏格兰佃农的革命激进主义运动的偉大时期，他們的領袖是具有社会主义傾向的苏格兰地主和議員魯·布·肯宁汉—格拉姆。

从宪章运动时期以来，土地改革的思想——地价稅，地租或土地本身的国有化——就占据着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激进主義者的注意力。經濟学家約翰·斯图亚特·弥勒在1870年創立的“土地所有权改革协会”里就有这两个階級的一些出色的代表。这个协会鼓吹“不劳而得的土地增益”及其产品应当整个交給社会。大蕭条时期中，不仅在农业而且在整个經濟部門中一再发生的尖銳的危机更加刺激了先进的激进主義者，特別是在“爱尔兰土地联盟”的土地改革的思想。“土地联盟”的領袖迈克尔·达維特試圖把改进劳工地位的計劃和民族解放以及土地制度的改革联系起来。

^① 指狄斯累利，意思是糊塗蛋。此处有双关的意义。——譯者

随着 1879 年亨利·乔治写的“进步与贫困”的出版，群众骚动达到了新的顶点。亨利·乔治是一个美国人，他主张废除地租税以外的一切捐税，实行“单一税”。这种主张当然未免过分简单化了，但是他以美洲西部拓荒者那种朝气蓬勃的热诚坚持认为土地和劳动——而不是资本——是财富的源泉的论点，却使一个古老的真理复活起来，并帮助许多人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乔治的书销售达 10 万册左右。1882 年，他到英国来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讲旅行，有意思的是他在爱尔兰的旅行是以他的被捕而结束的，释放后他继续在英国各地演讲。对于大多数未来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土地改革是他们从激进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中途站。

社会批评和激进民主思想就是这样在 70 年代末期和 80 年代初期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发展导致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复活。在这以前，社会主义思想几乎完全局限在少数勇敢地继承了第一国际旧日传统的人和小团体里面（特别是流亡在伦敦的德国工人集团里面）。1877 年“圣马太基尔特”的成立便是这种新趋势的象征。“圣马太基尔特”是伦敦一位副牧师为了发起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而作的尝试。但这只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强有力的趋势所引起的群众舆论的一部分。

在伦敦，赶车工人约瑟夫·累恩按照“施特拉福德激进俱乐部”的做法创立了“劳动解放同盟”。这个同盟在伦敦东区的露天下进行鼓动，宣传“建立社会的自由社会条件”和土地及财富生产工具的公有制。汤姆·曼恩（当时他还是一个年青机器工人，作为革命的工会运动者，他后来曾经进行过 50 多年极为广泛的活动）回忆说：他当时“狼吞虎咽”地读了亨利·乔治的书。他之所以能够看出和他一起的技术工人思想上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本书。他在读了这本书以后还组织了一个讨论社会问题的研

究会。同时，他说，他也很幸运地能够看到不仅把土地而且把机器和资本也变为公共所有的必要性。就这样，通过“崎岖不平的道路”，通过在公园和其他地方举行的露天集会，他找到了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汤姆·曼恩著《我是怎样成为社会主义者的》。）

另外一位青年技术工人詹姆斯·麦克唐纳，后来也变成了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和工会运动者。詹姆斯·麦克唐纳原来是爱丁堡的成衣匠。1881年他来到伦敦，参加了一个在托顿罕街一家酒馆里聚会的“苏格兰俱乐部”，这时候他才第一次和几个社会主义者有了接触。“有一天晚上”，他写道，“酒馆主人告诉我们说，有些狂热的芬尼党人和英格兰的恐怖党人正在另一间房里开会……他们猛烈抨击自由党政府的强制法案……我们注意着这些人举行的会议，并形成了一个反对派。……但是我们发现自己逐渐失去了自己的阵地，后来我们把我们的命运和其他的人联系起来，组成了‘中央马利波恩民主协会’。”不过真正把他吸引到社会主义这方面来的还是马克思的朋友兼合作者恩格斯在伦敦各业理事会机关报《劳工旗帜》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J. 麦克唐纳著《我是怎样成为社会主义者的》，第51—60页。）

先进的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并不是局限在伦敦，虽然伦敦在这一阶段是走在前面的。1879年初，“密德兰社会民主协会”在伯明翰成立。它的纲领包括废除皇室、上议院和英国国教等主张。它和英国广大地区的人民保持着通信联系。在它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曾经宣读了来自渥京、华尔沙尔、梅德斯通、吉尔德福特、普鲁姆斯梯德、彻斯特菲尔德及其他地方的来信。从彻斯特菲尔德来的信中强调指出了成立“主要行业的全国性组织以相互保障、反对资本的专横统治，以准备最后镇压资产阶级的必要性”。吉尔德福特的来信提出了“在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建立南方各郡的联

合組織”(見1879年1月5日和26日的《雷諾新聞》)的問題。^①

对当前的問題进行明确的分析、傳授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准备成立独立的工人階級政党的时机現在已經成熟了。这也是恩格斯在《勞工旗帜》周刊上发表文章的目的。工人階級,他說,逐漸了解到他們有一个时期“走錯了道路”,了解到像現在这样把斗争局限在工資和工时方面,只是把斗争卷入一个“找不到出路的恶性循环”里,了解到“根本的弊害,不在于工資的低微,而在于雇佣劳动制度本身。”

这种理解一旦在工人階級中傳播开来,“工会的地位一定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它們将失去作为工人階級唯一組織的特殊作用。同各个产业部門的工会并列,或者在它們的上边,一定会出現一个总的联合会,一个整个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只要英国工人階級能够組織成为一个整体,世界上就沒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对它进行一天的抵抗。”經濟上的大蕭条說明資本家階級已經“无法管理这个国家的巨大的生产系統”。必須让工人階級有机会来試一試。(見1881年6月4日和8月6日的《勞工旗帜》周刊;这些文章后来重印于1934年出版的恩格斯所著《英国工人运动》一书中。)

这种看法对于控制着各业理事会的老派自由党人來說是“太过火”了。恩格斯拒絕緩和自己的語气,他和这家報紙斷絕了关系。但是,就像我們已經从一个例子上看到的那样,这些文章对那些渴望找到前进道路的、有思想的工会运动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 社会民主同盟

現在,需要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已經是非常明显的了。正在这

^① 德国从1869年起就存在着一个社会民主工人党,这时由于它所进行的爭取工人階級权利和反对帝国总理俾斯麦的斗争而在整个欧洲博得好評。

时，富有、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证券交易商人亨利·迈尔斯·海德門提出了建立新政党的創議。1880年他閱讀了馬克思的法文版的《資本論》（英文版直到1887年方始出現），以后又花了原书作者很多時間來和他討論这本书所闡述的理論。

第二年春天，他在倫敦激进派俱樂部之間发动大家進行討論，並成立了“民主同盟”。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激进派組織都被邀請來參加這個同盟的成立大會。海德門是同盟的主席。與會的代表們都得到了他寫的一本題目叫做《大家的英國》的小冊子。这本书概括了馬克思的观点，但是沒有說明这些观点的來源。这件事促成了海德門和馬克思关系的破裂。馬克思认为海德門是一个野心家。

“社会民主同盟”首先站在激进主义的观点上，以外交事务、土地国有化、特别是爱尔兰問題为中心发动斗争，他們抗議自由党政府逮捕巴涅尔^①和其他爱尔兰領袖、封閉“土地聯盟”等加緊鎮壓的活動（这在当时一般被称为“强制”活動）。

《大家的英國》只是海德門在以后几十年中以文章、書籍、小冊子等形式發表的解釋馬克思主义的无数通俗著作中的第一本。这些著作尽管有缺点，但仍然很可宝贵，因为它们向英國工人階級介紹了馬克思对資本主义社会所作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分析。例如，他在1885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与奴役》中写道：

“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經不是純屬空想的計劃，也不是在受苦受难的階級中煽起普遍不滿的企图。它的代表已不再是那些自以为可以使人类一蹴而就地达到几乎无法达到的幸福的人，也不是那些自以为可以在无政府主义竞争的沙漠中能够建立起由可爱的合作者組成的小块綠洲那样的人了。社会

^① 巴涅尔是当时英國議会內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領袖。——譯者

主义是以政治经济学和社会进化为基础的一种明确的科学的历史理论。它既考虑了过去的阶级斗争所造成的进步，也注意到我们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引起的苦难和不可避免的矛盾，并且预测运动的未来发展，以掌握人类对自然界的日益增大的支配力，使它为整个社会服务而不是为资本家阶级和他们的附庸积累财富。当然，要造成这种变化只有一种办法，就是：一方面要制止现在上层人士之间为了个人或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竞争，同时也要停止下层人士为取得仅可糊口的工资而进行的竞争。用争取生存的有组织的合作来代替……阶级统治，用国际友好代替国家之间的敌对；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因此在我们面前进行的阶级斗争和影响到一切阶级的生产方法的变革——蒸气、机械、电气等等——在人们思想中就表现为集体主义的原则和个人主义原则之间的斗争，公有财产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之间的斗争。”

海德门是在英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的某些著作，如《社会主义与奴役》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有着巨大的价值。他那本讨论印度问题的书是英国人指出专制和剥削之间的联系方面所作的第一次尝试。列宁在1911年写的文章中說海德门“曾经坚决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并且赞扬了他从1878年起进行的暴露英国帝国主义暴行的“高尚的揭露运动”（《海德门谈马克思》。《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89页。），列宁在对海德门作全面评价时，說他是一个“英国资产阶级的庸人”，“他虽然是本阶级的最优秀的分子，终于找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从来没有完全抛弃资产阶级的传统、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成见。”（《海德门谈马克思》。《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1页。）

海德門对馬克思主义的解釋的基本弱点，因此也就是“社会民主同盟”中（他在这个同盟中占据着統治地位）他的大部分追隨者在理論观点方面的基本弱点在于：他认为曾經由馬克思精辟地加以分析的資本主义內部矛盾，将自动地造成資本主义的崩潰。例如，他在1889年写道：

“要不了几年，我們就会看到另一次經濟危机……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不断地向工人們指出：如果他們能教育自己、认真地准备好結束階級斗争，那么这一次經濟崩潰將使他們能够一劳永逸地掌握巨大的生产和运输工具……这些工具那时将从地主和資本家的无能的手中掉下来。”（見霍勃斯邦著《工人的轉折点》，第43頁所引，1889年11月23日《正义报》。）

因此，海德門不是一个組織者和領袖——即一个能够领导人民通过自己的日常需要和願望而参加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护民官”——他只是个宣傳家。由于鼓吹上面所說的这种消极等待思想，这种思想也逐漸影响到他自己，常常使他做出有損工人階級利益的事情，特别是在有关英国外交政策問題上。因此，当“社会民主同盟”于1900年正在进行反对波尔战争（南非战争）的英勇斗争时，海德門突然建議放棄这一斗争，“把它留給自由党人去做”。（这件事典型地說明了“社会民主同盟”內部海德門領導集团和盟員群众之間长期存在的分歧。在1900年的年会上，海德門在这个問題上陷于孤立，以致沒有参加执行委员会的竞选。）海德門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資產階級的政客，最后终于离开了馬克思主义。

但是，原則总是要比个别人物更偉大，許多从海德門那里初步得到对社会的科学認識的工人階級战士在英国傳播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曾經是海德門多年以来最亲密

的拥护者之一的倫敦工会运动者哈利·奎尔奇。正如列宁所說，在他 1913 年去世时，“在那些不屈不挠、满怀信心地反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治的人們中間，奎尔奇走在最前列。”（《哈利·奎尔奇》。《列宁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70 頁。）

“社会民主同盟”內社会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使这个組織的政策和成員的成分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它反对自由党并日益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关于住宅、八小时工作制等問題的斗争，結果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中老派的自由激进主义者都逐渐脱离了這個組織。另一方面，这个同盟人数虽然不多，但却吸引了那些认清只有工人階級运动才有前途而激进主义的道路是沒有前途的极有才干的工人和知識分子。他們和 1883 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的卓越的艺术兼作家威廉·摩里斯一样，感觉自己“必須行动起来”摧毁貧富悬殊的“令人无法容忍的”资本主义制度。他們认为要摧毁这样一种制度，只有“联合一切不滿现状的人……換句話說，就是通过这个制度所培养出来的、摧毁这一制度的自然而必要的工具——階級矛盾。”

“社会民主同盟”这时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綱領《社会主义淺釋》，說明它的政策是以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社会主义淺釋》共銷售了 10 万份。不久，在另一个从上层階級轉而信奉社会主义的人 H.H. 錢皮恩（他是一个退休的炮兵軍官，父亲是一个少将）的主持下，开始出版《今天》月刊和同盟的机关报《正义》周报。在倫敦，詹姆斯·麦克唐納已經把“馬利波恩民主协会”带过来。强有力的宣傳不仅在倫敦而且在許多外地的中心城市展开了。例如在布莱克本举行的一次棉业罢工中，“社会民主同盟”中 5 位领导人：J. L. 乔埃尼斯（前伊頓学校的教員），J. E. 威廉斯（一个曾經参加过

倫敦旧“德国社会民主俱乐部”的工人)，海德門，摩里斯和麦克唐納，进行了宣傳活动，后来就成立了同盟的支部。在爱丁堡，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斯赫参加組成了“苏格兰土地与劳动联盟”。这个联盟在1884年并入“社会民主同盟”。同年，“劳动解放同盟”也参加进来。在这一年的年会上，“社会民主同盟”的社会化綱領所包括的范围从土地、铁路、銀行扩大到一切生产、分配和交換手段。为了标志出这一阶段的发展，他們通过了“社会民主同盟”这个名称。新的綱領是由一个委员会拟訂的，委员会的成员是：錢皮恩、摩里斯、累恩（“劳动解放同盟”）和貝耳福德·巴克斯（他对馬克思主义理論的理解曾贏得这个理論的創始者的最热烈的称赞）。

由此可見，英国的社会主义絕不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模糊不清的渾沌的願望（人們常常特別喜欢用这种說法来污蔑摩里斯），也不像某些人有时說的那样：只关心最直接的、短时期的具体改革。英国的社会主义从披荆斬棘的草創时期起实际上就处在馬克思的影响之下。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英国的經驗为基础并且用英国的情况来作为例证的。恩格斯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都住在倫敦，他和英国許多积极活动的先驅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欧文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已經烟消云散，費边社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没有誕生。所以早期的英国社会主义者都是馬克思主义者，或者自认为是馬克思主义者。当然，整个說来，他們对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有缺点的；他們在实际政治活动中运用这种理論时缺点就更多了。

必須記住“社会民主同盟”，像它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是一个同盟——我們已經談到組成这个同盟的几个团体。这个同盟里面，特别是在早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傾向和个人观点。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同盟盟員中那些工会运动者，他們在建立和形成现代劳

工运动方面起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他们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了广阔的视野和理论认识，而并没有让自己领导群众的能力受到狭隘的、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的侵蚀（而这正是同盟的主要弱点）。汤姆·曼恩和约翰·伯恩斯两人共同领导了1889年的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后面我们将看到这次罢工在英国劳工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并创立了码头工人的群众组织，即后来的“运输与一般工人工会”。伦敦煤气工人魏尔·桑恩（同盟的盟员，马克思的女儿艾琳诺娜曾帮助他提高文化水平）后来创立了煤气工人工会。“全国一般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就是从这个工会成长起来的。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后来成为“伦敦各业理事会”书记的詹姆斯·麦克唐纳、未来的《正义报》编辑和“伦敦各业理事会”主席哈利·奎尔奇和“苏格兰土地与劳动联盟”的约翰·L·马洪。后来受到若干代劳动者特别是伦敦东区的劳动者的爱戴的乔治·兰斯伯雷也是通过“社会民主同盟”参加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

但是，尽管许多盟员都具有伟大的才能和前途，当时还没有可能把“社会民主同盟”变成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企图用个人手腕来保持独裁统治的海德门支配着这个组织。

这种情况是令人无法容忍的。危机很快就发生了。1884年底，同盟的执行委员会里的大多数委员集体辞职并着手建立一个新的组织——“社会主义联盟”。这些委员中包括摩里斯、艾琳诺娜·马克思、爱德华·埃夫林、巴克斯、马洪和一些工人领袖。他们发表了谴责海德门集团的宣言。宣言说：社会主义的组织并不需要“强使一切人和一切意见都服从自己的、诡计多端和阴谋善变的领袖”。它指责“社会民主同盟”的领导“政治上具有机会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如果发展起来将使我们陷入和这个或那个政治派系的同盟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如何短暂”。同时，“在拥护这种政治

冒險观点者中間有着一种过份強調本民族的傾向，这种傾向是社会主义的死敌。”随着这一政策的执行，“同盟內部的独裁統治”发展起来了，企图“扼杀所屬团体在自己范围内的自由”。

于是，在倫敦的“劳动解放同盟”、“苏格兰土地与劳动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的許多支部的支持下，这个新的团体，作为一个宣傳社会主义的組織，开始了自己的短促然而光輝的事业。它的心臟和灵魂是威廉·摩里斯。联盟本身和它的机关报《公益报》（这个报是由摩里斯資助出版的）都反映了摩里斯的才能和他对資本主义的罪恶的不可遏止的憤恨。他們是力图在英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最偉大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同一群工人和知識分子組成的团体——他們的人数在最多的时候也沒有超过几百人。

工党右翼分子曾經到处散播謊言，說摩里斯和他的朋友之所以同海德門分道揚鑣，是因为海德門处在馬克思的“骯髒的唯物主义”影响之下，而鼓舞着摩里斯的却是一种朦朧的、不切实际的对人类“善良”的爱——他們把这种爱当作英国的社会主义傳統，以別于馬克思的唯物主义。这种謊言是沒有任何根据的。这些退出“社会民主同盟”的人所发表的宣言，沒有絲毫暗示他們和海德門的分歧是在馬克思主义这个問題上。相反地，他們批評的正是海德門的“机会主义”，认为这种机会主义最后必将导致和某一統治階級的政党結成同盟。

摩里斯本人是一个艺术家、詩人和工艺家。我們都知道他所以参加到“社会民主同盟”里来，是因为这个同盟的階級斗争理論使他理解了很多問題并給他指出了結束資本主义統治的丑恶而令人窒息的压迫的道路。1894年，（当他和“社会民主同盟”消除隔閡以后）他写到自己轉向社会主义的經過。他說：

“过去的希望已成过去，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結果只落得

这一片骯髒的、盲目的、丑恶的混乱景象。在最近的将来，目前存在的一切罪恶似乎还要变本加厉，把这种污浊、骯髒的文明盘据这个世界以前那个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一点东西也一扫而光。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黯淡的前景；作为一个个人，而不仅仅作为一种类型，我感觉对于一个具有我这样性格的人，一个既不理睬形而上学和宗教也不理睬科学分析，但对大地和大地上的生命具有深挚的爱、对人类过去的历史有深厚感情的人来说，这种前景就尤其恶劣了。……因此那时我对生活有过一种颇为悲观的看法。幸而我多少开始了解到在这一切齷齪的文明中，一次伟大的变革——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这一发现改变了我对事物的整个看法。而我所需要作的，就是亲身参加实际斗争，做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是尽我所能地这样做了。”（《威廉·摩里斯百年纪念文集》，第 658 页。）

摩里斯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曾经有过困难——“我读《资本论》的历史叙述部分时感到心曠神怡”，他说，“但在我读到这部伟大著作中纯经济学部分时，简直觉得头昏脑胀。”但是他终于掌握了经济学，他对历史唯物主义也有深湛的了解，这可以从他的主要散文著作看出来。他对英国历史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梦见约翰·保尔》（1888 年）。《乌有乡的消息》（1890 年）是一篇充满想像力的叙述，它一部分是根据摩里斯自己对伦敦街头战争、对英国革命和革命后将要到来的幸福社会的体会写成的。摩里斯在 1893 年与贝尔福德·巴克斯合写的《社会主义：它的成长与成果》是这种著述中的典范。

“现在是战斗的年代”，摩里斯在 1884 年一次在题为“艺术和社会主义”的讲演中说。“当你听见四周传来的象征着不

滿、希望和恐惧的高亢或低沉的声音、象征着觉醒起来的勇气和觉醒起来的良知的声音时，难道你能怀疑这一点嗎？……說英国統治階級并不害怕言論自由，因此我們就不要自由地談論；这种說法我感觉是奇怪而荒謬的。恰恰相反，我們应当从勇敢的前人为我們打开的缺口中冲进去。如果我們躊躇不前，就会使他們的劳动、他們所受的苦难和他們的牺牲都付之于流水……”中等階級的人怎么能帮助工人呢？他自問自答地說：“办法就是背叛自己的階級，在一切发生階級斗争的場合下，把自己的命运和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的命运結合起来。……别的办法是沒有的”。（同前书，第643頁。）

最后，我們也可以用摩里斯和“社会民主同盟”决裂后在1885年发表的进行曲《工人之歌》中的两节歌詞來說明他对社会主义的感情：

啊，財主們，你們听吧、战慄吧！
因为这声音充滿了音信，
为了你們和死亡我們曾經汗流滿面；而現在斗争已經改变。
我們是人，我們要为人的世界和生命而斗争；
我們的軍隊正迈步前进……

于是我們，我們工人迈步前进。而你們将听到的傳聞
是日益临近的战斗和解放交織在一起的声音；
因为我們的旗帜是一切人的希望，
世界在迈步前进。

当时无論是摩里斯还是“社会主义联盟”都并没有拒絕馬克思主义和階級斗争的理論。他們和其他“社会民主同盟”里的同志所

遇到的困难，是如何把理論运用到實踐中去。由于对海德門的陰謀和机会主义感到憎惡——不久就揭发出来“社会民主同盟”在1885年参加竞选时接受了保守党的錢的駭人听聞的丑事，这就更加证实了他們最坏的估計——他們馬上轉到另一个极端，(这也是海德門的主要論調，也是早期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认为目前唯有进行宣傳，等候革命的到来。

退出“社会民主同盟”执行委員會的10位人士发表的宣言說：在目前形势下，一个社会主义組織的

“作用只是教育人民和进行組織，以便在危机到来迫使我們采取行动时不致手足无措。我們认为：把利用特权統治集团相互竞争的必然性来改善工人状况的希望当作誘餌，是有害的自欺欺人的作法。”

由此可知，“社会主义联盟”继承了“社会民主同盟”的基本弱点——就是不能使理論結合实践，不能通过工人为实现“改善生活的希望”所进行的日常斗争来教育工人并领导他們走向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当时社会主义先驅者所組成的小团体力图在英国人民中間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哲学，一种可以說明社会罪恶根源和指出通向新世界的道路的完善的新观点。必須声討和摒棄資本主义。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們正确地认为必須和数十年来在劳工运动中占統治地位的理論（就是认为劳工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局部改革为工人阶级，至少是为那些比較富裕的有組織的工人团体，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取得較为舒适的地位。）毫不妥协地断絕关系。多少世代以来资产阶级改良派一直在工人阶级中間培植这种傾向，利用它动员群众来支持自己的目标——这种目标基本上是为发展資本主义創造更有利的条件。事实也是如此，前面已經談过，張伯倫派的激进分子就在这个时期，拟訂了这样一种綱領。因此，

在“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的社会主义者之間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当前的改革，即使是那些他們准备为之而斗争的改革，是一贴“止痛剂”——这个名字意味着这些改革不但不是一种政治斗争，而且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们掩飾了资本主义的真面貌，分散了工人对真正目标的注意。

这种态度使他們在初期以及长时期內都不能——用恩格斯形容“社会民主同盟”的話來說——，“抓住人民的真正需要”。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对工会采取超然态度的原因。在那期間只有个别的人由于他們生性喜欢做群众工作，才在工会方面多少做出些成績。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了解，对于精力充沛、勇往直前的社会主义者來說，在旧工会里工作絕不是件容易事，因为这些工会处在自由党和保守党“工人貴族”的統治之下，而且由于不断要支付失业津貼而陷于瘫痪，有时甚至因此垮台。同时，由于工人群众在政治观点上都带着濃厚的自由主义倾向，社会主义的先驅者自然應該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宣傳社会主义方面。但他們的缺点在于：其中許多人到此为止，沒有再前进一步。

这种态度的另一重要結果，就是除了直接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以外，对一切政治活动和政治策略都不相信。摩里斯在这方面尤其严重，特别是在議會問題上，他曾經有一个時間把議會看成仅是統治階級設下的陷阱。联盟对政治活动的不信任沾上了一种强烈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这种色彩曾經在一段时期內影响了摩里斯，終于使他脫离了“社会主义联盟”，使联盟陷于瓦解，在这个組織成立的初期，恩格斯曾經希望它会成为一个“具有理論修养的人士的核心”。摩里斯在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以后达到了政治上的成熟。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和“社会民主同盟”重新言归于好。这件事無論是对摩里斯还是对“社会民主同盟”都是意义重大的。

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第三个集团——費边社——也在1884年宣告成立。成立之初，它就是倫敦中等階級知識分子的一个研究团体。它和“社会民主同盟”以及“社会主义联盟”的区别在于它的成員中几乎完全没有工人。最初，它并没有自己的政策或綱領，它的成員的观点也各不相同，有相信馬克思主义的，也有拥护无政府主义的。費边社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对社会問題作了系統的研究。这种研究主要是由悉尼和皮阿特里絲·韦伯发起的。在1887年以前，費边社实际上是一个无足輕重的組織。但是从1887年起，其中的一伙人，主要是韦伯、蕭伯納和格拉姆·华納斯，在正統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和政治理論的基础上，开始发展一种有意識地反馬克思主义的、所謂逐步过渡的社会主义。最后終於变成了工党右翼領導的理論基础。費边派对日常的工会斗争实际上毫无兴趣，他們千方百計地，甚至不惜采取破坏行动来阻碍成立工人階級的組織。尽管“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的盟員犯过错誤，但他們总还在人民中間傳播了社会主义的真理（“社会主义联盟”的活动深入約克郡、苏格兰、英格兰东北地区和諾威治；同时“社会民主同盟”在倫敦、密德兰和兰开夏有坚强的陣地）。但是費边派却想尽一切方法“滲入”或“打进”自由党，从內部进行活动，使它信奉自己的改良社会主义——实际上它只是自由党改良主义的进一步发挥。因此，費边社領袖人物的行为使人怀疑他們害怕社会主义，亟于想使資本主义在改善工人状况方面取得足够的进展以遏制社会主义。

3. 破浪前进

这时，內部問題尚未解决的“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卷进到大蕭条时期人民群众的貧困所引起的汹涌的社会冲突

中来。大萧条的影响在伦敦显得特别尖锐，后来许多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在伦敦发生的。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把“社会民主同盟”从它曾一度陷入的坏名声中拯救出来。两个组织在这几年中都在宣传方面做了辉煌的工作。摩里斯孜孜不倦地工作，为《公益报》写文章（他不但编报，而且还在街上推销），在“劳动者俱乐部”讲课，进行露天演说。

统治阶级和有关当局也注意到了风雨欲来的轰鸣雷声，因此社会主义先驱者经常面临警察的干涉，结果不是罚款就是坐牢。1885年，社会主义者在莱姆豪斯区的杜德街取得了一次最大的胜利。“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的演说者曾经在这里屡次遭受逮捕，还有一次，警察在这里袭击并驱散了他们的集会。这些每星期都发生的事件激起了伦敦工人阶级的愤慨。于是激进派俱乐部在杜德街举行了一次联合集会来支持社会主义者。这一次由于参加集会的人太多，警察无法把演说者逮捕起来。摩里斯事后仍然受到逮捕，但很快就释放出来了。第二个星期天“警察让步了。一次有组织的游行从斯特普尼广场出发：‘激进派俱乐部’、‘社会民主同盟’和‘社会主义联盟’的队伍奏着乐打着鼓、高举着旗帜涌向莱姆豪斯区的杜德街。伦敦东区的街道从来没有这样出名。群众多得挤满了整条街，一直伸延到波尔德特路上去”。（H. W. 李和E. 阿契波尔德合著《英国的社会民主》，第101页。）他们在杜德街上赢得了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件事为全国各地进行的争取言论自由的大规模斗争立下了榜样。

在接踵而来的严寒的冬天里，失业工人中间的深沉的动荡情绪逐渐增长。1886年2月，“社会民主同盟”在特拉法加广场上组织了一次反示威大会，来反对保守党“公平交易”的拥护者支持保护关税的骚动。警察强迫“社会主义同盟”把群众带到海德公园

去。但是在途經蓓尔美尔大街^①时，衣着襤褸的游行者为富有的俱乐部游客的譏嘲所激，向俱乐部的窗戶投擲石头。在混乱中，流氓們混水摸魚，搶劫了商店。海德門、伯恩斯、錢皮恩和威廉斯等“社会民主同盟”領袖遭到逮捕。后来，在审判中，伯恩斯作了一次出色的辯护演說。結果他們都被宣告无罪。“悲慘的星期一”的騷动在上层階級中引起了惊慌。倫敦西区^②的有錢人在談論着断头台和街垒的事，同时倫敦市长負責筹募的失业基金激增至 75,000 英鎊。

但是失业者只是造成倫敦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日益緊張的局勢的因素之一。所有工人，尤其是非熟练工人，越来越动荡不安。他們正在为标志着 80 年代的結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作准备。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中間展开了一个广泛的民主运动，积极地为改革倫敦当地的狹隘、腐化和缺乏效率的政府而进行斗争。人們，特别是激进派工人和为数甚多的爱尔兰移民都为政府在爱尔兰采取的高压政策和在国内压制言論自由的行为所激怒。80 年代末，劳动者的激进派俱乐部和他們的成員的数目都大为增加。艾琳諾娜·馬克思、爱德华·埃夫林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在这些俱乐部里面进行着最有效的宣傳鼓动活动。1885 年，这些俱乐部联合組成了势力雄厚的“首都激进派联合会”。当局在惊悸之余采取了加强鎮压的政策来对付他們。这种鎮压是由首都警察局长查尔斯·华倫爵士执行的。特拉法加廣場上的集会被禁止了。

但是，他們所策划的鎮压不但沒有拦住浪潮，反而使人民的憤激从分散的小河汇聚成汹涌的洪流。随着爱尔兰民族主义議員威

① 蓓尔美尔大街是倫敦有錢人士的俱乐部集中区。——譯者

② 倫敦东区是工人等貧苦人民居住的地区，西区是富豪和商业集中区。——譯者

廉·奥布林的被捕，“首都激进派联合会”发出号召，要求人们不顾禁令在1887年11月13日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联合示威。伦敦的民主主义者大力响应这个号召：有8万到10万人从伦敦各区带着乐队和旗帜向特拉法加广场前进。只是由于政府当局戒备森严，他们才没有能够占据这个广场。当时在广场里和周围布置了4,000名警察岗哨，把走近的游行队伍驱散。摩里斯在克勒肯威尔草场的队伍集合处宣布了自己要尽可能突破警戒线的决心。他的队伍被极为猛烈的进攻驱散了，但是他终于到达了广场。另外一个包括约翰·伯恩斯、杰·肯宁汉-格拉姆议员和安妮·贝赞特夫人在内的队伍也几乎冲破了警戒线。伯恩斯和肯宁汉-格拉姆都被抓去了。后来，一个携带着子弹、枪上装好刺刀的近卫步兵团的队伍和两小队近卫军骑兵先后开到广场。人们对他们高呼着这样的口号：“我们要求言论自由”，“我们是真正的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我们要求伦敦公民应有的合法权利”，“英国人不应该受无用的刺刀的统治”。这场斗争一直进行到深夜，许多人受伤，其中有3个后来死掉了。有一个名叫阿弗雷得·林訥耳的人在第二个星期中被警察打伤致死。政府当局想把这件事隐瞒起来。这时，人们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殓仪，大家跟在尸体后面从索哈区一直送到弯弓公墓。摩里斯是在墓前演说向死者致敬者之一。他为了纪念这一事件而写下了感人肺腑的《死之歌》。这首歌不但是悼歌，也是战斗的号召。

“血腥的星期天”绝不是进步力量的失败。在“法律与自由同盟”领导下，一次伟大的联合斗争展开了。这个同盟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和激进派组织在一起合作的第一个团体。1888年伦敦市议会成立时，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联盟赢得了这个议会里的多数席位。这次胜利的取得主要是

由于包括特拉法加广场事件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活动的结果。1892年，政府正式承认了在特拉法加广场集会的权利。

1886年和1887年是有关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战术和战略思想发展的关键阶段。英国，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着大萧条中情况最恶劣的时期，工人们正在进行反击。失业工人不仅在伦敦，而且在外省的伯明翰、曼彻斯特和莱斯特等各大中心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比利时和荷兰也发生了罢工和街头斗争。在美国某些地方爆发了暴风雨般的骚动。爱尔兰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潮，并且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英国群众中引起了强有力的响应。1885年的选举增加了工人阶级和爱尔兰人的代表权。（这次选举不但明确地表现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也为未来提供了教训。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是怀疑论者还是冒险主义者，都从这里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一股在自由党和保守党轮番当政的小天地中愈来愈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次选举也提醒大家：如果他们在竞选中有一个适当的纲领和组织，而不是依赖于大自由党分散地提出候选人的话，赢得的席位将远不止11个。其次，下议院中那些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爱尔兰议员所拥有的强有力的地位，说明一个不依赖两个统治阶级政治集团的坚强的少数党可以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如前所述，毕生参加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恩格斯是明确提出独立前进路线的第一个人。1881年他在《劳工旗帜》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工会几乎完全没有利用1867年改革法令通过后扩大了选举权作为斗争武器。工会应当真正走在前面。工人阶级总有一天会要求在议会中取得充分的代表权，那时候他们就会了解争取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斗争“以及工会在目前的形式下所从事的全部活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虽然是一种很必要而且很有效的手段，但毕竟不过是为达到一种更高的目的而采

取的各种手段中的一种；这更高的目的便是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恩格斯指出这样的一天很快就要到来。各个阶级的有识之士都开始认识到开辟新路线的必要性。“但是在工农业工人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英国，民主只能意味着工人阶级统治权。”按照当时的户主选举权制度，工人阶级可以选出四、五十名代表自己的议员。这些代表本身不一定都是劳动者，“但是没有任何民主政党……能有成功的希望，除非它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的性质。抛弃这一点，那就只是一种宗派和冒牌的政治活动”。

80年代后期工人活动的不断高涨和选举权的扩大日益明确地、有力地证明了这些看法的正确。选举权的扩大使工人们得到的权力等于普选给予德国工人的权力。而普遍选举权，正如恩格斯在一封关于英国和德国状况的信中所说，“是目前无产阶级运动最好的杠杆”。（1885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见1941年版《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42页。）1886年，美国工人的政治运动也得到很大的进展。密切注视着这些发展的恩格斯，坚持认为必须帮助工人阶级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认识到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党的必要性，而且这个政党必须以建立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

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他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话说，是“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02页。），并且在各个发展阶段和整个运动中携手前进，同时，“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同前书，第504页。）

他在一封寄给住在美国的一位朋友的信里强调说：最重要的是

“让运动有时间巩固起来，不要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现在还不能正确了解而将来很快就可以了解的事物，以免加剧运动

刚开始时不可避免的混乱。11月间如果有一、二百万劳动者投票赞成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党，现在看来，要比10万个人投票赞成一个纯理论的完美无缺的政纲有大得无限的价值。”（1886年12月28日和1887年1月27日给弗罗伦斯·凯利·韦斯奇韦斯基的信，见《恩格斯书信选集》，第543—545页。）

美国的发展在英国激起了巨大的兴趣。当爱德华·埃夫林和艾琳诺娜·马克思于1886年年底从美国演说旅行归来时，最近在数量和实力方面都有迅速发展的伦敦各个激进俱乐部都邀请他们去演说。他们在伦敦东区进行的强有力的鼓动工作就是这样开始的。在鼓动工作中，他们设法把爱尔兰、言论自由和建立独立的工党等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在1887年复活节期间，他们在海德公园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反对在爱尔兰实行高压政策。当时会上提出的纲领至少有15种之多。事情是真正搞起来了。恩格斯指出：“现在，组织一个拥有独立的、代表本阶级的纲领的英国无产者的政党已经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如果成功，它将使‘社会民主同盟’和‘社会主义联盟’都退居次要地位，并使目前的争论得到最令人满意的结局。”（1887年6月4日给索尔格的信，转引自赫特著《最后的危机》，第109页。）

工人阶级进行独立政治活动的思想得到了日益强大和坚决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来自伦敦，而且来自英国各大中心城市和全国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对于将来的发展来说，这一点或许更有意义。工会活动家开始从他们自己特殊的立场出发，对公共事务表现出更广泛、更深入的兴趣，于是各种小册子和《棉织工厂时报》等报纸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各地都开始成立地方性的委员会和联合会来争取劳工的独立代表权，虽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组

織——即“布拉德福德劳工联合会”——是两、三年以后才成立的。

1886年，“全国职工大会”为了适应这种新的情况和在前一年取得的选举上的胜利，成立了“劳工选举委员会”。当时有各种迹象表明，这个委员会和它的前身“劳工选举联盟”一样将唯自由党馬首是瞻。1887年它更名为“劳工选举协会”，把自己称为“全国工党中心”。它在宣言中提到爱尔兰党时说：近来各种事件“表明一个团结一致的、积极活动的政党可以在下议院中做多少工作。这个政党成功地使一个民族获得解放。如果英国劳动者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必须采用类似的方法。……劳动人民必须自行组成‘劳工选举协会’作为组织人民的中心”。（1954年出版的H. 培林著《工党的起源——1880年至1900年》。）

这时，在“保守党黄金”事件时担任“社会民主同盟”书记、并且是海德门的得力助手的H. H. 錢皮恩已經和这个同盟脱离关系。他决定以自己巨大的才能和資力来支持这个以工会为基础建立政党的新运动。这个在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行动是各个社会主义组织人员和机构的广泛改变及政策的变革的一部分。当这些社会主义组织各自用自己的方法解决政治行动问题时，就在进行着这种变革。

在1886年至1887年期间，“社会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政党来说基本上仍然以宣传作为它主要的工作。当然，失业工人问题是一个例外。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同盟”曾经在伦敦和各省组织游行，派代表向議員和“济贫委员”請願，并且在《正义报》上为之大肆宣传。《正义报》在“劳工札記”标题下每周开辟专栏报导工会活动消息。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政党在支持它的工人盟員进行多种多样活动方面所做的工作还是少得可怜的。这种弱点产生的原因可能要直接追溯到海德門的影响和他对工人阶级

面对的日常工作所采取的超然态度。隐藏在这种弱点后面的思想是：革命会通过资本主义的崩溃而自行到来；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的任务是促使人们改变思想，而不是领导他们展开行动。汤姆·曼恩后来回忆说：1886年当他在巴特西亚地方支部提出八小时工作制问题时，约翰·伯恩斯坦立刻对他的建议表示不赞成。“他说：尽管社会民主同盟的局部止痛性质的建议中包括八小时工作制，但争取这种枝节性改革的时期早已过去。他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是穷途末路；我们的责任是准备夺取全部生产资料，同时把所有的资本家都消灭干净。”在另一位发言人发表了一篇甚至更“革命”的演说以后，伯恩斯坦的观点就在雷动的欢声中以压倒多数票获得通过。^①

当“社会民主同盟”无法取得进展并失去曼恩等工人阶级杰出领袖的支持的同时，“社会主义联盟”也因为政策问题上发生内部冲突而陷入四分五裂状态。这些冲突主要是集中在争取当前的改革还是进行革命，进行议会斗争还是不进行议会斗争等老问题上。在1886年，摩里斯仍然以鄙视的眼光看待议会活动和那些“一有机会就和某些直接的敌人结成同盟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以为可以用诱说或恫吓的方法使这些敌人来做社会主义者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的工作”。（摩里斯著《1886年的政治展望》。）

这时，摩里斯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正在摸索前进，逐渐接近并且最后终于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年，他表示：如果其他的人争取采取八小时工作制法案等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社会主义者不能加以反对，虽然他们可以指出这种法案对人民好

^① 但是三年以后，伯恩斯坦本人在为争取实现工人实际而迫切的生活要求而举行的伦敦码头大罢工中起了领导作用。这个例子说明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如何不断冲垮海德门等徒劳无益地力图建立的障碍。

处很少；如果人们可以联合起来使这种法案得到通过，“他们也就可以联合起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把雇主们一脚踢开，为自己生产商品……社会主义者绝对不能公然和反动派一起反对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措施。如果他们反对，群众会认为他们不是白痴就是无赖，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见188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联盟”克勒肯维尔支部机关报《劳工之页》，转引自霍勃斯邦著《工人的转折点》，第53—54页。）

“社会主义联盟”的某些成员正热烈地转向恩格斯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建立独立的政党的思想，其中有工会活动家 J. L. 马洪和托马斯·宾宁。这两个人和 A. K. 唐纳德在1886年“社会主义联盟”成立“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中起了领导作用。翌年，在诺森伯兰矿工罢工期间，他们和“社会民主同盟”的成员共同在诺森伯兰建立了“北英格兰社会主义同盟”。这个同盟在最强大的时候曾经拥有24个支部。但这个新同盟并没有得到巩固的发展，罢工解决以后不久就消失了。但是它说明“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中最优秀的成员方面有一种健康的愿望，他们希望摆脱伦敦发生的争执和海德门式革命理论所造成的沉郁气氛，在工人的日常斗争中同工人形成真正的联系。“北英格兰社会主义同盟”曾公开宣布它的目标是：争取建立全国性和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工党，通过努力把社会主义者选举到议会和其他公共团体中去的办法来取得政权，并且支持工会运动、合作运动以及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劳工结盟。

这个纲领的拟订使“社会主义联盟”陷入一次巨大的内部冲突。摩里斯本人虽然支持给予工会运动和合作运动以帮助的思想，但却强烈地反对把社会主义者选入议会的做法，认为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在1887年“社会主义联盟”举行的年会上，支持进行

議會斗争的人为无政府主义者所击败。1888年，他們遭到另一次失败并受到大会正式的反对，从此以后，这个集团就从“社会主义联盟”中消失了。有艾琳諾娜·馬克思和爱德华·埃夫林参加的布魯姆斯柏雷支部被“社会主义联盟”开除了，这个团体以“布魯姆斯柏雷社会主义协会”的形式繼續进行活动。同时，馬洪派和过去的“劳动解放同盟”殘存的盟員也退出了“社会主义联盟”，另行成立了“劳工联合会”。这个“劳工联合会”始終只是霍克斯頓地方上的一个工人俱乐部，沒有得到任何更大的发展。

同时，在1886年和1887年期間，費边社的立場也明确起来。它采取了通过議會斗争爭取眼前改革的政策。但是在建立新政党問題上仍然存在着分歧的意見。以韦伯为首的多数派贊成把社会改良和公有制——国家和市的公有制——思想“渗透”到自由党人中去。这种政策的产生是由于費边社大部分成員出身于中等階級，和自由党人有着密切的个人联系，并且都居住在倫敦。譬如在倫敦，悉尼·韦伯在自由党人和激进主义者共同进行的爭取市政改革的巨大运动中占据着领导地位，这次运动的結果使这个联盟在1888年創立的倫敦市議會中获得了多数。但在不存在这种条件的外省，和自由党实行联盟和“渗透”的战术就沒有这样的吸引力。

这时，日益增加的征象表明，重点正在从社会主义組織轉移到更广泛的、有組織的劳工运动方面去。社会主义者促进了劳工运动活动的发展和觉悟的提高。許多社会主义者作为个人來說都轉而支持两种不同的然而互有关联的政策：扩大和加强工会运动，和在广泛进行迫切的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工人階級政党。

錢皮恩当时已經取得“劳工选举协会”倫敦地区的領導权，他在某些最优秀的青年社会主义工作者的支持下沿着这两条路綫向前推进。这些支持者中有曼恩（1886年錢皮恩曾經出版曼恩写的

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小册子)、伯恩斯和从“社会主义联盟”中脱离出来的霍克斯頓的“議會主义者”小组。在1883年,錢皮恩开始出版《劳工选举人》。出版这个刊物的目的是想在工人阶级中造成广泛的、进步的影响;它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进行斗争,并且刊载了曼恩揭露卜內的諾威治化工厂的情况的文章。在倫敦以外的地区,劳工运动也开始露出了活跃的端倪。

諾森柏兰的矿工們在經濟蕭条、罢工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之下拒絕支付他們的自由党領袖伯特和范威克的議員薪俸。在苏格兰,詹姆斯·基尔·哈第——一个坚决的青年矿工,“埃爾郡矿工工会”和“苏格兰矿工联合会”的建立者——通过他自己的經驗和亨利·乔治以及“社会民主同盟”的出版物認識到仅限于工会运动是不够的,他必須和他所在地区的傳統的自由主义断絕关系。在1837年,他会見了倫敦的社会主义領袖,其中包括恩格斯,創辦了《矿工》月刊,并且把新的思想第一次带进“全国职工大会”——他攻击議會委员会書記亨利·布罗德赫斯特在一次补缺选举中支持一名“吮引工人血汗”的雇主充当自由党的候选人。第二年春天,他在密德拉納克一次补缺选举中担任了矿工的候选人。

哈第在“劳工选举协会”支持之下申請提名为自由党候选人;他在这个阶段采取的綱領和一些激进派議員的綱領区别甚微,在他的傳单上有一句口号是:“投哈第一票就等于投格萊斯頓一票”。但他坚持矿工提出候选人的权利。他在这个問題上的坚定立場使他和自由党发生了冲突。自由党人挑选了一位倫敦律師为他們的候选人。他們建議在下次选举中提名哈第充当另一选区的候选人,如果哈第被选入議會,每年还給他300英鎊的津貼。他們想用这种办法来收买哈第,使他不要參加竞选。但是他們的企图并没有成功。

当哈第拒絕这个建議以后,“劳工选举协会”的全国领导机构

就放棄了对他的支持，結果他只能得到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的支持。为他竞选的人中間主要有錢皮恩、馬洪、曼恩、默多克（小佃农的領袖）、肯宁汉-格拉姆和迈克尔·达維特的少数朋友。这次补缺选举的真实历史意义在于：尽管哈第在数千票中仅得到几百票，尽管他的綱領和自由主义激进派并无显著区别，但是他对工人阶级代表权的坚持空前第一次表明和自由党的机构在組織上脱离关系是可能的。

不久以后，苏格兰工党創立起来了。这个党的主席是肯宁汉-格拉姆，副主席是 G. B. 克拉克博士（代表凱士納斯的激进派議員）和約翰·福格逊（达維特的支持者），执行委员会主席是肖·馬克斯威尔（亨利·乔治在苏格兰的支持者），書記是基尔·哈第。“苏格兰土地与劳动联盟”（它的领导人是現已重新参加“社会民主同盟”的馬洪）和这个新的組織合而为一。因此，可以看出，苏格兰工党代表着各种进步的、社会主义的傾向。它并没有宣布社会主义的目标；它的綱領是爭取政治和社会改革，其中包括实行法定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好几个欧洲国家，这种改革正在成为团结富有战斗性的工会运动者和非宗派的社会主义者的焦点。无论这个新的政党有什么弱点，它的力量的源泉在于它对工人阶级政治上的独立性的强调，在于它是从工人阶级的活生生的經驗中成长起来的。当时最引人注目的迹象之一就是：自由党的工人阶级群众中最活跃分子开始和上层和中等阶级的成員脱离关系，尽管自由党领导机构对他们提出了无数次劝告，进行了各种宣傳想使他们改变主意。这个爭取政治独立的运动和继之而来的热火朝天的群众性的工会运动的新阶段具有密切关系，因此它对于正在进入它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狂風暴雨的一个时期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第六章

工人階級再次大步向前迈进

1. 新工会运动

工人階級社会主义思潮的复活和政治觉悟的日益提高，只不过是日后获得惊人丰收的80年代的播种工作的一部分。这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复活和工人政治觉悟的提高与这时开始萌芽的新精神和新观点是分不开的。这种新精神把工会运动从絕望的困境里挽救出来，并赋予它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群众力量。

1871—1872年的經濟繁荣时期，工会組織有了显著的发展，許多新工会誕生了，旧工会也扩大了，看来工会組織似乎已在社会上贏得了合法的地位。可是正当“混合”派工会的領袖們感觉到他們的好运“到来”的时候，一連串的經濟危机开始了，雇主們在工資和工作時間問題上向工人发动了凶猛的进攻。大多数的工会都是由熟练技术工人和就业比較稳定的工人組成的，这些工会由于支付失业救济金和互助金，弄得資財耗竭，常常負債累累。这种情况对于新成立的工会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从1872至1885年中，成立不久随即垮台的工会至少有320个之多。另一方面，老的行业工会如石工、木工和翻砂工人工会，差不多成了一种病殘喪葬的福利会社。它們甚至对抗議削減工資或增加工作時間的这类罢工也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老一輩的工会領袖們已經受了資本家的經濟和政治观念的腐

蝕，大多缺乏積極的政策，不能像時代所迫切要求的那樣使他們的組織壯大起來，重新取得力量。全國也沒有一個真正的領導機構。“全國職工大會”把許多時間浪費在討論細微的社會改革問題上，同時各工會本位主義的私心極為嚴重。由於技術變革和爭搶工作，各工會之間常常發生下流的爭吵。

某些企業中的工人對雇主的進攻曾給予頑強的反击，但結果都是失敗的多。1878年，蘭開夏的紡織廠主們要求該地的25萬紡織工人削減工資10%，工人罷工達10個星期，最後還是接受了廠主的條件。從倫敦開始，後來成為他們在全國力量的一個考驗的石工的鬥爭，最終亦歸失敗。同年，克萊德賽德的機器工人為維持每日九小時工作制，罷工兩個月，結果還是讓步了。在英格蘭，“混合機器工人協會”在好幾個大工業中心進行了頑強的罷工鬥爭，反對雇主延長工作時間的企圖，他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才取得了勝利。該協會把1879年看做是他們“生命中最黑暗的年代”，在這一年中他們在罷工中支出的金額等於以前26年來開銷的總和。（J. B. 杰弗里斯著《機器工人》，第96—97頁。）

在煤礦區里（工人的數目和生產量35年來增加了一倍），礦工們現在進入一個沮喪的時期。他們雖然“似乎在好幾個郡中都有牢固的工會組織，另外還有兩個全國性的機構，一個在經濟鬥爭中領導互相支援（“混合礦工聯合會”），一個從事工業立法和政治鬥爭（“全國礦工工會”）。但不到幾年，一個已經壽終正寢了，另一個也是奄奄一息。”（R. P. 阿諾特著《礦工》第1卷，第56頁。）70年代中期，諾森伯蘭、杜蘭郡和約克郡各工人協會都採取了按煤價支付工資的辦法。這種計薪制度以及他們工資的削減都是在1873年和1875年雇主們舉行同盟閉廠之後強加在南威爾士工人身上的。1879年杜蘭郡工人在罷工失敗後，也被迫接受了一個更不利的煤

价计算制度。到了1880年，采矿企业中的工会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混合矿工联合会”在前一年就消失了，“约克郡工人协会”也几乎不存在了，兰开夏被分裂成20多个地方工会。现在支持“全国矿工工会”的仅仅有诺森伯兰、杜兰郡和约克郡。矿工的境遇非常悲惨，拿诺森伯兰的矿工来说，他们的工资只抵得上他们7年前工资的一半。进入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并未见好转。但在这些年中，工人们慢慢滋生了采取新战术和成立全国机构的欲望，虽然保守思想和怕较弱地区拖累较强地区的思想使他们踌躇不决。可是这种欲望是以后重要发展的萌芽。

这个巨大的运动高潮转变了全国工会的面貌，它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来源就是低工资和普通的非熟练工人——主要是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他们以前是被视为无法组织的，但现在他们组成了一个强大和比较稳定的团体。无法组织的看法显然是过时了。第二是来自如矿业这种有长期工会组织的企业（这些部门的不景气已使工人们清楚看到旧政策的软弱无力），和那些由于技术改进和人数的增加使得同业工会的老观念显然已不适用的企业。

在与新政策发展有关系的有组织的工会运动者中，由年轻的技术工人像机器工人汤姆·曼恩、约翰·伯恩斯和弗雷德·哈米耳所组成的集团占着重要的地位。他们的集团虽小，可是影响很大。他们批判了旧政策，恰如我们所知，他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能及时地向工人提出正确的方案，才不根据雇主们的“正统经济学”看问题。不同于束缚和破坏了旧同业工会组织的那种狭隘的自私自利，他们是以阶级团结为基础的。他们积极地从事发动一个工会运动，这个运动不特包括几十万技术工人，并且还要包括迄今尚未组织起来的数百万半熟练和不熟

練工人。

為了發動這數百萬工人，他們提出了兩個在工人們看來是天經地義的口號，雖然，老板們大嚷大叫說他們這種作法將引致經濟崩潰。他們要求政府通過一條法律規定八小時工作制，同時不論僱主們獲得到利潤多少，必須規定一個最低工資。他們的這種政策，不僅空前地在會員數日上增加了工會的力量，並提高了他們的認識和思想水平。兩項要求中最重要的一項是限制工作時間。這將使數百萬普通工人從一貫加班加點摧殘身體的勞累中解救出來。延長工作時間的現象當時仍然存在於許多用極低工資剝削工人的工廠、臨時工和一些僱主利用人力過剩和失業威脅有計劃加班加點的工廠中。

馬克思早在 20 年前就講到工廠工人們從他們於 1848 年贏得的“十小時工作制法令”中獲得的巨大的“在體力、道德和智力方面非常良好的後果”。（1864 年，《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 1 卷，1954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359 頁。）縮短工作時間，不僅直接改善了工人生活狀況，而且對今後提高他們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來說也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再說，與個別工會贏得的限制工作時間不同，要想在全國各行各業中對工作時間實行限制，必須要有“立法上的干涉”，而這只有通過政治鬥爭才能獲得。馬克思在談到“十小時工作制法令”時就說過：“而這種干涉沒有工人方面的經常壓力又是永遠也不會出現的。無論如何，限制工作日這層永遠也不能通過工人和資本家間的私人協商辦法達到。一種普遍政治行動的必要性本身證明出，在其純經濟的行動上，資本是比較強有力的一方。”（《工資、價格和利潤》。《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 1 卷，1954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423 頁。）

在这件事情中，日益增长的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之间有了重要的联系：我們已經看到，爭取工人階級政治独立的先鋒們，如基尔·哈第，就把八小时工作制列为他們的中心口号。

八小时工作运动除了这些主要特点外，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是它把大不列顛的这个真正的群众性运动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际工人运动。自从“国际工人协会”在60年代达到全盛时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美国工人在内战后不久就展开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到了80年代中期斗争更加热烈，1886年5月1日，全国举行了罢工来支援这个运动。欧洲也响应了，并恢复了国际工会的联系。“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議决案鼓舞了1889年的巴黎代表大会，使它重行組織了“工人国际”，并发出了在189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全世界以“八小时工作日”为中心口号举行示威的号召。

为了在階級基础上推动工会来从事这个广泛的激动人心的斗争，曼恩、伯恩斯和他們的同伴們不知疲倦地声嘶力竭地进行宣傳。曼恩在1886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写道：

“你們對你們工会組織的那種半心半意的斗争究竟要忍耐到几时？我不否认工会在过去作出过良好的成績。可是，請問它們現在干了什么？所有的工会都拥有大批失业人員，虽然各行业的工作非常忙。大工会唯一的政策，就是竭力維持工資不使它下降。往日工会运动者的‘进取’政策似乎完全被人遺忘了。的确，今日通常看見的工会运动者都是迂腐的知識分子，他們要不麻木不仁得叫人感到絕望，要不就是支持那正中資本家下怀的政策……我自己也在担任工会工作，我坦白的承认，除非它目前能振作精神采取积极的政策，否則我将不得不认为繼續把時間化在吵吵嚷嚷无聊的瑣事上是一种无謂的精力耗費。我相信有好几千人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因此在 80 年代的中期和后期，工人階級中——不論是有組織的或是沒有組織的——正在醞釀着一種新的戰鬥精神。第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突破”是由倫敦直到當時還沒有組織起來的不熟練工人在社會主義者的領導下進行的。1888 年遭受殘酷剝削的布萊恩特和梅火柴廠的女工所舉行的罷工震動了全國。先是貝贊特夫人在 7 月號的《鏈環》上揭露了她們駭人聽聞的工作條件，接着出人意料地這 700 名女工舉行了罷工。貝贊特夫人和另一個社會主義者赫伯特·伯羅斯，一位政府文官，立刻把她們組織起來，并向深憫於她們貧病交集的生活的公眾募集了 400 鎊。“倫敦各業理事會”為女工們進行交涉，得到了勝利解決。可是這次的勝利並沒有立即引起進一步的行動。

第二年春天，比較大的工會投入了行動。坎寧城“社會民主同盟”支部書記、煤氣工人魏爾·桑恩（他後來做了將近 40 年的西哈姆的國會議員）決定在每日勞累 12 到 18 小時的“煤氣焦炭公司”的加煤工人中組織一個工會，為他們爭取八小時工作日。他們舉行了一個大會，1889 年 3 月 31 日早晨，一個“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煤氣工人和普通勞動者全國工會”成立了——後來改名為“全國普通工人和市政工人工會”。在那一天之內參加的人數就達 800 人，所繳納的入會費的先令都要用大桶來裝。桑恩後來寫道：

“大會的消息好似燎原之火，迅速地傳播開來。在坎寧城、巴爾金、東哈姆和西哈姆的啤酒店、工廠和草間里，每個人都再談論它。每個星期天我們從巴爾金路 144 號我們的大本營出發，去鼓動其他煤氣廠的工人。每次總有 20 來車工人參加這種星期日遠征。這種作法很受群眾的歡迎。大家熱情高漲，不到兩個星期，我們會員人數增到 3,000 名以上。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工人像他們那樣積極。一連有好幾個月，倫敦沸

騰了。全國報紙都報導了我們的活動。我一直記着第一次大會上向群眾所作的保證。為了‘八小時工作制’而鬥爭——這是我的第一個目標，不久我們就獲得了勝利。”

一面是工人聲勢浩大的罷工威脅，另一方面是新興的電燈的競爭，煤氣公司未經鬥爭就投降了。“煤氣和焦炭公司”接受了工人八小時工作制的要求。隨後幾個月，許多外地的煤氣廠也這樣做了。這種鼓舞了倫敦工人的團結和信心的巨大浪濤傳到全國各地。在許多地方紛紛成立了煤氣工人工會或分會，各種各樣的不熟練的和沒有組織的工人都參加了進來。這些工會組織的發起人往往是馬克思主義者，新工會的地方工會組織者大多數都是“社會民主同盟”或“社會主義聯盟”的盟員。新工會現在已經成為英國的一種力量了。艾琳諾娜·馬克思是工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她曾經領導過銀鑛工廠女工的罷工。會章和章程都是由埃夫林起草的。

情況開始轉變了。在倫敦東部的“那個困苦的低窪地”重新露出了希望。在這個世界最大的海港，每天傾瀉來自世界各地的貨物。但是這裡的碼頭工人衣衫襤褸，為了爭搶工作他們常常打架，常常在賺到了幾個銅幣以後——每小時為4辨士或5辨士——就馬上丟下工作去買點食物充飢。火柴女工（許多女工原是他們自己的妻子和女兒）和煤氣廠加煤工人（加煤工人在忙季里便到碼頭上來和他們一起工作）的勝利給他們指出了道路。有兩年之久，本·提累特（他當過馬戲團里的小廝、鞋匠、水手，這時在做倉庫管理工人。他曾經組織了“茶桶和普通工人協會”。）在進行罷工的組織工作。同時社會主義者不斷地在碼頭上進行鼓動宣傳。於是，突然間碼頭工人的鬥爭爆發了。卷入鬥爭的“西南印度碼頭”的工人邀請提累特來領導他們。

他这时已經与社会主义者有了接触，于是他立刻請来了湯姆·曼恩。正如提累特后来写的：“湯姆·曼恩这个偉大的巨人拿出了他的全副魄力和勇气，投入到这个工作中来。”（提累特著《回忆和感想》）领导这次斗争的还有“社会民主同盟”的約翰·伯恩斯，碼頭搬运工人的领导者吉姆·图米，熟练工人哈里·奧貝尔则在提耳伯雷领导这次运动，艾琳諾娜·馬克思做秘书工作，錢皮恩負責宣傳聯絡工作，及时向工人群众报导社会輿論。社会人士以极大的同情注視着这个反抗貧困的斗争。

这个罢工不久就席卷了泰晤士河两岸，参加罢工的有3万名碼頭工人和3万多其他工种的工人。各工种之間的隔閡，尤其是有組織工人和无組織工人之間的隔閡消除了。碼頭搬运工人和駁船卸貨工人早已有了坚强的工会，他們也加入了这次罢工。50英里长的碼头上散布着16,000名罢工糾察員。成千的飢餓的工人領到了救济券。每天都有带着乐队，搦着旗帜的龐大的游行队伍。領袖們用热情的演說鼓舞在塔山举行集会的群众。全世界的人都对罢工工人怀着深厚的同情。在50,000鎊捐款中，其中有30,000鎊是当罢工运动最困难的时期，飢餓的工人精疲力竭将要不能支持的时候从澳大利亚电汇来的。

下列这一段描写罢工工人打着从各互助会和行业工会借来的旗帜，通过倫敦城的游行的文字，清楚地反映了泰晤士河边各行业工人團結一致的情况。

“参加游行的有魁梧的碼頭搬运工人、駁船卸貨工人、漆船工、水手、加煤夫、装配工、刮工、船机工人、造船工。永久會員打扮得很庄重，候补會員也穿得干干净净和永久會員一样。有的在他們褪色的青綠衣服上打着五顏六色的补釘，一望而知他們是临时散工。‘森林工人和鸞凤之子’會員披着华丽的

肩巾。一队曾获得杜格特奖的壮健的水手们穿着长长的大红上衣,粉红长袜,戴着丝绒帽子,胸前配着巨大的合金徽章,骄傲地在队伍中走着。运煤工人在车上用末端系有囊袋的竿子钩取铜元。结实的水手坐在装有车轮的小船里。轮船底货搬运工人正在吃力地旋转着一个空篮。‘海王’坐在车内,穿着灿烂华丽的长袍,披着鬃曲的垂发……”(H.卢埃林·史密斯和V.纳希著《码头工人罢工史话》,1889年。)

经过了一切希望、热情、斗争和勇于牺牲精神(这些是这次对不可容忍的贫穷所进行的斗争的力量的泉源)都遭到蹂躏的黑暗时期以后,工人们又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可以用“码头工人赢来的银光闪闪的6辨士圆角子”来象征。

宪章运动的老领袖乔治·朱利安·哈尼写道:“这次伦敦东头伟大的反抗斗争是过去所有罢工、停工、闭厂都不能望其项背的。……自从宪章运动达到最高峰的全盛时期以来,我还没有看到过任何运动,它的重要性和利害影响能与1889年的伟大斗争相比拟的。”而英国整个的工人阶级都有此同感。

可是泰晤士河畔的胜利不仅仅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这个众所瞩目的斗争证实了新工会运动者提出的两大真理:第一,即不论“老顽固们”怎么说,不熟练工人可以组织起来,并且可以将巨大的罢工运动坚持到底。第二,旧政策只能将人们引向灾难,而新政策不但赢得眼前的利益,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人的士气,在人数上增加了工会的力量。

东伦敦的榜样,带动了全国各地的新力量。一年之内,英国工会会员的数目就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889年的86万人增加到1890年的近乎200万人。

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报道1889年以后几年中的激昂的

斗争。几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动起来了。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以前从来没有好好的组织起来的工人——例如女工，职员，店员，运输和水边企业中的工人；新的食品、服装、家具业的工人；以及曾经一度有过组织、但在经济萧条中瓦解的工人如某些建筑工和矿工；此外还有新兴工业如炼钢和电器工人——都纷纷组织了新工会或加入旧工会。今日许多知名的工会和各业理事会都是在 1888 年到 1892 年这段时间中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各业理事会，它们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这个飞跃发展的时期它们团结当地积极的工会运动者进行了经济以及政治斗争。

虽然新工会主义最初的胜利是不熟练工人取得的，但现在已发展到整个工人运动中去了。我们已经看到矿工工会在 80 年代初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以后几年里各地方组织又连续遭受挫折。但矿工从这个长期的痛苦中获得了教训。“从他们个别斗争和行动不一致的痛苦经验中，年轻一代的矿工渐渐认识到成立一个全国统一领导机构的必要，以统一指挥各矿区的斗争。”（R. P. 阿诺特著《矿工》，第 80 页。）这种新思想——在这方面，约克郡的本·皮卡德起了重要作用——在这 10 年中不断增强。1887 年，在一次矿工会议上，尽管诺森伯兰和杜兰郡的人表示反对，大会仍然宣布了要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进行斗争。随着开始于 1888 年的声势浩大的和成功的工资运动，“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在 1889 年 11 月诞生了。这个组织的形成，不仅对于矿工，而且对于整个工人阶级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的工作包括进行经济和立法斗争，其目的是要为所有矿区在地下劳动的工人争得八小时工作日。这种休戚相关团结一致的新精神反映在会章第 20 条中，该条规定当任何地区在工资问题上受到资方的进攻，或当大会作出某项决议时，全体会员在经特别会议批准后应向资方提出抗议。第二年春，在工资

問題上取得了新的胜利，以后該联合会便把全部精力轉到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上去。

机器工人在70年代曾为保卫九小时工作制展开过坚决的斗争，所以这次他們再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进行斗争是很自然的事。80年代中，他們在工会内部討論了好几年新工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問題，特别是通过立法斗争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問題。曼恩和伯恩斯在年輕工人中进行活动，1890年机器工人的組織终于宣布进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下一年，曼恩在这个老行业工会中几乎获得了秘书职务。1892年，在同样的压力下，該协会重行改組，放寬了工人入会的限制，从而扩大了該会的基础。

同时，新出現的不熟练工人的組織遍布全国，气势銳不可当。“煤气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的发展席卷了整个英格兰，并伸入了爱尔兰。曼恩和伯恩斯所领导的“船塢、碼頭、水运和普通工人工会”更如燎原之火，从倫敦蔓延到东海岸各港口，进入了东苏格兰，沿着南部海岸，一直发展到布里斯特耳和威尔士。另外一个由达維特的弟子社会主义者和爱尔兰的进步領袖领导的一个新碼頭工人工会，在麦尔西賽德、克萊德賽德和北爱尔兰发展起来。其他一些从不为人注意的小工会，如西雷丁的羊毛工人的工会，現在也在富于斗争性的領袖的领导下，空前扩大了。1887年成立的“水手和救火員工会”，在两年之中會員增加了65,000人。在长期組織松散、备受剝削的铁路工人中，在脆弱的“混合铁路雇工协会”之旁也出現了一个“普通铁路工人工会”。

恩格斯总结了這個新运动的重要性——关于它的影响的例子是不胜枚舉的——他写道：

“新工会是在雇佣劳动制度可以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經大大动搖的时候成立的。它們的創立人和倡导人都是自觉的

社会主义者或情感上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会并且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粗野的，愚昧的，被工人贵族藐视的人。他们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头脑还是一片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可敬的’资产阶级偏见，这些偏见把地位比较优越的‘旧工会主义者’的头脑弄得糊里糊涂。我们已看到这些新工会如何争取领导着整个工人运动，并且益拖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走……人们现在参加运动的态度和过去也完全不同了，他们吸取更广大的群众加入斗争，对社会的震动也比以前深刻，提出的要求也比较激进：如八小时工作制，建立一个包括一切组织在内的联盟和团结一致……人们把目前的斗争看作是暂时的，虽然他们自己还不十分清楚他们最终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是这个模糊的思想已经深入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只挑选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者做自己的领袖。”（1889年12月7日恩格斯给索尔格的信，转引自赫特著《这个最后的危机》，第119页。）

1890年伦敦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示威游行是这些划时代日子的澎湃汹涌的浪潮的象征。在整个的80年代内，不列颠工人运动又重新与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在个别企业内以及在全国规模上建立了联系。1888年，在一次有英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会运动者代表参加的大会上成立了第二国际。大会发动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伟大运动。与恩格斯有关系的社会主义集团现在把这个要求作为在不列颠进行下一步工作的运动基础，那就是组织以工人阶级群众为基础的社会党。

一个由“布鲁姆斯伯雷社会主义协会”，一些激进派俱乐部和新近丧失了他们赢得的八小时工作日的“煤气工人工会”的代表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他们计划在189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

节”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八小时工作制的示威游行”，作为国际运动的一部分。“伦敦各业理事会”的“旧派”工会领袖企图操纵这个运动，但这些初期的争吵被5月4日从伦敦市涌入海德公园的数十万人的示威游行淹没了。

当时有一篇文章报导说，“好像全伦敦的人都向海德公园涌去”。这次示威游行表示了各阶层的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携手合作。参加游行的有穿粗布工作服的码头工人、戴羊皮手套和大礼帽的绅士式的排字工人、戴着羽毛帽和穿着华丽衣服伦敦东头的女工。（1890年5月5日《明星报》。）恩格斯在维也纳的《工人新闻》报上发表的文章，认为这是全欧洲五一节日“最伟大最重要的节目”，“过去宪章运动者的孙儿们都进入了战线”。

这个强大的群众运动很快影响了“全国职工大会”。以基尔·哈第为其主要发言人的新力量和旧派领袖在八小时工作制的問題上发生了冲突。像往日一样，以石工工会领袖亨利·布罗德赫斯特为首的“旧派集团”对新工会运动的发言人大肆辱骂，同时，用尽各种手段来拖延破坏，力图扑灭这个伟大的群众要求，可是历史是反对他們的。

职工大会中出现了新人物，他们代表着在社会主义者和富于战斗性的工人领导下组织起来并取得胜利的数十万工人。机器工人、粗木工和细木工、矿工，甚至布罗德赫斯特自己工会里的石工都投票支持“合法的八小时工作制”。新诞生的“矿工联合会”一马当先，向旧派领袖开火，并在1890年将他们逐出了职工大会。在通过的60个决议中有45项在两年前只有社会主义者曾经提出过。一个是关于“合法的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这是新力量的中心要求。新力量在随后的几年中保持并扩大了他们的优势。1894年，“职工大会”在基尔·哈第的提议下，通过了工业国有化的决议。

但是，回顾一下这几年来整个偉大运动的高潮，应当注意的是工会里的那些富于斗争性的进步的会员們所作出的贡献并不是出于各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策划。“社会民主同盟”領袖們对于工会仍然保持宗派主义的态度。“社会主义联盟”已經垮台了，它过去的遺風被夺取了它的领导权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扫无余。这时已經取得一定地位的費边社正在一心一意“渗入”自由党，而不想建立任何組織。

幸运的是，像我們已經看到的，“社会民主同盟”里有許多个别的盟員对馬克思主义的实践比海德門有較清晰的了解。由于他們的关系，几乎各地的新工会运动都是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只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有明确政策的政党或团体的成員进行工作。这是一个严重的弱点。其中有几个人，像湯姆·曼恩能够克服这个弱点，因为他們已經深刻地体会到阶级斗争的教訓。其他的人，如約翰·伯恩斯，却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久他們都陷入个人主义，机会主义，而且无原則地和“全国职工大会”的“旧集团”，下院以及倫敦市議會中的中等阶级政客結成联盟。1906年有一个时期伯恩斯几乎参加了自由党的內閣。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示威游行之后，与恩格斯有关系的集团想通过扩大“八小时工作委員會”（当时已改名为“法定八小时工作和解放工人同盟”），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政党的努力終于成为泡影。

2. 政治上的覺醒

工会战线上的胜利，大大地加强并鼓舞了工人阶级政治独立运动。罢工的艰苦經驗使支持自由党的工人們認識到自由党的雇主与任何其他的雇主同样的狠毒。布莱恩特和梅斯是自由党的柱

石。同样，与新成立的“水手和救火員工人工会”斗争的船主們，以及在1891年击败工人罢工的布拉德福德曼宁翰磨場的老板們也无不自由党的柱石。

倫敦已不再是斗争的中心了：斗争中心現在已經移至北部工业地区。社会主义和政治独立已不再是几个总部設在首都的小团体所关心的事，而变成整个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了。由于这个关系，积极参加实地群众斗争的“社会民主同盟”、“費边社”和“社会主义联盟”在外省的成員才得以从海德門宗派主义和“費边社”渗入自由党政策的羈絆中解放出来。事实上，有許多工人是为了要研究社会主义才加入“費边社”地方支部的，因此有些地方支部的社員具有与中等阶级的倫敦領袖显著地相反的背景和願望。

由于这些斗争，由于这种社会主义思想与群众运动的結合，政治斗争频繁起来了，团体組織和出版物也如雨后春笋。在这許多发展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布拉德福德劳工联合会”的成立。它是北部力量最大的地方組織，是一个明确地結合了政治斗争和經濟斗争的組織。1890年，里子煤气工人的罢工，是新工会运动几次最大的斗争之一。在这次斗争中，布拉德福德和里子两地的“社会主义联盟”支援了“煤气工人工会”的魏尔·桑恩和彼特·柯倫。紧接着就是曼宁翰磨場的酷烈战斗，事后领导这次罢工的領袖W.H.德魯又在“社会主义联盟”的盟員和前盟員——其中包括未来的內閣大臣弗雷德·乔伊特——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独立組織“劳工工会”。这个組織的胜利組成是工人們的觉醒及他們对公共事务日益发生兴趣所致。与这次胜利分不开的是1889年創刊的《約克郡工厂时报》，它的主編是兰开夏的一个叫約瑟夫·伯吉斯的接綫工人。該工会在布拉德福德的3个选区中提出了2名候选人——提累特和罗伯特·布拉奇福德。布拉奇福德是曼彻斯特一个頗有才

气的新聞記者，他不久即為面向廣大群眾的《工人時報》寫稿（伯吉斯這時轉到了這個報館里工作），隨後他又創辦了獨立工人運動早期最著名的《喇叭報》。繼此之後，布拉奇福德又以該地的“費邊社”、“社會民主同盟”、“各業理事會”和“工人基督教會”為基礎組成了“曼徹斯特獨立工黨”。

現在，工人的獨立政治運動正在日益壯大，並且很有希望作為一個真正有力的政黨走上政治舞台。現在獨立的工人階級的候選人不再唯命是從地跟在自由黨後面跑了，他們是社會主義者了，他們或者和自由黨人分庭抗禮，將他們擊敗，或者像恩格斯所說的，以“刀尖”迫使自由黨人提名他們做候選人。這樣，在1892年的大選中，伯恩斯在他的“勞工聯合會”的支持下在巴特西亞當選下院議員，基爾·哈第在西哈姆南部，水手工會的領袖哈符洛克·威爾遜在密德爾斯布羅也都當選了。此外，提累特在布拉德福德競選中得了將近3,000票，而自由黨提名的候選人也只得了3,300票。

的確，如果1892年有一個全國性的工黨組織，很可能還可以贏得更多的議席。不幸的是社會主義運動的弱點在這裡比在工會運動中造成了更大的危害。“社會民主同盟”全國領導機構的宗派主義使它無能為力，同時一心一意緊盯着自由黨的“費邊社”則積極地阻止工人階級進行獨立的政治活動，怕它會搞垮他們心愛的計劃。哈第未能全面領導這次的運動。他曾努力使伯恩斯更積極地注意集體利益，可是這時候這位倫敦人已經另有打算了。由於這些原因，工人階級沒有能在選舉中形成一個統一的陣綫，而是各自為政，單獨作戰。結果，雖然產生了3個獨立工人階級的國會議員即威爾遜、伯恩斯和哈第，但只有哈第是新思想的唯一擁護者。

雖然如此，一個全國性的獨立工黨組織正在醞釀中。伯吉斯通過《工人時報》為它進行鼓動宣傳，有許多地方，包括倫敦在內，都

建立了独立的工人組織。最后,1893年初,独立工党终于誕生了,意味深长的是成立大会不在倫敦而是在布拉德福德举行的。布拉德福德这时已經成了一个生气蓬勃的和多方面地方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各种各样社会主义和独立劳工思想的代表,包括“費边社”的領袖蕭伯納、“社会民主同盟”的詹姆斯·麦克唐納和代表“法定八小时工作制联盟”并代表新党党章起草委员会做报告的埃夫林。可是大多数的成員来自英格兰的北部和苏格兰, $\frac{1}{3}$ 来自約克郡的工人組織。此外还有一些北部地区的“費边社”和“社会民主同盟”兰开夏支部的代表(虽然“民主同盟”本身拒絕参加新組織)。綱領中的第一条就是八小时工作制,其次是各种經濟和社会改革,最后是“分配、交换和生产手段的集体所有制”。

基尔·哈第担任了这个會議的主席,他是独立工党的主要創辦人和領袖,嗣后他又是工党的創辦人和領袖。他的父亲是一个不得志的埃尔郡的木工,他在10岁时就开始在矿坑里工作,并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很年輕的时候就做了兰开夏和埃尔郡的矿工領袖。在政治上,像当时許多其他工人階級領袖一样,他开始时是一个禁酒主义者和自由党激进派。但到了80年代里,他感到了有成立一个独立政党的必要,同时虽然他沒有参加“社会民主同盟”,但已受了同盟中社会主义者宣傳的影响。他在建立了苏格兰工党之后,費了5年的时光,一心一意地从事創立独立工党的活动,不断地与反对这个目的的自由党人和費边社社員作斗争。1892年到1895年,他是国會議員,1900年再度当选。从9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致力于組織一个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由工会和社会主义者組成的团体,如果可能的話,他想利用这个組織作为基础,成立一个更广泛的联合战綫,以便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哈第是一个优秀的演說家和新聞記者,更重要的是他是工人

階級事業的一個忠實的傑出戰士。可是他沒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理論作他的指導；他的最大缺點之一就是頑固地拒絕了解馬克思主義。雖然他在主觀上完全忠誠於工人階級，但基爾·哈第從一開始起就常常徘徊於一個勇敢的工人階級戰士——尤其是在暴露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黑暗方面——和無原則的議會機會主義者之間。當他當選了國會議員，成為一個全國知名的人物以後，他出入議會仍然是一身工人階級的打扮，他不像一般的議員那樣穿大禮服，戴大禮帽，而戴一頂工人的布鴨舌帽，而且總有一個吹黑管的人伴隨着他。當下議院為今天的溫莎公爵的誕生祝賀威爾士親王而忘了頭一天晚上造成251名礦工死亡的彭提彼雷德礦坑慘劇時，他單獨一人提出了抗議。他反對南非戰爭和1914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各國社會民主黨人未能制止這次帝國主義戰爭和多數工黨黨員對這場戰爭的支持，使他感到萬分痛心。

獨立工黨的成立是一個重要的進展。恩格斯曾為此表示祝賀：

“不管是持宗派主義態度的社會民主同盟，還是費邊社都未能阻止各省社會主義的發展，所以，第三黨的成立是一樁非常好的事。社會主義的傾向現在已經非常強烈，特別是在北部的工業區，以致這個新成立的政黨在召開第一次大會時就顯出它的力量要比‘社會民主同盟’或‘費邊社’強大，如果它的強大比不上它們兩者加起來的力量。由於黨員群眾的質量的確不錯，由於它的重心放在外省而不放在黨派活動的老巢倫敦，由於它的綱領的要點和我們的意見相同，我覺得埃夫林參加這個組織並擔任它的執行委員這件事是做得對的。

“如果我們能夠對倫敦這幫未來的大人物的卑鄙的野心多少加以遏制，而我們的戰術不太走錯路的話，那末獨立工黨

- 就可能在外省胜利地把群众从‘社会主义联盟’手里争取过来，从‘费边社’手里争取过来，从而组成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1893年1月18日恩格斯给索尔格的信，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英国》，第531页。）

关于独立工党的领袖们，恩格斯这样写道：

“他们大多数……都是喜欢玩弄手段，与议会政权有密切联系的人。但站在他们后面的是群众，这些群众会教导他们好好做人，否则群众会抛弃他们的。”（1893年3月18日恩格斯给索尔格的信。）

这个政党的力量是建筑在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上的。布拉奇福德等人立刻纷纷著书对这种觉醒进行宣传鼓动。布拉奇福德写的一本小册子《欢乐的英格兰》（1892年出版）第一年就销出750,000本，它在唤起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方面所起的作用，大约没有一本其他的书可以和它相比。

可是独立工党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这使得它不能成为英国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

首先，它在团结工人阶级各政治党派上取得一些进展（“社会主义联盟”剩下的盟员被吸收过来，许多“费边社”地方支部变成了独立工党支部，“苏格兰工党”于1894年并入了独立工党），但它并没有把所有的社会主义团体团结起来。虽然它的第一届执行委员大部分都是伦敦或地方的“费边社”社员，但是没有能把伦敦的“费边社”拉过来。

90年代在伦敦和兰开夏获得了进展的“社会民主同盟”也不肯并进来，虽然它的支部时常以友好的态度与独立工党合作。的确，两党绝大多数的会员均赞成合并，1897年“社会民主同盟”和独立工党的6,000党员曾为此举行投票，多数（五对一）均赞成合

并。不过独立工党的領袖們，包括哈第在內坚决地反对这样做，理由是恐将失去工会的友情。于是独立工党的黨員們分別就合并还是联盟的問題进行投票表决，規定合并必須有 $\frac{2}{3}$ 的黨員投票贊成才能通过。投票結果，多数拥护联盟，但“社会民主同盟”不接受，因此談判破裂。

此外，某些工人領袖由于妒忌和个人野心而不願参加独立工党。例如，当曼恩以他对群众运动的了解和他个人的巨大推动力来支持独立工党（1894年，他当选为工党書記）时，伯恩斯就敌視他，不惜与“全国职工大会議會委员会”內的“旧集团”結成联盟（因为这个关系，“旧集团”让他做了該委员会的主席）。

独立工党在这个时期中的第二个缺点是它的群众基础仅局限于部分地区，主要是在約克郡的紡織区。在倫敦它的力量是薄弱的，在某些人数多而重要的工人組織中，如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矿工中，几年来它一直就沒有有什么力量。

第三，独立工党的組織松懈：各地方支部事实上各自为政，互不相关，仅靠几个巡游各地的演說家的个人威望（主要是靠基尔·哈第，他在90年代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几張報紙（哈第在倫敦和格拉斯哥发行的《劳工导报》和《喇叭报》）来联系。

第四，該党成立初期正巧遭遇到大蕭条的終了和帝国主义經濟繁荣阶段的开始，这就造成了工人階級运动暫时的衰落。独立工党候选人在竞选中的景况是每况愈下，在1895年的大选中沒有一人当选，甚至哈第也丢掉了他在西哈姆的議席。但另一方面，在市选举中独立工党候选人当选的人数日漸增加，尤其是在約克郡和苏格兰。“社会民主同盟”的情况也是如此。它在魏尔·桑恩领导下于1893年在西哈姆区市議會选举中获得全胜，取得議會多数。这在英国劳工史上还是第一次。

独立工党最大的缺点是它的理論不但混乱而且模糊。特别是它拒絕了馬克思主义。虽然它的基本动力来自工人們日益提高的政治觉悟,可是它摒棄了階級斗争的观念。

独立工党的思想力量和缺点在《欢乐的英格兰》一书中表現得很清楚。布拉奇福德用动人而又平易的語言解釋了社会主义的意义:

“我将使所有的土地、磨場、矿山、工厂、作坊、商店和铁路成为人民的财产。我将使铁路、邮电傳遞和貨物运输像走路和过桥一样一律免費……我将妥善計劃,設立公共食堂、公共浴室、公共洗衣作,以便解放那些奴隶——我們英国的妇女——的双手。我要使国家来担負全体儿童的撫养、穿衣和受教育的費用。我将教他們全体游戏和唱歌。我将使他們全体受到体育和軍事訓練。我要設立公共科学館。我将使人民成为他們自己的艺术家、戏剧家、音乐家、士兵和警察。最后我将逐步地使所有这些东西免費供应人民。”

根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不同的社会和經濟实质,布拉奇福德划分了它們两者之間的区别(他分別地称它們为“初級”和“高級”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划分簡單明了,使人一目了然,同时預言了后者是前者的繼續。

他对資本主义的攻击是尖銳的,他对未来的憧憬是鼓舞人心的,但在政策問題上,他却与其他社会主义先驅者具有同样的缺点。

“首先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以社会主义教育人民。一旦我們能使人民了解和向往社会主义,我相信不用我們,他們自己就会奔向社会主义社会。(重点是我加的。——著者)目前社会主义者所能干的最有用的工作是教育和組織工作。社会主

又不能以突然的‘政變’來實現。它將由我們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地逐步地滋生出來。不過可以用人力來加速它的生長和發展。”（《歡樂的英格蘭》，第 128 頁。）

這裡又是單獨的強調宣傳工作，我們已經看到，“社會主義聯盟”和“社會民主同盟”的領袖們也是同樣的看法。所不同的是，他不打算發動一個革命的社会改革，而是設法促進一種“在我們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地滋生出來的”社會組織。像這樣的觀念不過是把“費邊社”的基本理論改頭換面，推進了一步而已。“費邊社”的基本理論就是認為靠着推行自由黨的概念；逐步改革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這種觀念不但與早期的通過起義的手段（來一個“突變”）來改革社會的思想根本不相容，更重要的是它與工人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獨立政治鬥爭（這種思想隨着每天的鬥爭變得愈來愈強烈愈明確了）也是同樣不相容的。由於獨立工黨繼承了工人階級里監理會教徒的宗教狂熱，這個理論上的弱點遂使中等階級的改良主義漸漸地滋長起來。譬如一些忠實但是認識模糊的工人階級激進人物就和自由黨巨魁如腊姆齊·麥克唐納之流過往甚密。

給政治獨立的觀念潑冷水的“費邊社”，面對着工人們正在試圖組成他們自己政黨的這一事實，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態度。于是在政治舞台上出現了一種新的情況。假設自由黨主義不再能束縛工人階級，那末“費邊社”必須把他們的“滲入”戰術伸展到一個新的領域中去，就是竭力保證這個新政黨不走革命的路綫。倫敦“費邊社”根據他們在倫敦市政府里的經驗以及他們對工會運動和社會問題所做的研究，（幾乎所有外地的“費邊社”都已併入了獨立工黨）發展了他們的改良主義理論。

他們的目的不在喚醒和鼓舞群眾，而是要影響新一代的工人

階級政治家和工会領袖。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正当独立工党开始进行政治活动时他們出版的、针对議員們写的那些小册子。不多几年以后，他們又和独立工党共同創立了一个“地方政府情报局”。在工会方面，由于韦伯夫妇淵博的学識，他們写的《工会史》(1894年)和《企业民主》(1898年)两书成了經典性的著作。

由于这些原因，当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的巨大的运动高潮开始消逝的时候，資產階級自由党改良主义的旧思想，以更适合于当时运动的政治和經濟发展情况的形势又卷土重来。

“費边社”宣称他們在爭取工人运动思想領導的斗争中已經击败了馬克思主义，这是他們大言不漸的自我吹嘘。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失敗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社会民主同盟”的宗派主义，以及該同盟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运用馬克思主义理論的缺点。但是“社会民主同盟”毕竟要比独立工党高出一筹，因为它有一个独立工人階級的理論，并且它号召它的盟員研究和了解这个理論。

乔治·兰斯伯雷后来在回忆他怎样参加东倫敦的“社会主义格斗場”——鮑与布郎萊的“社会民主同盟”支部——时說：

“我們支部里約有40多个成員。我們都有穩定的职业，大家都很热情，相信我們的使命是要去改变世界……我們的支部聚会像是复兴运动者的聚会。我們在开会和散会时，都要唱一支歌。我們常常一起閱讀經濟学和历史著作……我們大家都很主观，并以我們的經濟知識自負。在黑茲尔同志領導下，我們办了一个經濟学研究班，半懂不懂地讀着《資本論》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的妻子虽然要照顾一个大家庭，进款很少，但是也参加了支部聚会和經濟学研究班。”(兰斯伯雷著《回顾与前瞻》。)

正是因为“社会民主同盟”，尤其是它的盟員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忠誠是建立在真正独立和明确的理論基础上的，所以“社会民主同盟”要比独立工党巩固得多。当 90 年代后期，不利的政治环境使独立工党发生困难时，“社会民主同盟”犹能繼續发展力量。它的盟員虽有种种缺点，但仍不失为国内最彻底的社会主义組織。在 90 年代中叶，不仅摩里斯与同盟和解了，而且盟內日益要求对工会采取进一步的合作态度：1896 年，詹姆斯·麦克唐納担任了“倫敦各业理事会”書記的工作。

第七章

工党的起源及其早期的发展

1. 雇主的反攻

我們剛才概略地論述了劳工运动的演进过程。雇主們对迅速发展的劳工运动发动反攻的結果，直接促成了工党的出現。高漲的劳工运动使各业的雇主們手足无措，但是他們剛在第一个回合中被打敗，就又开始了反攻。

他們的矛头最初指向非熟练工人的新組成的工会。1889年年底，倫敦的“首都南方煤气公司”不惜花費10万鎊的代价摧毀了那里的工会組織，取消了八小时工作制。幸而几个月后，里子的煤气工人斗争获胜，使雇主的这场进攻沒有蔓延到全国其他地区去。

然而，更严重的威胁系来自資本家中最为殷实的集团——大輪船主們。他們早在1875年就建立起“集团”和确定价格的协会，现在又成立了主要目的在于击破海員和碼頭工人（他們的初步斗争已經把倫敦、加的夫、赫尔这样一些港口变成了純由工会會員控制的城鎮。）工会組織的“航业联合会”。在加的夫雇主发动的一次閉厂停工摧毀了当地的工会組織。同时在倫敦的一系列的局部进攻迫使工会让步。接着雇主配合1892—1893年間的蕭条，发动全面的攻击：赫尔的一次大規模的閉厂摧毀了那里的工会組織。全国各地的大企业同业公会和“集团”以有步驟地利用停工这个武器来打击工会組織。

到了1893年，可以說1889年建立的那些“非熟练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就只剩下了当年風采的一个影子，能够免于全軍复沒的已經是十分幸运了。例如，在各大港口的碼頭工人中的組織实际上已經蕩然无存，它們所爭取到的权利大部分也丢了，直到1911年的大罢工中才失而复得。不过，幸运的是，非熟练工人的工会并没有全部消灭。无论如何它們还保存了一批富有战斗精神的领导骨干，他們在全国各地奔走，进行組織和宣傳的活动，抓住每个机会来建立工会的力量。因此，总有一些地区和产业团体如碼頭工人和煤气工人仍然是工会的强有力的組織中心。他們从来没有丧失繼續前进的基地。

接着，雇主們轉向比較强大也更有鍛炼的敌人，然而在这里他們碰了壁。例如棉紡工人在历时20星期的罢工之后击退了一次主要的削減工資的进攻。最重要的是，1893年雇主們企图削減工資25%而对“矿工联合会”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閉厂也失敗了。

1892年矿主們在杜兰郡把工資削減了10%，致使矿工和他們的家屬遭受到可怕的困难，但是这件事更加加强了工人們的团結——杜兰郡的矿工們不久都参加了“矿工联合会”。現在，約克郡、兰开夏和密德兰地区的工人們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地把罢工坚持下去，同时，妇女們在合作社的协助下，英勇地担負起維持家計的斗争。飢餓还不是唯一的敌人——警察和軍隊也被調进了矿区，在約克郡的費特斯頓，軍隊开枪打死了两个人，打伤了16个人。全国各地掀起了巨大的怒潮；在倫敦有人把自由党内政大臣H. H. 阿斯奎特的半身像連同象征死亡的骷髏和交叉的骨头一起抬到特拉法加廣場上去。

矿工們頑强的斗争終于迫使政府出面調停：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位主要的內閣大臣罗茲伯利勋爵正式插手来解决这一争端——

工人们按照原来的工资胜利地复工了。当时的“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的秘书，托马斯·艾希顿，事后回忆道：“事情解决的那天晚上，全国各地都欢欣若狂。在直接受到波及的地区里，工人阶级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参加了矿工的狂欢。同他们一道唱歌，跳舞，喊叫，大笑以至高兴得流出了眼泪，有几个区的教堂还为庆祝这件大事而响起了钟声。”（阿诺特著《矿工》第1卷，第252页。）

这个运动已经击退了一次重大的进攻，证实了它的日益壮大的力量和团结。虽然如此，新工会的失败对工会运动内部的力量对比究竟是有所影响的。不受老的技艺工人的同业工会的成见和拘谨所束缚，并且首先掀起了这场波澜的非熟练工人，到90年代中叶还只占这个扩展了的运动的很小一部分——在150多万的总数中只占10万左右；而早已建立起工会组织的采矿、棉纺和机械三大产业的工人则占总数的一半。

于是，正当要求战斗的行动和政治独立的新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充满了自由党主义和阶级调和思想的、特别是在工会领导机构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地位的老工会活动家们却秉承雇主的意旨开始了反击。新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了他们自己组织的内部，在1894年的全国职工大会上，汤姆·曼恩竞选书记的时候得到了 $\frac{1}{3}$ 的票数，据他本人的估计，在370名代表中就有80名是独立工党的党员。

“旧集团”长期以来就蓄意重新夺取领导权。经济萧条和新工会的失败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得以利用进步领导势力内部的互相猜忌，主要是野心勃勃的约翰·伯恩斯对于基尔·哈第的妒忌来分裂战斗的力量。他们取得了诸如矿工等工会的领导权。采矿工人中的一般群众，在证实了自己的力量之后，对他们领袖们的阴谋活动产生了容忍的倾向。在1895年“旧集团”发动了巨大

的攻势。议会委员会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职工大会制定了新的规章，将战斗的工人群众的据点“各业理事会”排挤出了职工大会。同样受到排斥的还有“不在本企业中工作”的代表——那就是说，像基尔·哈第这种把全部时间用在政治或者政治新闻工作上的人。最后，采取了集体投票的制度，这样就大大加强了专职干部的地位。由于这些强加于大会的反民主措施，“旧集团”，尤其是棉纺工会的保守党人詹姆斯·莫德司雷和锅炉工人工会的罗伯特·奈特，一个极端的阶级调和论者，重新爬上了统治地位。

然而，虽然在工会章程上要的手段压制了基尔·哈第和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人们的声音，从而有效地阻滞着工会运动新生力量的成长，却无法改变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无法遏止雇主们恶毒的、继续不断的进攻。我们在前面业已论述到，在这一世纪的最后几年中，英国刚刚摆脱大萧条，进入了1914—1918年世界大战前的繁荣时期，金融资本家和已经成熟的垄断趋势开始在经济领域中取得统治地位，贸易同盟、公司集团、卡特尔和托拉斯如雨后春笋。虽然这一场繁荣可能给工人贵族带来一线生机，但是重要的工业部门却充分地领略到了技术改革所产生的影响。重新充满了信心的雇主，在美国资本家于90年代初向工会发动凶猛进攻的先例的鼓舞下，现在把攻击目标从新工会，甚至于从那些在工人运动高潮中复活的工会，转向老的技艺工人工会的核心。

在机械制造业中两大势力之间展开了决战。1896年“机器工业协会雇主联合会”成立了，它吸收了北英格兰，北爱尔兰和苏格兰等已存的协会，目的在于“保卫雇主们的权益不受工人组合的侵犯”。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公司的经理H.戴尔上校被选为联合会的会长。各地发生的纠纷都提交联合会处理，闭厂的威胁一再地在工人们的头上飞舞。另一方面，“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战斗

性和会员也都在不断地增长壮大，事态迅速地向着全面决战的方向发展。

主要的争端是雇主要用廉价的，没有组织的工人代替技术工人来掌握新机器，但冲突是由八小时工作制的問題引起的，而且不是由北部而是由伦敦开始的。早在1897年，许多伦敦的企业就在每周四十八小时工作制上作了让步，可是同时雇主联合会已在伦敦建立了据点，設了分会并以德国实业家西門子为会长。工会拒絕承认这个組織、并通知不願意縮短工时的企业說，假如它們不让步就要举行罢工。雇主联合会于是出面干預，說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問題，如果工人真的举行罢工，全国各地附属于雇主联合会的企业就要对工会会员实行閉厂，每批25%的厂子每周輪流閉厂歇业。这项威胁成为事实之后，“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17,000名会员和其他工会的数千会员罢工了。

这场斗争成为当时主要的全国性的事件之一。在伴随而来的熾烈的論战中，雇主們的中心論点是他們“有权任意处理他們自己的财产(机器)”。西門子甚至于不惜公开宣布，雇主閉厂歇业的目的在于“彻底清除工会組織”，其实这一点工会早就指出了。雇主們在这场向工会的大举进攻中无所不用其极：四年前由雇主們建立的所謂“自由劳工协会”招募了一支破坏罢工的工贼队伍。時間月复一月地过去，工会在經濟上感到了困窘，虽然国内外公众和其他工会的捐助在某种程度上減輕了这种困难。大陆和殖民地工会募集了28,000多鎊；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德国。应当特別提到的是艾琳諾娜·馬克思对于这件事所給予的协助。到了秋季雇主們扩大了閉厂的范圍，尽管有着外界的援助，而且“倫敦各业理事会”又召开了會議来設法組織进一步的支援，但是困难已經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第二年，工人被迫接受了雇主的条件。这些条件大体上是：

工人不得干預企业的管理；每一个雇主都有权采用計件工资制；集体交涉；工会会员不得过問本工会以外的工人的工资；雇主有权雇用任何工人和决定使用机器的条件；最后还建立了防止爭执的机构。这是一个真正的失败，但是还没有到十分惨重的程度。事实上，这场斗争的结果有一部分还可以說是胜利——因为消灭工会的企图是完全失败了。

机械工人的斗争是这些年代里最大的一次斗争，但决不是唯一的斗争。在南威尔士，几乎从来没有参加过新工会运动的矿工們，现在在威廉·布雷斯（蒙默斯郡矿工代表，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的骨干分子）的不倦努力的影响下终于开始反对按物价計算工资的办法，并开始組織真正的工会。威尔士矿工們对威廉·阿伯拉罕（“馬本”）等人的老观念在内部进行了多年的斗争之后，最后在1897年通知資方要結束按物价計酬的办法，并且要求增加工资10%。矿主們为了想击破这个新的运动，用閉厂歇业相威胁，并且除了一小部分具有全权的工人代表以外拒絕与工人进行談判。他們不容許工人召开全体會議也不容許全体投票。这个条件在絕大多數人的决定下被拒絕了。尽管他們有“英国矿工联合会”和其他煤矿的支援，但是由于本身缺乏基金，矿工們在被雇主停工5个月后失败了，他們被迫复工，并且不得不仍旧接受了按物价計酬办法。

“但是这场斗争并不是白費的。在这几个月的苦难的过程中，工会运动的精神在蒙默思和格拉摩根的山谷間完全恢复了。就在这一年（1898年）‘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真正地建立起来了。它现在处理着工资問題，替代了原有的‘按物价計酬委员会’。”（阿諾特著《矿工》，第286頁。）第二年年初，威尔士的矿工們被吸收为“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的成員。

雇主们的法宝还不止闭厂歇业和“自由劳工”这两件。他们还握有法律。在90年代的中期，他们就开始在酝酿修改工会法，到了这一世纪的最后几年，法庭一系列的決定危及了工会在70年代制定的法律中所取得的基本权利。工人建立糾察队的权利或者在某种情况下的罢工权利现在都成了问题。这种倾向到了1901年塔夫谷案件的判決达于顶点。法院判決“混合铁路雇工协会”賠償“塔夫谷铁路公司”在罢工中遭受的损失2万鎊。只要这项判決存在，工会运动就不可能有效地展开。看来雇主们在政府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

但是这个印象是完全錯誤的。不錯，雇主们获得了很大的便宜，但他们想要削弱工会力量和削弱远較微小的社会主义者的力量的企图却完全失败了。另一方面，他们迫使劳工运动的各个方面，“老派”和“新派”，社会主义的和反社会主义的結成一条保卫劳工基本权利的統一战綫。生活本身教育了广大的工人群众，使他们認識到必須像社会主义者所主張的那样，团結起来进行政治斗争。由于事实证明了他们的正确性，社会主义者又恢复了陣地。例如，在南威尔士的巨大的斗争中許多矿工脱离了自由主义而归向独立工党。1900年基尔·哈第当选为墨地尔-梯德菲地区的国会议員。90年代中叶《喇叭报》提出的各行业組成一个战斗組織的运动在全国职工大会中为社会主义者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鉴于不久以前机器工人被迫停工的慘痛教訓，一个作为互助保險組織的“工会联合总会”在1898年成立起来了。像机器工人工会这样重要的組織也加入了这个联合总会，然而，“旧集团”的破坏使它未能发生作用。

总的形势对工人阶级中各式各样的政治思潮也起着重要的影响。随着不断的殖民战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危机而来的軍国

主义倾向，整个说来，使得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携起手来共同防卫敌人。例如，在南非战争期间，基尔·哈第领导着格拉斯哥的码头工人击退了一群好战暴徒，他们企图袭击一个由激进自由派领袖劳合乔治作报告的集会。同时在伦敦，“社会民主同盟”同激进派订有保护反战集会的协议。真正深刻的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和研究工作这时开展起来了，J. A. 霍布森的著作就是一个例子，这本书曾经获得列宁的好评。可是另一方面，大多数“费边社”不是对这个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就是事实上支持帝国主义扩张。这时候布拉奇福德也因为支持政府，同绝大多数独立工党分子发生了分歧。

劳工运动的整个形势于是乎越来越有利于哈第和他的朋友们若干年来一直鼓吹的在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盟的主张。“苏格兰职工大会”首先采取了实现这样一个计划的步骤。（苏格兰职工大会是为了抗议全国职工大会的新规章而建立起来的，在它的议会委员会中“独立工党”党员占大多数，其中包括矿工领袖罗伯特·斯迈利。）

1899年4月，“苏格兰职工大会”授权它的议会委员会召集一次特别的代表大会，来“商讨下届大选中工人阶级采取联合行动的问题”。第二年正月，这个由工会，各业理事会，“社会民主同盟”，独立工党以及合作社代表参加的特别会议，成立了一个“苏格兰工人议会委员会”来执行争取工人阶级在议会中的独立代表权的决议。

1899年“混合铁路雇工协会”在哈第和《劳工导报》的强烈支持下向英国职工大会建议采取类似的步骤。并拟了一个决议案要求大会通过：

“大会考虑到过去几年来的决议，并为了在下议院获得能够维护劳工利益的更完善的代表权，特指示议会委员会邀请

合作社、社会主义者、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的組織在相互同意的基礎上，共同召集一个由上述机构中願意参加者的代表举行特別大会，以研究措施爭取在下屆議會中为劳工議員贏得更多的席位。”

大会經過了冗长而激烈的辯論，在辯論中，矿工和棉紡織工人对这个決議案表示反对。矿工們认为每一个工会應該提出它自己的候选人，而棉紡織工人則认为这个政治步驟将使他們的工会陷于分裂。然而，尽管有着这样强大的反对力量，決議还是在拥护者的欢呼声中以 546,000 票对 434,000 票通过了。

2. 劳工代表委员会

“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召集委员会是由“职工大会議會委员会”的 4 名代表和 3 个社会主义組織的各两名代表組成的。职工大会的代表是自由工党华尔坦斯多地方議員、“矿工工会”的薩姆·伍茲；“費边社”的駁船制造工人、斯特普尼地方的議員 W. G. 斯特德曼；“煤气工人工会”的“社会民主同盟”盟員的魏尔·桑恩；以及自由工党的铁路工人領袖理查德·貝尔，他这时还是同情社会主义的。独立工党的代表是基尔·哈第和腊姆齐·麦克唐納，“費边社”的代表为秘书皮斯和蕭伯納。“社会民主同盟”的发言人是早期的倫敦市議員 H. R. 泰勒和倫敦的工会領袖、《正义报》的編輯哈利·奎尔奇。^①

在 1900 年 2 月 27 日这一天，“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成立大会终于在倫敦法林頓街紀念大厅中召开了。处在当时南非战争的战争狂热分子叫嚣声中，这件事几乎没有被人注意。出席大会的代

^① 大会之后不久，奎尔奇就把《正义报》的編輯部交給列宁作筹备出版《火星报》之用——这种报纸越过沙皇警察的封鎖被偷运到俄国去。

表来自共有会员 353,070 人的 41 个工会，7 个各业理事会（主要是密德兰和英格兰北部地区的），以及号称有会员 22,861 人的各社会主义团体。

斯特德曼在开幕词中明确地指出了各种错综复杂的思想能取得一致的主要的共同因素。他说他曾经主张过单纯的工会运动，直到10年前他的行业中发生的一次劳资纠纷才使他认识到主张采取政治行动的先进的工会运动的领袖们是正确的，而他自己则是错误的。他现在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希望看到劳工在下议院获得更多的席位。

但是，既然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转向于采取政治行动，有一些困难的问题就必须加以解决。应该支持哪一种人去竞选国会议员呢？新的机构的总政策是什么？它的目前的和长远的政策是什么？这个机构代表谁，在什么基础上产生？它对候选人和国会议员的控制权力应该有多大？必须就这些和类似的问题取得某种实际工作上的安排，否则就会一无进展。因此在劳工代表委员会初期的会议上这些问题就成了重要的讨论中心。

第一次会议很快就在是否只能支持工人阶级的候选人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在主张只能支持这种人作候选人的决议提出的时候，机器工人工会领袖、独立工党党员 G. N. 巴恩斯在巴特西亚地区的国会议员约翰·伯恩斯的附议下提出了一个修正案。修正案主张给予“同情劳工运动的目的和要求，并由我会员组织提名作候选人的人士”以支持。即将参加下届自由党内阁的伯恩斯竟在会上发言说：

“我已经开始对工人阶级的皮鞋，工人阶级的火车，工人阶级的房子和工人阶级的人造奶油感到厌烦了。我相信劳工和社会运动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我们不应该作阶级偏见的

俘虏而應該在所有階級組織之外來考慮政党和政策的時候了。”

社會主義者組織也反對這項決議案，原因不僅是由于他們（特別是費邊社）本身有非工人的成員，也是由于他們幾年以前曾經親眼見到“必須在本企業中工作”的類似條件被用來將像基爾·哈第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從全國職工大會排擠出去。再說，不管這種宗派主義的工會觀點在別處能夠得到多少支持，它自然不會為贊成勞工代表權的工會所支持。巴恩斯的修正案後來擴大到把合作運動（合作運動的支持又是很重要的）也包括進去，這項修正案乃以 102 票對 3 票被通過了。

“社會民主同盟”的詹姆斯·麥克唐納提出了政策問題，他建議“在承認階級鬥爭，並以生產資料、分配和交換手段的社會化為最終目標的基礎上”組成政黨。這個政黨應該“制定它自己的綱領以便促進符合勞工利益的實際的立法措施，並且應該準備同任何支持這類措施或者協助反對相反性質措施的政黨進行合作。”這項建議遭到了否決，它甚至沒有受到社會主義者的支持。同時有人另外提出了一項修正案，提議列一張基本要求的清單，在這些要求的範圍之外，各候選人都應該有權採取他個人的主張。

基爾·哈第覺得這樣還不夠，於是提出了另一件修正案，這件修正案以 53 票對 39 票，37 票棄權通過。它主張：

“建立一個立場分明的勞工代表的議會黨團，它應該有自己的領袖和統一的政策，它必須準備同任何目前從事於促進直接有利於勞工的立法措施的黨派合作，並且同樣準備同任何黨派一道反對與之相背的措施。此外，勞工議會黨團的成員不得反對按照第一項決議案提名的候選人。”

“勞工代表委員會”于是由選舉產生了，其中有 7 個工會代表，

两个独立工党代表，两个“社会民主同盟”代表和一个“费边社”的代表。而委员会的书记为腊姆齐·麦克唐纳。

劳工运动的发展已经向前走了有历史意义的一步。经过若干年来经济斗争中的蓬勃发展，经过了社会主义先驱者 20 年来的教导，工会（或者就现阶段来说至少是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终于转向了政治组织和政治行动。在这方面他们同社会主义组织，包括在初期同马克思主义者结成了同盟。

然而，这个新组织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这些缺点主要的根源在于一贯的自由主义倾向——或者说是对于统治阶级的某个阶层的意识和领导权的接受——这种自由主义倾向，正如我们所见，在大多数工会的领导中是根深蒂固的，而且经过费边社进一步以更巧妙的形式加以发挥之后，被政治上受费边派领导的独立工党散播到更为广泛的运动中去。在开始有了独立政治组织的劳工运动中，自由党—费边社改良主义的主要鼓吹者就是劳工代表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腊姆齐·麦克唐纳。他是劳工运动中新职业政客的典型代表。过去，这种人只有忠实地为自由党人效劳才能“飞黄腾达”——约翰·伯恩斯就是一个绝妙的好例子——但是现在劳工政治活动范围的扩展给他们提供了新的机会。而对麦克唐纳来说，以其翩翩的风度，动人的声调以及雄辩的口才，正是天赐良机。

正如同几年来费边社认识到的那样，他清楚地认识到工党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个党是进一步采取更鲜明的阶级政策，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意识、目标和行动上“独立自主”呢？还是领导工人阶级倒退回去支持自由党—资本家的政策呢？换句话说，这个广泛的工人阶级政党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还是在统治阶级思想的蒙蔽和欺骗下踟躇不前？麦克唐纳把资产阶级思想用社会主义的言词粉饰起来，使

它們顯得仍然是可以為工人們接受的。他致力於提出一條代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其結果直到現在仍然是工黨右翼的“學說”，雖然自從1931年他公開倒向資產階級以後，他的名字在勞工運動中已經成了叛徒的代名詞。

麥克唐納的基本思想就是否認階級鬥爭。他借用了一個似是而非的生物學上的比喻，把社會比作類似人體的一個有機體。他在1908年出版的一本書《社會主義和社會》中說，工黨之所以建立是由於工會運動根據過去的經驗發現階級鬥爭毫無結果。社會主義標誌着社會的發展，而不是某一個階級的興起。社會主義的基礎是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概念，一種有效的整體組織，其中不含任何“宗派的”成分。這完全是用社會主義的詞句裝飾起來的自由主義。

1901年召開的第二次會議上，“勞工代表委員會”又談到了政策的問題。奎爾奇提出了一項決議案，這項決議案像前一年詹姆斯·麥克唐納所提出的決議案一樣，本可以使黨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這項決議案由於所有獨立工黨和工會代表的反對而被否決了。會議反而通過了代表利物浦碼頭工人的獨立工黨黨員詹姆斯·塞克斯頓提出的決議案。這條決議宣稱：

“鑒於資本家形成了集團，僱主組成了聯合會，全國工會組織有必要運用它們的政治力量來保衛它們的利益並實現它們的要求。會議雖然並不贊成在工會運動中進行純黨派政治活動，然而工會會員仍必須為下列的目的團結一致採取獨立的政綱：（1）保衛集會結社的合法權利。（2）爭取在議會中通過法律，以結束這個迫使財富的創造者以租金和利潤的形式承當巨大的負擔來維持一個龐大的非生產者階級的制度。”由於否決了擁護社會主義的決議，發生了這些年代中的真正

的悲剧；由于一个严重的宗派主义的错误，“社会民主同盟”从这个新运动分裂出去了。社会民主党人立即失去了克服“劳工代表委员会”中的缺点和扭转不健康的趋势以及在他們内部培养群众领袖的机会。正如列宁在1907年所说，“他們不善于适应在他們周圍发生的、理論上虽然很弱但生命力旺盛强大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約·菲·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譯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6頁。）这个不幸的错误不止影响到“劳工代表委员会”，而且也影响了“社会民主同盟”本身，它的力量由于內部的分歧而受到削弱。同盟的下层群众对海德門领导集团逐渐感到不满，到了1903年，主要集中在克萊德賽德的一部分盟員分裂出去并組成了社会主义工党。强烈地反对一切政治上的妥协，反对同其他社会主义社团发生任何关系的社会劳工党最后轉而主張采取罢工斗争^①。这样建立起来的战斗傳統表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的克萊德賽德的斗争中。在这次斗争中社会主义工党的工会會員起了积极的作用。在1920年，“社会主义工党”的最富有战斗性的成員参与了共产党的建党工作。

“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前途最初看来并不很光明。还没有来得及作准备，它就投入了1900年的“卡噠选举”^②。这次选举是在深入劳工运动心腹的侵略主义的混乱之中举行的。这个新党派时运不济，它的15个候选人中只有两个——墨地尔地区的基尔·哈第和达比地区的理查德·貝尔——获得成功。貝尔不久后就回到了

① 1905年，“社会民主同盟”再度分裂，这次是主要集中在倫敦的部分盟員組成了大不列顛社会党。它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团体，它既排斥政治活动又排斥工会行动，以为只要每个人都相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会实现。50年后它仍是那么个小宗派，主要致力于充当反苏宣傳的应声虫。

② 利用群众的战争狂热来賺取多数票的选举。——譯者

“自由党”的队伍里去，只剩下哈第一人 是劳工議員；虽然議會里还有两个自由工党和五个矿工的議員，他們也都不向他靠攏。

但是，第二年，由塔夫谷审判事件所引起的强大的群众运动使局势为之改观。由于这个事件，工会最后的自卫武器被剥夺了，而这正发生在物价几十年来长期下跌后开始回升，以至实际工資日趋低落的时候。在这以前一直是半心半意地支持着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工会，现在全力参加政治行动了。到了1903年，委员会所屬的工会會員已經增加到百万左右，各业理事会也从7个增加到76个。不久工会日益增漲的力量开始在議員补缺选举中表现出来。1902年，大卫·沙克尔頓在克利特娄当选，第二年維尔·克魯克斯又在烏尔威治得手，而亚瑟·汉德逊（“翻砂工人工会”會員、“劳工代表委员会”最初的組織者）在巴納德堡被选上了。

但是，虽然这个新的党派日渐壮大起来，它的組織原則和政策却还是規定得不够明确。各工会存在着这样一种强烈的傾向，就是只推举自己的候选人而不願支持整个劳工运动的候选人。有一些工会領袖还想排斥社会党人。在1902年的年会上，独立工党的老党员、煤气工人工会的代表彼特·柯倫提出了扩大和加强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政治权力的动議。他建議指令委员会考虑解决国会議員候选人竞选和維持当选議員的生活費用問題。劳工議員必須代表所有劳工的利益，而且必須用共同的基金来維持。在与各工会磋商之后，这项基金在1903年的年会上建立起来了。年会同时也作出了决定，要求候选人保证服从工党議會党团的多数决定，并且不得同其他党派勾結。这个決議通过的时候并不是毫无阻碍的。就是在这一次基尔·哈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要求支持他所說的“劳工主义”。

“他們已經确定了一項公約，那就是当他們在下議院中采

取行动的时候，他们既不是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也不是保守党人，而是劳工党人。他们应借助这个决议来防止个别的人破坏整个运动。他们应该提高警惕，以免陷于自由党人的路线，因为自由党人的路线会使他们行动受到束缚，言论遭到箝制，最后把他们变成一群孤立无援、信誉扫地、无能为力的废物。他们应该同自由党、保守党以及任何工党以外的‘党派’断绝关系。他们应该直接为群众树立一种榜样，如果他们真能做到这一点，群众就会拥护他们。”^①

当新的会章制定以后，劳工代表委员会又同它的母体职工大会正式脱离了关系。在1904年，职工大会主席、这时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自由党人的理查德·贝尔把“劳工代表委员会”裁决为“会外组织”，因而大会已经无权加以控制。

这个时候，在英国实际上也是在世界各地，政治和社会形势已经有了改变。不仅工会在大力支持“劳工代表委员会”为争取恢复工人阶级组织的基本权利而斗争。原来暂时被这个世纪末的繁荣景象和南非战争中帝国主义狂热掩盖起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重新暴露出来了。战后，萧条再度袭来，贫困和失业现象剧增，这与金融资本家对工人的无耻剥削和穷奢极欲适成鲜明的对照。但是人们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逆来顺受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复兴以及自从8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组织的蓬勃发展为消灭这些罪恶提供了条件。1905年1月，在基尔·哈第主持之下的一个特别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失业和供给在学儿童以膳食的决议。它宣称：

“失业并不是由于缺乏土地、资本、国民财富，或者由于缺

^①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正如赫伯特·格莱斯頓的文件所示，“腊姆齐·麦克唐纳在哈第的默许之下，正在同自由党头目在选举问题上安排一项秘密的谅解。”（H. 培林著《工党的起源——1880年至1900年》，第240—241页。）

乏消費能力而引起的，因为在經濟恐慌期間，就像我們目前所經歷的一樣，創造財富的人被迫在物資充裕的情況下挨餓。”保護政策也好，自由貿易也好，都無濟于事，罪惡實際起因于“壟斷的存在，不勞而食的人過多，勞動階級負擔過重，以及缺乏某種產業上的組織來防止有時使工人工作過度有時又使他們陷于失業的現象。”(W. S. 亞當斯著《愛德華的時代遺產》，1919年出版，第218頁。)

本着這種精神，地方政府中的新進的社會主義者代表一直在為失業者進行宣傳鼓動，反對吝嗇、卑鄙、架子十足的濟貧法。這項法律駭人聽聞的弊端後來在皮阿特里斯·韋伯于1905年皇家失業調查委員會上作的“少數派報告”中受到徹底的揭露。在這期間不斷的騷動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1905年11月由奎爾奇，詹姆斯·麥克唐納，馬格雷特·邦德菲爾德，喬治·蘭斯伯雷和國會議員維爾·克魯克斯向首相引見的倫敦東部貧民區代表團了。為了配合這個代表團的晉見，倫敦各業理事會和其他地方組織安排了几千群眾的示威遊行。遊行高舉着標語，上面寫着“全世界的工人聯合起來”，“失業者要求工作權利”以及“給我們男人工作—給我們的孩子麵包”。

在這個世紀最初的年代中，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都陷入了深刻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中，而工人階級不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殖民地國家則開始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階段。這一次高潮中最有力的打擊是俄國工人1905年的革命，它從根本上動搖了沙皇遼闊的帝國，並且使各處的普通人民受到新的希望和決心的鼓舞。國際的反響是巨大的：奧匈帝國所發生的強有力的示威迫使維也納政府接受了男子選舉權的要求。在德國工人中也發生了深刻的騷動。1906年法國爆發了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大罷工。它在

殖民地国家中的影响可能更要深远，因为这个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已经证明不过是个纸老虎；于是乎开始了行将改变中国和印度亿万人民的命运的伟大的民族革命运动。

俄国 1905 年的事件，这场反抗世界上最可恨的专制暴政之一的人民革命，在英国激起了包括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进步阶层的深刻同情。1月24日斯特普尼的失业工人举行集会，第二天（新堡）埃尔威克造船厂的工人又举行了晚餐时的聚会来抗议对圣彼得堡工人的屠杀。1月25日，独立工党在每年一度的劳工代表大会开幕前夕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会议一开始就通过了一项同情俄国人民反抗暴君起义的决议。“当听众逐渐了解到这件决议的重要性的时候，”1月27日的《劳工导报》报道说，“一阵巨大的欢呼声响了起来，最后每个人都表示同意并为之欢呼。”劳工代表大会本身也一致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决议，并且发出指示，要求建立一项基金“以援助为自由而进行崇高斗争的罢工工人和救济生活困难的寡妇和孤儿”。同一天的《正义报》（当时提奥多·罗斯坦正为这个刊物撰写着有关这些伟大事件的内容至为丰富的评论）宣称：“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在多少世纪的奴役和困苦之后，俄国人民站起来了，沙皇的宝座已经从根本上推翻了。”在伦敦、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等大城市里举行了群众大会，它们往往是由“社会民主同盟”、独立工党、“费边社”和工会联合主持的。基尔·哈第在议会中要求就沙皇政府不经审判在华沙枪杀了120名工人阶级领袖一事提出抗议。

俄国革命就这样对工人运动的深刻的思想动荡和不断加强的斗争输入了新的有力的因素。工人运动这时已经在为失业问题和对工会的基本权利受到威胁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済政策等问题积极地展开了斗争。资产阶级在保守党20年来从未中断的统治期间，

对工人一直在执行着镇压政策，但现在碰到了真正的困难：除了“英国困难情况”以外，还有引起激烈争执的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问题，日渐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和爱尔兰独立问题，而这些还不过是几件最严重的而已。保守党内部在关税问题上的分裂促成了政府的辞职。在1905年年底，曾经因为谴责英国在南非的暴行而遭到保守党人嫉恨的性格倔强的苏格兰激进派人士亨利·坎贝尔一班纳曼爵士组成了新政府并且在新年开始就解散了议会重新进行选举。

自由党人在1906年的大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而工党也取得了使当时的舆论界为之震惊的进展。工党（这时“劳工代表委员会”已经被人称为工党）的席位从4个增长为29个，此外还有24个（其中13个矿工工会的领袖）工会的候选人以自由党人的身份当选。

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确取得了重大的发展，然而，要想了解它真正的意义，还必须对产生这个结果的复杂的社会倾向加以仔细的分析。首先，自由党人采取的政策是根据资产阶级面对着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的压力不得不实行战略退却的情况下拟定的。保守党领袖巴尔福在评论选举结果的时候，很清楚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假如我的观察不错的话，已经发生的事情同近几年来我们所喋喋不休地争吵着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关系。坎贝尔一班纳曼只不过是一个在他所无力控制的激流上跳动着的水木塞子，而目前此间发生的事件是同引起圣彼得堡的屠杀，维也纳的暴乱和柏林社会党人的游行的同一运动是遥相呼应的。”

自由党人相信，凭着狡猾的妥协政策，激进的言词以及在选举上与工党进行勾结，这场风暴就可以平安渡过。而且这样一来，

統治階級政黨可以把權力保持在自己手中而以工人階級政黨為同盟的小伙計。這是他們鬥爭的最高目標而且他們達到了這個目標。頭號政客大衛·勞合喬治在選舉結束僅幾個月後的一次集會上宣稱，他可以告訴他的自由黨聽眾，將來可能“使這個獨立的工黨運動成為一支巨大而銳不可當的力量”。

“在尋常議會任期屆滿的時候，如果人們發現自由黨議會沒有作任何努力來認真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情況，來掃除在這個充滿了財富的土地上存在貧民窟、飢饉窮困的國家恥辱；發現他們不敢大膽地攻擊造成這種悲慘狀況的主要原因（其中最顯然的是酗酒和萬惡的土地制度）；發現他們沒有制止由於擴張軍備而造成的國家富源的浪費，也沒有為孤苦的老年人提供妥善的生活條件；發現他們馴順地讓上議院把他們提出的法案中的所有精華剔除淨盡；在這種情況下，勢必就會有人發出呼喚要求成立新政黨，而我們這些在座的人中也會有許多附和人附和這種呼聲的。但是，如果自由黨政府採取措施來對付地主，制酒商和貴族，就如同他們曾經對付牧師那樣，把這個國家從壟斷資本家的魔爪中解救出來，那麼工黨即使號召英國的勞動人民背棄正在為消滅那些壓迫勞動者的罪惡制度而英勇鬥爭的自由黨的主義，那也是不會有什麼效果的。”（M. 比爾著《英國社會主義史》第2卷，第388—389頁。）

這樣一種政策是大多數工黨議員——不論他們怎樣叫嚷他們的“獨立性”——所十分歡迎的。這種政策實際上等於力求改進資本主義制度以使它得以維持下去，或者更坦率地說，等於用帝國主義壟斷和殖民剝削的超額利潤來收買英國工人階級。

因此工黨在選舉上獲得的巨大勝利具有了兩重性：它是統治階級為了分化和控制工人階級爭取獨立的力量而採取的長遠政策

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种力量是实在的，并且沿着胜利的道路在不断地发展，同时他们所取得的让步也是真实的。他们迫使“自由党”领导实践诺言，接受了一项使工会免于受类似塔夫谷案件赔偿威胁的法案。其他重要的收获有：又有600万工人享受到劳动者工伤救济的待遇；地方当局供应贫苦学童膳食；根据1908年的煤矿法令矿工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同年建立了非捐助性的养老补助金；1909年工潮调解法令在消除血汗劳动的弊端方面开始作了一点努力。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在这个政治上一帆风顺，当统治阶级的堡垒在人民的攻势面前将要土崩瓦解的时候，工党的出现简直同自由党的大获全胜同样地引人注目，而工党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它看起来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

第八章

社会主义和大动荡时代

1. 为社会主义道路而斗争

现在面临着—个社会主义的宣传、组织和活动蓬勃发展的时期。1906年，“独立工党”宣称拥有130个新的支部，同时“社会民主同盟”也声称从1905年至1906年共发展86个新的支部，此外布里斯特耳和新堡的重要的社会主义团体也并入了“社会民主同盟”。有些“社会民主同盟”支部在一星期内集会达8次之多。“社会民主同盟”、独立工党及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喇叭兄弟会”和“喇叭先锋队”比以前更加壮大更加活跃起来，在伦敦和苏格兰在这两个“喇叭”先锋队的支助下，他们举行了数百次集会。“二十世纪出版社”所出版的小册子和“社会民主同盟”发行的三种社会主义报刊《正义报》、《劳工导报》和《喇叭报》的销路在这一年中与日俱增。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同盟”在1906年的市议会选举中都得到了巨大的收获。（请参看弗雷德·尼发表在“社会民主同盟”1907年《社会主义年鉴》中的《1906年社会主义运动》一文。尼是“社会民主同盟”的领导盟员，《正义报》的副主笔，后来担任“伦敦各业理事会”书记。尼在担任书记期间，推动了1914年伦敦工党组织的成立，并做了它的第一任书记。）

社会主义思想现在在成人教育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社

会民主同盟”外，社会主义工党也开始研究经济学，开班讲授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的著作。“社会科学图书馆”里所流行的社会学书籍中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早在1903年，工人思想波动剧烈，迫切要求有受教育的机会，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同时也为了抵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工人运动和大学生联合成立了“工人教育协会”。1899年牛津大学创立了腊斯金学院给三、四十个工人授课。学生们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得到了院长丹尼斯·希尔德的支持。到了1906年，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冲突变得严重起来，后来希尔德被撤职了。愤怒的学生在1909年组织了“平民联盟”，企图通过工厂车间学习小组，传播马克思主义。从这个事例中，可以极明显地看出工人阶级教育的两种倾向。尼曾经写道：

“社会主义多少年来从来没有在人民的心目中占有像1906年那样突出的地位。社会主义活动的开展从来没有像这样的风起云涌。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壮大了。从所做的工作来看，所取得的进步成就来看，以及从社会主义运动在统治阶级中所引起的恐惧来看，1906年是顺利赢得胜利的一年。”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上述的胜利，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像暴风雨般地袭来，尽管如此，种种征象表明社会主义运动将成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1907年，在查洛地方补缺选举中，独立工党党员和曾经因为社会主义见解受到猛烈攻击的新工会先驱者彼特·柯伦击败了他的3个竞争者而当选议员。更令人震惊的是维克多·格雷逊在科伦河谷补缺选举中以一个不为工党支持的和不受承认的社会主义者击败了一个自由党党员和一个关税改革主义者。恼羞成怒的保守党人开始对正统的工党乃至自由党候选人大肆攻击，骂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在刻克特尔地方的竞

选运动中，保守党党员把社会主义、无神论和自由恋爱列为攻击一个工党候选人的理由。

社会主义的各组织“光荣地接受了这个挑战”，结果增加了会员并扩大了活动范围。社会民主党（从1908年4月以后社会民主同盟开始被人称为社会民主党）宣称该党支部的数目有了迅速地增加，党员以及党组织的素质也都有所提高，尤其是在伦敦和苏格兰两处。独立工党也声称拥有700个支部和许多组织工作者。（刊载于《社会主义年鉴》的尼写的《1907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文）正如列宁在次年指出的，社会主义在英国工人阶级当中迅速传播，社会主义在英国又在成为群众运动，这一点只有瞎子才看不到。（《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1页。）

现在摆在政治劳工运动面前的中心问题是社会主义问题，也就是说真正政策独立，而不是在组织形式上与统治阶级政党分离，事实上却进一步坚持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实行改革的政策。在整个运动中，尽管有着种种错综复杂的思想，但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显著的趋势：一方面是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由于大批失业现象的再度出现和从二十世纪初以来物价高涨所造成的实际工资降低，要求更大的让步，要求更激烈的改革，并开始转向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社会主义观点。在另一方面，大部分仍然保持着自由党人观点的工会干部和独立工党与工党内费边社改良派的领袖们和统治阶级集团，特别是自由党正在更加紧密地勾结在一起。议会工党的党员摘下了基尔·哈第的布帽子，换上了丝织大礼帽，他们在议会中和在统治阶级政客的乡间别墅里受到了资产阶级影响的腐蚀。如果由他们这些人的态度和观点来看，自由党的把工党做为自由党的尾巴以稳定工人情绪的愿望是很有可能如愿以偿的。腊

姆齐·麦克唐纳，一个善于词令的野心家，现在继基尔·哈第之后成了工党议会党团的领袖。基尔·哈第的下台是因为他过去的工人阶级的战斗性与工党（他在这个政党的建立中出了很大气力）内日益增长的机会主义之间发生了矛盾。哈第于1907年写给菲利普·斯诺登的信上说：

“我希望摆脱这个地位的最大理由是以后我可以自由地讲话。在最后一次会议期间，这个党实际上已不被公众所注意……这种趋势显然是因为与政府过于亲密的缘故，如果这种政策继续下去，我们将失去我们的独立并且总有一天要自食其果与自由党人同归于尽。下次开会，我们中间凡是相信战斗的社会主义者将团结起来，倘若我们不能把党引导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就‘走我们自己的路’。”

当工党的议会领袖与政治和工会激进分子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的时候，建立社会主义联合政策的要求变得更加强烈了。格雷逊（他的社会主义理论虽然说得有声有色，但比较肤浅）的行为就证明了这种动荡的心情。他事前未曾得到独立工党的正式认可，就在科伦河谷单枪匹马地进行斗争。事后独立工党表示同意接受他入党，但他拒绝签署工党党章，所以虽然他是工党的党员，但在开会时却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者。第二年，工党提出了“工作权法案”，格雷逊代表失业工人谴责工党努力不够。在下议院中经过几场激烈辩论后，会议宣布延期讨论，在休会期间展开了一场火热的宣传活动。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立即宣布支持格雷逊，在宣传工作中格雷逊、海德门和布拉奇福德进行了更加紧密的合作。1909年，当党在年会上提到过去全国行政会议报告中关于格雷逊那几段时，他获得了独立工党群众的广泛支持。独立工党“四巨头”——哈第、麦克唐纳、斯诺登和格莱雪西尔——为了表示对党

內支持格雷逊的抗議，同时也是由于党员們对議會工党經常妥协感到不滿，暂时退出了全国行政委员会。

在社会民主党內，人們日漸贊成合并。少数派认为脱离工党是一个錯誤，1906年大选的胜利更增强了这种想法。1906年，在社会民主同盟的大会上几乎全体一致通过了建立統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決議，而支部不得参加地方“工人代表委员会”的建議仅以52票对36票之差遭到了否决。独立工党的上层领导却不願接受任何与社会民主同盟合并的意見。在科倫河谷补缺选举以后，“社会民主同盟”与它的《喇叭报》的支援者經常遭受攻击，特别是麦克唐納和哈第的攻击。麦克唐納說他們是“好作豪言壯語的蠢人”。

社会主义思想的增长可于1908年工党的代表大会中看出来，虽然这种思想的力量尚不足以影响政策的决定。在討論修改党章时，染紙业工人代表威廉·阿特金森和“社会民主同盟”的一位盟員（該同盟的盟員仍作为工会代表列席會議）动議大会明确规定工党参加議會活动的“最終目的是通过推翻目前資本主义竞争制度和建立生活資料公有制，来为工人階級爭得全部劳动果实”。

反对这个決議的人說，大会不得强迫工会組織接受社会主义的綱領。国会議員 J. R. 克萊斯（奥哈姆各业理事会的代表）說他本人贊成公有制，但他又宣称“他們罢工事实上不是为了达到最終目的，而是为了爭得年老贍养金，为了目前的工厂立法，为了取得一种有效的有助于解决失业問題的立法，同时，也是为了把未来的理想灌輸給人民”。

这个修正案以931,000票对91,000票遭到否决，但是在两天以后，會議又以514,000票对469,000票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決議案，以“表示表示意見”而不作为一项生效的政策。这项決議是机

器工人代表 J. J. 斯蒂芬逊动議的；

“現在已經到了工党應該有一个固定目标的时候了，工党应当把下列事項作为自己的目标：生产資料、分配和交換社会化，由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民主政府来控制；把全部劳动力从資本家和地主的統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两性間的社会和經濟平等。”

这个決議对贊成合并的“社会民主同盟”內部的少数派是一个新的刺激。同年在同盟召开的年会上，以丹·欧文为首的伯恩利支部建議“如果所有‘社会民主同盟’的候选人都作为社会主义者参加竞选的話”，就应当重新考虑同盟的态度。虽然这个提案有海德門的支持，但以 103 票对 31 票遭到否决。奈尔奇是重新合并的主要反对者。少数派的这种重要意見——就是认为同盟失去了領導工人脱离自由党主义的絕好机会——繼續存在在同盟之內，但这时党内大多数人都有一個感觉，就是工党必須先表示自己的独立性，然后社会主义者才能和它合并。

这种观点的近視和有危害性在 1908 年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对这个問題进行討論时就表現出来了。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党一道組成了国际社会主义局英国支部，独立工党要求工党加入国际，因为凡承认階級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等劳工組織都有資格参加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黨員卡尔·考茨基提議接受工党加入，他的理由是“虽然它沒有直接承认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但实际上它进行了这种斗争，同时做为一个独立于資产階級政党之外的政党，事实上它已采取了階級斗争的基本观点”。但海德門等人則主張在工党未直接承认階級斗争和社会主义原則之前暫不接受它加入。

列宁发言支持接受工党加入，他說工党是“工联的議會代表

机关”，但他建議修正考茨基的說法，另加一段說明接受工党参加是因为它（工党）是“英国真正的无产阶级組織走向自觉的阶级政策和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第一步”。列宁之所以有这个建議，是因为考茨基的动議未經修改就获得了通过，“这样一来似乎‘国际’已担保工党实际上在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似乎只要工人的組織在議會中形成单独的工人团体，就可以在一切行动上不依赖资产阶级了！”列宁說他的提議“将会使几十万十分尊重‘国际’的決議、但是还没有成为社会主义者的英国工人再一次地考虑一下，为什么认为他們只是走了第一步，以后在这条路上的步驟該是怎样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會議》。《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8—211頁。）

不久，一再放棄社会主义立場的議會工党，在上議院法官議員的一次严重打击之后，不得不更加依靠自由党了。“一位保守党工人”，混合铁路雇工协会华尔坦斯多支部的 W. V. 奥斯本于1909年在资本家的經濟支助下取得了上議院的裁定，使他有权阻止其工会向會員收費或用工会的基金来津貼工党的国会議員。工会的資助是工党的重要經濟后盾，上議院的這項裁定无异于剥夺了工会从1876年以来所享有的参加或支援政治活动的权利。

资本家立刻利用了这个好机会，在全国搜罗馴順的、准备采取类似行动反对他們工会的工会活动家。如今議會工党面临着沒有薪金和沒有选举費的前景，比往日更加兢兢业业了，生怕做出什么危害或刺激自由党政府的事情。自由党人以前在塔夫谷案件的判決上所感到的那种群众压力現在不复存在了，他們当然不忙于改变这种对他們有利的局面。2年后他們使政府采取了付給議員薪金的制度（每年400鎊）。这个决定就其本身來說是一个进步的措施，但这样一来更加确定了工党議員对自由党政府的依附。

直到1913年通过了“工会法令”，允许工会在大会特别决议下可以设置政治基金（但反对者亦可“免除”这个义务）后，情况方有了一些好转。

这时保守党人渴望东山再起，以便实行他们的关税政策。于是他们利用在他们控制下的上议院来否决自由党的法案，想借此强迫政府解散议会重新改选。1909年劳合乔治提出土地税预算，并在莱姆豪斯及其他地方发表演说痛斥地主阶级进行反攻，意图扭转局势。上议院不顾宪法惯例，否决了劳合乔治的预算案，从而使这位一代枭雄得以提出“贵族对抗人民”的漂亮口号。在这口号下，他骗取了激进派和工人阶级的支援，使他们进行了一场与人民真正切身问题，与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运动无关的激烈斗争。

在限制上议院否决权的“1911年国会法令”未获通过之前，1910年的两次大选都在这个宪法问题上进行了斗争。通过这两次竞选运动，主要与自由党人合作的工党，在议会中获得了42个席位。但从30席增加到42席主要是由于矿工工会自由—工党的议员并入了工党。这种合并虽然巩固了工党在议会中的地位，但同时也增强了自由党在工党内部的势力^①。

这时议会中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势均力敌，所以工党和爱尔兰的议员的行动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工党领袖借口必须拉拢自由党人以防止保守党卷土重来，拒绝采取有力的独立政策。另一方面，自由党人也看出他们在社会立法方面无须做什么重大的让步。

这时期中最突出的事件要算是1911年针对工人健康和失业

^① 在1910年12月的大选中，工党的票数下降了。这只是以后45年中三次选票下降的第一次。而每次工党席位降落的原因都是由于它与资本家沆瀣一气。

問題的“全国保險法令”了。這項計劃的基金系依靠政府、僱主和工人三方面的捐助。但是僱主方面的捐助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揭穿了还是用穷人的錢来救济穷人。計劃的执行由政府委托給几个机构办理——互助会、保險公司和工会。自然，社会主义者和富于战斗性的工会活动家对这个計劃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可是工会領袖們却欢迎这个計劃，他們对政府这次对他們的垂青感到受寵若惊，他們把它看做是一个发展會員的机会。因此，議會工党最后也接受了这个法令。

1911年，还通过了其他两个社会改革的法令——严格規定礦內的安全措施和給予店員工人固定的用飯時間以及每星期半天的假日——从此社会改革的立法就停止了。

議會工党領袖的行为引起了社会主义者的憤怒和蔑視。麦克唐納在1911年独立工党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下議院的巨大功用在于把国内所宣傳的社会主义变成立法”的甜言蜜語的保证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代表們指出，虽然从独立工党成立以来，自由党—工党政策的尸体被埋葬了，但它的阴魂在新的工党中仍然不散。^①当时的独立工党議員乔治·兰斯伯雷說：他不止一次为他同伴的行为感到害羞，而想辞职拂袖而去。

“自由党总是用一些枝节問題在議會中糾纏，而工党的議員必須依附他們。每逢討論到群众穷困問題时，自由党和保守党人总是提出一些所謂‘重要’問題来引开話題，躲避討論。我坐在下議院里，眼前浮起了那些把我送到这里来的拥挤在鮑和布郎萊貧民窟里日夜操劳的男男女女的影子。他們为我工作，他們把我送到这里来，因为他們以为我不同于自由党人

^① 工党議員、当时英国社会党的黨員，魏尔·桑恩，曾在1913年工党大会上指出，40个工党議員中，仅仅有13个社会主义者。

和保守党人。他们送我到议会来，原为要我大胆地讨论贫困、贫困、贫困的问题……我号召你们在议会里组织一个坚决不向自由党和保守党人妥协的强大的政党。”

兰斯伯雷的这篇演说不断地被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但是麦克唐纳仍然维持住了他的领导地位。第二年，在独立工党大会上，经 F. W. 乔伊特和兰斯伯雷再三要求执行真正的独立政策后，只获得了工党领导方面口头上的让步。例如菲利普·斯诺登对乔伊特的坚决态度表示了他“斗争本能”的同情，但解释说，“常识、判断和经验”使他反对乔伊特的主张。

2. 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独立工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的那种情绪，只不过是正在工人群众中酝酿的愤怒反抗的一个征象而已。工人群众改善情况的愿望不断受到工党议会领袖妥协政策的挫折。现在他们进入了一个通过罢工来提高生活水平的伟大斗争的时代。

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四年中，工人们展开了从 1888—1891 年以来还未曾有过的如火如荼的罢工运动。码头工人使各港口陷入停顿；铁路工人使广大的内地运输网陷于瘫痪；100 万矿工全部离开了矿坑；其他如机器制造厂、纺织厂和建筑工地都卷入这场反抗的大风暴中。

金融资本家一本万利，人民生活水平却急剧下降（这是由于工资固定不变，生活费用不断上涨所造成的），这种尖锐的对照就是引起这个被正确的称为“大动荡时代”的骚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工人们所表现的昂扬斗志、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原因却要深远得多。他们和悲惨的生活进行斗争：贫穷、剥削、增加劳动强度、加班加点、雇主的蛮横、破烂的住屋，以及这个“40 岁就嫌

太老了”的世界的絕望。与这个运动同时（一部分是摻混在一起的）进行的，特别是在工人阶级领域内，就是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这不仅是为争取选举权，也为了要结束自古以来轻视妇女的观念。

工人们感到了他们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系来自工人阶级的日益成熟和团结一致。他们的目光从眼前的工资和工作时间问题，扩大到了他们参加管理生产的更重要的问题。像列宁当时所指出的，“如果说1911年铁路工人的罢工已经显示了英国工人的‘新精神’的话，那末煤矿工人的罢工简直可以说构成了一个时代。”（《1912年英国的工人运动》。《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9页。）

这些年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普遍发生工人群众反对工会领袖和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合作路线的事件。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富于斗争性的工人常常抛弃政治斗争的概念，幻想单凭大规模的强大的工会活动就可以使工人获得解放。对于许多激进工人，特别是在法国和美国，“政党活动”这个词已经变成一个污蔑性的字眼。

工团主义运动在积极组织广大群众进行斗争。它的最終日在于建立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里每个工会将负责管理自己的企业。工团主义的眼前目标是（按产业工会主义的方式）将工会组织简单化，集聚力量，准备进行一场猛烈的斗争。工团主义是这些年来与美国残酷而傲慢的雇主作着艰苦斗争的“世界产业工会”的理论。法国的“总工会”在1906年宣布，赞同举行一次剥夺雇主生产手段的总罢工，以建立一个以工会“为社会组织基础，作为生产和分配单位”的社会。

在英国，自1910年开始以来的这段时期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

遺產，工人團結起來了，鬥爭性加強了，力量壯大了。它最大的缺點在於工人階級這次規模巨大的進攻只採取了罷工的形式，換句話說，就是它缺乏一個能够在涉及人民生活各方面的政治、工會和思想領域中領導一次全面鬥爭的政黨。

獨立工黨和工黨的領袖們完全不能擔負這個任務，由於他們日益把全部精力貫注於議會的機會主義活動，他們的力量在不斷地遭到削弱。而社會民主黨里雖然有一些忠誠的富有鬥爭性的工人和積極的工會活動家，但是作為一個政黨它仍然嚴重地受着它傳統的宗派主義的限制。

這種宗派主義是根深蒂固的，一時不易消滅。1907年，在德國斯圖加特城舉行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際代表大會”上，社會民主同盟（正如列寧於同年9月在一篇反對孟什維克的論文中所特別指出的）投票擁護一項號召社會民主黨人和工會緊密合作的決議。在英國這首先意味着工黨內社會民主黨人與工黨黨員的合作。但我們知道，社會民主同盟的1908年大會拒絕了與工黨合併的建議，同時在國際社會主義局里，社會民主黨的代表於同年又反對接受工黨加入國際社會主義局。

社會民主黨反對獨立工黨的機會主義是對的。1903年4月，列寧著文支持這個鬥爭，認為這等於德國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與修正主義者的鬥爭，俄國布爾什維克反對孟什維克的鬥爭。（見列寧著《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列寧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頁。）但錯誤的在於在實際鬥爭中把工會里思想混亂的工人羣眾與工會中的機會主義的領袖不分皂白地混為一談，特別是當時的工會，像列寧在6個月以後發表的另一個文件里指出的，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儘管它們走得不敏捷、不徹底、不直接，但畢竟是在走向社會主義。”（《國際社會黨執行局會議》。《列寧

全集》第 15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11 頁。）

这种作风意味着把怀着满腔怨愤的广大的工会会员推向他们机会主义领袖们的怀抱里。这给了工团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一个额外的推动力——工团主义在英国企图不用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来达到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

如果认为 1908—1914 年的错误和 20 年前的错误一样，认为社会民主党每天的工作只是坐待社会主义宣传说服工人阶级那就错了。社会民主党在 1909 年 7 月 25 日召开的“粮食供应会议”就是工作比以往进步的一个证明。在这个会上他们讨论了未耕种的田亩问题，成立全国麦子贮藏机构，公用运输和销售组织问题，农田国有化以及成立农业工资局等问题，这些讨论是在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中进行的。出席会议的团体有苏格兰职工大会的议会委员会；码头工人工会、煤气工人工会、店员工会、家具制造业工会、全国印刷工人协会等 11 个工会；伦敦机器制造业工会和伦敦邮务工会等 16 个工会地方委员会和分会；10 个各业理事会，包括伦敦、格拉斯哥、南安普敦、考文垂和亚伯丁；6 个合作社团体，如皇家兵工厂（乌尔威治）、厄德蒙顿、波尔顿和布兰；8 个独立工党支部和 5 个工人代表委员会，以及 41 个社会民主党支部。会场上宣读 11 个各业理事会（利物浦、布拉德福德、斯托克波特和福尔刻尔克等）和 5 个合作社团体（乌尔佛罕普吞、奥哈姆和利物浦等）的贺信。一个能够召集像这样的会议的組織已不再是 80 年代孤立于广大群众之外的組織了。另外，1910 年弗雷德·尼发表在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也证明了它勇敢坚决的态度，在这篇文章中这位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伦敦排字工人协会著名的领导人）抨击了资本家报纸对非正式罢工的攻击。尼还批评了某些工会干部，这些工会干部打击工人，说他们不等

“集体谈判”就对雇主侵犯工人权利举行反抗。“若要教训任何人的话，那么首先应当予以教训的是叛离群众的工会领袖们，而不是不服从他们的群众。”（重刊于《工人月刊》，1950年6月号。）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些原因，工团主义暂时高涨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理论影响了许多工人团体，其中包括富于战斗性的腊斯金学院的学生，他们于1909年组成了“中央劳动学院”。在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和后来于1913年成立的“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支持下，中央劳动学院根据它对“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利益的矛盾性”的学说，竭力“武装工人们去宣传并保卫他们的阶级利益”。（比尔著《英国社会主义史》第2卷，第353页。）

腊斯金学院以前和现在的学生所组织的“平民联盟”在苏格兰、南威尔士和密德兰创办了许多学校。其中一个美国社会党的教师约翰·麦克累恩不久就成了克莱德赛德战时运动的领袖。

这一代最伟大的杰出的战士恐怕要数汤姆·曼恩了。曼恩在熟悉了世界各地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以后，于1910年又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他曾游历各国，在澳大利亚他看到了自由党政府的脆弱，在巴黎他研究了法国的工团主义。他游历归来后立刻投入英国工会建立新路线新组织的斗争。各团体的积极份子把这个使命带到自己的企业中去，曼恩在做新闻记者的盖·鲍曼的协助下出版了一套月刊性的小册子。以后经常有刊物出版，如《工团主义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在南威尔士非正式的改革运动中，出现了革命工会运动著名的文件《矿工的下一步骤》（1912年），这是由A. J. 库克帮助写成的。1910年秋季，200个工团主义代表集会于曼彻斯特，成立了“产业工团主义教育者联盟”。它主办的月刊《产业工团主义者》一直出版到第二年。1912年正月，鲍曼主编的《工团主义者》杂志第一期刊世了。

新运动經常強調巩固和簡單化当时的工会組織的必要性。

《产业工团主义者》第一期說，英国工会运动的

“致命伤就是在于（若不是仅仅在于）联合王国 1,100 个工会的地方性，完全缺乏工人階級團結一致的真正精神，結果工会运动者也就无法利用手里的工会組織有效地进行階級斗争。”

拿造船业來說，它的 24 个工会“从来没有能够对资本家采取联合行动”。曼恩和他的朋友相信

“不管这个时期的工会怎么反动，也必须把它们当作早晚使工人階級發揮自己作用的适当途徑，这是唯一明智的策略。所以我们必須避免参与任何以損害工会为目的的任何活动，相反的，我們要在工会內全心全力地工作，把它们推到正确的道路上去。”（曼恩著《从单一税到社会主义》，第 64 頁。）

从这里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在各个方面指导工人斗争的革命工人階級政党的概念是怎样消失的。事实上多数工团主义的著作都說明了这一点。

坚强而有效的工会組織是工团主义运动进入斗争的第二个阶段——控制企业生产——的首要条件。曼恩在 1911 年 4 月号《产业工团主义者》上写道：

“头等重要的是必須告訴工人群众，工人階級要想获得經濟解放，必須在車間、工厂、倉庫、矿山，在輪船、小船，在机器上以及一切工作中取得权力，然后慢慢控制生产工具直到在全世界的无产階級都組織起来，鏟除資本主义生产，这时候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南威尔士煤矿——《矿工的下一步骤》的出产地——这時間正发生“坎布里安联合企业”的大規模罢工运动。現在从它的政策說

明中摘出几条,来看一下它所采取的手段的本质。

“1. 取消过去把雇主与我們的利益結合起来的政策,而代以公开对垒的政策。

“13. 必須不断地为增加最低工資和縮短工时而进行斗争,直到我們取得雇主的全部利潤为止。

“14. 我們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組織,以便最終把煤矿生产管理权接收过来,使它为工人階级的利益服务。”

《矿工的下一步驟》这本小册子指出:每个工会領袖,作为一个工会領袖,“由于切身利害关系必然会阻止进步”(第8頁);“所有工会領袖,虽有滿腔好意,都墮落腐化了”(第13頁);“生产上的投票权对工人的幸福和生存的影响远比政治上的投票权为大”(第24頁);矿工工会不但要自己参加政治斗争,而且要联合所有其他的工会“为实现工人自己管理全部生产而斗争”(第19頁)。这几段文字和载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无数类似的話,表明工人群众对工党的机会主义作风和社会民主党不切实际的态度深感痛心,以致他們对一切政治組織都抱着冷漠甚至敌視的态度。

工人階级日益高漲的昂揚斗志,像我們在独立工党和“喇叭”会中看到的那樣,在各社会主义組織中引起了重要的反响。

甚至“費边社”也經受了一連串的危机;从小說家 H. G. 威尔斯到 G. D. H. 柯尔和“基尔特社会主义”^①的支持者,一个接着一个地起来反对韦伯夫妇和蕭伯納的旧領導。“費边社”的危机造成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第一是設立了“費边社研究部”,后来改为“劳工研究部”,这是一个一直具有与工会紧密合作和斗争傳統的組織。第二是在大学生中展开了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是由各大学內的費边分社在1914年大战前夕发动的(詩人魯帕特·布魯克是这方面的先驅者之一)。

工人运动中最重要政治发展是社会民主党把社会主义各党派糾合起来組成了一个联合社会党。在社会民主党的倡議下,于1911年在曼彻斯特召开了一个大会,出席的有独立工党各支部的41个代表,喇叭俱乐部的32个代表,社会民主党的86个代表,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代表委员会的48个代表,他們总共代表着35,000会员。在这个大会上,英国社会党诞生了。

这个新政党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宣布它将支援“一切保护工人生命和健康的措施和加强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它宣布它的方法是:

“用社会主义原则教育人民;尽可能地与工会组织紧密合作;团结全体工人以实现生产社会化”;而且要在“议会和地方机构中建立一个与所有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党派完全分开的富于战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英国社会党第一届年会报告》,1912年。)

英国社会党創立以后,“群众斗志显著高涨”。(T. A. 杰克逊著《喇叭独奏》,1958年,第96页。)这个党开始积极响应工会的斗争,在第一年中当铁路工人和矿工举行全国性罢工时,它所发出的

① “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是由许多中等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团体发展出来的,特别是在各大学中。他们企图将工团主义的观点套到英国议会政治制度上去,他们感觉要改变社会,单有工人运动是不会成功的。他们于1915年創立了一个“全国基尔特联盟”,作为宣传新思想的机构,事实上它却成了一个新的政党组织。全国基尔特联盟旨在以基尔特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基尔特社会中,各企业由本企业内的工会管理,在由工会或基尔特组成的议会之外,另有一个代表作为消费者的全国人民的第二议会。这个运动虽然思想混乱,却曾一度赢得许多工会积极活动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支持。有一些人经过这一阶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另外一些人如威廉·柏洛、伯特兰·罗素、R. H. 托尼、克利福德·艾伦、乔治·兰斯伯雷和 W. N. 尤尔后来都在不同的方面成了著名的反马克思主义者。

小册子就达 20 万份，在罢工期间还派遣演讲人员前赴矿区。在 1912 年第一届年会上，主席海德門在报告中着重指出社会主义者在近来罢工中的活动和他們“与工会組織的日常工作保持紧密接触（工会中有許多人是該党党员）”的重要性。他认为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合作，是这些罢工运动中最令人滿意的特色之一。大会通过了一项特殊的政策決議，保证英国社会党給予各工会以积极的支援，敦促一切有条件的党员都加入工会，并宣布組織沒有組織起来的工人“是党的明显的責任”。

第二年，1912—1913 年，英国社会党在运输工人的罢工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它的支部組織人們照料罢工工人的孩子（常常就用党的办公室做哺乳站），并在全国各地筹募基金。湯姆·曼恩因于 1912 年的矿工罢工中宣称自己支持向士兵呼吁不对工人开枪而被捕下獄。英国社会党积极参加了营救曼恩的运动。它还单枪匹马地进行了反对提高海运载貨吃水綫的斗争，提高吃水綫就是降低安全系数，这将造成“大量水手的死亡”。

虽然英国社会党内仍然存在着意見分歧——許多党员仍然主張將全副精力放在宣傳工作上，有的还反对妇女选举权，有的反对进行一切改善眼前工人状况的斗争运动——但从整个說来，这个党还是愈来愈积极地参加工人的罢工斗争。但这时发生了一个新的严重的問題，在社会主义政策的这个基本問題上引起了极端的分歧——也就是說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对帝国主义战争是支持还是坚决反对的問題。

1907 年以后，沙皇俄国和英法結成了联盟，同时日耳曼帝国企图染指摩洛哥，因此，这个时期国际局势經常处于紧张状态中。各国在惊人的速度上进行着軍备竞赛，在萊因河和北海两岸，战争叫囂愈来愈高。

很自然的，各国社会主义运动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1907年8月，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的国际大会全体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军国主义和战争是资产阶级的工具；社会民主党人有责任号召群众扑灭战争的威胁，但假如战争果真爆发，他们就应当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1910年8月和9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大会，和1912年11月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又重申了这项决议。

可是从1909年以后海德门却叫喊建立“强大海军”来回答德国的“威胁”和做好准备对德开战。他发表在《正义报》和《喇叭报》（布拉奇福德和他的意见一样）上的文章的精神是和国际社会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他遭到了提奥多·罗斯坦、约翰·麦克累恩等人的强烈反对。1911年5月在社会民主党于考文垂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许多支部的决议批驳了海德门的提案，于是（反对派的主要发言）泽达·卡恩（中央海克利）与整个执行委员会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者以47票对33票否决了反对派的决议。

英国社会党成立后，泽达·卡恩和康拉德·诺埃耳牧师于1912年被选入执行委员会，这个斗争又开始了。是年12月，执行委员会以一票的多数采纳了泽达·卡恩的提议宣布“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海陆军只是为了保护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益而建立的”，“对工人阶级来说德帝国主义也好，英帝国主义也好，都是一丘之貉，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英国社会党退出了要求增加海军预算的宣传——这对海德门是一个不客气的谴责。

因为海德门以辞职相恫吓，遂使这项决议拖延了三个月之久，但这个问题又在1913年5月党的布拉克普尔会议上提了出来。海德门被迫答应不再公开发表他的个人意见。会议除了9人表示异议外，一致通过了一个议决案，声明英国社会党，“是国际社会党

的一个组成部分，须受 1907 年斯图加特和 1912 年巴塞尔关于战争的决议的约束”，并表示要和法德两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执行反对军备的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各种形式的军国主义的滋生”。这次会议上，海德門未再当选主席，就是老执行委员会中也只有二人重新当选。

列宁曾于 1911 年对考文垂大会的决议提出谴责，指出英国社会民主党还从来没有这样“丢过脸”——“它的……宗派主义性质还从来没有暴露得这样明显。”（《英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59 页。）——现在终于获得了胜利。1913 年 5 月，他写到海德門的态度时说，“英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与这种卑鄙齷齪的行为妥协，同它进行激烈的斗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应当说这是他们的光荣。”海德門的失败是“对英国社会主义事业大有好处的事情”：“英国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起来坚决反对自己的领导机构的种种民族主义罪孽，那他们就会丧失同所谓‘独立工党’（即不依赖社会主义，而依赖自由主义）的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权利。”（《“英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77 页。）

海德門^①和拥护帝国主义的政策同时遭到失败固然有意义，而更有意义的是：它为以后不久在世界大战中更重要和更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斗争铺平了道路。

1913 年 7 月，在莱斯特的一次补缺选举中，工党的执行委员会突然拒绝批准地方工党支部所推荐的一名候选人。理由是莱斯特城只有两个议席，一个席位已为独立工党领袖同时亦为工党领袖的腊姆齐·麦克唐纳所占；而工党和独立工党领袖们与自由党人

^① 在奎尔奇死时，奎尔奇所代表的选区曾选举他，但 1914 年就下台了。

曾有默契在先，不爭夺另一席位。于是英国社会党提出了一名候选人，爱德华·哈特莱，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宣传家，又是布拉德福德城的顾问官。所有地方工党的代表除一人而外都支持他，可是工党议会党团的主要召集人在自由党报纸上发表了一则声明对他进行攻击。

这次在这个主要为工人阶级选区里的选举可使我們回忆起那些日子——自由党得了 10,863 票；保守党得 9,729 票；英国社会党得 2,580 票。列宁的评论是：

“各国觉悟的工人往往‘迁就’英国独立党人。这是一个大错误。独立党人背叛萊斯特的工人事业，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独立工党’全部机会主义政策的结果。一切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站到那些正在坚决反对英国‘独立’工党用自由主义来腐蚀工人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这一边。”（《揭露英国机会主义者》。《列宁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68 页。）

列宁于当年 9 月在一篇哀悼哈利·奎尔奇的文章中，再一次赞许英国社会党的新趋向，并表示相信该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相信它在经过许多弯路以后，不久一定会带来重大的收获。

“确实，脱离群众有时使英国社会民主党人沾染上一些宗派主义的习气。英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创立者海德門甚至滚进了沙文主义的泥坑。但是社会民主党反对他；同时在全英国只有英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数十年期间一直以马克思主义精神进行系统的宣传和鼓动。这是奎尔奇及其同志们的极其伟大的历史功绩。马克思主义者奎尔奇的活动的成果将会在最近几年的英国工人运动中充分表现出来。”（《哈利·奎尔奇》。《列宁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70—371

頁。)

1913年7月又发生了另一个重大事件，国际局在倫敦召集英国的社会主义团体开会，討論團結的問題。出席會議的有英国社会党、独立工党和費边社的代表。大会在国际局的代表埃米耳·范德維耳德和 C. 郝司曼的动議下采取一个双重政策，就是英国社会党應該并入工党，而独立工党則应归入英国社会党。代表們就并入工党和成立“联合社会主义理事会”取得了協議。

第二次會議在12月間举行，出席这次會議的有各国的許多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領袖，有比利时、俄国、法国、德国、奥国、阿根廷、美国和其他許多国家的代表和英国各組織的主要成員組成的代表团。

丹·欧文代表英国社会党发言。在一篇和解的演說中，基尔·哈第接受了英国社会党四項条款中的三条。即党應該有自由申述它的社会主义目的；承认階級斗争的存在；在議會內外支持工会和其他工人組織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关于英国社会党候选人必須站在社会主义者的立場上的第四項規定，三个組織的代表表示要向他們的組織提出要求，要求工党修改它的党章，使一个候选人能称自己是一个工党和社会主义党的候选人。他們还同意联合举行示威游行以促进社会主义政党的團結。

1914年春，英国社会党的复决投票表示大多数贊同并入工党，成立一个統一的社会主义政党。1914年6月，合并申請书已准备妥当，拟于下届工党集会时递交。但因为大战爆发，工党集会直至1916年才举行，会上一致通过接納英国社会党并入工党。但大战爆发后，費边社和独立工党却拒絕进行以前早已談妥的成立联合社会主义理事会的問題。

3. 罢工斗争

上述的社会主义政策和组织的演变，是以从海员和码头工人开始的大规模罢工斗争为背景的。

1910年，汤姆·曼恩和提累特组织了“运输工人工会全国联合会”。第二年曼恩应哈符洛克·威尔逊的邀请，帮助重行建立“水手和救火员工会”。运输工人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令人难以忍受，同时“国际航运协会”拒绝雇用加入工会的工人。1911年6月，当世界最大的邮船“奥林匹克”号光临南安普敦加煤时，加煤工人为了求改善情况而罢工，于是各港口的海员都宣布罢工。在不多几天内，海员们的全部要求如愿以偿。“国际航运协会”20年来第一次遭到了挫败。

随着这次干脆和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展开了一系列的坚决的罢工运动，特别是在伦敦和利物浦。汤姆·曼恩是利物浦运输工人联合罢工委员会的主席，罢工运动在海员罢工胜利后一直继续进行，未曾间断。成千工资菲薄的铁路工人坚决地举行罢工，迫使铁路工人工会执行委员们不得不支持这些自发性的运动。港口当局的总同盟歇业引起了运输工人总罢工。参加的达8万工人，他们在汤姆·曼恩领导下，遵守纪律，团结一致，完全控制了全城的运输。

政府企图采用强硬手段：两艘炮舰开到了麦尔西，内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又调来了7,000名军队和特别警察。警察在圣乔治大厅高地野蛮地向示威人群进攻。有一群人试图阻止一辆捕人的大篷车驶行，军队向群众射击，结果枪杀了2名工人。可是这种暴力全无效用；工人们著名的汤姆·曼恩领导下，被坚强的信心和激昂的情绪所鼓舞。“让丘吉尔放肆干吧，”曼恩说。“让他再调十

倍的军队到利物浦，占领每条街吧，即使出动英王所有的军队也不能使船出坞入海。”最后雇主和当局不得不面对现实，举行谈判，向工人让步。

在这个时候，伦敦港口由于工人罢工陷于停顿，像这样的示威运动从英雄的1889年以来还是第一次。码头工人要求把他们的“6辨士银币”改为8辨士，加班每小时为一先令，其他工种的港口工人还提出了许多别的要求。伦敦港务当局拒绝与工人谈判，在丘吉尔的建议下，陆军部加强伦敦的街防，并扬言要调25,000名军人来代替码头工人的工作，企图破坏罢工。但工人们不为威吓所动，相反地他们越加坚强起来。工人们每天在塔山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参加游行的工人多至10万人。有4天之久伦敦完全处于哈里·戈斯林、维尔·戈弗雷和本·提累特领导的罢工委员会的势力之下。伦敦港务当局和“航运协会”被迫让步，接受工人们的各种要求，同时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第二年，当格拉斯哥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时，伦敦方面又发生了劳资纠纷，因为雇主撕毁了前年的协定。由于缺少其他地区的支援，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不久，利物浦、曼彻斯特以及其他几个都市的自发性罢工引起了全国性的铁路工人罢工。铁路工人工会的领袖向雇主提出限24小时内答复的最后通牒，政府立刻站在雇主一边出面干涉，通知工会领袖政府将以武力阻止罢工。在铁路公司（而非市府当局）的要求下大批军队开到曼彻斯特和其他各处。在兰纳莱的示威游行中，两名工人牺牲了。群众愤慨达到了极点，虽然还不是全部工人都参加罢工，但20万铁路工人巨大的力量足以使政府让步。雇主被迫破例与工会进行谈判。在再度举行罢工的威胁下终于达成协议，并成立了调解委员会，允许工会代表担任书记，这是资方被迫承认工会的一个保全面子的办法。

矿工这时也动起来了。战斗的序曲是龙达河谷“坎布里安企业联盟”的10,000矿工的罢工，争端是为了矿坑内在艰苦地段工作的工人的报酬问题。矿主的傲慢无理激怒了工人，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在汤尼潘迪地方，首都的军警与罢工工人发生了冲突，在这个地区罢工运动在第二年整整继续了一年。

矿工联合会尽了一切努力，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就在艰苦地段工作的问题和最低工资问题达成协议，但毫无进展。1911年年底，矿工们就为争取实现最低工资——男工每班5先令，童工2先令——举行全国罢工的问题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445,800票对115,271票多数赞成罢工。1912年3月1日，100万矿工不论已入工会或未入工会的，一起离开矿坑停止工作。这是英国工业史上规模最大最全面的一次罢工。政府立刻再度让步，在议会中匆忙通过了一个“最低工资法令”，规定了地方工资最低额的尺度。但这个法令不符合矿工们的要求，他们要求规定一个全国性的最低工资额。可是在第二次投票中，赞成继续罢工的人不是多数，同时首相亲临会场要求工人复工，代表大会同意停止罢工。

这个汹涌澎湃的公开斗争时期的一个特征，是对兵士的著名的“不要开枪”的呼吁，因为当时政府经常用军队镇压大的罢工运动。1912年正月，《工团主义者》重印了“不要开枪”的呼吁，它原是一个利物浦建筑工人所写，登在康诺利的《爱尔兰工人》上的。它的内容如下：

“你们是工人阶级的儿子，我们为了改善我们的命运才进行罢工，你们的长官命令你们屠杀我们，不要听他们的，因为我们的命运也就是你们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命运。”

在阿尔德沙特军营里散发了这个传单的铁路工人弗雷德·克洛斯莱，被判处4个月徒刑，《工团主义者》的编辑被判9个月徒

刑，印刷該傳单的工人被判6个月徒刑。第二个月在矿工举行罢工的时候湯姆·曼恩对集中的軍隊宣讀了这个呼吁，声称他相信其中的每一句話。湯姆·曼恩在轰动一时的审判之后，亦被判处徒刑6个月。

上述这些不过是这个“偉大的动荡时代”的最重大的个别事例。一位当代的观察家称之为一种“普遍的反抗情緒”正在工人階級中蔓延，差不多影响了每一个工业部門，許多企业和地区的工会运动是在这些年中才真正发展起来的。1913年的“黑乡罢工”使最落后和最受压迫的地区之一的工人第一次組織起来了。在某些不景气的企业中的工人，例如德文和康尼緒两地的粘土工人，約克郡不熟练的毛織工人，以及密德兰新兴工业中的半熟练机器工人，第一次真正的懂得了工会的意义。

大批的工人参加了馬克思主义者在80年代末期建立的普通工人工会——碼頭工人和煤气工人工会，特别是湯姆·曼恩于1898年建立的工人联合会。当老的普通工人工会，特别是J. R. 克萊斯领导下的“煤气工人工会”已經轉向右傾以后，“工人联合会”仍然保持着战斗精神和它創辦人的领导風格，因此它就变成了落后和乡間地区前进的先鋒队（这个組織在1929年并入“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

工会組織在妇女、农业工人和小職員中有特別重要的新发展。

直到当时为止尚沒有組織起来的成衣店和食品工厂中的女工在瑪丽·麦克阿瑟领导下举行罢工并获得了胜利，她們全部加入了“全国女工联合会”。这方面最突出的要算1911年倫敦碼頭工人罢工时，伯尔蒙德賽女工的“起义”了。当时附近的果醬、胶状食物和腌菜工厂的女工如潮水般的来到街头呼喊和唱歌。15,000妇女共赴騷斯沃克公园开会，向本·提累特热烈欢呼。不到三个星

期，20家工厂中有18家雇主答应增加工资。重要的是这个工人阶级妇女新的斗争运动与左翼妇女参政运动联在了一起，这时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达到了顶点。佩锡克—劳伦斯、基尔·哈第、乔治·兰斯伯雷（他为这事进了监狱）和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她也离开了她中等阶级选举运动的领袖的母亲和姐姐，而参加了伦敦东市的工人队伍）都很了解把这两个运动结合起来的重要性。

自从70年代约瑟夫·阿奇可歌可泣的英雄日子以后，农业工人中的组织是比较弱的。1889年以后，成立了一些临时的组织，1898—1900年又出现了小规模工会。现在有了建立一个强大工会的基础。1906年在自由—工党胜利之后，在农业工人运动的老根据地诺福克，乔治·爱德华兹（他的一个老战友称他是一个“循循善诱的导师”）决定重行组织老工会。这是一个艰难困苦的战斗。工人举行了罢工，但失败了。在罢工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他们的忠实朋友不是他们一向信赖的自由党领袖而是社会主义者。因此在“大动荡时代”，好几个社会主义者做了工会领袖。同时，“工人联合会”也开始在农场中组织起来，主要是在约克郡和赫尔福德郡，后期则主要是在西乡——威尔特郡及其附近的地方。1913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力量“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它急速发展着。在许多农村中，当地的铁路工人脱离了乡绅和牧师的势力，变成乡村工人非正式的工会组织者。从1912年起罢工开始了，虽有几次规模较大，但大都限于地方性的事件。工人也常常获得胜利。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爱德华兹创立的“全国农业工人工会”已发展到360个分会，拥有15,000会员。同时“工人联合会”也很强大，每星期都有工人争先恐后的要求入会。大战后不景气时期，各工会均受到严重的打击，但过了这个时期，它们便稳定下来了。

最后,在这个“偉大的大动蕩时代”在所謂“白領”工人中也出现了工会組織,为日后的“文官職員协会”打下了基础。

1913年最偉大的战斗发生于都柏林,8万工人在詹姆斯·拉金和詹姆斯·康諾利领导下和当局的威吓和警察的恐怖手段(两名罢工工人被打死,400人受伤)进行斗争,击败了他們粉碎“爱尔兰运输及普通工人工会”的企图。这个工会是拉金于1908年在帮助格雷逊贏得科倫河谷的議席后不久建立的。1910年康諾利也担任了这个工会的领导工作,康諾利冷靜的判断和理論知識对拉金口若悬河的辯才和执拗脾气具有重要的平衡作用。他們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引起了雇主們的恐惧,他們也在“都柏林電車公司”主席、爱尔兰大資本家威廉·墨菲下团结起来与工人对抗。

1913年9月,許多在墨菲控制下的工厂中的工人接到通知,要他們脱离工会,否則将被开除。他們拒絕了,于是大規模的雇主歇业和工人罢工开始了。全国的工会运动者都對他們抱着强烈的同情。合作运动派遣一艘粮船到都柏林便是这种同情的最明显的表現,此外铁路工人还举行了同情罢工。基尔·哈第宣称,除非对工会的威胁在都柏林被击退,否則他們也将在英国展开斗争。

在激烈的斗争中,幻想破灭了,新的思想开始生长发育。“矿工联合会”的主席罗伯特·斯迈利在“职工大会”的讲话露出了一縷新希望。他說:“假如有人采取了像在都柏林和其他地方的那种行动,逼迫我們进行革命的話,那么我說,不論合法与否,我們有責任訓練我們的人实行自卫……当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問題的时候,大工会有責任就全体工人举行罢工的問題进行討論。”

但并不是所有英国工会运动的領袖們都有积极的群众那种慷慨无私的热情,例如曾由于大力宣揚中等階級激进的經济学理論而获得了“英国的罗伯斯庇尔”这个可怕的称号的菲利普·斯諾登

却在这个时候宣布罢工将使工人“道德堕落”。其他如码头工会的詹姆斯·塞克斯顿、海员工会的哈符洛克·威尔逊和“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J. H. 托马斯都积极阻挠工会声援都柏林的工人。

罢工工人最后因饥饿而被迫复工。不过他们的斗争不是毫无收获的。在雇主闭厂歇业期间的公开调查暴露了雇主的残酷和都柏林工人居住条件的恶劣。同时，爱尔兰民族主义议会党团和资本家的关系也被暴露无遗。而对未来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罢工斗争中工人为了自卫和保护家属免受警察的残酷蹂躏，组成了打着“犁和星”的旗帜的“爱尔兰市民军”。在1916年复活节起义中，这支军队成了康诺利手中的主力军。

上边所述的这些斗争，仅不过是大战前夕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的罢工运动中突出的单个事件而已。《每日先驱报》上刊登的“罢工，把罢工进行到底”的口号充分表现了这个时期的精神。该报是伦敦排字工人在1911年罢工时创办的。第二年，前社会民主同盟的《鲍与布朗莱工人报》的乔治·兰斯伯雷担任了该报的编辑，而开始了它的政治经历。“等到秋天来临”是1914年夏季挂在每一个人咀上的话，用韦伯夫妇的话来说，“英国工会运动当时正在酝酿一个巨大的革命性的工潮”。但大战爆发后，罢工的浪潮便消逝了。

我们将怎样估价这个工人阶级热烈斗争的时期呢？工团主义的理論虽然鼓舞了这个时期富于斗争性的群众领袖，可是除少数地区外，它在工人阶级中并没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可是除了剥夺资本家生产手段的总罢工的基本概念外，工团主义派所提出的其他想法——如百分之百的工会活动、同情罢工和进取的工会政策——和它对当时工会组织缺点的批评，都引起了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注意。每当他们的力量增长时，整个运动在人数、力量和信

心方面都有加强。在这个短短四年里，工会会员从不到250万增加到400万。进展最大的是运输工会，它拥有50万会员。他们举行了最艰难、规模最大的斗争。

由于新思想的传播和积极参加斗争，工会组织在这个时期内发生了若干重要变化：最大的发展是1913年“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成立，该会系由“混合铁路雇工协会”（最大的铁路工人组织，拥有会员132,000人）、“普通铁路工人工会”（拥有会员20,000人）和“转辙及信号工人联合工会”合并组成的。可是“铁路职员协会”与“司机和加煤工人联合协会”都没有参加。新工会采取了新的政策，宣布凡一切受雇于铁路的工人均可参加这个新组织，这引起许多技术工人的反对，尤其在铁路工厂中。新工会的形成使会员人数在18个月中增加了一倍，达到30万人。新工会的章程将大权集中在执行委员会的手中。

这种改革精神也激动了“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工人群众，经过复杂的内部斗争之后他们也于1912年决定修改工会章程，使不熟练工人也能参加工会。虽然，旧规定于三年后就废除了，但一直等到1920年，该企业中的大部分团体才参加进来组成了由汤姆·曼恩任书记的“混合机器工人工会”。

在建筑业里，改革运动虽然在工会基层群众中的声势很大很坚决，可是由于上层领导的反对和传统的行业忌妒，大大地受到阻碍。1912年投票结果群众赞成合并，但未见之于实行。两年以后，产业工会主义者放棄了坚持改革旧工会而不愿重起炉灶的政策，另外成立了“建筑工人产业工会”。但它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成就，这一部分也是由于1914年爆发了世界大战的缘故。

改革中的一个重大收获，是“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和“运输工人联合会”（这是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工会

于1910年合并而成的)建立了三角联盟。这个组织间(这几个组织在这个时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斗争)互助的盟约是由矿工领袖提出而为大家同意签订的。

在这个暴风雨的年代里,经过不断的活动和多方面的斗争,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人数上,而且也表现在组织和协作方面。工人的眼睛被打开了,使他们看清了阶级社会的实质。就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吧,大战前夕,托利党地主和陆军军官在库拉阴谋叛乱,决心要阻止“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实现。结果他们反倒无事,而呼吁他们不要开枪的工人却被送进了监狱。这件事教育了工人群众。同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是这样,尽管过去有许多错误和偏见,群众日益感到需要有一个思想纯洁,但善于在实际斗争中团结一切受资本主义压迫和威胁的人共同进行斗争的革命政党。

第九章

帝国主义战争

1. 战争的性质

1914年夏天隆隆的炮声，标志着人类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几十年来的国际紧张局势现在终于破裂了，几十年来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在各“先进国家”中渐渐取得统治地位，像饿虎一样地寻觅新的市场和原料资源。正如列宁指示的，从1876年到1914年，六“大国”（英、俄、法、德、日和美国）一直在争夺一块比欧洲面积大出二倍半的土地，在这个时代的末期它们奴役着500多万殖民地人民。他说，实际上“几百个亿万富豪和百万富豪便直接掌握了整个世界的命运”。（《给布哈林的小册子〈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写的序言》。《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5页。）像这样的巨大扩张，势必要引起冲突。既然世界上的土地已经分配完毕，现在就要按照这些竞争者的改变了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重新分赃。

1914年两大强国集团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边的主要角色是老牌帝国主义者英国和法国加上沙皇俄国；另一边为德、奥两个帝国。德国现在已是羽毛丰满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了。但因她发展较晚，在掠夺殖民地的竞赛上远远的落在别人后面，因此她计划抢夺英法的殖民地，并从帝俄手里夺取波兰、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诸省。俄国自90年代以来一直得到法国借款的支持，

1905年革命后,英国和比利时都又对它进行贷款和投资,故而现在也雄心勃勃,想瓜分土耳其和侵占奥国的属地。英国打算粉碎德国,借以除去这个在经济上威胁它的劲敌,并在中东捞上一把。法国则虎视眈眈地注视着煤钢中心萨尔和亚尔萨斯-洛林。

可是当冲突最后爆发时,战争的口实却和上述这些真正目的无关。与被正确地称为“人民的监狱”的沙皇俄国结成同盟的英国,自称是为了保护“勇敢的小国”比利时才参战的。德国的参谋本部早已制订了周密的进攻计划,可是他们对人民说,他们的战争是为了防卫“野蛮的俄国”的侵略和为了“解放”波兰。法国人民听到的是他们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反对可鄙的“德国鬼子”。俄国政府则告诉俄国人,他们的参战只是为了防御军国主义的普鲁士。

在战争的初期,各国人民大部分都受了这些和类似宣传的欺骗。在最后双方精疲力竭,各国工人阶级和士兵革命情绪的高涨为世界带来和平,摧毁德、奥、俄帝国以前,欧洲有1,000万青年男子(其中光是英国就有100万人)牺牲在欧洲和中东的战场上。

欧洲社会主义的领袖们早已预见到这次灾难的轮廓。我们知道1912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二国际重申了5年前斯图加特大会的决议。但对大多数的社会主义领袖们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虔诚的希望,和“实际”的政治斗争没有什么关系。不久,除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其他国家少数团体和卓越的个别人士外,社会主义领袖们不是投降了,就是被排外侵略主义的浪潮冲走了,他们纷纷支持本国统治阶级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2. 英国工人与战争

战时的考验,很快就暴露了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脆弱和分裂。

同时在一定时期之后，也显示了工人群众的无比忠诚和巨大力量。因此，大战之后工人运动比 1914 年更加壮大，政治觉悟也更加提高了。

支持“第二国际”决议的社会主义者所领导的反战运动，为时很短而且毫无效果。8 月 1 日奥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后，基尔·哈第和亚瑟·汉德逊代表国际社会主义局“英国支部”发表了一项宣言，号召“在各大工业城市举行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反对战争”。并且作了如下热情的呼吁：

“统治者和他们的报纸迫切希望使你们和俄国的专制主义合作，我们要迫使他们沉默，强迫他们尊重绝大多数人民的意见，人民不愿意参加或被牵入这个不名誉的战争。在今天，俄国的胜利将给世界带来灾难……工人们！大家团结起来，争取和平！团结起来，一劳永逸地打倒军国主义敌人和自私自利的帝国主义者……打倒阶级统治！打倒暴力统治！反对战争！拥护人民的和平统治！”（艾伦·赫特著《最后的危机》，1935 年版，第 220 页。）

第二日，汉德逊、哈第、兰斯伯雷、桑恩和其他几个领袖对聚集在特法拉加广场上的群众发表了演说，并且通过了一项决议：

“我们拥护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号召各国工人阻止他们政府投入战争……大不列颠政府应严正地拒绝参加战争，并应该尽速努力恢复世界和平。”

8 月 5 日，即英国对德宣战的第二天，工人组织就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可是会议所通过的一连串决议，只是关于如何准备采取措施以“减轻”战争将给工人阶级带来的贫困的问题的。为此目的还成立了“全国工人战时紧急委员会”。工党执行委员会还忠告全国工会机构集中力量商讨救济办法。这样情势开始急转直下，不

到几个星期工会領袖就完全和政府携手合作了！8月8日，麦克唐納宣布：“無論我們对战争起源看法如何，我們必須参战。”一年一度的全国职工大会被延期了，事实上以后再也没有召开过。8月24日，工会和議會領袖宣布“停止罢工斗争”。隔了五天，工党执行委员会批准工党議員关于参加“各党派”征募新兵运动的決議；汉德逊与首相和在野党的領袖一同担任了議會征兵委员会的主席。三星期后，英国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在海德門思想的影响下，对军队发表了一个支持征兵的声明。声明說：“本党当然希望看到这次战争迅速而胜利地結束”。

这样，在力量和政治觉悟方面有了迅速发展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暂时陷入紊乱状态。工会領袖們一时都放棄了国际的決議而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浪潮。千千万万的工人紛紛应征入伍。正如威廉·加拉赫所說，他們受了战争的“可怕的誘惑”——“疯狂的兴奋，对冒险生涯的幻想，对工人单调死板的生活的逃避。”（加拉赫著《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風暴》，1936年版，第18頁。）所以，在当时工人运动就没有一个独立的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因为工人运动的官方机构（没有它們的协助，战争是不可能繼續下去的）都支持統治阶级的战争政策。韦伯夫妇在《工会史》一书中說：“如果当时有組織的劳工反对战争的話，可以肯定地讲，政府就无法动员全国力量参加战争。”（第692頁）

于是从社会主义和工会机构的群众中，开始慢慢出現一批新的独立的領袖人物。我們已經注意到独立工党中强大的和平主义情緒，这种傾向在富于战斗性的工人阶级党员中常常能变成一股反对战争的坚强的政治力量。更重要的是英国社会党党员的态度：在一个短时期中大家对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感到非常沮丧。但从一开始就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站在政治立場上反对战争，这批人

不久就变成了多数。1914年9月的征兵声明“惹起了全党的骚动”（李与阿契波尔德著《英国的社会民主》，1936年版，第18页。），基层组织的决议，拥护的以及反对的，大批地涌进了社会党的总部。在批评以海德门为首的主战派的人里有H. W. 英克品，他说：“这是一场资本家的战争，因为这个战争是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掠夺倾销剩余产品的市场而引起矛盾，和围绕这些矛盾所奉行的军事和外交政策的结果。”（同上书，第230页。）提奥多·罗斯坦退出了社会党，抗议党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同时他立刻开始团结坚决的党员，积极进行反战斗争。和H. W. 英克品一样进行斗争的还有他的兄弟艾伯特·英克品（英国社会党总书记，后为共产党总书记）、乔·芬伯格和E. C. 费尔柴尔德。

这样，英国社会党赞成战争的多数领袖与党员群众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些党员从事地方支部的活动，他们的力量和思想认识在复兴的群众运动中提高了。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领导上仍坚持着它的路线。1915年2月，协约国社会主义组织在伦敦召开会议，英国社会党、独立工党、费边社和工党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宣布，它没有忽略“欧洲大战的深远原因，看出这种冲突是使资本主义社会分崩离析的矛盾的产物，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可怕的结果。但同时也注意到，德意志帝国主义的胜利将意味着欧洲民主的失败和毁灭。”于是，成立了“全国社会主义防卫委员会”，后改为“英国工人防卫联盟”。意味深长的是，这个组织后来竟变成一个强烈的反社会主义机构。

这二个趋势现在变得更清楚了，反战派在英国社会党里获得了多数。1915年春季全国会议休会，举行地方会议，爱丁堡分会提出的对执行委员会的信任投票，以78票对70票未予通过。中央海克利谴责征兵运动决议案，以59票对56票获得了通过。可是

在另一方面，一个撤销征兵声明的动议却以 67 票对 57 票遭到否决。群众的意见仍不一致，但主战派领导集团的势力在逐渐衰退。早在 1915 年 12 月，执行委员会根据各支部的意见以 5 票对 4 票通过了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的决议（该委员会是由澤默尔瓦尔德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建立的），这个决议遭到全体主战派的反对，但各支部以绝大多数通过了这项决议案。老一辈领袖的最后被击败是第二年国内外群众运动复兴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在下面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3. 群众运动和镇压

停止罢工和各党参加征兵运动，虽然曾经一度使工人阶级运动陷于混乱和停顿，却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体系的实质。过去引起“大动荡时代”的工人阶级的穷困和遭受压榨的情况现在因为战争的关系变得更为严重了。耗资巨大的西线战事需要千百万人去参加。英国政府不断地要求更多更多的军火；这次战争被正确的描写为“第一次工程技术人员的战争”。人力的缺乏和生产的增加引起了资本家变本加厉的剥削和女工及非技术工人的招募，从而使大规模生产中发生的问题更形尖锐化。不独军火制造商对此感到兴趣，整个资本家阶级都想利用战时情况，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解除工会的武装，使工人阶级无保障地听任无限制的剥削。战争是一个大有油水的买卖。各个部门由于物资缺乏均利市百倍。粮食和衣服的价格上涨了，同时因为工业城市人口增加房租也在升高。少数部门中工人的工资也确实很高，不过随着战争的进行，工资追不上物价，结果工人阶级广泛地生活艰难。但对资本家那一方面来说，战争却是一本万利。据估计他们在战争中获得了将近 40 亿英镑的利润。

当工人们发觉他们的爱国主义被利用为私人谋利，发觉资本家利用战争环境来摧毁工会力量，把兵役和劳役加在工人阶级的头上时，新的工潮开始了。这次运动当然是由下层组织领导的，因为工会的官方机构正与雇主们和政府紧密合作，1915年5月工党甚至参加了内阁。（这种亲密的合作使韦伯夫妇把战时说成是“工会组织的官方代表的社会和政治立场发生急剧转变”的时期，工会组织现在已被看作是“国家社会机器的一部分了”〔《工会史》，第635页〕。）

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最初并不是在全国规模，而是在地方上，围绕着不同的团体和个人进行改革和扩大力量的。最著名的地区，是克莱德赛德。英国社会党、独立工党和社会主义工党曾经在这里进行过许多年紧张的反战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1914年8月后，当“大动荡”在全国许多地方已经烟消云散的时候，唯独在这个地方依旧方兴未艾。真正的群众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使广大群众有了政治觉悟，所以能够抵抗排外侵略主义的浪潮。

站在这个斗争的前列的是英国社会党的约翰·麦克累恩。他是个不屈不挠的战士。“他的整个生命都是在革命的社会主义斗争中渡过的。每天夜晚，他不是街头就是在会堂里。到了夏天学校长期放假的时候，他更是活跃……他走遍了整个苏格兰，号召工人起来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这个中等身材体格结实的人有着无穷的精力，他永远不停地在奋斗，向着他的目标奋斗——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共和国。”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苏格兰劳工学院创办人，他把马克思主义传给了千千万万年青工人。“当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精神抖擞，浑身是劲，比以前更活跃了。……他对将人类推向毁灭深渊的资产阶级恨之入骨，他奔走于格拉斯哥街头，煽起工人们反对战争，反对战

爭制造者的怒火。”(加拉赫著《克萊德河上的反抗風暴》，第20頁。)

克萊德賽德群情鼎沸，人心激昂，工厂里售卖书刊、組織討論会，群众参加学习，举行露天大会和游行示威(第一个反对战争的群众大会就是在1914年8月9日在格拉斯哥草場上举行的)。富于斗争性的領袖从各方面涌现出来，如英国社会党的麦克累恩和威廉·加拉赫，一群和他們党里頑固的宗派主义决裂了的社会主义工党的党员(其中有日后担任共产党的主席才华卓絕的亚瑟·麦克馬納斯)，敏感而喜欢沉思的J. W. 繆尔，为人慷慨但比較个人英雄主义的大卫·柯克伍德(他这时正准备脱离社会主义工党，加入独立工党)。加拉赫說，到11月里，“反对战争、反对提高物价和房租，以及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如火如荼。家庭主妇以及工厂工人都卷入了政治斗争”。麦克累恩所办的研究班源源不絕的供給宣傳材料，在这次斗争中占着重要的地位。麦克累恩从来不“空談理論”，他总是把馬克思知識应用到周圍的事物上去。

他“彻底地揭露了站在战争背后的殘暴的强盜力量”，“他举出一个又一个例子，說明金融巨头和大制造商如何利用战争向政府勒索利潤，某些厂商如何把战争物資卖给中立国，而明明知道他們是要轉卖给德国的。这些例子会同日用品和房租的漲价，一天天的灌入工厂工人的脑子里。‘前綫的青年’在为了人家的利潤遭受屠杀，在前方屠杀工人的劊子手又被利用来在后方对工人加紧剝削。現在，在克萊德工人的心目中反对雇主、反对‘发战争財者’和反对‘抬高租金者’的斗争的重要性开始超过了‘反对德国’的斗争。”(加拉赫著《克萊德河上的反抗風暴》，第38頁。)

第一个主要的发展，是由机器工人在战前提出的每小时增加工資2辨士的要求而引起的。雇主利用工会领导的奴顏婢膝，对

这项要求一再延宕。这种情况延迟到1915年2月，由于发生了新的事件（“魏尔公司”付给美国工人以较高的工资），于是一触即发。車間代表决定立即采取罢工行动，克萊德各机器工厂工人馬上广泛而热烈地响应了这个决定，8个最重要的工厂举行了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9,000人。

各工厂車間代表組織了一个“中央劳工撤退委员会”来指揮整个运动。工人于罢工开始前四天以8,927票对829票否决了“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执行委员会”每小时增加3个法寻^①的提議，这件事說明了工人对这个新机构的支持。可是在工会領袖、政府和对工人发动的战争歇斯底里运动的联合压力下，罢工工人被迫让步。然而他們的士气和团结并没有受到損害，他們在政府威胁要举行强迫仲裁的最后通牒的3天限期期满后，全体工人一齐复工，紀律謹严。这次爭端由政府仲裁，决定每小时增加工資一辨士，計件工資增加10%。

虽然克萊德的罢工是截至当时为止最突出的一次，但它仅仅是1914年冬季大規模罢工运动复兴的一个朕兆。事情很清楚地摆在面前，政府不能再仅仅依靠工会領袖們的“善意”了，他們的威信已經成問題了。早在1915年，政府曾召集工会領袖在財政部开了一个会，签署了一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工会要放棄罢工权，放棄軍用品生产額习惯上的限制，和同意在生产政府訂貨中，雇用不熟练工人。政府为了使对方接受这种严重危害工会地位的协定，曾答应了不少条件，但后来一条也未見实施：例如規定該协定仅适用于軍用物資生产，它只限于战争时期內有效，不熟练工人的应用应有一定比例，利潤应有限制。

^① 法寻(Fardhing)系英国货币的頂小单位，一法寻等于一辨士(Penny)的四分之一。——譯者

工会虽然作出了这许多重大让步，政府仍不满足，夏天，政府采取了强制手段。军需部成立了，并匆忙的通过了“战时军需品生产法令”，使“财政部协定”的条文变为国家法律，由各地方的“军需裁判所”执行。并规定今后军火制造工人没有从雇主方面取得“离职证明信”之前不得擅离职守调换工作。

但政府的压力不能遏止正在工人群众中迅速滋长的不满情绪。果然，当政府第一次准备执行它的权力时，就不得不立刻退了回来。在煤矿企业中旧契约即将失效，虽然在大部分地区经过折衷让步后新契约已经达成，但在南威尔士 20 万矿工却不管政府通过的法令举行了罢工。军需大臣劳合乔治不得不匆匆地赶往矿区接受工人大部分的要求而达成协议。

南威尔士的榜样，其他地区没有立刻效法。可是它发生了作用，雇主和政府的态度比以前缓和慎重了，他们正确地看到这是旧工会领袖可能对工人失去控制的一个警告。这样的担心是有确实根据的，在全国的工厂、车间和造船厂富于斗争性的群众领导正在成长，虽然它还缺乏全国性的协作。

工人决心保卫工会地位，最典型的例子要算 1915 年 9 月南安普敦锅炉制造工人的罢工。哈里·波立特在这里取得了他早期的斗争经验。新建立的重要的飞机制造工业从战争一开始就在工会与车间组织的联合领导下发动了一个强大的斗争。各工会一同建立了“全国飞机制造业木工委员会”，这个组织后来在 1917 年 11 月曾迫使军需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让步。

同时，克莱德从二月罢工结束后，“中央劳工撤退委员会”仍旧异常活跃，它变成了一个永久性的机构，称为“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由威廉·加拉赫担任主席，J. M. 梅赛任秘书。虽然它并不是一个政党，其中却有許多政治觉悟很高的工人，它积极地领导过含

有直接政治意义的运动：特别是反对战时军需品生产法令和房租限制法令的斗争。

这个委员会表示了克莱德工人无比的愤怒，它指责工会领袖们对政府军需品生产法令的支持就是对“工人阶级最卑鄙的背叛”。这个委员会所宣布的目标不独是对军需品生产法令的直接挑战，而且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直接挑战。该委员会自称它的目的是：

“日益取得对工厂的控制权，修改雇佣工人的条件，在阶级基础上组织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直到工资制废除，工人获得自由和建立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为止。”

工人们特别反对“离职证明信”，厂方可以利用它来对工人进行诽谤，可是没有它工人又不能离开他的工作岗位。1915年8月，弗阿菲尔德造船厂开除了两名工人，厂方在他们的“离职证明”上写着“懒惰”字样，于是船厂工人起而罢工，整个克莱德群情激愤，濒于停工的边缘。

这个法令中另一个容易引起人们反对的是关于雇用非熟练工人的一项。委员会承认它是一个“促进生产发展”的直接措施，增加劳动力的流动量，有利于增加生产。但委员会认为“这个雇用非熟练工人的计划必须置于工人的控制下……除非答应这个要求，不然，他们将斗争到死”。

同时，该委员会又大力支持了反对增加房租的运动，这个运动获得了群众广泛的热烈响应。

“在戈文地区，巴波尔夫人，一个地道的工人家庭主妇，变成了这个运动的领袖，像这种事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街头集会、后院集会、敲鼓、打钟、吹喇叭——她们用尽各种方法招唤妇女出来并组织她们进行斗争。她们印了几千张传单，

贴在窗子上，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见。一条街接着一条街，很少窗户上没有：‘绝不付增加的房租！’”当官吏要来撵人搬家时，巴波尔夫人一行人能够在‘执行官吏还在一英里以外时就得到了风声’，她们立刻把正在洗衣和煮饭的妇女召集起来，在这位官吏和他的手下人尚未到达预定的地点之前，“这一群怒气冲天的娘子军就在半路上截住他们，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落荒而逃。”（加拉赫著《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第53页。）

当18个军火制造工人因未付增加的房租受到法院传讯时，这场斗争达到了紧要关头。差不多有1万机械工人和船厂工人离开他们的工作，列队来到法院。同时他们拍了一个电报给政府，说除非当局采取措施，否则将继续罢工。法院最后将这个案子撤销了，同时议会赶忙通过了房租限制法令。

克莱德工人终于赢得了这场辉煌的胜利，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更大的威胁——战时军火法案——的斗争。当劳合乔治偕同工党在内阁中主要的代表亚瑟·汉德逊访问克莱德时，他企图以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车间代表，谁知道代表们对他的演讲报以嘲弄揶揄的诘难，喊倒好和高唱《红旗》歌。集会就这样在混乱中结束。

政府于是放弃了和平劝服的企图，双方形成了激烈的拉锯战。格拉斯哥的《前进报》由于刊载了劳合乔治在车间代表面前受到屈辱的真实情况而遭到封闭，但是罢工的威胁迫使政府撤销了这个决定。“生产委员会”拒绝了每小时增加2辨士的建议。

麦克累恩始终不懈地从事旋风般的运动，抗议新的征兵威胁，终于以叛乱罪遭到逮捕。当时征兵已引起全国的反对，即使一向很顺服的地区这次也加入斗争。麦克累恩提出了义正辞严的辩护，结果仍不免被判处3年徒刑。独立工党领袖詹姆斯·麦克斯

頓亦被拘禁。克萊德工人委员会机关报《工人》被查封，編輯繆尔和委员会主席加拉赫各被判处徒刑 12 个月，印刷人瓦尔特·貝尔 3 个月。

雇主們的再次进攻惹起了新的風暴。厂方通知帕克海特一福祺的車間代表會議主席柯克伍德，在工作时除了自己的部門以外不准拜訪其他部門車間。克萊德机器工人再度在工人委员会领导下举行了总罢工。但包括麦克馬納斯、梅塞和柯克伍德等 8 个領袖在他們的床上被逮捕了，并被押解出境。运动失去了領袖，工人們虽然很憤慨，但因群龙无首，不得不接受劝告而复工。

这次克萊德賽德运动受到的打击是严重的，可是工人的动荡現已扩大到全国范围，政府进一步的措施引起工人們的不滿，其他各大工业中心如倫敦和設斐尔德均效法克萊德的榜样，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征兵于 1916 年春季开始实行，接着免除兵役的条件也經過了修改，非熟练工人的雇用扩大到私人企业，按照劳动成績付給工資的办法也广泛采用了。政府用“征召入伍”来恐嚇积极的工人，或将他們根本拔除——当时大家把軍役委员会戏謔地称之为“清洗委员会”。这种种倒行逆施引起工人憤怒的抗議，設菲尔德事件即是一例，在那里工人罢工的威胁加上巴罗地方工人的支援，迫使軍役委员会将一个熟练装配器械工人釋放回来。

征兵也引起了那些在“志願”基础上支持战争的劳工运动組織中的人的不滿。独立工党中有很多和平主义者和在良心上反对战争的人(其中有不少人是“反征兵友誼会”的支持者)，現在他們遭到了打击：差不多有 9,000 人受到軍法处的傳訊，約有 5,000 人被投入監獄或去做苦工。

政府的鎮压伸展到各个方面，人民的憤恨日甚一日。便衣警察和密探布满了工厂和其他地方。有一次，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

因所謂陰謀毒害勞合喬治和亞瑟·漢德遜罪判處了長期徒刑，這個案子就是這些吃黑飯的人的一個傑作。根據“國防法令”，樞密院可以將任何政府所不喜歡的事列為罪行。凡認真討論戰爭原因者，進行和平主義宣傳者，甚至一句不留意的閑話都要課以很重的罰金。警察擅入民房更是司空見慣的現象。私藏反對征兵的舊傳單的人也會受到控告。警察常常光臨娛樂場所，凡拿不出身份證的人就要被帶到警察局里去。書籍和小冊子被沒收了，戲劇禁演了，報紙被停止發行或封閉。警察禁止集會，人民無權申訴。

鎮壓非但未能撲滅這些騷動，反而使情況更加嚴重了，不僅使工人更加團結一致，甚至使具有各種不同觀點的但反對戰爭的人團結起來，進行鬥爭，如支持獨立工黨和《每日先驅報》的和平主義者、英國社會黨的革命社會主義者，以及忠實的自由黨人如E.D.莫雷耳和他的“民主管理聯盟”（這個組織搜集材料，報道了有關戰爭的事實，以揭露偏見和軍國主義的宣傳）。

1916年取得某些各不相同但互相關連的極其重要的發展。

在工業戰線上，1916年為全國性群眾運動奠定了基礎。這就是“全國車間代表和工人委員會運動”。

“組織單位為車間委員會，委員會系由各個車間或部門選出的代表組成。再由各個車間委員會組成生產或工廠委員會。各工廠委員會選派代表組織地方或區委員會。再由區委員會共同產生運動的領導機構‘全國管理委員會’。根據規定，必須經常舉行車間會議，車間代表和其他幹部每6個月改選一次，但得連任。”（赫特著《工會運動史》，第77—78頁。）

⑧ 從各種不同觀點反對戰爭的少數派，在戰爭初期，在所有交戰國的工人階級黨派中，逐漸壯大起來。1915年年底這個事實增強了各國反對戰爭的人的信心。在那一年的9月，反戰派在瑞士的

澤默尔瓦尔德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该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国、俄国、波兰和一些中立国家的代表。英国社会党的费尔柴尔德和独立工党的布罗斯·格莱雪西尔由于没有得到护照而未能出席会议。到会的代表一致反对战争，虽然大多数代表停留在和平主义者的立场上，没有接受列宁和左翼提出的展开反战革命斗争的路线。但这个会议谴责了战争并号召反对它。这是一个重大的收获。

在英国，这次会议的结果显著地加强了国际主义思想，它的影响对英国社会党尤为重要，该党愈来愈多的党员从政治的和社会主义立场上来反对战争。早在1916年罗斯坦（他以约翰·勃伦笔名发表文章）、费尔柴尔德、芬伯格和英克品创办了《呼唤》半月刊，作为这个运动的团结中心。

党内意见的澄清和一致不久就表现出来了：1916年在索尔福德召开的年会上，海德门在公开还是秘密地讨论战争问题的辩论中遭到惨败，被嘘下台来后，他和21个支持他的人退出了会场^①。他们组织了一个“全国社会主义顾问委员会”，但是党的领导向他们提出，或者将这个委员会解散，或者退党。

海德门及其支持者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组织了“国家社会党”，在那里他们的军国主义和右派言论可以畅所欲言。1918年，这个组织改用“社会民主同盟”的老名称。同时二十世纪出版社拒绝将《正义报》交给英国社会党。在这种情况下《呼唤》半月刊改为周刊，变为该党正式的机关报。

震撼世界的事件在慢慢逼近，1916年都柏林的“复活节起义”

^① 这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因为在当时政治恐怖的情况下，海德门派知道公开讨论将有效地堵住多数出席代表的口，因为凡是发表自己见解的人将立刻招致政府法律的制裁。

不仅是英雄的序曲，而且鼓舞了以后的革命运动。领导这次起义的是詹姆斯·康諾利，这是一个具有英雄形象的革命家，他与苏格兰工人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战争初期，他在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反战示威大会上讲过话。1915年5月1日，他在格拉斯哥说过：

“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压迫者的战争和无产者反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者所能参加的最迅速、最安全也是最和平的建设工作。”

“我们不为英王也不为德皇服务，我们只为爱尔兰服务”，这是悬挂在爱尔兰运输工人工会的自由厅里的一幅标语。当康諾利的《爱尔兰工人报》于1914年12月被禁，但在第二年5月以《工人共和国》的名称再行问世，由格拉斯哥的社会主义工人出版社承印，然后秘密运入都柏林。1915年年底，旨在建立工人共和国的“爱尔兰市民军”已经和“爱尔兰志愿军”的左翼结成了同盟。1916年的起义，在6万名军队和兵舰的轰击下失败了。15个领袖被处以死刑，康諾利受了重伤，也支撑在椅上被枪毙，数千名起义者被关进了英国监狱。

1917年春，政府决定将雇用非熟练工人的措施扩大到私人企业中，并撤销免役证（志愿参加军火制造的技术工人免服兵役的证明）后，机器工人普遍地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在罗奇德尔变成了积极的反抗，该地有一家纺织厂违反法令，雇用女工磨制纺锤，并开除了拒绝教她们操纵机器的男工人。400个工会会员举行罢工，要求依法惩处厂方。政府拖延不理，5月初，6万名工人在兰开夏罢工了。一个强大的团结运动继新的全国车间代表运动之后席卷了整个企业。设菲尔德有1万工人参加罢工，考文垂也有3万人参加罢工，伦敦罢工也成了普遍现象。这时只有克莱德和泰因两大工业中心的机器工人还在工作。全国车间代表在达比举行会议——

这事本身就是新运动日益团结的一个证明。

当时的军需大臣是爱迪生博士，他拒绝和罢工工人举行谈判。八个车间代表的领袖被逮捕了，同时又发出了拘捕另外两个代表的拘票。这时置身事外的“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领袖知道这会引起可怕的群众的愤怒，就为爱迪生和罢工者安排了一个会议。在取得不作报复和继续谈判的诺言后，工人们同意复工。

初看起来，好像他们这次收获很小，其实这次罢工发生了重要的后果：政府得到一个实际教训，它现在的态度比以前缓和了。对八个领袖的起诉撤销了。将雇用非熟练工人的办法扩大到私人企业去的事，经过一个时期的踌躇迟延以后，也不再提起了。到了秋天，引起公愤的“离职证明信”也废止了。增加工资的要求也被接受了。罢工之后打击工会运动者的行为被禁止了。同时政府通过了严密的条款，恢复工会战前的权利和习惯制度。“总之，企图在1917年从机器工人身上获得更多让步的政府，由于群众运动的结果，不得不被迫退让。”（杰弗里斯著《劳工的萌芽时代》，第185页。）

车间代表在机器制造业中证明是一个真正的力量，由于这次斗争的结果，“全国车间代表管理委员会”成立了。秋季在考文垂5万工人举行短期坚决的罢工之后，这个机构终于得到雇主的承认。

随着这次巨大的罢工运动，便是1917年3月推翻沙皇统治的俄国十月革命所带来的新浪潮。组织成苏维埃的俄国工人和士兵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从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和绝望中打开了一条光明大道。他们的榜样对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起了深刻的鼓舞作用。

经过了这些斗争，英国工人阶级比在1914年突然经受考验时有了更好的准备。1917年正月举行的工党年会上也有了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代表,这是从1901年以来的第一次。费尔柴尔德代表英国社会党提議宣布这次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并要求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各国立刻举行和平谈判。这项提議以1,697,000票对302,000票被否决。他要求审查执行委员会对工党参加战时联合政府的报告的提議也以較大的多数——1,849,000票对307,000票——遭到否决。英国社会党、独立工党和工人党联合建議提出警告:在战争结束时资本家可能采取合并和經濟侵略的政策,并要求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局會議。这项提案也遭到否决,但票数的对比只不过是二对一,即是1,498,000对696,000票。

事实上,各工会投的反对票的票数,并不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意見,实际上的意見分歧要大得多。例如机器工人代表团在审查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問題上贊成和反对的人数相等,結果由于主席的决定,他們所有的340,000票全部都算做支持执行委员会的票数。普通工人共有10万多票,他們在这个問題上的分歧是11:6,在和平問題上为8:5(余者棄权)。在矿工代表中,在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局會議的問題上支持执行委员会的人只是微弱多数——33万对27万。(見1917年2月1日的《呼喚》和《劳工导报》。)

1917年2月,英国社会党党员,地方靴鞋匠支部書記艾伯特·泰勒,做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候选人,在罗森特尔参加补缺选举,对手是一个政府官員。英国社会党、独立工党和其他人士都参加了这次选举运动。泰勒获得1,084票,对方赢得了6,019票。这次选举的結果在意义上更证实了工党大会的教訓。

三月間,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英国社会党为将在巴黎举行的协約国社会主义政党會議起草了一个宣言。这次會議沒有开成,可是英国社会党把由费尔柴尔德和英克品两人签了名的这个宣言发表了。宣言的内容为:(一)譴責这个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

的战争，在协约国方面其目的为“在全欧洲建立协约国资本主义的霸权”；(二)要求工党和社会主义政党退出政府；(三)坚持终止“阶级休战”，并提醒工人阶级党派斯图加特大会关于号召工人利用战争条件“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决议；(四)发起一个通过谈判(而不是吞并)求得和平的运动，由“国际”立即召开全体会会议推动这件事情。

就在《呼唤》报刊载这个文件的那个星期中，俄国革命把沙皇赶下了他的宝座。

4. 俄国革命

俄国革命给整个英国的激进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信心。克莱德在前一年由于受到严重打击，工人运动瓦解了，但二月革命“是该地工人运动复兴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加拉赫这样说：

“‘自由俄国’是我们旗帜上的辉煌的标志，全苏格兰都组织了巨大的示威运动以支援这个革命……在1917年初的几个月中，我们格拉斯哥的广大群众热情高涨达到了顶点。‘释放麦克累恩’，‘自由俄国万岁’，‘打倒战争——打倒战争贩子’。那些狂热的此伏彼起的骚动的日子，是笔墨所不能形容的。”

从1916年以后在社会主义工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起着阻碍作用的狭隘宗派主义，现在开始崩溃了。被判处流刑的人们回来了，由于群众的压力，麦克累恩终于获得释放，于是“克莱德工人委员会”又重新建立起来。加拉赫再度当选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在前妇女选举权运动者海伦·克劳福德领导下的“妇女和平十字军”是一支反战争的生力军。车间代表们，4人一排，有效的保护了一次庞大的和平示威免受帝国主义流氓的袭击。格拉斯哥各业理事会主席伊曼纽尔·辛威尔对战争贩子所说的话，足以代表当时的战

斗精神。他說：“他們目前是困頓躊躇了，但在我們还未把他們結果以前，我們一定要使他們发抖。”

这种新精神瀰漫了全国。这个时代的象征是“联合社会主义理事会”（英国社会党和独立工党已使該会复活）提出在里子召集一个會議来“庆祝和鼓励我們的俄国伙伴们”，“来了解这个国家的工人階級对已在和正在俄国发生的事情的意見，并表明我們的态度”，并努力在“工人階級团結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面的真正的世界和平”，給予俄国人民为和平所做的奋斗以同情的支持。（《呼喚》，1917年5月24日。）

参加开会的1,150名代表代表着209个各业理事会，371个工会分会，294个独立工党支部，86个英国社会党支部和184个妇女合作組織。加拉赫代表克莱德工人委員會呼吁展开革命斗争来反对战争，贏得全場热烈的掌声。在会上艾伯特·英克品被推为“联合社会主义理事会”的秘书，理事会委員为13人，其中4人系英国社会党黨員。但为麦克唐納和斯諾登的蠱惑宣傳所欺騙的和平主义者和独立工党黨員控制了里子會議和“联合社会主义理事会”，致使成立工人与士兵委員會的动議沒有获得任何結果。

可是环境的改变和群众压力将新生命灌輸进了工党，在該党領導集团中引起了矛盾。做为工党在内閣中閣員之一的亚瑟·汉德逊偕同第二国际其他代表前往劝說俄国不退出战争，他归来后表示必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一个有德国人参加的国际會議。这个建議曾經获得彼得格勒苏維埃的支持。这个會議实际上是全体交战国工人階級政党間的和平談判。

这个建議在工党大会上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但汉德逊被撤去了内閣大臣的职务。工会領袖中的帝国主义分子特别是魏尔·桑恩（煤气工人工会的領袖）和哈符洛克·威尔逊（水手和救火員

工会领袖)策动了一个疯狂的运动,虽然这个运动并没有能改变大会的决议,但使原来赞成的人数大大地减少了。政府有鉴于此,于是拒绝签发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护照。汉德逊和他的友人只好在来年初举行了一个盟国间社会主义者会议,宣布了战争的目的。

这时,英国社会党愈来愈坚决地支持布尔什维克对俄国革命的破坏者和内奸(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这些叛徒与俄国资产阶级政党携手合作的政策是受到独立工党和工党领袖的积极鼓励的。

早在7月26日,《呼唤》报社论即谴责这种合作,并指出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是在“挖革命工作的墙脚”。10月4日《呼唤》报评论沙皇将领考涅诺夫将军的反革命叛乱时说:

“苏维埃必须夺取政权。这种看法在俄国已经相当普遍……我们希望‘民主会议’能就此作出决定。只有这样才能挽救革命。”

10月18日,在“民主会议”已经证明是一个大失败之后,《呼唤》评论说彼得格勒苏维埃(现在其中多数为布尔什维克)“拒绝与资产阶级党派进行合作是正确的”,并说将于11月7日召开的“苏维埃全俄会议”将产生“一个真正的革命政权”。

英国社会党是当时西欧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国际主义者曾在战争中期联合了多数党员驱逐了党内的军国主义分子),所以在十一月革命前它是西方唯一支持布尔什维克与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的“社会民主党”。革命后它更采取了鲜明的毫不妥协地支持苏维埃政府的态度。《呼唤》11月29日的社论说道:

“社会主义者——真正的而不是伪装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夺得了政权……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布尔什维克获得了胜利是因为他们取得了城市工人和

普通士兵的同情和支援……列宁及其战友为了他们的同胞和为了全世界苦难大众，正在设法镇压战争牟利者和贪得无厌的地主，正在设法取得和平与面包。我们是不是应当帮助他们呢？”

《呼唤》报一再著文庆祝俄国工人的胜利。1918年1月中旬，执行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庆祝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在11月初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历史新纪元……向彻底消灭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迈进了一大步”。决议还号召英国工人展开斗争，迫使英国政府“立即承认俄国现在的新政府”。

同月，在诺丁昂举行的工党大会上，苏维埃政府的代表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在会议上作了演说，受到出席会议的代表们的热烈欢呼。英国社会党提出一项决议，庆祝俄国人民十月革命的成功，并吁请英国政府参加已在波兰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镇开始举行的和平谈判。但是在腊姆齐·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代表的支持下，亚瑟·汉德逊动议一项支持协约国战争目的的决议。大会主席在一片骚乱声中不让英国社会党代表上台发言后，宣布该项决议通过。但这些片面的决议是完全不能代表工人们的意见的。

革命胜利的消息进一步刺激了广泛开展的群众运动。“每个革命的工人都为此感到兴奋”，哈里·波立特回忆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锅炉制造工人，准备在泰晤士河畔进行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时说，“当我们知道像我和我周围的同事这样的工人获得了政权，击败了统治阶级的时候，我们的热情愈来愈高了。”（波立特著《我斗争的时代》，第91—92页。）

在格拉斯哥，工人们欢腾地迎接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当工党领袖们，包括兰斯伯雷在内，对此震撼世界的大事保持绝对沉默的时候，克莱德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却快乐得大喊大叫……他们

呼吁立刻举行和平谈判，禁止领土兼并，禁止勒索战争赔款，公布秘密条约，群众欣喜欲狂，整个地区都沸腾了。每夜都有盛大的集会，群众支援布尔什维克的热情达到了极点”。（加拉赫著《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第174—175页。）

波立特和加拉赫两人均记载了这种热情如何化为实际行动的情况。波立特与一些有斗争性的工人组织了“泰晤士河车间代表运动”，不久“从切威克到提耳伯雷工人们都以拿到我们的会员证为荣，我们组织了包括由各工种车间代表参加的船坞工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出版了一份《团结报》。在克莱德，1月14日召开了工会干部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即刻召集一个国际会议讨论和平问题”。会议在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下通过一个附注通知，通知政府如它不在月底以前撤销“人力法案”（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杀人法案”），否则“我将劝告我们在克莱德的工人放下工具罢工”。

工人阶级现在普遍地强烈地仇视这个“法案”。车间代表的全国管理委员会在3月间的曼彻斯特会议上决定号召举行一次全国大罢工来表示反对。但后因德国的春季攻势和国难临头、一致对外的呼吁使工人意见分歧而未能采取行动。

不过这种沉寂为时不长，在停战前的夏季和秋季，斗争的激烈和规模是空前未有的，这种深刻的不安不特存在于工人中，并且波及了警察和军队。陆军和海军的反抗和不服调动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海员们组成了船员委员会和港口委员会。8月，警察举行了罢工，政府对他们作了一些让步。7月里，考文垂和伯明翰机器车间工人广泛举行罢工；击败了政府对某些厂家按照全部工人比例限制雇用熟练工人的指示。第二个月，与警察举行罢工同时，运输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给做男子工作的女工以相同的报酬。9月，

紡織工人罢工了，同时铁路工人在坚强的基层組織的领导下举行的罢工运动严重影响了南威尔士的运输。当战争接近尾声时，机器制造、造船和采矿等工业中一连串的罢工运动创造了战争年代中的新纪录。

第十章

战后的危机

1. 大战结束后的英国

大战以后，劳工运动以汹涌澎湃的声势出现，这是自宪章运动的全盛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工人经过战场上长年累月的艰苦生活和前一章概述的波澜壮阔、日益加剧的罢工斗争，觉醒过来了，同时也坚强起来了。他们抱定决心，要结束他们亲身经历的贫困和被剥削的悲惨生活。他们决心要在一场“消灭战争的战争”以后，最后实现他们建立一个和平富足的大同世界的理想。

对过去苦难的反抗和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引起了一个充满着新思潮的时期，一个工人运动在政策和组织上得到空前发展的伟大时代。工人阶级之有所转变不仅是因为他们过去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也是因为他们正处在一个全人类都在前进的时代中，俄国工人已经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障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各国的劳工运动正以新的力量和决心奋勇前进；正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也作为一支决定性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总危机的时期：在这个新世界诞生的前夕，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都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局部的稳定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英国资本主义的地位在变革的巨浪冲击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革已经孕育了半个多世纪，现在是瓜熟

蒂落了。德国在经济竞争上的威胁虽然暂时被消灭，然而，一个新的更强大的竞争者——美国——已驾临英国之上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它成了最大的债权国，而昔日曾经雄踞这个宝座的英国现在却沦为债务国。由于对殖民地进行剥削曾经在十九世纪末使英国的经济免于崩溃，但现在殖民地国家自己也正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并且在为独立而奋斗。一方面基本工业中的从业人员逐渐减少，其中有一些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技术改进，英国就这样在一个全世界生产力膨胀而人民穷困无力购买消费品的情况下进入了经济竞争的丛林。由于更换设备，暂时出现了一阵狂热的繁荣之后，随即降临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直到1939年世界大战再度爆发，失业人数从来没有少过100万左右。

同时，如果不看到资本家及其政客仍然保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和政治力量，就无法正确理解英国的战后危机以及今后发展的历史过程。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地位已经受到战争及其后果的无可挽救的打击；但是在目前，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金融资本和大托辣斯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反而大大地加强了。从“大不列颠企业联合会”和专门针对工人的“雇主协会全国联合总会”的成立也可以看出来大资本已经获得巩固。大战期间，这个强大的经济力量又同战争期中具有非常权力的国家机器进一步结合起来，由于人民力量崛起，不久国家机器又重新运用这种权力。正如我们在韦伯夫妇的著作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国家权力的一支臂膀正是工会的官僚机构。这的确是一个强大的联盟，执掌着这个联盟的，就是那些靠战争起家而在战后的繁荣时期中由于巨额利润和股息分红又大发其财的“厚颜无耻之徒”。

和这个联盟相抗衡的空前强大的劳工运动正以史无前例的速

度发展着，它的觉悟和决心在日益增长。全国职工大会所属工会的会员人数从1914年的225万增加到1918年的450万，到1920年又增加到650万。这时所有工会会员的总人数（包括不属于职工大会的工会在内）已达到了800万以上的高峰。这支斗志昂扬的巨大力量，尽管工资和工时的问题是它们当前最关心的事，它们也不可能把自己的行动局限在这些问题上。

现在这两个强大的敌对力量面面对峙了，做为这个时期特色的几次重大罢工斗争的胜利或失败不仅对国家的经济前途而且对国家的政治前途有着重要的影响。英国的劳工运动这时的确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改善劳工生活和维护劳工运动的斗争已经很明显地同争取权力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了。

这就是战后年代中巨大斗争的真正意义。它们再一次指明，由于政治上的混乱给了头脑不清甚至公然变节的领导集团以可乘之机，以致工人群众虽有争取胜利的热情和意志，竟无法取得最后胜利。另外一个原因是缺少一个在群众中真正享有威信的革命政党。尽管如此，战后危机时期仍然是富有成果的，尤其重要的是共产党的建立。

2. 罢工斗争

1919年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危急的一年。只是由于缺少一个坚决而又集中的领导来把那些从战争的黑夜中奔泻出来的人民反抗的激流汇集起来，统治阶级才得以免于复灭。

在动乱时代中，一向做为统治工具的警察和军队，本身也受到时代精神的感染。停战之后，武装部队中的不满情绪更为普遍，特别是在迟迟不能复员的这个问题上。当时政府不敢把成千的久经战斗的兵士放到民间去，他们还害怕这会加重由于战后失调已在

萌芽的失业問題。同时他們正在虎視眈眈地注視着苏俄，企图进行干涉。

但是士兵們却希望尽快地解甲归里。在法国的駐軍已經爆发了兵变，在埃塔普里发生的焚燒营房的事件进一步說明了1918年部队的情緒。这时在福克斯頓、多維尔、布里頓、塞里斯伯雷、普兰和艾尔华慈又相繼爆发了兵变。士兵、海員和飛行員在营地和船舰上成立了委员会。有一次成千的部队駕着强征来的卡車到倫敦請願。这个运动迫使当局迅速而匆忙地进行了复員工作，从而有效地制止了用征集的兵員去干涉苏俄的企图。但是这个运动是盲目而自发的，几乎与組織起来的工人階級没有什么关系，原因是工人階級許多积极的領袖由于痛恨軍国主义宁可坐牢，也不願从軍入伍，所以軍隊中没有什么組織。

同时，罢工的浪潮也达到了新的頂点，即使在这个怒潮澎湃的时期中，1919年也是最高潮的一年。在自1917年以来的5年中，参加罢工的人数和損失的工作日比包括“大动蕩”时期大战前的5年间的同类数字高出一倍以上。

战后第一次的角力发生在克萊德賽德，当地的机器工人和造船工人在工人委员会领导下，同車間代表和地方工会干部一起为爭取每周40小时工作而举行罢工。工人热情之高是当地10年来猛烈的斗争中前所未見的。示威群众如潮水一般涌入城市，市政厅的旗杆上升起了紅旗。

政府当局一边害怕工人起义，一边又不放心駐扎在本地的对战争已經厌倦的部队，他們把这些队伍关在軍营里，然后把新兵部队調来进行镇压。政府的恐惧并不是沒有根据的，因为“在乔治广场的战斗”中，由加拉赫、柯克伍德、国會議員詹姆斯·麦克斯頓和伊曼紐尔·辛威尔所率領的示威群众在遭到警察的野蛮攻击以后

进行了反击，并且毫不客气地回敬了袭击者。但是这一場罢工没有得到工会领导的支持，只有贝尔法斯特和爱丁堡给予了援助。

正如加拉赫后来所指出的那样，缺点在积极的工会分子轻视“政治活动”以及“未能认识到在各种斗争中工会都必须永远一贯的站在群众的前面”。他说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正当我们应该掀起革命的时候，我们却去搞罢工。”（加拉赫著《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第221页。）

同时，拥有100万会员的“矿工联合会”正准备在更为广泛的战线上发起新的攻势。矿工们以将近六比一的绝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定，要为支持争取增加工资30%，六小时工作制，矿山国有化和工人参加管理的要求而举行罢工。这时煤的贮存已经告罄，矿工们又从他们的三角同盟——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取得了协助，政府于是面临着一个十分严重的全国性危机，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了矿业的劳动条件和所有权的问题，虽然这些方面的重要性也是非同小可的。

政府许下了诺言同时也发出威胁，但两者都没有兑现。他们答应任命一个皇家劳工调查委员会，并且许诺履行它所提出的建议。同时他们又威胁说要用武力镇压罢工，而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他们的力量所办不到的。矿工领袖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方始劝服他们的会员，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暂缓举行罢工的决定。

皇家委员会由杰斯提斯·桑基先生任主席，12个委员中有6个是矿工指定的。它的报告对于煤矿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并且建议增加工资，实行七小时工作制以及在这类企业中实行公有制度并让工人参加管理。由于委员会中间报告中的这些内容，加上政府重新作了保证，矿工们同意撤销罢工的决议。危机过去了，政府悄悄地背弃了它的诺言，而用由工会和雇主组织

共同組成的“全国工业會議”所做的烟幕彈式的詞句来掩飾它的詭計。正如某国会議員指出的那样，矿工們完全可以說，“我們受騙了，被出賣了，上当了。”

运动遭受到一次严重的失敗，然而斗争立刻在新的战綫上展开了。夏天，兰开夏的 30 万紡織工人要求增加工資 30% 和每周 48 小时工作举行罢工，并大获全胜。另外警察工会举行了第二次罢工，但是只有部分人响应。結果虽然在工資和劳动条件方面贏得了重大的让步，然而罢工者遭到解雇，工会組織也被取消了。

在政府的支持者中，一种“要同工会大战一場”的情緒逐渐在抬头，于是政府企图进行反攻。政府对铁路工人在矿工罷工潮期間提出的关于“标准化”以及增加工資的要求采取拖延手段；等这个危机过去后，为了使火車司机不至卷入罢工中去，政府对他們作了让步，然后发出了最后通知，要其他工人削減工資每周 1 到 16 先令。这个要求不允許工人有任何修改，因此被称为“无条件的”。

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领导人立刻号召罢工，这次罢工受到統治階級鬪言的疯狂攻击。劳合乔治称这个罢工事件为“无政府主义的阴谋”，其他人也跟着随声附和。政府調动了軍隊并且对地方当局发出了征集“市民卫队”的指示。尽管如此，一个星期以后铁路工人还是获得了胜利；削減工資的要求撤銷了，現行的工資标准稳定下来，而且最低的工資还有所提高。他們之所以获得胜利，首先是因为上下团结一致（火車司机沒有被收买），其次，合作組織向罢工工人及时提供了基金和食物，同时三角同盟的其他成員也給予了同情和支持。此外劳工研究部的援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用活生生的事实狠狠地打击了雇主和政府。

工人們在与雇主的反攻进行斗争一事上取得一次重要的胜利。艾倫·赫特在他的《战后工人階級史》中写道：

“这似乎是一件令人不解的事，铁路工人的罢工竟然没有成为产业中的劳工运动大踏步前进的起点。人们认为这次罢工原是不可能波及其他企业的；它之所以没有蔓延开来，是因为托马斯先生和铁路工人的领袖们极力避免导致这种后果，他们甚至避免向三角同盟呼吁举行同情罢工。”

铁路工人的胜利不但没有推动整个的工人运动，并且由于领导上的软弱，成为曇花一现，从此在战后时期就再没有发生过重要的罢工斗争，虽然这期间还有其他一些次要的收获（特别是有一次码头工人在调查法庭上彻底揭露雇主以后，赢得了增加工资的胜诉。在这次事件后欧内斯特·貝文得到了“码头工人的王室法律顾问”的称号）。

领导集团使工人运动招致挫折和力量分散的做法可以由当时再度投入罢工斗争的矿工事件中明显地看出来。矿工们在“桑基报告”事件上了政府一个大当以后，他们乃转而求助于全国职工大会。在一次特别大会上发动了“煤矿国有”的运动，以迫使政府履行诺言把煤矿收归国有。但是在1920年3月召开的另一次特别大会上，当提出了如果政府不答应就举行总罢工还是进行“激烈的政治宣传鼓动”时，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采取了后一项建议；实际上也就等于不采取任何行动。到了夏季，矿工们向雇主提出了最后通牒（这个决定得到绝大多数票的支持），同时请求三角同盟中的其他两个盟友予以声援。但是铁路和运输工会的领袖们，不顾群众的情绪，拒绝举行同情罢工，而打算从中斡旋。矿工们的罢工开始后，铁路工人举行的群众投票表明大多数人同意举行同情罢工，但是已经太晚了，矿工们已经在雇主接受按照产量（即基准线）增加工资的临时协定的条件下结束了罢工——所以这次罢工后来往往被称为基准线罢工。

由于这个时期中矿工們沒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工会运动的领导和組織問題就成为爭論的焦点。隨着十几年来工会會員人数、力量和职責的扩展，这个問題也日益迫切需要解决。工业体制的变化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工会运动中各种問題性质上的变化，要求有一个符合罢工斗争需要的工会組織，不只是工业发展初期那些行业工会的拼凑，这种行业工会由于琐碎的妒嫉使得合作的效果經常受到影响。它所要求的领导也不只是一年一度在議會委员会去运动議員之前大喊大叫一番的工会领导。这种局面已經过时50年了，然而改进仍然是迟緩而費力的。我們已經看到，在大动荡时期中，曾經由于产业工会运动所进行的宣傳有所改进而取得过一些成就。大战期間和战后时期中，运动的发展和活跃加速了这个过程。大战期間三角同盟被批准成立，“鋼铁同业联合会”也建立起来了。

在战后的年代里，由于10年来工会积极分子努力的結果，許多組織机构进行了合并和改組，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英国工会运动的組織結構。

在这些变动中，1920年成立的“混合机器工人工会”要算最重要的一个。它突出地說明，事态发展的邏輯和前进的职工群众的压力，虽然不能全部地也部分地克服了几十年来由于行业工会的脱离群众和妄自尊大所造成的重重阻碍和糾紛。

战争期間，“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和若干有关的較小工会的执行机构之間进行了长時間的談判，結果毫无进展。但是在各地区，由于地方工会干部和車間代表根据日常斗争的經驗經常強調团结的好处，因而取得了重要的发展。战前就存在于若干工业大城市中的合并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来对这个开展宣傳鼓动，这个委员会在1917年又同全国車間运动合并起来。

直到三年以后“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才同6个行业工会合并组成了“混合机器工人工会”。这个新的组织拥有将近50万会员，它的总书记是自从80年代工会运动复兴以来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汤姆·曼恩。就是这样，这个组织也没有能真正满足合并和改组的需要：锅炉工人、铸铁工人、印模工人和电气工人的强大工会组织还没有加入这个新组织。进展是大的，但还不够圆满。

在这些年代里还通过合并成立了两个巨大的普通工人工会。“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在1921年由码头和运输工人工会合并组成。这些工会是在80和90年代非熟练工人展开汹涌澎湃的斗争时产生的，它们在1910年散漫地被组织在“运输工人联合会”里。“工人联合会”归并进来之后，它就成为了最大的一个工会。但是这种发展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巩固团结和走群众路线，这是自从社会主义先驱者创立这些工会组织以来奋勇斗争的悠久传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当它们的地位巩固以后，它的战斗精神就受到把大权集中于官僚机构手中的工会会章的窒息和挫伤。正如赫特所说：“这个巧妙的组织——权力高度集中，同时将会员在纵的方面按产业系统、在横的方面按地区加以双重划分——使这个强大的机构实质上完全操纵在它的总书记欧内斯特·贝文的手中。”另一个新生的巨人，“全国普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也渊源于英勇的80年代。它是由几个普通工人工会合并而成的，后来也成了右翼官僚主义的据点。这两个组织，“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和“全国普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不论在全国职工大会还是在工党的会议上，都因拥有众多的工会会员票数而日益支配着运动的重要决议。”（赫特著《英国工会简史》，中译本第94页。）

在这个时期中，许多产业都采取了巩固组织的重要措施，虽然，例如在机器工人当中，这些措施往往并不能达到应有的结果。

在建筑业中，砌磚工人和石匠的两个老工会組織合并为“混合建筑工人工会”，木工和細木工两个工会也合并为“混合木工协会”。同时在1918年成立的“全国建筑业工人联合会”使以上两个組織和其他工会取得了某种程度的配合。

3. “不許干涉俄国”行动委员会

但是这个时期还不只是一个充滿了罢工斗争和影响深远的內部改組的时代。英国工人階級这时正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同其他国家觉醒了的工人共同来改变世界历史的軌道。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正如我們见到的那样，使工人们欢欣鼓舞。这种胜利和同情的心情不仅在有政治觉悟的人们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它在工人群众当中也是深刻而强烈的。这种心情既不是統治階級在憤怒、恐惧和狂暴之中迸发出来的叫囂，也不是右翼工党領袖的絕望呼声所能改变或轉移的。

英国公众在1918年获悉英国部队已經卷入反对这次革命的战争，英国工人感到異常憤慨，他們采取断然措施的决心也与日俱增。同資產階級发生决定性的正面冲突的条件日益成熟。这时資產階級一面在策划进一步采取干涉行动扑灭十月革命，一面匆忙地通过“紧急时期权力法令”（1919年10月）准备在国内进行镇压。

1919年春，“矿工联合会”借召开政治和产业方面的特別會議的机会，通过了一項決議，要求結束对苏俄的干涉。6月間举行的工党大会曾經就采取直接行动制止干涉战争的問題进行了討論，使領導集团感到震惊和憤怒。矿工領袖鮑勃·斯迈利直率地对領導集团說：“工党执行委员会竟在这个时候采取了同英国所有剝削者和政客完全一致的立場，实在令人不解。他們最害怕的莫过于所謂的直接行动了。”赫伯特·莫里遜說：

“他們必須認識到，目前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对俄国所进行的战争并不是一场反对布尔什维克或者反对列宁的战争，而是一场反对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战争。这是一场反对工会运动组织本身的战争，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用整个工会运动的全部政治和产业力量来加以反击。”（艾倫·赫特著《战后英国工人阶级史》，1937年版，第34—35頁。）

會議以二比一的多數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立刻終止干涉戰爭，並且呼喚運動的政治和产业方面進行合作採取行動“以便充分運用它們在政治和产业方面的全部力量，使這些要求得以實現”。七、八月間全國各地舉行了規模巨大的示威遊行，格拉斯哥各業理事會在群情激憤達於頂點的時候建議舉行24小時的總罷工。

1919年夏，成立了以爭取結束干涉戰爭為目的的“全國不許干涉俄國委員會”，它的主席是職工大會議會委員會委員A. A. 柏塞爾，總部設在曼徹斯特。到了年底它已經包括著名的革命戰士如湯姆·曼恩（“機器工人工會”的總書記），A. A. 高悉普（“裝修工人工會”總書記）和威廉·加拉赫，以及完全不同的人物如C. T. 克蘭普（“全國鐵路工人工會”產業書記），約翰·布郎萊（機車工人工會總書記）和威廉·斯特雷克（“諾森伯蘭礦工工會”書記）。委員會的書記是W. P. 寇茨，他是英國社會黨的組織者，臨時調到委員會來工作的。

第二年春季，當波蘭人在英國和法國的協助下進攻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時候，緊張局勢達到了新的頂點。這時，十月革命在英國工人心中激起的希望、同情和熱忱都集中在一件十分重要而實際的任務上——這就是阻止軍運船隻開往波蘭。對於泰晤士河上的工人們來說，這是歷史性的時刻。英國社會黨，東倫敦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和在波立特領導下的泰晤士河車間代表運動的積極

分子都在不断地进行宣传鼓动。

5月10日，正当统治阶级为波兰人攻占了基辅城而兴高采烈的时候，码头工人拒绝为运送军火的船只“快乐乔治”号装货，添煤工人也拒绝为它添煤。5天之后，这批军火不得不重新卸在码头边上。每只箱子上都牢牢地贴着这些熟悉的字样——“不许干涉俄国”。波立特后来写道：“这些标语虽然很小，然而在那个日子里它却是足以传遍全世界的大事。”

这个胜利，鼓舞了劳工运动去作更大的努力。“码头工人工会”禁止装载一切运往波兰的军火。工党年会要求同俄国媾和，英国社会党建议加上一条号召举行总罢工以制止干涉的附款，但没有获得通过。可是劳工运动这时已经彻底地动了起来，以至这项建议实际上成了它所奉行的政策。

工人在制止干涉问题上发起的运动到8月间面临着决定性的关头。红军在波兰发动了出色的反攻，当全欧洲都处于革命风暴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对这次反攻的后果感到极端恐惧，因此提出了向苏维埃共和国宣战的威胁。正如工党执行委员会事后在报告中说的，这个威胁在工人中所引起的反响是“劳工运动史上，表现劳工的团结、坚决和热情的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

全国各地的工党组织和各业理事会响应了工党总部8月5日发出的电报，在周末期间举行了几百个反对侵俄战争的群众示威游行。第二天，新成立的共产党打电报给它在各大工业中心的支部，敦促它们在一切集会上提出动议，要求在战争一旦爆发时举行总罢工，并且要求成立代表运动各个阶层的“全国劳工理事会”，下设地方委员会，以组织具体行动。这个号召在第二天做为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一项宣言，刊登在8月8日星期日的《每日先驱报》的特刊上。周末在利物浦、伯明翰、设菲尔德和其他许多城市举行

的規模巨大的示威大会上都提出了这些要求。

星期一那天，全国职工大会的議會委员会，工党执行委员会和議會党团举行了联席會議，一致同意向政府提出警告，“有組織的工人将动员其全部力量来制止这次战争”。会上还設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来貫徹这项政策。4天以后特別召开的“劳工运动全国會議”批准了这些決議。會議保证要反对对俄国进行任何形式的武装干涉，并且授权行动委员会繼續工作直到承认苏維埃共和国并同它建立正常的商务关系时为止。为了这个目的，决定委员会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号召工人举行一切形式的停工”。

在所有主要城鎮（大部分在各业理事会的基础上），一共建立了350个地方行动委员会。650万工会会员团结一致抗議政府的这种可耻政策。他們知道自己的力量，并且懂得他們走的道路同那些官僚主义者和趋炎附势者流的可鄙的路綫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正如英国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A. G. 凱麦隆（木工工会）所說：

“如果有一天我們必須采取这种行动，如果当权者非要橫加干涉不可的話，我們也許不得不行动起来迫使他們滾蛋。而且我們还要告訴他們，如果他們不肯和平而人道地来管理这个国家，非要干涉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不可，那么就請他們試一試看我們究竟能不能行动起来，把国家掌握在我們手中，由人民自己来管理。”（艾倫·赫特著《战后英国工人階級史》，第40頁。）

英国工人階級不仅要在全国範圍內而且要在全世界准备采取行动；他們打电报給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請他們参加罢工。

英国政府无条件投降了。它劝告波兰政府停止对俄国武装进攻并同俄国讲和。

英国工人階級这一次运用了从宪章运动时期以来从来没有达

到过的团结和独立的力量，在国家政策的主要问题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列宁评论道：

“这个‘行动委员会’，以全体工人的名义不经过议会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这是向专政的过渡……英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说，‘行动委员会’就是苏维埃。它们说对了。它虽然不叫作苏维埃，但是实质上就是苏维埃。”（《在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4页。）

4. 领导问题

工人们建立起了政权机器，通过这部机器他们能够在包含极其重要的社会、外交和军事政策等因素的历史事件中，强迫资产阶级接受他们的意志。这件事戏剧性地象征着目前劳工运动力量的强大和地位的重要。工人阶级这时像一个从睡梦中醒来的巨人：仅仅一举手就震撼了整个国家。如果再有高瞻远瞩的政策作指导，和充分认识自己的使命，它的力量将更是无穷的。

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由于十九世纪最后25年来大规模生产的发展而变得更明显了。这种发展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消除或打破了各行业和企业之间的隔阂。巨大的此起彼伏的经济斗争，主要是在1888—1891, 1910—1914和1917—1920年间的斗争，表明了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的增长，并且使工会增加了好几百万新会员，出现了许多新工会，在落后的地区和企业中也建立起组织来了。

这些成就所以能够取得，是由于勇敢和忠心耿耿的左翼群众领袖说出了工人心中的话并且唤起了他们的战斗意志。同样，在政治上，社会主义先驱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热情和知识，加上保卫工人的进行组织的基本权利和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促使工

人阶级起来为建立独立的政治组织和采取独立的政策而斗争。

推动这个斗争向前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就是要把运动提高到新的阶段，不仅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本身的利益而斗争，还要把这种斗争同改变社会制度的有意识的斗争结合起来。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必须就组织、政策和领导作出重大的决定。毫无疑问，工人们是倾向于采取坚决、一致的行动的。

这些战后英勇年代中的悲剧是，尽管运动在思想和组织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由于工人中的上层分子，即工会官僚主义者的狭隘的特殊利益所造成的政策，特别是由于社会上和政治上的某些安于现状的、表面上公平而实质上有害的观念，使这些成就受到妨害、阻碍而被抵消了。

1919年的铁路罢工最为明显地表明了工会运动是迫切地需要一个统一的领导。同年年底举行的全国职工大会特别会议接受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和建議。报告指出，有必要为“整个运动建立起真正有效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于缺乏全盘领导已经一再造成了“不仅在行政工作上的机构重叠，而且使整个劳工运动蒙受巨大的财力和精神损失的内部以及其他的无谓纠纷”。工会运动必须有集中的领导，运动在政治、产业和合作方面的工作必须协调起来。

从工会方面说来，这个问题更加迫切地需要解决，因为工会事实上根本没有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唯一常设机构是议会委员会，它的职责原本是为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在议员中奔走活动。于是成立了“职工总会”代替了议会委员会，它是由17个产业组织提名经过全体代表大会通过的32名委员组成的。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促进联合行动，但是它也没有强制的权力。

新成立的共产党批评了这种做法，认为这是“旧领导的新联

合”，換湯不換藥。它建議以工会和團結在各業理事會周圍的車間和工廠委員會為基礎成立“勞工大會”，這樣，這些組織就成了這個真正全國性的領導機構的地方組織。

同時為協調整個工人運動而作的努力，其結果也受到類似的限制。有全國職工大會和工黨參加的“勞工聯合委員會”，在1921年為由職工六會總理事會、工黨執行委員會和工黨議會黨團聯合組成的“全國聯合理事會”（後來稱為“全國勞工理事會”）所取代。不過這個組織純粹是一個諮議性的機構，而且4年以前成立的合作黨還不包括在內。

組織和領導機構的問題雖然已經引起了注意，但解決的辦法主要仍然停留在形式上，它既不合乎時代的需要，也不能滿足運動中絕大部分群眾的願望。

戰後時期第一個政治上的變革是工黨接受了社會主義的綱領並通過了新的章程。工黨在1918年宣稱它的目標是：

“在生產、分配和交換手段的公有制的基礎上，依據把所有產業和服務業交給人民經營管理的最完善的制度，來保證體力和腦力勞動者按照尽可能地最公平的分配方法享受他們的勞動果實。”

由韋伯夫婦起草的綱領對戰後重建工作中“敷衍了事”的現象提出警告，它說工黨在晚近的事件中親眼看到“一種特殊的工業文明的興衰，工人們無意再重建這種文明”。它又說：

“我們希望，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生產制度……連同它所产生的極端不平等的社會和它所造成的道德和精神上的墮落和野蠻，確已遭受致命的打擊。隨同它的死亡，必然還有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以及反映它的思想意識。我們工黨黨員，不論是在野還是在將來執政的時候，絕對不得叫它死灰復燃。相反

地，我們將尽一切力量把它同为它所牺牲的几百万人們一同埋葬掉。”

这种对資本主义制度的辛辣的譴責，同当时日益壮大的工人階級以及中等階級的輿論是适相吻合的。由于自由主义的基础已經消失，自由党人的政治上的蠱惑宣傳也就站不住脚了。而力量迅速增长的工党現在取代了自由党的地位而成为全国两大領導政党之一。工党所获得的选票在 1910 年不过 50 万張，到 1918 年就上升到 240 万張，等到 1924 年工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就为 550 万張了。

随同政治勢力的擴張，工党黨員人数和地方組織也在新党章的推动下急剧地增加。在新党章通过以前，工党只是通过社会主义社团吸收个别黨員；現在，由于在选区建立了工党組織，就有可能直接吸收人們入党。战前隶属于工党的各业理事会和地方党組織一共有 146 个，在战后的第一年中这个数字上升到 389 个，到了 1920 年，工党的区組織和地方組織几乎遍及所有选区，一共有 2,000 多个。

但是，在新綱領的某些章节中的响亮口号的背后，却隱藏着費边主义和自由党改良主义的旧思想。綱領一再否认它所提出的建議具有“階級性”，而韦伯夫妇也声称，工党已經“从一个仅仅代表体力劳动者的階級利益的集团轉变成一个全民性的具有完善組織的政党”。这个新章程，他們說，导致了“黨員人数的大量发展，他們主要系来自职业界和中等阶层”。在这种影响之下，一向是工党的主要政治支柱的独立工党現在变成了“那些对自由党失去信心的、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有学問的男男女女的栖身之所”。(M. 皮尔著《英国社会主义史》第 2 卷，第 389 頁。)

就这样工党成了工人階級和中等階級下层分子的联盟——后

一类人的代表人物中不仅有自由党人而且还有脱离了工人群众的工会系统的国会议员，他们并且居于领导地位。工党虽然在口头上对工人群众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愿望作了让步，但它在政策和观点上却主要是属于自由党—工党的改良主义的。

这种矛盾在独立工党内部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它一方面大量吸收幻想破灭了的中等阶级自由党分子，一方面又在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当中发展组织。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工人的态度在这时都是很激昂的。因此，尽管领导集团谴责俄国革命，下面的群众却支持革命并且提议退出第二国际，而靠攏由若干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1920年组成的共产国际。

这个关键性的时期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在英国终于建成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的政党——共产党。经过了长期的讨论和谈判，同时由于列宁的敦促，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分歧终于趋向一致，它们合并成了一个政党。

在组成共产党的各党派中最重要的是英国社会党。我们已从英国80年代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社会民主同盟”起，追溯过它的发展。40年来这个组织曾经为工人运动培养出一批杰出的领袖，这些人在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绩。尽管在形式上往往流于狭隘和教条，但是它毕竟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无价的遗产。

其他左翼团体则同运动中的某些地区或某些活动有着特殊的联系。认识到没有工人解放就不能实现妇女解放的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所建立的“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只限于伦敦东部的贫民区（这个地区在复兴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曾经几度获得胜利）。在南威尔士的矿工中，存在着强大的工团主义运动和规模宏大的罢工斗争的传统（工团主义就是在这种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种传统部

分地体现在当地的“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这个组织之中。主要集中在苏格兰的社会主义工党这时已经扩展到了北英格兰，它的成员包括许多车间代表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此外，我们也看到许多独立工党的普通党员和腊姆齐·麦克唐纳的观点是大不相同的。最后，在国家基尔特运动中（这是工团主义思想的一个翻版）还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

以上这些就是当时构成共产党的组成分子。它们之所以结成了一个党派，是由于受到以下世界事件的剧烈影响的结果：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巨大发展；工人阶级在俄国取得政权的令人振奋的榜样；列宁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已经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1920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有来自35个国家的66个政党的代表参加）。

关于合并统一问题的讨论是在1918年大选以后提奥多·罗斯坦发起的。第二年3月，英国社会党在全体投票后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一项宣言，赞成加入共产国际。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党、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和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代表在1919年6月集会。会议表明它们在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则上意见完全是一致的。

通往统一的道路似乎是打开了。

但是事实证明这个过程却是漫长而困难的。主要的原因是有人在有关根本政策的两个重要问题上有严重的意见分歧：一个是关于党在未来应否隶属于工党的问题，一是关于以后应否参加议会斗争的问题。它们的起因基本上是一个：即从80年代的发轫时期以来，战斗的社会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迎合时尚的政治伎俩，特别是对于工党和工会中那些认为议会活动就等于一切的领袖人物，极为轻蔑。这种弃绝议会行动的动机是非常良好的，但是，正

如我們曾一再見到的那樣，這樣做的結果使得戰鬥的社會主義者脫離了運動的日常生活，使他們無法在每一個問題都正確地指導群眾進行鬥爭，因而就使右翼分子得以乘虛而入攫取了領導地位。

在所有革命黨派中唯有最大的英國社會黨主張參與議會政治並同意加入工黨（當時它本身就是工黨的成員組織）。已經多多少少改變了早期極端作風的社會主義工黨則同意參與議會政治（它剛在1918年提出了3個候選人），但是不同意加入工黨。工人社會主義聯盟連議會行動也一概反對，雖然在談判初期它並沒有把這個當作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分歧使得一個統一的政黨未能早日建成。

英國社會黨建議在統一的共產黨成立後3個月內舉行黨員投票來決定是否加入工黨的問題。3個組織的代表都表示同意，但是社會主義工黨執行委員會後來卻拒絕了這個建議。社會主義工黨沒有派代表參加在1920年1月舉行的另一次會議，但是它原來的3個代表——亞瑟·麥克馬納斯，湯姆·貝爾和T.T.墨菲——同意在他們黨內繼續進行鬥爭。可是儘管大家又作了些讓步也沒有用，復活節時這幾個人召集了他們的同情者在諾丁昂舉行會議，隨後他們就以“共產主義統一派”的名義參加了談判。“工人社會主義聯盟”就這樣和大家分道揚鑣了，在6月舉行的一個規模很小的會議上他們竟打算“搶先一著”把自己稱作“共產黨”。但是他們的組織沒有誕生就夭折了。

這個時候，其他參加談判的各方一致同意組成了“臨時聯合委員會”準備召開一個“統一大會”，成立共產黨，同時就政策上的主要問題（包括加入工黨和參與議會政治的問題）作出決定。

在這個漫長而艱辛的歷程中，他們得到了列寧的支持。他在

写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一封信中说道：

“密切联系工人群众，善于经常地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参加每次罢工，回答群众的一切疑问。这一切对共产党来说，都是主要的东西，尤其是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在英国，像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一样，直到现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一般工人运动的，大多是工人中的少数上层分子，工人贵族，他们多半已不可救药地为改良主义所腐蚀，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偏见所俘虏。”（《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16页。）

然而列宁不赞成这个会议的做法。他在7月8日致临时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和W. S. F. ‘工人社会主义联盟’把B. S. P.①、S. L. P.②等组织撇在一边，而不把它们合并成为统一的共产党的策略是错误的。并且我个人特别主张在保证共产党人可以充分自由和独立工作的条件下参加议会和加入‘工党’。”（《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回信》。《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77页。）而当他发现（稍为提前谈一下）在共产党成立以后，甚至于像加拉赫这样真正的工人阶级战士都由于在内心对工党领袖抱着反感而采取冷淡的态度时，列宁就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中同他展开了论辩。这次代表大会，在统一大会召开时，已经在莫斯科开幕了。

很久以后，加拉赫对这次讨论写道：

“要说服我是不容易的。我对工党领袖和他们奴颜婢膝的无耻行径感到厌恶，我不愿意受到沾染。讨论逐渐发展下去

① B. S. P.——英国社会党。——译者

② S. L. P.——社会主义工党。——译者

以后我开始认识到我的看法上的缺点。列宁的清晰而简明的论辩和解释愈来愈深入我的思想……我愈同列宁谈论就愈感到工人阶级的政党在革命斗争中的意义……一个深入工厂里和群众的、并以工人阶级政策的正确性来争取工会和合作社支持的革命工人的政党，一个除了工人阶级及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同盟者的阶级利益之外没有其他利益的政党，这样一个党，可以利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议会成为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讲坛，以唤起广大工人群众对资产阶级敌人进行有力的斗争。”（《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第251页。）

英国共产党在1920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举行的会议上成立了，参加会议的有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党的共产主义团结派和许多小党派的代表。这个时期党员中的杰出人物有汤姆·贝尔，艾伯特·英克品，T. A. 杰克逊，亚瑟·麦克马纳斯，威廉·保罗，哈里·波立特，包勃·斯图尔特，R. 派尔姆·杜德，R. 佩季·阿诺特和华尔特·霍姆斯等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第二年正月，共产主义劳工党（它主要由“苏格兰车间代表和矿工改革运动”的支持者组成，他们之中的主要人物有威廉·加拉赫，J. R. 坎贝尔，J. V. 累基和亚里克斯·格迪斯）的新力量又参加进来。在复活节召开的独立工党年会结束之后，这个党的左翼，其中有埃米尔·伯恩斯，沙伯齐·萨克拉特瓦拉，海伦·克罗福德和欧内斯特·布朗，转了过来，统一的共产党于是组成了^①。

^① 埃米尔·伯恩斯以“独立工党面临的问题”为题撰文支持发表在1921年3月26日的《共产党人》杂志上的致独立工党年会的宣言。他提到当时正在开始的失业和工资的危机，并且断言说，“矿工，铁路工人和好几类工人现在都尝到了过去7年来改良主义策略的恶果。”他敦促独立工党的党员群众在“阶级斗争中的重大问题”上参加各国工人的革命运动。独立工党以多数票否决了这项呼吁，但是一部分党员却参加了共产党。

共产党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为基础，它的成员大部分来自诸如克莱德赛德、南威尔士和东伦敦等过去 10 年中的风暴中心，它继承了宪章运动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摩里斯和其他英国社会主义先驱者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国际主义的傳統，举步向前，担负起它在劳工运动中的职责。

诚然，英国共产党既继承了英国的革命社会主义传统的优点，也继承了它的缺点：如党的建党党员大多来自从事宣传工作的组织。然而党的建立本身却标志着他们为解决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中心问题所作的努力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人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

当英国劳工运动的蓬勃朝气和群众力量达到新的高峰的时候，它进入了一个我们在过去半世纪中看到的不断演进的事态获得了充分发展的阶段。自此，资本主义便处于总危机之中，而最后的出路只有一条：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在他们的前面横着许多困难，许多已经被遗忘了的教训还要从头学起。但是，在回顾几乎两个世纪以来，英国劳动人民为了寻求一条真正的前进道路所作的英勇斗争，坚贞的忠诚和不断的努力，谁又能怀疑劳工运动终将获得成功呢？在 1920 年记载在它的旗帜上的光辉战绩预示着未来的胜利。

英国劳工运动的历史在世界上是最悠久的，行会俱乐部和通讯社在十八世纪就开始为了在英国建立民主，不顾残暴迫害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英国工人第一个建立了自己的群众性政党“全国宪章协会”，来争取政治自由和最终的社会解放。首先建立了合作社并且在全国建立了合作经济制度的也是英国工人。甚至于在宪章运动瓦解以后，表面上沉寂的时期中，英国工人仍然在国内和国际上保持着对民主制度的无限忠诚，因为这是争取自由和民主权

利的斗争基础。他们坚持了建立和保护工会组织的斗争，他们不顾各种限制击退了一心要破坏它们的企图。

贯穿了这一整部史诗的主题是斗争，是对新情况不断地但有时是缓慢痛苦的适应过程。就这样，曾经鼓舞了欧文以及宪章运动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们的理想，重复出现在复兴时期的摩里斯和哈第的光辉业绩中。这次劳工运动的复兴为劳工运动最后阶段中的巨大发展揭开了序幕，这时已经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劳工运动宣布了它要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决心。

或许有人会问，这样一个运动怎么会受到挫败的呢？正如我们所见，其原因至少有一部分在于运动内部的分裂，而最主要的则是帝国主义的腐蚀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工人中间的一些上层分子的影响。这些上层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由于他们所据的领导地位，却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作用。他们为了在目前的社会上取得一席公认的地位，而情愿容忍甚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不仅无视甚至积极支持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这种蜕化堕落，以及它在运动中所造成的分裂和软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老的劳工运动没有能首先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因。

在这段历史所给我们的许多教训中，最重要的就是：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要有一个领导，一个献身于这个目标并且对它的使命有充分科学理解的政党，同时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领导他们进行斗争，领导这个以绝大多数工人阶级为主体、以尽可能多的中等阶级为同盟军的运动。

英国有着一辈光辉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战士，它也有着一个强大而纪律严明的劳工运动。如果单有两者之一——单有群众运动而没有建设新社会的深刻而自觉的愿望，或者单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没有使它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生根——都不可能建成社会

主义。只有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先决条件下，才能实现人民这个世代代梦寐以求的理想，即工人阶级和普通人民战胜资本主义，并且在这片产生社会主义理想的土地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本书资料来源及参考书籍

下面这份从英国劳工运动的卷帙浩繁的文献中选出来的书目是本书的材料来源,这些书对那些想进一步了解工人运动的历史发展的读者可能有些帮助。

I. 总 介

A. L. 莫尔顿著的《人民的英国史》(A. L. Morton, "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 修订本, 1948年出版)从社会主义观点对劳工运动发展期间的英国国内局势作了广泛的论述。

关于运动本身,韦伯夫妇所著《1666年至1920年间英国工会史》(Sidney & Beatrice Webb: "The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1666—1920", 修订本, 1920年出版)当然是最偉大的经典著作之一,并且是极有价值的资料来源,不过本书并没有接受该书中的费边派改良主义的见解。艾伦·赫特著的《英国工会简史》(Allen Hutt: "British Trade Unionism", 修订本, 1952年出版)是一部比较简短的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的著作。

G. D. H. 柯尔和 R. W. 波斯特格特著的《普通人民》(G. D. H. Cole & R. W. Postgate: "The Common People", 1938年出版)有着大量关于经济和社会历史的资料,不过它的见解的价值高低不等。另外一本需要小心对待的具有丰富资料的著作是马克斯·比尔著的《英国社会主义史》(Max Beer: "A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ism", 一卷集, 1940年出版)。

艾伦·赫特著的《这个最后的危机》(Allen Hutt: "This Final Crisis", 1935年出版)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运动发展的令人振奋的著作,它搜集了一部分有价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摘录,这是其他的英文著作中所没有的。

T. A. 杰克逊著的《英国自由的考验》(T. A. Jackson: "Trials of British Freedom", 1940年出版)生动地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历史上的一些最为重要而激动人心的事件。

本书所涉及的大部分时期中的令人鼓舞而良有教益的资料系取自丛书“形成中的历史”(“History in the Making”, 总编辑多纳·托尔[Dona Torr]): 马克斯·摩里斯著的《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Max Morris: “From Cobbett to the Chartists”, 1948年出版); J. B. 杰弗里斯著的《劳工的萌芽时代》(J. B. Jefferys: “Labour’s Formative Years”, 1948年出版); 以及 E. J. 霍勃斯邦著的《工人的转折点》(E. J. Hobsbawm, “Labour’s Turning Point”, 1948年出版)。

由约翰·萨维尔主编的《民主与工人运动》(John Saville, “Democracy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1954年出版)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劳工运动若干方面的饶有价值的论著。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曾经研究并且参与英国劳工运动约达半个世纪之久, 他们的著作和通信对运动的发展具有精辟的见解。

《资本论》(“Capital”)第一卷本身就是有关十九世纪英国的资料的丰富宝藏; 而《马克思恩格斯论英国》(“Marx and Engels on Britain”)则是一部收集了他们关于这个题材的其他著作的有益而流传甚广的总汇。这部书包括恩格斯的著名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Engels: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以及他在1892年该书再版时写的回忆性的有价值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Marx—Engels Correspondence”, 多纳·托尔[Dona Torr]编, 1934年出版; 新版1956年出版)也是一个主要的资料来源。

《列宁论英国》(“Lenin on Britain”)是另一部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的评论著作。这本书是对英国劳工运动深感兴趣的列宁所写的有关英国的文章的总汇。

另一个涉及这个时代大部分时期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著作是提奥多·罗斯坦著的《从宪章主义到工会主义》(Theodore Rothstein: “From Chartism to Labourism”, 1929年出版)。

关于合作运动有许多本历史著作, 其中可能以韦伯夫妇著的《消费合作运动》(Sidney & Beatrice Webb: “The Consumers’ Co-operative Movement”, 1921年出版)和 G. D. H. 柯尔著的《合作运动一百年》(G. D. H. Cole: “A Century of Co-operation”, 1946年出版)最为完备。

关于工会的历史著作更是浩如烟海, 但是有三部由于其质量和完备的内

容值得一提：J. B. 杰弗里斯著的《机器工人》(J. B. Jefferys: "The Story of the Engineers", 1945年出版)；R. P. 阿諾特著的《矿工：1889年至1910年英国矿工联合会史》(R. P. Arnot: "The Miners: A History of the Miners' Federation of Great Britain 1889—1910", 1949年出版)和《矿工：1910年以来的斗争年代》("The Miners: Years of Struggle 1910-", 1953年出版)；以及 R. W. 波斯特格特著的《建筑工人》(R. W. Postgate: "The Builders", 年代不詳)。

II. 分期介紹

現在具体地談談各章中引用材料的出处。閱讀本书的人会发现下面开的这张簡明的书目有些帮助，而且这些书籍一般是比较容易找到的。

第一章：这个时期的大量的背景材料来自 J. L. 哈蒙德和 B. 哈蒙德 (J. L. & B. Hammond) 所著的三部作品：《乡村劳动者》("The Village Labourer", 1913年出版)，《城市劳动者》("The Town Labourer", 1917年出版)和《熟练劳动者》("The Skilled Labourer", 1920年出版)。这些都是学識淵博，热情洋溢的著作，它們的主要缺点在于它們把工人阶级当作牺牲者而不同时当作积极力量来看待。P. A. 布朗在《英国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P. A. Brow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English History")一书中卓越地描繪了英国激进派初期的发展以及法国局势的影响。H. N. 布雷斯福德所著的《雪来·葛德文及其集团》(H. N. Brailsford: "Shelley, Godwin and their Circle", 1913年出版)就这个运动的理論方面作了叙述。

能够搜集到的当代的史料来源也很丰富。G. D. H. 柯尔和 M. 柯尔合編的《威廉·科貝特論文集》(G. D. H. and M. Cole: "The Opinions of William Cobbett")以及威廉·賴特澤尔 (William Reitzel) 根据科貝特的作品写成的傳記体小說《一个农家儿童的故事》("The Progress of a Ploughboy")确实把这位偉大的激进的战士活生生地刻划出来。在賽繆尔·班弗德著的《一个激进主义者一生的变迁》(Samuel Bamford: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a Radical", 两卷集, 1839, 1842年出版)中也有着俯拾皆是的第一等材料，不过要注意，由于作者的立意在于为自己作辯护因而这部书也就受到若干影响。

第二章, 已經在总介中提过的馬克斯·摩里斯著的《从科貝特到宪章运动者》(Max Morris: "From Cobbett to the Chartists")一书对这一时期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梅科伯的《1832—1852年的英国激进主义》(S. Macco-by: "English Radicalism, 1832—1852", 1938年出版)包含了大量有用的材料; 这部书的主要缺点是它沒有把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的界限划分清楚。

H. L. 比尔斯著的《早期英国社会主义者》(H. L. Beales: "The Early English Socialists", 1933年出版)和理查德·潘克赫斯特著的《威廉·湯普森, 1775—1837年》(Richard K. P. Pankhurst: "William Thompson, 1775—1837", 1954年出版)对于早期在欧文周围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作了很好的介绍。关于欧文的最好的一本传记要算 G. D. H. 柯尔著的《罗伯特·欧文的一生》(G. D. H. Cole: "The Life of Robert Owen", 1930年出版)这部书了。

关于宪章运动时期的范本各地流传最广的是馬克·霍佛尔著的《宪章运动》(Mark Hovell: "The Chartist Movement", 1918年出版)和 J. L. 哈蒙德与 B. 哈蒙德合著的《黯淡时代》(J. L. and B. Hammond: "The Bleak Age", 1934年出版), 这两部书都是根据自由人道主义的观点写就的。不幸霍佛耳在全书未完成前就去世了, 最后由 T. F. 陶特(T. F. Tout)續华的那一部分是比较差强人意的。薩尔姆 A. 杜德著的《当英国站起来的时候》(Salme A. Dutt: "When England Arose", 1939年出版)一书在政治上弥补了上述著作的缺陷。

在宪章运动的知名人士所著的书籍中有三本应该不难找到, 并且这三本书也是有助于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了解。不过应该记住, 作者著述这些书籍的目的不仅为了记录史实, 同时也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辯解。这三部书是: 《威廉·罗維特的一生和斗争》("The Life and Struggles of William Lovett", 1876年出版); 《托马斯·庫柏自傳》("The Life of Thomas Cooper, Written by Himself", 1872年出版); 和 R. G. 加米季著的《宪章运动史》(R. G. Gammage: "History of the Chartist Movement", 1854年出版)。

1934年职工大会出版的一本叫作《托尔普德尔的烈士》("The Martyrs of Tolpuddle")的百周年纪念集中有着許多关于那次偉大运动的参加者的

史料和有趣的記述。

第三章：《形成中的历史》（“History in the Making”）丛书第二册，J. B. 杰弗里斯著的《劳工的萌芽时代》（J. B. Jefferys: “Labour’s Formative Years”），对于这个时期作了生动的剖視。

S. 梅科伯著的《1853—1886年的英国激进主义》（S. Maccoby: “English Radicalism, 1853—1886”，1938年出版），该书是前面提到的《1832—1852年的英国激进主义》的續志。

約翰·薩維爾著的《宪章运动者欧内斯特·琼斯》（John Saville: “Ernest Jones, Chartist”，1952年出版）对于琼斯的生平和著作作了精彩的描述，它的特别有价值之处在于它使讀者对不为人所注意的宪章运动后期的情况有所了解。

《1860—1950年倫敦各业理事会史》（“London Trades Council, 1860—1950, a History”，1950年出版），有着关于《劳工議會》（“Junta”）和它在60年代的活动的写照。这本著作是紧紧地根据这个組織的會議記錄写成的。乔治·豪威耳在《劳資冲突》（George Howell: “The Conflicts of Labour and Capital”）一书中闡述了“議會”的观点。

《第一国际的建立》（“The Founding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1939年出版）是一本有关国际工人联合会成立文件的有用的集子。多納·托尔著的《馬克思主义，国籍和战争》（Dona Torr: “Marxism, Nationality and War”，第二卷，1940年出版）也涉及了这个时期的更为广泛的、国际方面的情况。

第四章：这一章是一个新时期的序論，它企图把壟断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它們对工人階級运动的影响等主要方面作一番概述。这一个阶段的名称得自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1917年出版）。

前面已經提到过的恩格斯在1892年为《1844年英国工人階級状况》（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着关于十九世紀末叶的英国及其工人階級的有价值的概括敘述。

美国经济学家 D. A. 威尔斯著的《最近的經濟变化》(D. A. Wells: "Recent Economic Changes", 1890 年出版)对于当时陷于危机的世界资本主义作了生动的描述。另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J. A. 霍布森(J. A. Hobson, 列宁对他的作品评价很高)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展开了深刻的批评,特别是在他的《资本主义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 1898 年出版)和《帝国主义》("Imperialism", 1938 年出版)这两部著作中。

晚近出现的一些价值很大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有 M. H. 多布著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M. H.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1946 年出版),这本书的第七章是叙述十九世纪的;霍勃斯邦关于《十九世纪英国的劳工贵族》(E. J. Hobsbawm: "The Labour Aristocracy in 19th Century Britain")的论文(包含在《民主和劳工运动》["Democracy and the Labour Movement"]一书中)也是这类著作之一,其中有着不少关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史料。

已经提到过的多纳·托尔所著的《马克思主义,国籍和战争》(Dona Torr: "Marxism, Nationality and War")的第一卷是有关帝国主义时期的著作。

第五章:恩格斯的内容充实、见解精辟的论著在这个时期中特别丰富;英文版的佳作已经在总介一节中提到了。

H. 培林以费边派观点撰写的《工党的起源》(H. Pelling: "The Origins of the Labour Party", 1935 年出版)对于 1880—1900 年期间的运动作了系统的论述。本章和其后两章都用了这本书中的材料。

社会民主同盟的一部历史,《英国的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 in Britain", 1935 年出版)这本书对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事件和人物提供了大量有趣而有用的材料。不过,由于同盟的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因此这本书对于事件的分析也有一定的偏见。

上面提到过的 E. J. 霍勃斯邦所著的《工人的转折点》(E. J. Hobsbawm: "Labour's Turning Point")就是专为研究本章和以后数章涉及的时期(1880 年至 1900 年)的作品,它是很有价值的参考书籍。

我们已经大略指出了威廉·摩里斯(William Morris)在英国社会主义历史上的重要地位。E. P. 汤普森著的《威廉·摩里斯:从浪漫到革命》(E. P.

Thompson: "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1955 年出版), 以其精湛的考据和深厚的同情, 使摩里斯解脱了几个世代以来别人对他的误解, 同时提供了大量关于当代局势的有价值的史料。

由 G. D. H. 柯尔主编的《威廉·摩里斯, 百周年纪念集》(G. D. H. Cole: "William Morris, Centenary Edition", 1934 年出版) 是最好也最易获得的摩里斯本人著作的一种选集。

恩格斯在 1881 年为《劳工旗帜》周刊("The Labour Standard") 写的文章中提出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这些文章收集在叫作《英国劳工运动》("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1934 年出版) 的小册子里。

我们关于 1877 年和平运动的记述是根据布赖恩·皮尔斯(Brian Pearce) 在《中欧观察家》("The Central European Observer" 杂志, 1951 年七、八、九月号) 上面写的几篇连载文章写成的。

以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和群众劳工运动的发轫为序幕的这一段时期中有着丰富的自传性的资料。其中包括: 汤姆·曼恩著的《回忆录》(Tom Mann: "Memoirs", 1923 年出版), 和《从单一税到社会主义》("From Single Tax to Socialism", 1913 年出版); 海德门著的《冒险生涯》(Hyndman: "Record of an Adventurous Life", 1911 年出版); 本·提累特著的《回忆和感想》(Ben Tillet: "Memories & Reflections", 1931 年出版); 魏尔·桑恩著的《我的战斗的一生》(Will Thorne: "My Life's Battles", 1925 年出版); 乔治·兰斯伯雷著的《回忆与前瞻》(George Lansbury: "Looking Backwards & Forwards", 1935 年出版); 和 T. A. 杰克逊的《独奏的小号》(T. A. Jackson: "Solo Trumpet", 1953 年出版)。

第六、七、八章: 这几章的资料来源和我们推荐的参考书籍大多数已经在第五章的栏下和总介里提到了。

此外, 多纳·托尔著的《论汤姆·曼恩》(Dona Torr: "Tom Mann") 的小册子是为了写更大的著作而作的前奏, 其中包含有关于这一整个时期的许多有用的材料。

《马克思主义季刊》("The Marxist Quarterly") 上面登载的两篇文章, 一篇是艾伦·赫特著的《工时》(Allen Hutt: "The Hours of Labour", 1955 年一月号), 另一篇是 W. S. 亚当斯著的《英国对 1905 年俄国革命的

反应》(W. S. Adams: "British Reactions to the 1905 Russian Revolution", 1955年七月号), 分别对新工会主义的意义, 以及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鼓舞作了新的分析。

第九章: 1914—1918年的大战的起因和性质在《联共党史》("The History of the C. P. S. U.", 1935年出版) 以及已经提到过的《马克思主义, 国籍和战争》("Marxism, Nationality and War") 第一卷中有所叙述。

威廉·加拉赫著的《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William Gallacher: "Revolt on the Clyde", 1936年出版) 和哈里·波立特著的《我斗争的时代》(Harry Pollitt: "Serving My Time", 1940年出版) 这两部自传式的著作对于工人阶级运动发展中的若干斗争过程作了生动的第一手的描绘。汤姆·贝尔著的《约翰·马克累恩的一生》(Tom Bell: "Life of John Mc Lean", 1943年出版) 也是有关这个时期的有价值的作品。

关于“英国社会党”("British Socialist Party") 的反战政治活动的发展, 李和阿奇波尔德 (Lee and Archbold) 两人的著作是片面和含有敌意的。本书根据当时的史料对此作了修正和补充。

前面提到过的普通历史著作在本章中也有所引用; 这个时期中的最重要的工会历史——由于这个时期正进行着一场“机器工人的战争”("engineers' war") ——也许可以算杰弗里斯著的《机器工人》(J. B. Jefferys: "The Story of the Engineers") 这本书了吧。

第十章: 艾伦·赫特著的《战后工人阶级史》(Allen Hutt: "Post-War History of the Working Class", 1937年出版) 中的最初几章对战后经济萧条期间的劳工运动作了激动人心的叙述和透辟的分析, 同已经提到过的波立特和加拉赫的自传一样, 都是为进一步研究这个时期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索 引

A

- 奥贝尔 Orbell, Harry—201。
 奥布林, 布朗特雷 O'Brien, Bronterre
 ——55, 57, 80, 84, 90, 97。
 阿伯拉罕, 威廉 Abraham, William
 (Mabon)—223。
 奥布林, 威廉 O'Brien, William—
 183—184。
 爱丁堡 Edinburgh—20, 117, 174。
 爱德华兹, 乔治 Edwards, George—
 265。
 爱德华兹, 乔治(间谍) Edwards, George
 (the spy)—40, 42。
 爱迪生博士 Addison, Dr. —286。
 埃耳登勋爵 Eldon, Lord—35。
 艾耳华兹 Isleworth—297。
 《爱尔兰工人》 Irish Worker—263,
 285。
 爱尔兰人 Irish, the —84, 99, 124,
 102—163, 166, 183—185, 266—267,
 269。
 爱尔兰人大同盟 United Irishmen—
 20—21, 25—26。
 爱尔兰市民军 Irish Citizens' Army
 ——267, 285。
 爱尔兰土地联盟 Irish Land League
 ——166。
 埃夫林, 爱德华 Aveling, Edward—
 175, 183, 187, 191, 200, 210。
 奥杰尔, 乔治 Odger, George—113,
 122, 126, 131。
 奥康诺, 弗格斯 O'Connor, Fergus—
 75, 83—86, 90, 92, 96—97, 99, 100。
 阿兰 Allen, H. —154。
 奥里佛 Oliver (the spy)—41。
 “奥林匹克号” S. S. Olympic—231。
 阿兰, 威廉 Allen, William—110,
 113。
 爱姆奈许, 詹姆斯 M'Nish, James—
 79。
 阿诺德 Arnold—32。
 阿诺特, R. 佩季 Arnot, R. Page—
 315。
 阿奇, 约瑟夫 Arch. Joseph—132,
 166, 235。
 奥斯本 Osborne, W. V.—245。
 阿斯奎特 Asquith, H. H.—219。
 奥斯脱雷, 理查德 Oastler, Richard
 ——74, 98。
 阿特金森, 威廉 Atkinson, William
 ——243。
 阿特伍德, 托马斯 Atwood, Thomas
 ——62, 78, 87。
 艾希顿, 塞缪尔 Ashton, Samuel—
 18。
 艾希顿, 托马斯 Ashton, Thomas—
 220。

B

- 北安普敦 Northampton—162。
 本鲍, 威廉 Benbow, William—64, 90。
 邦德菲尔德, 马格雷特 Bondfield, Margaret—234。
 彼得卢 Peterloo—25, 42。
 波尔顿 Bolton—43。
 巴尔福, 亚瑟 Balfour, Arthur—236。
 贝尔, 理查德 Bell, Richard—226, 231, 233。
 伯尔蒙德赛 Bermondsey—264。
 伯恩斯, 埃米尔 Burns, Emile—315。
 布尔什维克 Bolsheviks—271, 286, 290, 292。
 巴恩斯 Barnes, G. N.—227。
 伯恩斯, 约翰 Burns, John—159, 175, 183—184, 189, 192, 196, 198, 204, 207, 209, 213, 220, 227, 229。
 贝尔, 汤姆 Bell, Tom—313, 315。
 波尔战争(南非战争) Boer War—146—147, 172, 211, 225, 226, 233。
 《北方不列颠人报》North Briton—5。
 班弗德, 塞缪尔 Bamford, Samuel—13, 37, 41。
 保护自由和财产协会 Association for Preserving Liberty and Property—19。
 保加利亚 Bulgaria—164。
 伯吉斯, 约瑟夫 Burgess, Joseph—208。
 伯克, 埃德蒙 Burke, Edmund—15。
 巴克斯, E. 贝尔福德 Bax, E. Belfort—174—175, 177。
 巴罗 Barrow—282。
 布里顿 Brighton—297。
 布拉德福德 Bradford—85, 89, 208, 209, 210。
 布拉德福德劳工联合会 Bradford Labour Union—188, 208。
 布兰德莱斯, 吉莱米亚 Brandreth, Jeremiah—41。
 布罗德赫斯特, 亨利 Broadhurst, Henry—158, 192, 206。
 布莱德洛, 查尔斯 Bradlaugh, Charles—162。
 巴黎公社 Paris Commune—132。
 布莱克本 Blackburn—96, 173。
 布莱克斯斐尔德大法官 Braxfield, Lord—20, 21, 23。
 布朗莱, 约翰 Bronley, John—304。
 布朗, 欧内斯特 Brown, Ernest—315。
 布拉奇福德, 罗伯特 Blatchford, Robert—208, 212, 214, 257。
 伯罗斯, 赫伯特 Burrows, Herbert—199。
 布里斯特耳 Bristol—2, 64, 68。
 布雷斯, 威廉 Brace, William—223。
 波立特, 哈里 Pollitt, Harry—279, 291, 305, 315。
 布赖特, 约翰 Bright, John—115, 116, 126。
 保罗, 威廉 Paul, William—315。
 拜伦勋爵 Byron, Lord—32, 39。
 布雷, 约翰·弗朗西斯 Bray, John Francis—50, 53。
 鲍曼, 盖 Bowman, Gay—252。
 伯明翰 Birmingham—8, 9, 18, 41, 60, 70, 71, 78, 79, 82, 87, 89, 124, 168。

185, 292, 305。
 伯明翰政治联盟 Birmingham Political Union——59, 78, 86。
 巴納德堡 Barnard Castle——232。
 保內穆尔 Bonnymuir——42。
 宾宁, 托马斯 Binning, Thomas——190。
 伯納特, 約翰 Burnett, John——158。
 卜内, 約翰 Brunner, John——156。
 布思, 查尔斯 Booth, Charles——155。
 巴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大会 Basl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ference——257, 271。
 比斯萊教授 Beesley, Prof. E. S. ——128。
 波特, 乔治 Potter, George——113, 129。
 普通铁路工人工会 General Railway Workers' Union——204。
 伯特, 托马斯 Burt, Thomas——129, 158, 192。
 巴特西亚 Battersea——209。
 貝文, 欧内斯特 Bevin, Ernest——300, 302。
 《北星报》Northern Star——80, 83, 85, 90, 96—97, 107, 122。
 “不許干涉俄国”委员会 “Hands off Russia” Committee——303。
 編織工 Weaving——3, 11, 27, 31, 83—84, 94。
 貝贊特, 安尼 Besant, Annie——162, 184, 199。

C

查德威克, 爱德温 Chadwick, Edwin——73。
 車間代表 Shop Stewards——278, 281,

283, 285—286, 292, 297, 301。
 查洛 Jarrow——240。
 慈善大力士 Philanthropic Hercules——44。
 查塔姆伯爵 Chatham, Earl of——5。
 船塢、碼頭、水运和普通工人工会 Dock, Wharf, Riverside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204。
 产业工团主义者 Industrial Syndicalist——252—253, 263。
 产业工团主义者教育联盟 Industrial Syndicalist Education League——252。

D

达比 Derby——64, 68, 70, 231, 285。
 都伯林 Dublin——266, 284—285。
 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 Miners' Federation of Great Britain——203, 206, 219, 223, 263, 268, 298, 303。
 大不列颠企业联合会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295。
 大不列颠社会党 Social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231。
 杜德街 Dod Street——182。
 杜德, R. 派尔姆 Dutt, R. Palme——315。
 道尔蒂, 約翰, Doherty, John——45, 67。
 迪耳克, 查尔斯爵士 Dilke, Sir Charles——162。
 东方問題协会 Eastern Question Association——164。
 道格拉斯 Douglas, R. K. ——78。
 杜兰 Durham——67, 111, 131, 195, 203, 219。
 独立工党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147, 209—217, 225—227, 229—
230, 232, 235, 239—244, 247—248,
250, 254—255, 258—260, 273—274,
276—277, 281—283, 287, 289—297,
310—312, 315。

登宁 Dunning, T. J. —130。

多维尔 Dover —297。

顿, 沃尔夫 Tone, Wolfe —25。

戴维斯 Davis, R. —152。

达维特, 迈克尔 Davitt, Michael —
163。

E

俄国革命 Russian Revolution (1905)
—235。

恩格斯, 弗里德利赫 Engels, Frederick
—13, 49, 57, 102, 114, 121—122,
169, 180, 185—186, 190, 204。

俄国十月革命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286—287, 291, 304。

F

腐败的下议院 Rotten House of Com-
mons —76。

芬伯格, 乔治 Finberg, J. —284。

费边社 Fabian Society —181, 191,
207, 209, 211, 215—216, 225, 228, 254,
260, 274。

《蜂巢》Beehive —113, 120, 122, 129。

费尔柴尔德 Fairchild, E. C. —284,
287。

费尔登, 约翰 Fielden, John —74。

法国大革命 French Revolution —9,
14—15, 25。

福克斯顿 Folkestone —297。

法律与自由同盟 Law and Liberty
League —184。

翻砂工人联谊会 Friendly Society of
Ironfounders —40。

翻砂工人协会 Society of Ironfound-
ers —152。

费特斯顿 Featherstone —219。

弗罗斯特, 约翰 Frost, John —89, 90。

反阴谋和财产保护法令 Conspiracy and
Protection of Property Act (1875)
—129。

反征兵友誼会 No Conscription Fellow-
ship —282。

纺织品 Textiles —36, 141, 143。

房租限制法令 Rent Restriction Act
(1915) —280—281。

G

钢 Steel —105。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大会 Copenha-
gen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
ference —257。

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274, 305,
308, 311—316。

《共产党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
—122, 186。

共产国际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311, 314。

工潮调解法令 Trade Boards Act
(1909) —238。

共产主义劳工党 Communist Labour
Party —315。

共产主义统一派 Communist Unity
Group —313。

工党 Labour Party —229, 236—237,
250, 254, 258—260, 272, 274, 287, 303,
305—306, 312—314。

戈登暴动 Gordon Riots —6。

格迪斯, 亚里克斯 Geddes, Alex —

- 315。
 葛德文, 威廉 Godwin, William——
 51—52。
 盖尔, 丹尼尔 Guile, Daniel——113。
 国防法令 Defence of the Realm Act
 (1914)——263。
 戈弗雷, 维尔 Godfrey, Will——262。
 工会法令 Trade Union Act (1913)
 ——246。
 《共和杂志》Republican——39。
 国际工人协会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31, 132, 138。
 国家社会党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284。
 国际社会主义局 International Socia-
 list Bureau ——244, 250, 250, 272,
 287。
 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mmission——275。
 格雷勋爵 Grey, Lord——59, 61。
 格莱斯頓 Gladstone, W. E. ——126,
 132, 162, 192。
 格拉斯哥 Glasgow——31—32, 37, 42,
 70, 77—79, 85, 100, 117, 235, 262, 278,
 281, 285, 288, 291。
 格拉斯哥各业理事会 Glasgow Trades
 Council——117, 288, 304。
 格莱雪西尔 Glasier, Bruce ——242,
 284。
 格雷逊, 维克多 Grayson, Victor——
 242—243。
 格雷, 约翰 Gray, John——50, 53。
 《工人》Worker——282。
 《工人共和国》Workers' Republic——
 285。
 工人阶级全国联盟(圆厅党人) National
 Un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nd
 Others (Rotundists) ——58, 61—
 62, 66。
 工人教育协会 Workers' Education
 Association——240。
 工人联合会 Workers' Union——264—
 265。
 《工人时报》Workmans Times ——
 209。
 工人社会主义联盟 Workers' Socialist
 Federation——311—314。
 戈斯林, 哈里 Gosling, Harry——262。
 钢铁同业联合会 Iron and Steel Trades
 Confederation——301。
 工团主义 Syndicalism ——248—249,
 267。
 谷物法 Corn Laws, ——37, 47, 82, 92,
 96。
 高悉普 Gossip, A. A.——304。
 《公益报》Commonweal——182。
 雇主与工人法令 Employers and Work-
 men Act (1875)——129。
 雇主协会全国联合总会 National Con-
 federation of Employers' Associa-
 tion——295。
- ### H
- 《黑矮子》Black Dwarf——39。
 霍布森 Hobson, J. A.——142, 225。
 海德公园 Hyde Park——103, 124, 187,
 206。
 海德門, 亨利·迈尔斯 Hyndman, H.
 M.——170—172, 174—176, 190, 207
 —208, 231, 244, 256—257, 273, 284。
 哈代, 托马斯 Hardy, Thomas——
 17—18, 22—23。
 汉德逊, 亚瑟 Henderson, Arthur——

- 232, 272, 281, 283, 290.
- 赫尔 Hull——114, 218.
- 霍恩比与克娄斯案件 Hornby v. Close——127.
- 霍恩, 威廉 Hone, William——39.
- 辉格党人 Whigs——1, 3, 48, 59, 61, 63, 65—66, 124.
- 《呼唤》报 Call——284, 287, 288, 289, 290.
- 混合机器工人工会 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45, 268, 302.
- 混合机器工人协会 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110, 112, 113, 119, 130, 132, 152, 195, 221, 222, 268, 278, 286, 302.
- 混合建筑业工人工会 Amalgamated Union of Building Trades Operatives——303.
- 混合矿工协会 Amalgamated Association of Miners——118, 195.
- 混合木工协会 Amalgamated Society of Woodworkers——303.
- 混合铁路雇工协会 Amalgamated Society of Railway Servants——204, 224, 225.
- 混合营造木工协会 Amalgamated Society of Carpenters——119, 303.
- 霍季斯金, 托马斯 Hodgskin, Thomas——50, 53—54.
- 华伦, 查尔斯爵士 Warren, Sir Charles——183.
- 《欢乐的英格兰》Merrie England——212, 214.
- 哈利法克斯 Halifax——96, 109, 114.
- 哈米尔, 弗雷德 Hammill, Fred——196.
- 霍姆斯, 华尔特 Holmes, Walter——315.
- 赫诺将军 Haynau, General——115.
- 哈尼, 乔治·朱利安 Harney, G. J.——79, 99, 100, 120, 122, 202.
- 华纳斯, 格拉姆 Wallas, Graham——181.
- 赫泼本, 汤姆 Hepburn, Tommy——67.
- 汉普登俱乐部 Hampden Clubs——38.
- 《红色共和国》Red Republican——122.
- 赫瑟林顿, 亨利 Hetherington, Henry——61, 75, 82.
- 华生, 詹姆斯 Watson, James——75.
- 亨特, 亨利 Hunt, Henry——39, 41, 56.
- 哈特莱, 爱德华 Hartley, Edward——259.
- 怀特, 乔治 White, George——83.
- 豪威耳, 乔治 Howell, George——113, 122, 126.
- 亨逊, 格雷夫纳尔 Henson, Gravenor——32, 34.
- 欢迎与抗議委员会 Welcome and Protest Committee——121.
- 合作党 Co-operative Party——309.
- 互助会 Friendly Societies——114.
- 合作 Co-operation——51, 53, 62, 113, 114.

J

- 杰布, 约翰博士 Jebb, Dr. John——6.
- 警察工会 Police Union——299.
- 加的夫 Cardiff——218.
- 基德, 塞缪尔 Kydd, Samuel——100, 101.
- 基尔, 哈第 Hardie, Kier——160,

- 192—193, 198, 206, 209—211, 213, 220, 221, 224, 225, 228, 232—233, 235, 242, 260, 265, 272, 317.
- 基尔特社会主义 Guild Socialism——254.
- 紧急时期权力法令 Emergency Powers Act (1919).——303.
- 激进主义 Radicalism——9—10, 18, 28, 39, 58, 146, 153, 160—161.
- 杰克逊 Jackson, T. A.——315.
- 加里波的 Garibaldi——120.
- 加勒尔德, 威廉 Garrard, William——83.
- 加拉赫, 威廉 Gallacher, William——273, 277, 279, 281—282, 288—289, 298, 304, 314—315.
- 监理教派运动 Methodism——4.
- 加米季, 罗伯特 Gammage, Robert——90.
- 济贫法 Poor Law (1834)——63, 72—75, 80, 83.
- 机器工人协会雇主联合会 Employers' Federation of Engineering Associations——221.
- 机器制造业 Engineering——123, 143, 150, 153, 204.
- 剪絨工人 Shearmen——33.
- 結社法令 Combination Acts (1799, 1800)——12, 26, 29, 31, 34, 43—45.
- 加斯特, 約翰 Gast, John——39, 43, 45.
- 《今天》Today——173.
- 伽图街阴谋案 Cato Street Plot——40, 42.
- 《决擇》Take Your Choice——6.
- 建筑工人 Builders——68, 69, 70, 118.
- 建筑工人产业工会 Building Workers' Industrial Union——268.
- K
- 科布登, 理查德 Cobden, Richard——115.
- 坎贝尔 Campbell, J. R.——315.
- 坎贝尔-班纳曼, 亨利爵士 Campbell-Bannerman, Sir H.——236.
- 科貝特, 威廉 Cobbett, William——24, 36, 38—40, 42, 55, 58, 62, 63.
- 寇茨 Coates, W. P.——304.
- 考茨基, 卡尔 Kautsky, Karl——250—251.
- 柯尔 Cole, G. D. H.——254.
- 奎尔奇, 哈利 Quelch, Harry——173, 175, 226, 230, 234, 244, 259.
- 柯尔生, 埃德文 Coulson, Edwin——113.
- 卡恩, 澤达 Kahan, Zelda——257.
- 《矿工的下一步驟》Miners' Next Step.——253—254.
- 庫克 Cook, A. J.——252.
- 柯克伍德, 大卫 Kirkwood, David——277, 282, 297.
- 庫拉叛变 Curragh mutiny——269.
- 柯倫, 彼特 Curran, Pete——147, 208, 232, 240.
- 克莱德工人委员会 Clyde Workers Committee——279, 282.
- 克莱德賽德 Clydeside——195, 231, 252, 276—277, 282, 285, 292, 297, 316.
- 卡莱耳, 理查德 Carlile, Richard——33, 42.
- 克罗福德, 海倫 Crawford, Helen——315.
- 克利夫, 約翰 Cleave, John——76.

82.
科倫河谷 Colne Valley——240, 242。
克魯克斯, 維爾 Crooks, Will——232, 234。
克里默 Cremer, W. R.——113, 122, 126, 131。
克里米亞戰爭 Crimean War——115, 120。
克蘭普 Cramp, C. T.——304。
“快乐乔治号” s. s. Jolly George——305。
克莱斯 Clynes, J. R.——243, 264。
克罗斯莱, 弗雷德 Crowsley, Fred——263。
科林斯, 约翰 Collins, John——87, 90。
克利特娄 Clitheroe——232。
凯麦隆 Cameron, A. G.——306。
坎宁顿 Kennington——71, 99。
肯宁汉-格拉姆 Cunningham-Graham, R. B.——166, 184, 193。
康诺利, 詹姆斯 Connolly, James——263, 266—267, 285。
卡斯尔雷勋爵 Castlereagh, Lord——35。
卡特赖特少校 Cartwright, Major——6, 38, 39。
考文垂 Coventry——285, 292。
- L
- 《喇叭报》 Clarion——209, 213, 239, 257。
理查兹, 约翰 Richards, John——88。
伦敦 London——1, 2, 4, 5, 17—18, 29, 38, 41, 43—45, 62, 64, 68, 71, 78, 100, 108, 118, 123—124, 133, 143—144, 146, 155, 173, 181—183, 199—202, 212, 218, 235, 260, 262, 282, 297, 304, 316。
伦敦革命协会 London Revolution Society——7。
伦敦工人协会 London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75, 77, 82。
伦敦各业理事会 London Trades Council——113, 118—119, 124, 127, 129, 175, 206, 217, 222, 234, 239。
伦敦市议会 London County Council——184, 191, 207。
劳动解放同盟 Labour Emancipation League——167, 174, 176。
鲁德派 Luddites——32—34。
伦敦排字工人工会 London Society of Compositors——152。
劳伦斯, 佩锡克 Lawrence, Pethick——265。
罗德斯, 赛西尔 Rhodes, Cecil——146。
伦敦通信社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17—18, 22, 25。
累恩, 约瑟夫 Lane, Joseph——167, 174。
洛夫累斯, 乔治 Loveless, George——71。
《劳工导报》 Labour Leader——213, 225, 235, 239。
劳工代表委员会 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226, 228—233。
《劳工旗帜》周刊 Labour Standard——168—169, 185。
劳工选举协会 Labour Electoral Association——188, 191—192。
劳工研究部 Labour Research Department——254, 299。
《链环》 Link——199。
劳合乔治, 大卫 Lloyd George, David——159, 225, 237, 246, 279, 281, 283。

299。
 联合王国全国大联盟 Grand National Un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67。
 累基 Leckie, J. V. —315。
 路加德勋爵 Lugard, Lord —146。
 拉金, 詹姆斯 Larkin, James —266。
 兰开夏 Lancashire —3, 9, 32, 40, 45, 67, 84, 86, 88, 94, 99, 110, 119, 124, 195, 212, 219, 285, 299。
 列宁 Lenin, V. I. —137, 140, 143, 156, 171, 225, 231, 241, 245, 258, 270, 284, 307, 311—312。
 林訥耳, 阿弗雷德 Linnell, Alfred —184。
 拉納克郡 Lanark —94。
 兰納萊 Llanelly —262。
 罗奇德尔 Rochdale —285。
 罗奇德尔先锋队 Rochdale Pioneers —114。
 《論人权》Rights of Man —16, 19。
 兰斯伯雷, 乔治 Lansbury, George —163, 175, 216, 234, 247, 255, 265, 267, 272, 291。
 腊斯金学院 Ruskin College —240, 252。
 莱斯特 Leicester —3, 11—12, 185, 258—259。
 雷塞, 湯米 Ramsay, Tommy —111。
 罗斯坦, 提奧多 Rothstein, Theodore —235, 257, 274, 284, 312。
 六条法令 "Six Acts" (1819) —42。
 娄威, 罗伯特 Lowe, Robert —124。
 李維諾夫, 馬克西姆 Litvinov, Maxim —291。
 利物浦 Liverpool —12, 29, 117, 235, 261—262, 305。

罗維特, 威廉 Lovett, William —61, 66, 75, 82, 87, 90。
 腊·希頓, 本杰明 Rushton, Benjamin —83。
 两项法令 "Two Acts" (1795) —24。
 莱因下亚士吞 Ashton-under-Lyne —88。
 里子 Leeds —8, 60, 62, 83, 218, 289。
 罗茲伯利勋爵 Rosebery, Lord —219。

M

密德尔斯布罗 Middlesbrough —209。
 墨地尔·梯德菲 Merthyr-Tydfil —224, 231。
 密德拉納克选举 Mid-Lanark Election —192。
 密德兰社会民主协会 Midland Social-Democratic Association —163。
 莫德司雷, 詹姆斯 Mawdsley, James —151—152, 221。
 穆尔 Muir, J. W. —277。
 馬尔薩斯 Malthus, Rev. T. —73。
 曼恩, 湯姆 Mann, Tom —160, 161, 175, 189, 192—193, 196, 198, 201, 204, 207, 213, 220, 252—253, 256, 261, 264, 268, 302, 304。
 穆尔, 托馬斯 Muir, Thomas —20—21。
 墨菲 Murphy, J. T. —313。
 墨菲, 威廉 Murphy, William —266。
 棉紡业 Spinning —26, 45, 67, 77—78, 151。
 美国革命 American Revolution —14。
 木工和細木工总工会 General Union of Carpenters and Joiners —45。

- 馬格罗特, 莫里斯 Margarot, Maurice
——21。
- 美国内战 United States, Civil War
in——119, 123—124。
- 棉花 Cotton——2, 7, 26, 105, 119, 157,
219, 220。
- 馬洪, 約翰 Mahon, John L. ——175,
190, 193。
- 麦金脱希, 詹姆斯爵士 Mackintosh, Sir
James——15。
- 《梦见約翰·鮑尔》Dream of John
Ball——177。
- 麦克阿瑟, 瑪丽 MacArthur, Mary
——264。
- 麦克杜尔, 彼得博士 McDouall, Dr.
Peter——83, 87, 91, 95, 100。
- 馬考萊 Macaulay, T. B. ——93。
- 麦克累恩, 約翰 McLean, John——252,
257, 276—277, 281, 288。
- 煤矿, 煤矿工人 Coal, Colliers——2,
11, 36, 67, 94, 105, 118, 131, 195。
- 麦克馬納斯, 亞瑟 McManus, Arthur
——277, 282, 313, 315。
- 馬克思, 艾琳諾娜 Marx, Eleanor——
175, 183, 187, 191, 200—201, 222。
- 麦克斯頓, 詹姆斯 Maxton, James——
281—282, 297。
- 馬克思, 卡尔 Marx, Karl——3, 8, 57,
102, 108, 120, 122, 131, 168, 174, 197,
316。
- 曼彻斯特 Manchester ——8, 32, 40—
41, 44—45, 60, 62, 74, 85, 95, 122, 185,
262, 292, 304。
- 摩里斯, 威廉 Morris, William ——
160, 164, 173—178, 180, 189, 217,
316—317。
- 麦克唐納, 亚历山大 MacDonald, Ale-
xander——117, 129。
- 麦克唐納, 詹姆斯 MacDonald, James
——168, 173—174, 217, 228, 230,
234。
- 麦克唐納, 詹姆斯·腊姆齐 MacDonald,
James Ramsay ——215, 226, 229—
230, 233, 242—243, 248, 258, 273, 289。
- 莫雷耳 Morel, E. D. ——283。
- 摩萊·賽繆尔 Morley, Samuel ——
126。
- 摩里遜, 赫伯特 Morrison, Herbert
——303。
- 摩里遜, 詹姆斯 Morrison, James——
68。
- 蒙默思 Monmouth——89, 223。
- 梅賽 Messer, J. M. ——279, 282。
- 馬尼, 里欧·吉柴爵士 Money, Sir Leo
Chiozza——155。
- 煤气工人工会 Gasworkers' Union
——264。
- 煤气工人与普通工人工会 Gas Work-
ers' and General Labourers' Union
——204—205, 208。
- 《每日先驅报》Daily Herald ——283,
305。
- 毛毯党人 Blanke teers——40。
- 碼頭工人工会 Dockers' Union ——
264, 305。
- 莫特赫德, 托馬斯 Mottershead,
Thomas——164。
- 《母夜叉》Gorgon——39, 44。
- 民主管理联盟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283。
- 民主共济会 Fraternal Democrats——
21。
- 民主协会 Democratic Association
——121。

N

- 諾埃耳, 康納德 Noel, Rev. Conrad
— 257.
- 南安普敦 Southampton — 261, 279.
- 紐波特 Newport — 89.
- 諾丁昂 Nottingham — 11, 18, 31—
32, 37, 41, 64, 99, 313.
- 牛頓, 威廉 Newton, William —
110.
- 諾爾兵變 Nore mutiny — 26.
- 諾福克 Norfolk — 265.
- 尼, 弗雷德 Knee, Fred — 239.
- 諾克斯 Knox, W. — 156.
- 紐卡斯尔公爵 Newcastle, Duke of
— 32.
- 紐拉那克 New Lanark — 52.
- 諾森伯兰 Northumberland — 67,
119, 131, 196, 203.
- 奈特, 罗伯特 Knight, Robert —
150—151.
- 南威尔士 South wales — 87, 89, 224,
252—253, 279, 293, 311, 316.
- 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 South Wales
Socialist Society — 312.
- 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 South Wales
Miners' Federation — 252.
- 諾威治 Norwich — 9, 11, 96.
- 农业 Agriculture — 2, 3, 59, 73, 74.

O

- 欧文, 丹 Irving, Dan — 280.
-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 50,
52—53, 54, 57, 68—69, 71, 113, 317.

P

- 皮尔, 罗伯特爵士 Peel, Sir Robert

— 22.

- 潘恩, 托姆 Paine, Tom — 16, 19, 38.
- 批发合作社 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 — 114.
- 平均派 Levellers — 6.
- 皮卡德, 本 Pickard, Ben — 203.
- 潘克赫斯特, 西尔維娅 Pankhurst, Syl-
via — 265, 311, 313—314.
- 皮林, 理查德 Pilling, Richard — 83,
94.
- 普賴斯 Price, Dr. — 7.
- 普勒斯敦 Preston — 96, 108.
- 普雷斯, 弗朗西斯 Place, Francis —
45, 62, 64.
- 普里斯特利, 約瑟夫 Priestley, Joseph
— 7, 19.
- 平民联盟 Plebs League — 240, 252.
- 帕默斯顿勋爵 Palmerston, Lord —
116.
- 皮斯 Pease, E. R. — 226.
- 彭特里奇 Pentridge — 41.
- 皮特, 威廉 Pitt, William — 15, 28,
35.

Q

- 乔埃尼斯 Joynes — 173.
- 鉛玻璃制造工人联合会 United-Flint
Glass Makers' Society — 109.
- 全国保險法令 National Insurance Act
(1911) — 247.
- 全国改革联盟 National Reform Lea-
gue — 124—126.
- 全国工人战时紧急委员会 War Emer-
gency Workers' National Com-
mittee — 272.
- 全国各业統一工会 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 —

- 69, 70, 71, 160.
- 全国建筑工人联合会 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ilding Trades Operatives—303.
- 全国矿工工会 Miners' National Union—117—118, 195.
- 全国劳工保护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abour—67.
- 全国劳工理事会 National Council of Labour—309.
- 全国煤气工人工会 National Union of Gas Workers—200.
- 全国女工联合会 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Workers—264.
- 全国农业劳动者工会 National Agricultural Labourers' Union—133.
- 全国农业工人工会 National Union of Agricultural Workers—265.
- 全国普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 National Union of General and Municipal Workers—302.
- 全国排字工人协会 National Typographical Union—109.
- 全国铁路工人工会 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men—252.
- 全国宪章协会 National Charter Association—90—91, 96, 99, 108, 316.
- 全国职工大会 Trades Union Congress—129—130, 133, 192, 195, 206—207, 213, 220, 224—226, 228, 273, 296, 300, 302, 306, 308—309.
- 《前进》Forward—281.
- 丘吉尔, 温斯顿 Churchill, Winston—261, 279.
- 权利法案协会 Society of the Bill of Rights—6.
- 钱皮恩 Champion, H. H.—173, 183, 188, 191, 192, 201.
- 《穷人卫报》Poor Man's Guardian—49, 55, 58, 63, 66, 69, 79—80.
- 琼斯, 欧内斯特 Jones, Ernest—83, 99—101, 107, 109, 116, 121.
- 琼斯, 威廉 Jones, William—90.
- 乔伊特 Jowett, F. W.—248.
- 乔治, 亨利 George, Henry—167, 193.
- 乔治三世 George III—3, 19.

R

- 《人民周报》People's Paper—107, 116, 122.
- 《人民之声》Voice of the People—67.

S

- 斯巴广场 Spa Fields—40.
- 斯宾斯, 托马斯 Spence, Thomas—39, 51.
- 斯蒂芬斯 Stephens, J. R.—74, 90.
- 斯蒂芬逊 Stephenson, J. J.—244.
- 斯德哥尔摩大会 Stockholm Conference—289.
- 首都激进派联合会 Metropolitan Radical Federation—184.
- 桑恩, 魏尔 Thorne, Will—175, 199, 208, 213, 226, 247, 272, 289.
- 设菲尔德 Sheffield—3, 8—9, 12, 13, 45, 60, 62, 89, 117, 119, 127—128, 282, 285, 305.
- 索福克 Suffolk—74.
- 苏格兰 Scotland—19, 31, 166, 181, 204, 221, 276.
- 苏格兰工党 Scottish Labour Party

- 193, 212。
苏格兰劳工学院 Scottish Labour College—276。
苏格兰土地与劳动联盟 Scottish Land and Labour League —174, 176, 193。
苏格兰人大同盟 United Scotsmen—25—26。
斯赫, 安德里亚斯 Scheu, Andreas—174。
社会民主党 Social-Democratic Party —241, 243, 244, 250—251, 255, 257。
《社会民主党人》 Social-Democrat—251。
社会民主同盟 Social-Democratic Federation—160, 169, 172—174, 184—190, 192, 207, 209—213, 215—216, 217, 225—226, 228—229, 231, 239, 243—244, 267。
社会主义 Socialism —49—51, 53—58, 80, 160, 170, 173。
社会主义工党 Socialist Labour Party —231, 276—277, 288, 312—313, 315。
社会主义联盟 Socialist League —175, 178—181, 190—191, 208, 212, 215。
《社会主义: 它的成长与成果》 Socialism its Growth and Outcome—177。
世界产业工会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249。
司机和加煤工人联合会 Associated Society of Locomotive Engineers & Firemen—268。
三角同盟 Triple Alliance —298—300。
桑基委员会 Sankey Commission—298, 300。
斯开尔文, 威廉 Skirving, William—21。
萨克拉特瓦拉, 沙伯齐 Saklatvala, Shapurji—315。
塞克斯顿, 詹姆斯 Sexton, James—230, 267。
塞里斯伯雷平原 Salisbury Plain—297。
泰勒, 约翰博士 Taylor, Dr. John—83, 87。
梳毛工人 Woolcombers—11—12。
史密斯 Smith, J. E.—68。
圣马太基尔特 Guild of St. Matthew—167。
斯诺登, 菲利普 Snowden, Philip—242, 248, 266, 289。
斯皮恩汉兰德工资制 Speenhamland system—23, 72。
斯皮特海德叛变 Spithead mutiny—26。
圣乔治广场 St. George's Fields—5。
水手和救火员工会 Sailors' and Firemen's Union—204, 208。
萨沃克 Southwark—12。
斯特德曼 Steadman, W. G.—226。
斯图尔特, 包勃 Stewart, Bob—315。
斯塔福德郡 Staffordshire—68, 95。
斯图加特社会主义国际代表大会 Stuttgart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ference—250, 257, 271, 288。
斯特季, 约瑟夫 Sturge, Joseph—97。
斯托克波特 Stockport—30, 40。
施特拉福德激进俱乐部 Stratford

- Radical Club—167。
斯特雷克, 威廉 Straker, William—
304。
斯文队长 Swing, Captain—49。
十小时工作制法令 Ten Hour Act
(1847)—98, 102, 106, 197。

T

- 铁 Iron—2, 7, 26, 36, 141。
托尔普都尔 Tolpuddle—71。
特尔瓦尔, 约翰 Thelwall, John—
22—23。
塔夫谷案件的判决 Taff Vale Deci-
sion—224, 238, 245。
铁路 Railways—7, 104—105。
泰勒, 艾伯特 Taylor, Albert—287。
托利党人 Tories—48, 61, 64, 124,
269。
特拉法加广场 Trafalgar Square—
124, 183—185, 219, 272。
特兰南特 Tranent—25。
提累特, 本 Tillett, Ben—200, 208,
261—262。
铁路职员协会 Railway Clerks' Asso-
ciation—268。
图克, 霍恩 Tooke, Horne—22—23。
图米, 吉姆 Toomey, Jim—201。
托马斯 Thomas, J. H.—267, 300。
唐纳德 Donald, A. K.—190。
汤尼潘迪 Tonypandy—263。
汤普森, 威廉 Thompson, William—
50, 53, 56—57。
陶器工人工会 Potters' Union—68,
72, 75, 109。
塔山 Tower Hill—201, 262。
泰赛德 Tyneside—123。
《泰晤士报》Times—39, 41。

W

- 韋伯, 皮阿特里絲 Webb, Beatrice—
181, 191, 216, 234, 254, 309—310。
韋伯, 悉尼 Webb, Sidney—181,
191, 216, 254, 309—310。
魏茨貝赫 Wisbech—74。
威尔伯福斯, 威廉 Wilberforce, Wi-
lliam—29。
威尔克斯, 约翰 Wilkes, John—4, 6。
威尔斯 Wells, H. G.—254。
沃尔斯通克腊夫特, 玛丽 Wollstone-
croft, Mary—50。
窝尔维克郡 Warwickshire—132。
乌尔威治 Woolwich—232。
威尔逊, 哈符洛克 Wilson, Havelock
—209, 261, 267, 289。
文官职员协会 Civil Service Clerical
Association—266。
《危机》Crisis—64。
伍勒 Wooler, T. J.—39。
威廉斯 Williams, J. E.—173, 183。
威廉斯, 泽法奈亚 Williams, Zepha-
niah—90。
文森特, 亨利 Vincent, Henry—87,
90, 97。
瓦特, 罗伯特 Watt, Robert—21。
五一国际劳动节 May Day—198,
205。
《乌有乡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
—177。
伍兹, 萨姆 Woods, Sam—226。

X

- 新堡 Newcastle—74, 85。
萧伯纳 Shaw, G. B.—181, 210, 226,
254。

行动委员会 Councils of Action——
306—307。
希尔德,丹尼斯 Hird, Dennis——240。
《先锋》Pioneer——68—69。
謝弗特伯爵 Shaftesbury, Earl of
——98。
刑法修正法令 Criminal Law Amend-
ment Act (1871) —— 128—129,
133。
宪法知识促进协会 Society for Promot-
ing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
——7。
西哈姆 West Ham——199, 209, 213。
雪莱 Shelley, P. B.——35, 39。
休谟, 约瑟夫 Hume, Joseph ——44,
82。
希普顿, 乔治 Shipton, George——113。
辛威尔, 伊曼纽尔 Shinwell, Emmanuel
——288, 297。
宪章运动 Chartism——6, 10, 48, 55,
65, 74, 75, 79, 86, 88—93, 96—104,
107—109, 115, 116, 117, 122, 125,
316。

Y

一八八四年改革法令 Reform Act
(1884)——163。
亚伯丁 Aberdeen, ——85。
一八六七年改革法令 Reform Act
(1867)——124—125, 127, 163, 185。
一八七二年投票法令 Ballot Act (1872)
——126。
一八三二年改革法令 Reform Act
(1832)——9, 46, 48, 59, 62—66。
印度 India——2, 116。
英格兰人大同盟 United Englishmen
——25—26。

英国社会党 British Socialist Party
——255, 256, 257, 258, 259, 273, 274,
276, 283, 284, 287, 289, 290, 291。
“议会” Junta——113, 118, 127, 129。
印花布工人 Calico Printers——43。
一九〇八年煤矿法令 Coal Mines Act
(1908)——238。
一九一一年国会法令 Parliament Act
(1911)——246。
约克郡 Yorkshire ——5, 32, 86, 87,
117, 119, 131, 195, 203, 210, 213, 219。
《约克郡工厂时报》Yorkshire Factory
Times——208。
英克品 Inkpin, H. W.——274。
英克品, 艾伯特 Inkpin, Albert——
274, 284, 289, 315。
移民 Emigration——107。
羊毛 Wool——3, 7, 26, 105。
伊普斯威奇 Ipswich——74, 83。
运输工人工会全国联合会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port Union
——261。
运输工人联合会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268。
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 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302。

Z

《资本论》Capital——170, 177, 216。
张伯伦, 约瑟夫 Chamberlain, Joseph
——146, 159, 162。
职工大会总理事会 General Council (of
T. U. C.)——309。
载货吃水线 Plimsoll Line——256。
查腊德, 约瑟夫 Gerrald, Joseph ——
21。
殖民地 Colonies——2, 138, 146—147,

- 234, 235, 270, 295.
- 澤默尔瓦尔德大会 Zimmerwald Conference—275, 284.
- 主僕法 Master and Servant Law—127.
- 蒸汽机工人和机器安装工人协会 Journeymen Steam Engine Makers' & Millwrights' Society—109.
- 蒸汽机制造工人工会 Steam Engine Makers—45.
- 蒸汽机制造工人协会 Steam Engine Makers' Society—110.
- 战时軍需品生产法令 Munitions of War Act (1915)—279—281.
- 《正义报》Justice—172, 175, 188, 235, 239, 257, 284.
- 中央劳动学院 Central Labour College—252.
- 中央劳工撤退委员会 Central Withdrawal of Labour Committee—278, 279.
- 《政治紀事》Political Register—38, 38, 40, 49.
- 《政治正义論》Political Justice—51.